中国近代心理学史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1872—1949）

阎书昌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 (1872—1949)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早在1872年，一位署名"执权居士"的中国人创制过"心理(学)"这一颇具中国文化底蕴的学科名称。晚清传教士在心理学课程开设、著述翻译方面作出了拓荒性贡献。晚清新政之后，近代知识分子、留学生纷纷走上推动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舞台，并铸就了一个"黄金时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一批心理学者依然矢志不渝地展开基础研究和实践工作，延续着心理学在中国的血脉，追逐着"中国心理学"的梦想。

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心理学国际传播的组成部分。其中既有传教士、留学生的引介和传播，亦有国外心理学者来华开展的研究和实践，同时还有一批心理学者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对心理学的贡献。

本书秉持实证史学的宗旨，发掘和梳理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大量的文献资料，它们将改变或丰富学界对这一历程的许多认识，同时也使近代心理学者的追求为心理学事业后继者所铭记。

世纪出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官方微信平台





ISBN 978-7-5444-5643-2

易文网：www.ewen.co

定 价： 50.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09YJCXLX0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1872—1949）

阎书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 1872~1949 / 阎书昌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44-5643-2

Ⅰ.①中… Ⅱ.①阎… Ⅲ.①心理学史 - 中国 - 1872~1949
Ⅳ.①B8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5425号

责任编辑 谢冬华
封面设计 郑 艺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阎书昌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3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643-2/B·0099
定 价 50.00元

序　言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跟世界心理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从古代哲学的怀抱中分化出来的。而其能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心理科学的根本原因，就是科学的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因此，1929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以主席的身份致辞，认为美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没有心理学和心理学家。卡特尔就是以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1879 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科学心理学诞生为标准的，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谓精神哲学或道德哲学，他都不认为是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界公认的我国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则是以 1917 年陈大齐（1886—1983）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

当然，科学不能割断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心理学，但已经具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在我国古代众多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的著作中，对人的知、情、意及气质、能力、性格等诸多方面都有所论及，一些见解卓有价值，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心理学界早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某些挖掘和整理工作，但因为心理学在我国屡遭劫难，1958 年遭大批判，“文革”中更是停止了一切教学与研究工作，人员都下放到农村或厂矿去进行改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被撤销了，所以整理工作未形成气候。直到 1976 年“文革”结束，我国心理学才重新迎来发展的春天，全国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才步入正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于发展中国心理科学的需要，在我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的潘菽、高觉敷两位老教授的倡导下，成立了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学会组织。由于当时迫切需要高校统编教材，国家教育委员会正式发文成立了以潘菽和高觉敷为顾问、主编的共 10 多人的《中国心理学史》高校教材编

写组。编写组成员接受任务后,都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无所依傍,很少借鉴,并且任务重,时间紧。特别是大家心中还另有一件压力极大的事,那就是当时都知道几大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由英国的学者李约瑟替我们写出来并正式出版了。当然,别人为我们写科技史是无可厚非的,但细想之下,又觉得不是滋味,中国人的历史,特别这第一本书,应当由中国学者自己写为好。当时,我们编写组不怕别的国家来写《中国心理学史》,就是担心日本学者会写这类书,因为日本一些学者对中国古籍经典的造诣相当深,日本接受西方的心理科学也比我们略早些,他们是很有条件写这类书的。所幸的是,我们的担忧并未成真。编写组的同仁兢兢业业、争分夺秒,胜利完成了编写任务。这样,我国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高校教材于198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还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空白。

《中国心理学史》问世已经28年了,这门学科在我国也已茁壮成长起来。在其发展道路上,教学与科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具有一定研究水平的中国心理学思想史、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中国现代心理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不断面世,争妍斗艳,为中国心理学史的百花园增光添彩。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阎书昌教授近来撰写的专著《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就是这样一部著作。我阅读后,有以下三点体会愿与大家交流。

第一,阎书昌著《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的历史分期较有创意,也符合我国心理科学发展阶段的真实情况。其宏观视角研究对象的界定,凸显了在中国近代心理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心理学国际传播大背景的影响以及中外心理学工作者互动交流所作的贡献。研究范畴和内容明确,学科史与思想史双管齐下,相得益彰。这项研究意义重大,他在探索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把握特点与规律,总结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成就与贡献,继承和弘扬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同时也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为发展我国当代的心理学提供宝贵的精神动力。其研究指导思想正确,研究方法科学合理。总之,这本新书,对于喜爱心理学或是研究心理学史的人来说,很值得一读。

第二,阎书昌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经济建设与科学追求都有了较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过去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的

事情，现在都可以进行探索。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泛滥，谁有海外关系（包括有台湾、香港、澳门的关系）就很可能被怀疑成特务、间谍，每次运动来了，就可能受到另眼看待，甚至挨整，那些当年学成归国的心理学家大多难逃厄运，在1958年全国对心理学的大批判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他们都首当其冲被批、被斗、被整，有的甚至被整死。他们勤奋刻苦在国外学习的心理学被批成“伪科学”，他们本人被批成“反动学术权威”、“洋奴”、“特嫌”和“历史反革命”。“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他们终于迎来学术的春天，成为学术带头人、博导、硕导，成为国家的宝贵人才。但很遗憾，经过10多年政治运动的折腾，不少优秀的专家已经离世，真令人痛惜！有鉴于此，阎书昌几年来花了很大的力气，下了苦功夫将很多心理学家的事迹与成果陆续挖掘整理出来，收入他的这本专著。这一方面弥补了我国心理学史研究中的某些缺陷，另一方面也弘扬了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博大的仁爱精神！

老一辈心理学家的成果中，荦荦大者有：国际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郭任远，他是唯一入选世界《实验心理学100年》的中国心理学家。他以“反本能”思想为导引，进行了鸟类胚胎发育和训练猫不吃老鼠两个实验，曾引起国际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在世界心理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艾伟、周先庚等心理学家的汉字心理学研究成绩卓著。周先庚还热衷于阅读实验仪器的设计与改良，发明四门速示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心理学研究，开创了我国军官心理测验所及伞兵选拔工作的新局面，为抗日战争训练和提高军事战斗力作出了贡献。儿童心理学家孙国华曾与人合作发表论文《初生儿的行为研究》，这是西方儿童心理学领域一篇重要的文献，长达246页，曾单印成册，列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丛书”。萧孝嵘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于重庆成立了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开展技工训练班招生中的适性心理测验，编制了人事心理参考书索引，组织全国人事管理调查，军官人格品质与政工人员品质的测评，交通与刑事警察、警官心理的测验等工作，团结了全国大部分心理学工作者参加协作，并取得了优良成绩。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阎书昌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评介都以公心公正、公允地对待。如对抗日战争时期，周先庚等全国知名教授及其学生欣然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聘请，担任部队军官心理测

验所所长、测验官、测验员、助理员等这件事,他就是持肯定与赞扬的态度,认为这加强了我国抗日的军事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军事心理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阎书昌为人谦虚、勤奋好学、待人诚恳。他多年来在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任教。近几年来,仅在《心理学报》上就发表了三篇研究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学术论文,新近又在美国 *History of Psychology* 上发表了一篇新作。他治学态度严谨,很重视资料的占有。他为撰写《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一书,曾不遗余力地广搜资料,包括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图书馆去查阅、复印,也到网上花高价去购买。有时为寻求第一手资料,他更是通过各种渠道,不辞辛劳地去拜访资料保管人。如他为寻找周先庚教授的有关资料,从周老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周广业手中获得大量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写到此,我内心充满了对自己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的老师周先庚教授的深深怀念!同时也对清华大学助人为乐的周广业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是他无私地为阎书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才使得广大读者能见到这么令人耳目一新的珍贵史实材料,使我们对中国心理科学发展的理解与认识又提升了一层。今天,面对我国欣欣向荣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我感到非常高兴,为潘、高二老开创的中国心理学史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而高兴。书昌是多年前随我攻读中国心理学史的硕士研究生,看到自己学生的著作问世,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我愿赋诗一首,作为序言的结语吧!

喜看中国心理学史欣欣向荣感赋

潘高二老血汗洒,从无到有开奇葩。

前辈植树荫凉广,后昆攻关意气发。

科学事业无止境,人生岁月一刹那。

齐心圆好中国梦,同登神舟游天涯!

邹大炎

2015年3月18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　　论

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心理学，自清代晚期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在中国知识界获得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融入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之中，并最终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成员之一。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首先是心理学知识体系融入中国现代学术系谱之中，其次是心理学在中国获得自主性发展的空间。前一方面要归功于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工作，后一方面主要归功于一批海外留学生研习心理学回国之后的开创性工作。这批早期心理学者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成果与西方心理学界形成交流和对话，融入国际心理学界的发展之中，还有大量心理学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实践当中。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与变革，这一时期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跌宕起伏，既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有跌入低谷的十年(1937—1946)。自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之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一直占据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相对主导地位，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随着人们对1949年之前中国心理学发展认识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心理学者认识到需要对这一时期心理学的发展史及思想史进行抢救式挖掘和整理，一方面其中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始终未被当代心理学者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很多珍贵历史文献资料面临流失的危险。中国近代心理学文献资料的完整性直接决定着从史实到史识再到史观的逻辑结构牢固性和可靠性。本书试图立足中国近代心理学文献资料，重新建构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在中国发展轨迹的认识和理解，总结近代心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确立他们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而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学术营养和精

神动力。

第一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一、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虽有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并没有从中国文化中直接孕育而生,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心理学史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两部分组成。以往中国心理学史学界对这两部分的划定多以中国历史的分期标准为参照,也就是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断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将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断为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其中又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杆,其前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史,其后至1949年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史。

这种以历史学领域的分期标准来框定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是将心理学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与中国的巨大社会变革联结在一起。其实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及其后的发展虽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紧密联系,但是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遵循着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本书中,作者试图将晚清至1949年之前的心理学发展视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同时也出于表述的简洁性,故将这一时期心理学的发展视为中国近代心理学,1949年之后的心理学则可视为中国现代心理学。①

关于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较为便宜的界定是中国近代心理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事实、特点和规律。但是,这样的界定有三个问题:(1)未能凸显出西方心理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2) 忽视了国外学者在中国开展的心理学工作;(3) 忽视了中国早期心理学家在西方心理学界从事的心

---

① 将中国近代的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延至1949年,这一观点在史学界也早有先声,见陈旭麓著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同时,"modern"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兼有"近代"与"现代"的含义。作者认为,将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历史时期划分断为1949年之前,并不会影响到对该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本质性认识。

理学工作。因此,本书试图以更宏观的视角,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心理学国际传播背景下中国近代心理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事实、特点和规律。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理论性问题,即:何谓中国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边界是否清晰?心理学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心理学或开展心理学研究工作,如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心理学知识,以及民国时期西方心理学者来中国开展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研习心理学后回国开创和发展这一学科,以及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心理学界的研究工作及其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参与情况。由此可见,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存在着融汇,并没有严格的边界,这些东西方心理学的交流和互动在本书被纳入中国心理学的认知框架。可以说,中国心理学并不是专指中国人开展的心理学工作,也涵盖着西方学者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开展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不是专指发生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心理学发展情况,也包括中国学者在西方心理学界开展的相关工作。因此,本书尝试以更宏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心理学并试图厘清其发展轨迹。

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范畴

(一)学科史

中国近代心理学学科在19世纪末至1949年经历了传入、建立和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与中国近代教育革新、政治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梳理中国近代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史实,反思中国近代政治环境、教育背景对心理学学科体制化的影响有其重要意义。

(二)思想史

1. 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

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是第一代心理学家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对于心理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仍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通过对这些心理学家心理学思想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和分析,试图揭示出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

2. 近代心理学中国化的思想研究

近代心理学是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学科,中国引进该学科必然遇到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相关问题,例如心理学术语的翻译与创制问题,心理学对象与方法的文化契合性问题,这些方面隐含着心理学中国化的思想与实践。

（三）活动史

近代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脱离不开一批批心理学者开展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以及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和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以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偏重思想史研究,以总结、概括、诠释心理学思想为中心任务,而忽视了心理学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相关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心理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每项活动何尝不是心理学思想——与心理学发展相关联的思想的体现呢?近代心理学者开展的许多研究和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值得当代心理学者予以重视。

（四）交流史

近代许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参与过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创立和发展工作,但真正意义的近代心理学家多是接受过西方心理学专业训练的留学生,他们在西方心理学界同西方心理学诸多学派的领军人物有过学习经历,并开展过许多原创性的研究,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有过积极的、重要的贡献,但目前中国近代心理学相关研究中对这些贡献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对东西方心理学的交流与互动的分析和探讨,将改变中国近代心理学仅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吸收和传播的传统认识,丰富对中国近代心理学者在西方心理学界的参与情况,以及曾经输出的心理学思想、研究方法和技术的认识。

第二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方法

梁启超曾经指出:“史识是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需要何种观察

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出来。”①从事史学研究确实要观察敏锐，但是如何做到敏锐？敏锐应该来自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自觉系统的应用。中国心理学史学界有多部著作曾讨论和提出一些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本书结合中国近代心理学史这一领域的特点提出以下指导思想和方法。

一、研究指导思想

（一）实证史学取向

实证史学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认为史学研究当以史料为基础，广泛收集资料并给予严格的考证，使之系统化，然后进行概括，以发现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规律，使历史从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记录变为连续的、可以理解的记载。实证史学在中国历经严复、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强调与推崇，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应用。胡适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②在海外留学时曾经学习过心理学而最终从事史学研究的傅斯年，则明确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主张，这促进了实证史学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具有两条主线，其一是学科史，其二是思想史。学科史表现为科学心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实践活动，思想史表现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工作者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其实二者在本质上没有严格的划分和对立，人的实践活动也是人思想的结果，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正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③利用实证史学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史进行研究，其目的是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和严格考证，不断地确定新的事实，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恢复心理学在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原貌。

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中，史料的积累、汇集和整理是基础。自20世

---

①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7.
② 胡适.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M]//胡适. 治学方法.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
③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9.

纪80年代以来,赵莉如、马文驹曾经在这方面进行过开创性工作,并取得巨大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界主要还是依靠赵莉如、马文驹的研究来认识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的。应该说前辈们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也有几位学者继续沿着这条路径开展过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某些领域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的文献搜集和梳理工作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同时它也将是未来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的基础。

(二) 心理学国际传播及文化互动的视角

科学心理学由西方传入中国之后,其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完全独立于西方心理学,而是在与西方心理学的交流与文化互动中发展的。东西方心理学的交流和文化互动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例如,"心理学"一词的"外来语"说和"出口转内销"说,就涉及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日本、欧美之间术语创制的交流与互动。在本书中对"心理学"的创制与确立的讨论被置于文化互动的视角下予以展开。

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边界存在着交融。首先,中国早期的心理学留学生在西方并不是单纯的学习者,同时也是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参与者,其中尤以中国激进行为主义者郭任远为典型代表。其次,西方心理学家也并非置身于中国之外,而是有一些西方心理学家来到中国从事心理学的相关工作,积极参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有西方心理学家将中国文化下的研究成果发表到西方学界,展示出中国文化下心理现象的特点。另外,也有一些中国近代心理学家在中国开展心理学研究工作,具备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研究背景之后移居海外,继续利用中国经验在西方文化之下从事心理学研究,并作出显著的成绩,在西方心理学界发出源自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的声音。例如,戴秉衡以中国人为对象,开展了精神分析实践以及结合中国文化对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修正就是一例证。这些都体现出东西方心理学交流和互动以及心理学国际传播的特点。

二、具体研究方法

(一) 史料考证法

史料是研究或讨论问题时依据的材料。史料考证法是根据事实的考察

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结论。史学家将史料分为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 or original authorities，即一手文献）和二手史料（secondary sources or derivative authorities）。史料也可分为三种：（1）当事人直接的记载与遗物；（2）当事人事后的追记；（3）同时代人的记载。凡是非直接的史料，非原形的史料，经过转手的史料，都是间接史料，即转手史料、二手文献。[①]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的某些研究主题需要对清末以及民国时期的报刊进行检索以寻求证据，同时还要借助一些心理学家个人的档案资料，这些都要使用史料考证法，从中获取证据并提升对一些研究主题的认识。例如，本书对“心理学”一词创制的溯源问题，对抗战时期军事心理学的研究，等等。

（二）纵横剖析法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既有纵向结构又有横向结构，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之进行剖析，将会得到更全面系统的认识。例如，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成就，一方面可以按照各个心理学家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认识进行横向剖析，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各个心理学家取得的成绩和贡献，按照心理学分支领域进行汇总和分析。

（三）系统比较法

系统比较法是指通过比较历史现象来获得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方法。没有比较，历史研究就难以获得深入的认识。系统比较既可以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也可以通过对一类历史现象（事实）内部的不同形式或阶段进行分析比较。颜永京和丁韪良在清末心理学传播过程中都有重要贡献，分别出版了《心灵学》（上本）和《性学举隅》，对这两部著作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它们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史学价值。颜永京凭一己之力在清末开启的汉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工作，通过其前期翻译《肄业要览》和后期翻译《心灵学》（上本）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心理学知识体系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后，汉语心理学术语创制的特点和规律。

（四）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最初是社会科学家借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对历史文献

---

①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0－113.

内容进行内容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创刊于1922年的《心理》杂志是中国创办的亚洲第一份心理学专业期刊,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代表着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的早期开拓,其文章背后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心智,蕴含着他们对中国心理学的追求,借助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意义

人不能没有自己的过去,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学科也不能割断它的历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的史学研究,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虽有式微的迹象,但是它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晚于西方,而且中国心理学在近代史上的发展更是曲曲折折,其经验和教训尤为重要,应该成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学自我认同过程中的组成部分。

一、整理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事实

作为一门知识体系的心理学的传入开启了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1949年之前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汇聚着西方传教士对心理学的传播,中国留学生海外研习心理学,以及中国近代心理学建立和发展的诸多事实和材料,它们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历史痕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诸多特点和规律蕴藏其中,如果不能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的积累和梳理,就无法真实再现心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更谈不上获得深刻的理性认识。只有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整理和发掘出历史事实,才能够去探索和揭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无限接近和恢复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原貌。

二、揭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研究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是将心理学在中国近代发展的历程置于近代

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分析中国心理学与社会变迁的关联性,以及学科自身发展中的历史事实,进行综合、归纳、概括,进而揭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特点。同时,以事实和特点为依据,通过独立思考,探索并发现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三、总结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成就和贡献

在实现并完成上述任务的基础上,还要总结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成就和贡献。虽然中国的科学心理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由于受到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再加上许多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心理学领域进行了颇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成果。

四、继承和弘扬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科学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学术自身还是学术精神,都是需要传承的。中国近代心理学家在1949年之前,奠定了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尤其是抗战爆发前创造出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部分研究成果曾经达到与西方心理学交流和对话的高度。如果说近代心理学家为当代留下了一笔遗产的话,它既包括有形的、文本化了的学术思想遗产,还包括无形的科学与人文精神遗产,即心理学国际传播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中国本位精神、实践精神、开创精神等。中国近代心理学家承担起了他们的历史责任,这种担当的精神在中国心理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章　西方心理学的早期传入（1872—1902）

第一节　中国对西方心理学的早期接触

一、中国人对心理学的早期接触

（一）早期在西方学习心理学课程的中国人

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该校于1842年迁至香港，1850年解散。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1847年，就学于此校的容闳（1828—1912）、黄胜（1827—1902）和黄宽（1828—1878）跟随请假回国的布朗赴美留学。在布朗和其他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他们三人进入马萨诸塞州莫森学校（Monson Academy）读书，这是一所预备学校。容闳等三人于1847年进入该校英文班，为进入大学深造做准备。在第一年里学习算术、文法、生理、精神哲学等课，其中生理和精神哲学两科是由一位女教师丽贝卡·布朗（Rebekah Brown）讲授，精神哲学课程的教材是厄珀姆（Thomas Cogswell Upham，1789—1872）的著作《精神哲学原理》（*Elements of Mental Philosophy*）。①

颜永京（1838—1898），字拥经，原籍山东，生于上海。他幼年时入私塾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1848年进入美国圣教会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① Yung, W. (1909). *My Life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Transcribed by Cassandra Bates, 2006).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enry Holt & Company, p. 10.

Boone,1811—1864)在上海南市创办的学堂读书。1854年,年满15岁的颜永京跟随其英文教师波茨(Points)赴美留学。经过两年左右的入学准备,颜永京考入哥伦比亚语言学校。1857年又升入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建阳学院(Kenyon college,又译凯尼恩学院),于1861年毕业。在颜永京毕业前,1860年秋或1861年春,他学习过海文(Joseph Haven,1816—1874)著的《精神哲学》(*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课程。该课程的学习对颜永京产生了深远影响,回国后,他于1889年将海文这部《精神哲学》的上半部分翻译成《心灵学》(上本)并予以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心理学译著。[①]

心理学在美国作为一门知识体系或学科,是在"intellectual philosophy"(智识哲学)的基础上增加"情感"和"意志"两部分内容之后形成的,最早称为"mental philosophy"(精神哲学,亦译为心灵学)。在精神哲学这一领域,厄珀姆曾于1831年出版过两卷本的《精神哲学原理》,他的著作在美国大学和预备学校广为使用,它被誉为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著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之前最好的心理学教材。[②] 施马科(Samuel Simon Schmucke,1799—1873)于1842年出版过《心理学或者精神哲学原理》(*Psychology, or Elements of Mental Philosophy*)一书。[③] 同年,菲斯克(Nathan Welby Fiske,1798—1847)出版了《问题体的精神哲学或心理学纲要》(*Outlines of Mental Philosophy or Psychology in a System of Questions*),正文中直接使用"psychology"达14次,其中专设一个问题,即使用"psychology"来命名通常称为"mental philosophy"的科学分支有何优势?该书实际上是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当时用于"mental philosophy"课程的教学资料,书中列出的均是提出的问题。[④] 维兰德(France Wayland,1796—1865)于1854年出版过一本《智识哲学要素》(*The Elements of Intellectual Philosophy*),限于教育领域智力方面的讨

---

① 赵莉如. 有关《心灵学》一书的研究[J]. 心理学报,1983(4): 380-388.

② Roback, A. A. (1952).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York: Library Publishers, p. 50.

③ Lapointe. F. H. (1970).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erm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5(7): 640-646.

④ Fiske, N. W. (1842). *Outlines of Mental Philosophy or Psychology in a System of Questions*. Amherst: J. S. & C. Adams, p. 2.

论。海文于1857年出版了《精神哲学》，其文笔优美，通俗易懂，印刷版本众多，影响甚广。在海文的著作里已经明确提道，“为了将关于心灵的科学同其他科学区分开来，需要使用更精确的限定性的术语，现在，‘psychology’作为这样的一个术语正逐渐被人使用”。[①] 在当时，“mental philosophy”就是“psychology”，只是“psychology”一词还未被广泛使用。因此，容闳、黄胜、黄宽、颜永京是在美国最早接触到心理学的中国人，只是容闳等人回国后没有从事与心理学相关的工作，唯有颜永京进行过心理学著作的翻译工作。

（二）1868年“psychology”**在汉语语境中的首次出现**

“psychology”一词进入汉字文化圈要早于它所指的学问本身，就目前所知，该词最早见于1868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在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第三卷)，其汉译名为“灵魂之学”、“魂学”及“灵魂之智”。“psychologic”和“psychological”两个形容词，则被译作“灵魂学的”、“论灵魂的”。也就是说，若去掉“的”字，“灵魂学”、“论灵魂”也可看作是“psychology”的译名。[②] “psychology”是由“psyche”和“logos”合成而来，“psyche”的本意即为灵魂，可以说罗存德用汉字“灵魂学”将“psychology”的本义对应翻译出来，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因素，该译称未能融入中国的汉语语境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三）1872**年“心理(学)”学科名称首次出现在中国**

1872年11月28日，一位署名“执权居士”[③]的中国人在《申报》上发表《论西教兴废》一文，讨论西方宗教受到科学兴起影响而衰落的情况。文中写道：

---

① Haven, J. (1858).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Boston: Gould & Lincoln, p. 16.

② 聂长顺，王淑贞. 近代“心理学”的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M]//冯天瑜. 文化论丛(2012年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87-303. 王彩芹. 斯宾塞中译本《肄业要览》译词考[J]. 或问，2011(21)：91-116.

③ 遗憾的是，目前还查找不到“执权居士”真实姓名和身份的线索，只能付之阙如。这主要是由于他使用化(笔)名所致。就“执权居士”这个名字而言，“权”是中国古代度量衡中的衡器，俗称“秤砣”，“执权居士”本人取意为自己是掌握着判断事物标准的人。“居士”在晚清时期往往是一些文人雅士的自称。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判断，“执权居士”和“真实之士”当时可能居住在上海或其附近，而且“执权居士”是一个比较熟悉传教士及西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当时有英文报纸曾对《申报》发表“执权居士”的言论进行批评，1872年12月13日《申报》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以上信息可供学界同仁参考，以备查证和补充。

余前与一西人谈及耶稣、天主两教之事,闻西人幼时不学西教之义理者虽鲜有之,及人既冠能明理之后而又信其教者亦鲜有也。推其原,泰西国中上古时学术未能大兴,……近数百年以来,学术日盛而教事日衰矣,何者?缘西教所论之道往往有悖于人理。虽彼之化学、天文、格物、心理各学亦皆有所以惩教道之假讹焉,故此学之越兴,而教道之越废矣,……中华之世只有一正教而已,虽格物、化学、天文、心理等事或盛行,而教犹必中立为孔子之教,我谓西人亦必有以知之也。①

这里的"心理"与其后的"学"组合在一起就是"心理学",尽管受当时中国文言文表述方式的影响,将"化学、天文、格物、心理"进行两字一组式的排列,而没有将"心理学"三个字并列在一起,但是此处的表达与"化学、天文学、格物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这样的现代语言表达方式具有同样效果。另外,"化学"一词作为学科名称是1840年首创于中国,"化学"、"天文(学)"、"格物(学)"作为学科名称在"执权居士"之前已经见诸报端,如1872年8月1日第80号《申报》上的《拟制造局新刻西学书十三种总序》一文中介绍了化学的情况,1872年9月26日第128号《申报》上的《书中西闻见录后》一文中称,《中西闻见录》"杂录西国近事,以及天文、地理、格物之学,议论宏通,皆有所据"。因此,无疑"执权居士"在这里就是用"心理(学)"来称呼一个学科的。同一篇文章中,"执权居士"一次在学科意义上使用"心理(学)",一次是将"心理"用作专有名词,这说明"执权居士"是有意识地使用"心理"与"心理(学)"。不过准确地来讲,这是中国知识界带有"昙花一现"的色彩而使用了这一名词,因为随后有一位西方传教士以"真实之士"为名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质疑"执权居士"有关西方宗教兴废的观点时也提到这一学科,却使用了"既知格物、天文、性理各学者……"中的"性理(学)"来指代它。② 由此可见,当时"心理(学)"和"性理(学)"并没有定制,而是作为同一个学科的不同名称来使用。

在目前发现的"执权居士"使用"心理(学)"一词的历史事实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心理学"是不是指"psychology"。因年代

① 执权居士.论西教兴废[N].申报,1872-11-28(182),2.
② 真实之士.辨论西教废兴书[N].申报,1872-12-5(187),3-4.

久远,难以找到直接证据,因此需要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上。19 世纪上半叶,英文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最初其名称为"mental philosophy"。英文世界里于 1840 年第一次出现标题中含有"psychology"一词的著作,[①]其后不断出现以"psychology"进行称呼的心理学著作,至 1855 年,斯宾塞出版《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海文 1857 年出版《精神哲学》,因此,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psychology"在英语世界里作为学科名称广为使用。"执权居士"在《论西教兴废》一文开篇即提到他曾与一个西方人谈论基督教、天主教的事情,因此,"执权居士"通过西方人对西方文化是有所接触的,而且传教士罗存德编著的《英华字典》在 1868 年出版之后销售、传播甚广,因此 1872 年"执权居士"很有可能接触到"psychology"这个词。

"执权居士"整篇文章的立论是西方科学的兴起导致宗教的衰落:"近数百年以来,学术日盛而教事日衰矣,何者?缘西教所论之道往往有悖于人理。"[②]由此看来,"执权居士"是将化学、天文(学)、格物(学)、心理(学)放在西方科学兴起的背景下来谈论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心理(学)应带有自然科学倾向。另外,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尽管格物学与格致学作为学科名称有些混乱,但是其主流为格物学,被用来指物理学(physics),格致学指科学(science)。尤其是"执权居士"和"真实之士"将"格物(学)"与"化学"相提并论,这里应该是指物理学。我们认为,随后出现的"心理(学)"和"性理(学)"是指偏科学性质的学科,而不太可能是指带有思辨性质的"philosophy"(哲学)。尽管"执权居士"《论西教兴废》一文并非专门论述心理学,但这并不能否认心理学学科名称包含于其中的事实。同时这也反映西学东渐过程中一门知识体系以西方传教士为中介向中国传播的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地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输入的。

综上所述,在不完全排除"执权居士"与"真实之士"所用"心理(学)"和"性理(学)"指称"mental philosophy"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其最大可能性是指称"psychology"。而且即使是指称"mental philosophy"的情况,也不足以否定"执权居士"是用"心理(学)"来称呼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因为在 19 世

---

① Fay, J. W. (1939). *American Psychology Before William Jam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 96.

② 执权居士. 论西教兴废[N]. 申报,1872-11-28(182),2.

纪中期,“mental philosophy”和“psychology”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

二、中国早期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教会学校

(一) 登州文会馆

在我国最先开设心理学课程的学校是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英文校名Tengchow College,校址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市),创办者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狄考文于1864年1月达到山东登州开始传教,并于同年8月开始招收贫困孩子开办蒙养学堂。1873年狄考文扩充蒙养学堂,添办正斋,使之成为包括正斋(中学程度)和备斋(小学程度)两级制的学堂。至1876年正式定名为登州文会馆,一直到1904年登州文会馆与山东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迁至潍县(今山东潍坊),改名为广文学堂(1917年后逐步扩展为设在济南的齐鲁大学)。狄考文从1876年起,把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升格为书院,分备斋(三年)和正斋(六年)两个学部,一共设有九年的课程。其中在正斋第六年,要学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和富国策(政治经济学)。这是目前学术界知道的心理学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最早开设。① 狄考文发给1876年首届毕业生李青山等三人的文凭中就列有“心灵学”课程。②

狄考文在1881年2月14日向美国长老会正式提出把文会馆改为大学的计划书中有八条具体计划,其中第三条称书院学制六年,课程中包括“mental philosophy”(心灵学)课程。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批准了该计划,但是校名暂不变仍称文会馆。③ 在19世纪末以前,严格来说,这所学校的基本性质还属于中等教育。④

(二) 圣约翰书院

稍晚于山东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理学课程的学校是上海圣约翰书院,它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在培雅书院(Baird Hall)和度恩书院(Duane Hall)两校合并基础上成立

---

① 王元德,刘玉峰.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1891年)[M]//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225.

② 韩同文.广文校谱[M].青岛: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10.

③ 顾长声.狄考文[M]//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91.

④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75.

的。该校于1879年9月开学,由中国牧师颜永京主持教务,并讲授心理学课程。1880年2月3日《申报》发表了一则《圣约翰书院告白》的招生告示,称:"美国耶稣教传教公会在万航渡新设圣约翰书院,教习英文、中国文艺经书以及西国名院所习各书,即天文书、地理书、地质书、万国纲鉴、万国公法、算学、格致学、化学、辨实学、心学、伦学、圣教明证学、音乐书。延请教读西儒四位,中国在庠先生三位,司理衣膳先生一位。……"[①]此处将"心学"列在这里并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心学,而是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学科,即颜永京开设的心理学课程。1889年颜永京翻译出版了《心灵学》(上本),其内容是海文原著的上半部分。[②] 圣约翰书院先后设立文理学部、神学部、医学部和预科。"1904年后,改组为完全大学,该校重视心理学教学的传统一直保持着。西学斋正馆普通科规定第三年开设心理学课程。1911年进一步规定文艺科和医学科均开设实验心理学。""在该校1912年招生简章中,关于应用心理学一项有如下说明:高级生上下两学期读教员宣讲以及练习试验方法、问题应对,每礼拜三小时。课本用铁去纳(今译铁钦纳)所编之'实验心理学',史乞登(今译斯特拉顿)所编之'实验心理学'及其进化参考书则用孟斯德堡(今译闵斯特伯格)所编之'心理与生命',麦歇而所编之'审美学要旨',路史(今译罗斯)所编之'社会心理学',少恩大爱克(今译桑代克)所编之'教育心理学'及'心理学比较',孟斯德堡(今译闵斯特伯格)所编之'治心术',老治(今译洛奇)所编之'生命与物质',勃欧拿生所编之'天演进化',路司所编之'中国改革'等书。是课之所需者学生须能独出心裁作长篇论说关于中国教育或社会之心理学者。""从1904年到1913这十年间,在圣约翰大学列为教材的西方心理学专著尚有:哈拉格'心理学'、雅各(今译耶基斯)'心理学',乾姆司(今译詹姆斯)'心理学概要',墨道格(今译麦独孤)'生理的心理学',梅亚(今译梅耶)'实验心理学'。"[③]

此外,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早期教会学校还有美国传教士谢卫楼(Davello

---

① 圣约翰书院告白[N]. 申报,1880-2-3(2431),6.

② 马文驹教授曾从颜永京后人家藏的此书中发现一张当年发行时加入的铅印卡片,上面写道:"近因身体违和,不能校辑自如,所以下本未同时刊刻。然断不至久延时日,愿诸君共谅之。颜永京具。"卡片背面为英文的同样内容。马文驹. 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39-46.

③ 马文驹. 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39-46.

Zelotos Sheffield,1841—1913)任校长的通县潞河书院。潞河书院前身为1868年开办的潞河男塾,1886年改为潞河中学,1893年升格为书院。当该校第一批学生于1892年毕业时,他们就已学过精神哲学课程。谢卫楼用中文编写过不少教科书,1911年出版了《心灵学》。潞河书院后改称华北通州协和大学,后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于1919年改称燕京大学。

第二节　颜永京与《肄业要览》、《心灵学》

颜永京1862年回国,先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任翻译,此后相继任职于同文书局、上海租界工部局。同时,他研究神学,参加了基督教日校和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的工作。1871年他正式任牧师,在武昌筹建文华学堂,后来扩充成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嗣后称华中大学。他在武汉一带兴学布道12年,1878年回到上海,与圣公会主教施若瑟一起改建圣约翰书院,颜永京任院长八年,主持院务并兼授心理学等课程。颜永京翻译出版《心灵学》(上本)之前,他还翻译过斯宾塞的《肄业要览》(*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他在1885年从圣约翰书院退职后,担任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的牧师,同时编辑了一些中文宗教书籍。1886年他出任基督教会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即益智书会)委员,参加编辑工作。另外,颜永京十分重视引介国外的教育改革经验,编写了用于启蒙教育的读物。①

一、《肄业要览》

《肄业要览》作为一部教育著作,其中涉及大量心理学知识以及心理学在教育中应用的问题。颜永京在该著作中有一条重要的译者注:"按西土,身具有形之肢体,肢体各有其用。心有无形之心才,心才亦各有其用。形体不止一,心才亦不止一。心才之要者,即悟、视、闻、臭、尝、摸、记、像、思、度、断等养身卫身之计,即衣食、习武艺。练心才之计即肄业。"在后文中,颜永

① 杨鑫辉,赵莉如.心理学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05-107.

京也曾在提及“心才”时，写明“心才包含觉、悟、记、思、像、度、断等，其发动有定理，有次序”。[①] 在这段短短的文字里，颜永京阐述了心理(mind，译为“心才”)具有无形性、功能性的特征，以及心理现象种类划分和发展的顺序性。他将教育(译为“肄业”)看作是对人之心才的培养和训练，界定了心理与教育的关系。也正是在此书中颜永京首次将“psychology”翻译为“心才学”。受斯宾塞著作中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颜永京将各种心理现象看作是具有养身卫身的功用。《肄业要览》在晚清时期有过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影响，19世纪末曾在《湘学新报》(后更名为《湘学报》)上发表，部分内容也曾被裘昌龄改写成白话文发表于《无锡白话报》(后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

二、《心灵学》

颜永京所译《心灵学》(上本，见图2-1)的原著作者海文是一位牧师、教师和学者。1850年之前海文主要从事神职工作，因其哲学和神学思想出众，1850年被聘为阿姆赫斯特学院的精神和道德哲学(Intellectual and Moral Philosophy)教授，自此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858年受聘于芝加哥神学院，教授“系统神学”课程。1874年因患伤寒病逝。1857年他出版的《精神哲学》是19世纪后半叶美国高等教育该领域最好的教材之一。此书组织有序，风格简洁明了，而且毫无当时的华丽文风，因此被誉为心理学前实验时期(pre-experimental period)最好的教材之一。此书出版后成为这一领域最流行的教材，乃至1883年版的出版者提到，如此一版一版地重印致使印刷用的铅版都用坏了。[②] 此书共分绪论和三



图2-1 颜永京译《心灵学》封面

① 史本守. 肄业要览(颜永京，译)[M]//袁俊德，辑. 富强斋丛书续集(第卅册). 小仓山房校印，1901：2，26.

②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07-108. G. F. Vaughn. Amherst professor Joseph Haven and his influence on America's great social critic, Thorstein Veblen, *Historical Journal of Massachusetts*, Winter 2006, See in http:// find articles. com/ p/ articles/ mi_qa3837/ is _2 00601/ ai_n17187222/.

编内容。

绪论中第一章为心理科学(mental science)的性质与重要性;第二章为心理能力(mental power)的分析与分类。

第一编为智识能力(intellectual faculty),其中初级主题分三章,第一章是意识,第二章是注意,第三章是概念,然后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感知能力(presentative power),主要论述感觉和知觉;第二部分为表征能力(representative power),分两章论述记忆和想象;第三部分为反省能力(reflective power),分两章论述综合过程(概括化)和分析过程(推理);第四部分为直觉能力(intuitive power),分四章论述直觉的存在与性质、直觉形成的真理和概念、美的概念和认识、正义的概念和认识。这一编的补充主题分两章,其一是人类智慧不同于兽类智慧,其二是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某些状态对心理(mind)的影响。

第二编为情感(sensibilities),其中初级主题分两章,第一章是情感的本质、困难和重要性,第二章是情感的分析和分类。其后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简单情绪,又分两章为本能情绪和理性情绪;第二部分为情感(feeling),分两章为仁爱的情感和恶意的情感;第三部分为欲望,分四章,第一章为欲望的性质和分类,第二章为生理引发的欲望,第三章为心理引发的欲望,第四章为希望和恐惧。

第三编为意志(will),初级观察分为七章:意志的性质、意志与其他官能的关系、意志的自由、同前者相关联的问题、从与某些宗教教义的关联看意志的原则、意志的力量以及历史上关于意志自由之争的概要。①

颜永京《心灵学》(上本)的目录为:

心灵学凡例:第一章　论心灵学之为何及其紧要处(共两段:心灵学之为何、心灵学之紧要处)、第二章　论心灵之诸才及诸才次序(共两

① Haven, J. (1858).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Boston: Gould & Lincoln.

段：心灵之诸才、心灵诸才之次序)；

卷一 论智：开宗第一章 论内悟、开宗第二章 论专想、开宗第三章 论专意；第一题 论呈才(共六段：达知为何、达知用之逐节、物之内性外状取其相似处以定等类、达知之体及各体之用、五官各以何传、五官之可靠)、第二题 复呈才：引端、第一章 论复出复认才(共十段：复出才之为何、复出之凭何法、复认才之为何、复认才之用、复认才与他项才有何联属、习练记、疾病有害记、记有助人之快乐)、第二章 论幻像(共六段：幻像之为何、幻像与他才有何异同、幻像以形体之物为本、幻像之为才、幻像之用、习练幻像)；第三题 思索：引端、第一章 论汇归(共两段：汇归之为何、汇归续论)、第二章 论分核(除引端外共分四段：分核之用、辨实之分别、立希卜梯西以助辨实、辨实之格式)；第四题 理才：第一章 论理才之为何、第二章 论原有之实及原有之意绪(共两段：原有之实、原有之意绪)、第三章 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共两段：艳丽之意绪、识知物之艳丽)、第四章 论是非之意绪及识知是非(共两段：是非之意绪、识知是非)。①

颜永京在《心灵学》(上本)的序言中提到他翻译海文著作的初衷。他说："西国论心灵学者，不一其人，而论法各异，予独爱名儒海文氏之作，议论风生，考据精详，窃取以为程式，而译言之……"在此序中，颜永京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心灵和心灵学(即心理和心理学)，以及学习心灵学的重要性和译书经过。他说：

盖人为万物之灵，有情欲、有志意，故西土云人皆有心灵也。人有心灵而能知、能思、能因端而启悟、能喜忧、能爱恶、能立志以行事，夫心灵学者，专论心灵为何及其诸作用。

夫故备详其义，学者当以之为根本也，西国书院之例，童生肄业凡四年，至季年知识宏开，然后从事于此。余昔游学美国曾读之，而知其书之裨益良多，前在圣约翰书院曾逐日将大略翻译汉文教授后学，而学

① 颜永京，译. 心灵学(上本)[M]. 上海：益智书会，1889，目录：1-3.

> 者似乎得其益处，予以为凡肄业者欲立为学之本，不可不读是书，爰将前译者，选词考义，补辑成书，颜曰心灵学。[①]

用“心灵学”来翻译“mental philosophy”并非颜永京首创。早在1875年，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灵学课程时就使用了这一名称。狄考文主张在中国办教育以促进基督教传播。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外使用中文名字“益智书会”)，狄考文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之后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中文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中所列书目中有“mental philosophy”科目。[②]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随后召开了几次会议，达成的决议中称，凡是已经出版过相关书籍，或已经着手准备编写，或愿意承担编写教材任务的人，都可以与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联系相关教材的撰写事宜。[③] 颜永京1886年参加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辑工作，并任该会委员。[④] 可见，在颜永京所译《心灵学》(上本)出版之前，他与狄考文曾同任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狄考文使用过的“心灵学”一词应该不会陌生。

三、颜永京与心理学早期术语创制

(一) 颜永京心理学术语的创制

作为较早系统接触过西方心理学的中国人之一，颜永京积极向中国传播西方心理学知识，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莫过于心理学术语的翻译问题。正如他在《心灵学》(上本)序中所言：

> ……其中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已达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字，勉为联结，以创新称谓。读是书者，从外面以窥，似属模糊莫辨，而精心以究，不能贯彻由来，庶其谅之……其间文气

---

① 颜永京，译. 心灵学(上本)[M]. 上海：益智书会，1889，序：1.

② The prepar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books (1880). *Chinese Recorder*, 11: 140. List of school and text book (1881). *Chinese Recorder*, 12: 95.

③ 韦廉臣.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1890)[M]//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86 - 90.

④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06.

或不雅驯,所创之称谓或不的确,实由创译之故。后有博学君子,将是书精益求精,译文进于美备,是则予之所深望也夫。①

颜永京的翻译工作基本上是意译,无论是在《肄业要览》还是在《心灵学》(上本)中,他都会将大段英文用文言文言简意赅地表述其基本内容,但是他无法回避一个学科的专业术语。专业术语是学科的基石,但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没有相应的术语可以供颜永京用来翻译西方心理学,在这个局面之下,唯有创制汉语心理学术语的路可走。颜永京不畏艰辛,以一己之力为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创制了许多专业术语。现将颜永京在翻译《心灵学》(上本)、《肄业要览》过程中创制的汉语心理学术语汇总于表 2-1 和表2-2。

表 2-1 《肄业要览》中的心理学术语

英文(Spencer)	汉语(颜永京)	英文(Spencer)	汉语(颜永京)
desire	欲	mental nature	心与性
emotion	情欲/心怀/心意	mind	心才/心
experiment	试验	moral training	启发天良
faculty	才能	perseverance	耐久之心
feeling	心怀	psychology	心才学
independence	自恃之心	reflective faculty	思索之悟性
intellect	资性/心才	science of mental	心性学
intellectual	慧悟	sensation	觉
judgment	明决之心/主见勇决	sincerity	崇实之心
memory	记心/记忆	test	体验
mental exercise	磨炼心才	understanding	悟性

表 2-2 《心灵学》(上本)中的心理学术语

英文(Haven)	汉语(颜永京)	英文(Haven)	汉语(颜永京)	英文(Haven)	汉语(颜永京)
analysis	分核	desire	欲	idea	意念
association	索引	experience	经历	imagination	幻像
attention	专意	experiment	试验	intellect	智
conception	意绪	faculty	才	interest	致味
conscience	良心	feeling	心动	judgment	裁断/决断
consciousness	内悟	habit	习惯	mental philosophy	心灵学

① 颜永京,译.心灵学(上册)[M].上海:益智书会,1889,序:1.

(续表)

英文(Haven)	汉语(颜永京)	英文(Haven)	汉语(颜永京)	英文(Haven)	汉语(颜永京)
observation	见闻	reflective	思索	synthesis	汇归
perception	达知	remember	记	think	思/思索
phenomena	显然之形用	represent	复呈	volition	志决
reason	辨实	reproduction	复出	will	立志
recognition	复认	sensation	微觉		

(二) 颜永京心理学术语的嬗变及其分析

颜永京创译的心理学术语经历过变迁的过程,这反映了西方心理学碰触到中国文化之后,中国文化为接受它而作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肄业要览》的早期版本曾发表在《格致汇编》上,通过对发表于《格致汇编》的部分《肄业要览》与正式出版的全书文本比较分析,并结合对照斯宾塞写于1864年的英文原著,可以看得出颜永京在翻译部分心理学术语过程中的变化,较为明显就是"mind"一词的翻译。在《格致汇编》上发表的部分内容中,颜永京将其翻译为"性灵",如他在《格致汇编》版本中翻译成的"视其子女之性灵,一如视其身体"一句话,而在全本《肄业要览》中则用"视其心一如视其身"。另外,他最初将"treat the mind"翻译为"加益智慧",后改为"栽培心才"。我们还发现,颜永京对"philosophy"的翻译则有从"性理学"到"穷理学"的变化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颜永京在翻译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西学过程中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直接从中国文化的语言文字中寻求可利用的资源,进行了早期汉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工作。从《肄业要览》到《心灵学》(上本),颜永京使用的心理学术语,经历了松散意译到定制译语的过程。在《心灵学》(上本)一书中,其创制的心理学术语基本上在稳定使用,而且由多音节词变为双音节词,仅有少量译语是多音节词或单音节词,体现出专有名词的特征。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肄业要览》一书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并不成熟,一方面体现在颜永京几乎完全采用意译的方法,很少使用特定的词语进行对应性翻译,而是采用接近词组的多个字进行翻译;另一方面,一个英文词在不同语境下,颜永京会使用不同的词语,如"emotion"分别译为"情欲"、"心怀"、"心意"等,还出现用一个汉语词翻译不同的英文术语,如"心才"

一词曾用于“intellect”、“mental”、“mind”的翻译。整理《肄业要览》的心理学术语可以发现,心理学术语的翻译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这些翻译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颜永京当时的翻译,因《肄业要览》并不是心理学专著,所以颜永京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要为这个学科创设一套专业术语,而是试图使用中国已有的文字或词语将英文术语的内涵表述出来,如他将“conscience”译为“良心”,又如他将“hereditary transmission”翻译为“祖孙性与身相似性”,可谓既表达出英文的内涵,又能被国人理解。但是在翻译《心灵学》(上本)时,由于这是一部完整的心理学著作,专业术语是整个著作的基础,颜永京这才开始有意识地创制汉语心理学术语。

如果说从1882年的《肄业要览》到1889年的《心灵学》(上本),颜永京心理学术语的翻译方式有所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外在因素之一可能是他1886年加入益智书会教科书编辑工作的经历。益智书会自1877年起就有多名传教士曾致力于科学名词的翻译与统一,①当颜永京有机会接触到益智书会的这些工作之后,必定会促使其心理学名词的翻译更为严谨、统一,朝着定制方向而努力。

海文的《精神哲学》英文原著传入日本之后,当时的学者西周于1875年将其翻译成《心理学》出版。日本学者儿玉齐二曾将颜永京和西周各自译制的25对中文、日文心理学译词(均为汉字)进行比较分析,分别让中、日大学生对各自随机排列的25对译词,选出一组同义词进行匹配。结果发现,虽然中、日大学生均有错误匹配的情况,但是正确匹配的情况占绝大多数,而且中国大学生匹配成功的成绩好于日本学生。② 这很好地说明汉字本身传递的信息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颜永京还是西周,都在充分利用汉语(字)的内涵来创制中、日心理学术语,绝非单纯的臆造。当然,日本学界创造的心理学术语在1900年前后经由日本来华的教师和中国留日学生输入中国,并大部分被学界接受。这背后同样是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意涵在起作用的体现。

① 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J].中国科技史料,1991(2):9-19.
② 儿玉齐二.第一个将心理学传到中国的颜永京牧师.谈丽青,戴捷,译[M]//杨鑫辉.心理学探新论丛.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41.

（三）颜永京心理学术语创制的意义及贡献

颜永京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工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事件，它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首先，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作为一门西学在被颜永京接触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由颜永京开始向中国引介心理学，而且他也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把它翻译、引进到中国学界。其次，由于中国学界并无现成的术语可借鉴，颜永京最初选择一种较为自由的意译方式，避免过多地创制新语，以使国人能够初步理解这门学科。当致力于将心理学专业书籍的引入时，他才有意识地创制专业术语。再次，在他创制心理学术语时可借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如他使用的"心才学"（psychology）、"心性学"（science of mental）译词显然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含义及中国历史上的"心性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将其创制的术语定义为晦涩难懂，因为这些术语在当时很可能是最好的译语，既能为当时的人所理解，又能传递英文著作的内涵。一个多世纪之前颜永京以其学习过心理学相关课程的良好基础，不畏艰辛，以一己之力开始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工作，书写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历程，应该说颜永京承担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颜永京不仅创制了许多心理学术语，而且创制了一些其他专业的术语，例如将"education"（教育）翻译为"肄业"，将"aesthetics"（美学）翻译为"艳丽之学"，"oratory"（演讲术）翻译为"口才学"，"science of society"译为"民景学"。颜永京的著译工作基本上是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完成的，他的英语汉译工作也深远地影响着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当颜永京之子颜惠庆于 1908 年主编中国第一部《英华大辞典》时就是由当时十多位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协助他完成的。[①] 同时，颜永京曾使用过的"心灵学（psychology）、幻像（imagination）、心才（faculty）、汇归（synthesis）"等词都被颜惠庆收录于各自英文词语的释义之中。[②] 这里面既反映出颜永京汉语术语创制的精神在后人身上的延续，又体现了其创译的术语尽管逐渐式微但仍有所传播。

---

①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M]．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18．
② 颜惠庆．英华大辞典（缩本第 5 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844，1157，1788，2298．

第三节　丁韪良与《性学举隅》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字冠西,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1850年,丁韪良在长老派神学校毕业后,被派来中国,在宁波传教。1862年他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任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任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是清朝末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丁韪良也曾涉及政治,但主要还是从事传教、译书、教学等文化活动,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过重要影响。在丁韪良的众多著作中,1898年出版的《性学举隅》是一部以问答体撰写的西方心理学著作。[①]另外,丁韪良早在1854年出版的《天道溯原》一书中就曾涉及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一、《天道溯原》中的心理学知识

《天道溯原》一书是丁韪良传教布道间隙撰写的,其"意在究其根源,揆其事理,俾知所传之道并非托诸虚词,皆有所本"。该书自1854年出版之后,曾用中文、日文、朝鲜文出版近40版。其内容主要是以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证明基督教教义。[②] 据1869年上海美华书馆新铸铜版,该书包括两篇序文、引言、上中下三卷内容。其中上卷第五章"以灵魂为证"基本上是心理学的相关知识。

丁韪良称:"灵魂惟一,诸才可论,才分两端,一曰灵才,一曰心才。""致知者为灵才",灵才有五种,分别是觉、悟、记、思、像。其中"觉"的功能是知晓身外之事,"悟"的功能是知晓身内之事。人有了悟,才能"知我之为我",

① 1988—1989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汪兴安在随荆其诚出访美国期间,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发现这本1898年版的《性学举隅》。汪兴安将此书从海外复制了一本,现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

② 王文兵. 丁韪良与中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45.

而且“知己所为之事”,从这里来看,丁韪良所说的悟应该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丁韪良否定了中国文化于“耳目口鼻心”中将“心”列为五官之首的观点,提出“五官之职,专通外物,而心则寓于内”,同时“五官无不归心之统辖”,因此他主张将“心”从五官之中删除,而代之以“肤”。丁韪良将心才分为欲、情、好恶、是非之心四种。在讨论中国的“七情说”(喜、怒、哀、乐、爱、恶、欲)时,他指出,“欲从身而发,遂其欲而止,非若情之萦回不已”,因此“欲”不能归为“情”。丁韪良提出爱、恶、怨、怜四情说。[①] 这些内容在《性学举隅》一书仍有进一步探讨。丁韪良在此书中使用“心才”一词,这或许是颜永京创制“心才学”一词的源头。

二、《性学举隅》的内容与体系

《性学举隅》的英文名字为 *Christian Psychology*。这是第一部融入许多近代西方心理科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丁韪良出版《性学举隅》得到登州文会馆两位毕业生罗善智(1886 年毕业生)、綦策鳌(1893 年毕业生)的帮助,他们两人协助丁韪良进行此书的笔述、润色工作。丁韪良称:“綦、罗二君,夙擅格致、天算诸学,于性学尤易明晰,以为臂助,实称得力。此余既感激于天假于年,天假于地,又不能不感激天之假我以人也。”[②]可见,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灵学(心理学)课程间接地帮助丁韪良顺利出版了《性学举隅》一书。

丁韪良之所以采用“性学”来命名“psychology”,大致源自明朝 1623 年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用中文撰写的《性学觕述》一书。该书采用问答体方式撰写,由序言(包括李鸿章序、罗善智序和丁韪良自序)、总论以及上下两卷组成。此书简要目录如下:

总论;

卷上　论灵才,共分十五章,分别为论觉、论五官、论习觉、论悟、论记、论强记之术、论思、论思之三要、论思索致知、论以思索广实学、论象

---

① 丁韪良. 天道溯原[M]. 上海:美华书馆,1869:5-8.
② 丁韪良. 性学举隅[M]. 上海:美华书馆,1898,自序.

才、论思之限址、论梦、论梦行与行梦、论相脑;

卷下 论心德,共分十四章,分别为论欲、论情、论求好、论心之动、论是非心、论行之所本、论诸德、论心之主、论习、论修身、论物之灵性、论才德次第、论灵魂诸说、论天地来原。①

在“总论”部分,丁韪良概述了近代西方心理学由注重研究生理(身体)走向研究心理(灵魂、主观世界)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及目的,其内容基本涵盖了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近代心理学的“知、情、意”三个组成部分,以此建构起他的基督教心理学体系。他指出,对于人的研究可分成两个部分,“曰身曰心是也,曰体曰魂是也,曰内曰外是也”。“体学”相当于生理学,而“性学”专门研究灵魂(即心理),灵魂虽然依赖于身体,尤其是“筋络”、“脑髓”,但性学着重研究人的主观世界。灵魂的研究从构成灵魂(心理)的诸要素开始,以道德修养为归宿,心理学因而分成论“才”(即知)与论“德”(情、意)两个部分。才分五类,即觉(感觉)、悟(知觉)、记(记忆)、思(思维)和像(想象),其功能划分是“觉、悟之职在取材,记、思、像之职,则将所取之才而成知”。人仅能思、能知还不够,人还要有“所好”,即“食、色、名、利等情”,也就是需要和动机。人的才与情欲皆有统领,这个统领就是“我”,即意志,丁韪良用“心之主”表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除了有情欲外尚有“好名之心”、“是非之心”。“人以情欲下接物类,以是非之心,上接天神,以好善为鞭策,可期脱壳而跻于光明之域”,这就是丁韪良要阐述的,即如何能做到修心养性,培养良好的基督教道德。在“总论”之后,丁韪良以“灵才”和“心德”两卷,分章阐述了“知”、“情”、“意”的内容,他并没有将“情”与“意”分开立卷而是归于“德才”的统称之下。

在生理心理学方面,丁韪良论述了感觉的作用、传导机制和感觉器官。如“心之所觉,知之本也”,心之觉“赖筋以外接而内达,则灵被警而觉似成矣”,即靠人的神经系统传导。司觉者则为“五官”:耳、目、口、鼻、肤。丁韪良较科学地阐述了五官的工作原理,如耳朵能闻声是因有耳膜,目能视物是因有视网膜(“目底铺有细筋织成的帐幔”)。在论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

① 丁韪良. 性学举隅[M]. 上海:美华书馆,1898,目录.

他强调“意在先而言在后”,但思维要依赖语言的表达,“特无言则意不明澈,亦难就绪,故必藉言以助之”。可见,丁韪良在当时为中国传入较多西方近代生理心理学方面的科学知识。另外,丁韪良还介绍了一些西方心理学流派,如他介绍并肯定了西方精神分析学派采用的催眠疗法。他所谓的“梦行”是指梦游症,而“行梦”是指催眠术,“行梦”对于治病有助益。丁韪良描述了他亲眼看到的西方催眠术的具体过程,并介绍了西方催眠术的起源以及法国巴黎沙尔格(亦译作沙可)的催眠术中“重在梦中授意”以治疗病人的理论。[①] 这也是西方心理治疗技术较早地向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接触到心理学应用性的一个侧面。

丁韪良在介绍西方心理学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心理认识论、情感论进行了部分修改。如他针对中国文化中“耳司听,目司视,口司味,鼻司臭,心司思”的“五官”论提出两个不足之处,一是“物之冷热燥湿等情,无专官以司之”,二是“心”并不是“思”的器官。他建议:“删心补肤,与耳、目、口、鼻并列,则五官之数备而心之位正矣”,中国人将“心”作为思维器官是错误的,“心与脑之各有所司,不可不辨”。另外,他还将“欲”从中国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的“七情”论中分离出来,赋予“欲”字以身体内在生理需要的含义。“欲”不同于其他“六情”的地方在于,它是“出于本身按时而发者”,共分为四种,即“饥、渴、男女、动静”,其功用或为绵延种族,或为保养身体。

丁韪良的目标不仅是向中国传播西方心理学知识,用来修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更主要的是利用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为其印证基督教而服务,如他将孟子的“恻隐之心”论、墨子的“兼爱”论等看作与基督教教义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参照,而有些内容则需按照基督教进行补充完善。丁韪良创造性地以西方心理学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建立了一套以“事天”道德修养为中心的基督教心理学体系,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较科学的心理学体系和心理学知识。另外,丁韪良创制的一些心理学新术语,如“梦行”(即梦游)、“行梦”(即催眠)、“相脑”(即颅相学)、“心君”(即意志)和“联属”(即联结,association),虽然未能流传至今,但在当

---

① 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74-276.

时中国的知识界仍不失为比较契合其心理学内涵而又易于理解的词汇。[①]

三、《性学举隅》与《心灵学》的简要比较

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丁韪良的《性学举隅》是20世纪之前近代中国心理学早期发展史上的两部重要著作。它们的著(译)者皆为传教士,具有一定的宗教背景。《心灵学》(上本)是19世纪中叶英文哲学心理学著作的汉译,《性学举隅》带有一定的创作性质,融入19世纪末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心灵学》(上本)的翻译工作是在中国早期大学内完成,与教学活动有紧密联系,而《性学举隅》则是出于丁韪良将心理学服务于宗教传播的目的完成的。这两部著作也分别反映了20世纪之前西方心理学早期向中国传播的两种形式:由西方学者直接传入,由中国学者翻译引介。

(一) 著作性质与目的的比较

有资料显示,丁韪良曾为益智书会撰写过心理学教科书,但最后未见他有这样的著作在益智书会出版,出版的却是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性学举隅》是丁韪良带有原创性的著作,这是他在西方心理学领域新进展的基础上独立撰写(当然他的著作经过中国人的润色)的完整著作。而《心灵学》(上本)是颜永京译自海文的《精神哲学》。海文的原著共有序言、绪论、第一编"智识能力"、第二编"情感"和第三编"意志",而颜永京仅译出原著的第一编"智能",设为第一卷"论智",再加上颜永京的自序,构成《心灵学》(上本)的全部内容。颜永京在《心灵学》(上本)中列举出心灵学(心理学)与宗教、医学、口才学(oratory,即演讲术)、肄业法(the art of education,即教育的艺术)、个人兴趣和磨炼人心都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颜永京更侧重心理学的应用价值,而非单纯的传播宗教的作用。丁韪良《性学举隅》下卷"心德"部分的宗教传播目的更为明显。

(二) 著作影响的比较

这两本书在当时中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当时,丁韪良与来自社会底层的教徒,以及清政府许多官员都有所接触,甚至还邀请到李鸿章为《性学举隅》写了一篇序文,无形中增加了这一著作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更为重要

---

① 王文兵. 丁韪良与中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77-284.

的是,丁韪良站在中西学术交流和碰撞的潮头,吸收大量西方科学的最新知识,顺应并促进当时中国对西方科学知识吸收的趋势。而颜永京则是靠一己之力来完成这部《心灵学》(上本)的翻译,工作之艰辛致使他因身体不适而未能完成剩余内容的校辑和刊刻。另外,《心灵学》(上本)并不是严格的翻译,而是一种有删减的节译或者说意译,如他所说"将大略翻译汉文,教授后学"。丁韪良的《性学举隅》出版之后,传教士狄考文、怀定(J. L. Whiting,1834—1906)分别于1899年、1900年对此书进行了相关的评论,[①] 1900年第136册的《万国公报》上还刊印了《性学举隅》中李鸿章的序文和"总论"部分,编者并在文章后面加上按语,向读者推荐购买此书。相比之下,颜永京著作的影响要小得多,其术语影响也较小。海文原著中的"情感"和"意志"两编内容因未能刊刻于世,成为一大遗憾,未能促使原著包含的一些科学知识在当时中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不过《心灵学》(上本)出版之后,也受到当时知识界的关注,被收录于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之中,编者称"西人论脑气作用之说,愈出愈精,大凡知觉为一纲,情欲为一纲,志决为一纲,是书但译智才一卷,余未之及。颜氏所译如此书及《肄业要览》,皆启悟童蒙善本"。[②] 可见,时人比较注重《心灵学》(上本)在教育中的作用。《性学举隅》则收录于1902年的《增版东西学书录》之中,与《心灵学》(上本)同列于"心灵学"名目之下。

(三)心理学科学性的比较

在剔除神学内容之后来比较《性学举隅》和《心灵学》(上本)的心理学知识可以发现,《性学举隅》中的心理学知识有更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而《心灵学》(上本)中的心理学知识,哲学倾向更为明显,更具思辨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性学举隅》成书于19世纪末,西方心理学已经确立起学科地位,科学取向的心理学知识日益增多,许多心理学著作也相继出版,《性学举隅》对这些心理学知识吸收较多。而《心灵学》(上本)的原著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西方心理学还处于哲学心理学阶段,近代科学知识还没有和哲学心理学相互融合起来。另外,丁韪良在阐述心理学知识时具有较强的实证精神。

① 王文兵. 丁韪良与中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282-283.

② 徐维则,编. 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M]//熊月之,编.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25.

他在提及一个心理学观点或理论时经常会以"何以验之"来设问,然后再提供相应的证据或实验依据进行回答。同时他指出,"试验"(即实验)是西方实学盛行的原因,中国如果想大力发展实学,也应该以实验方法为重。丁韪良的这种实证精神,无论是对当时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心理学,还是对于其他学科都有积极意义。

(四) 著述心态的比较

丁韪良在《性学举隅》中也创制了一些心理学术语,如"梦行"(即梦游)、"行梦"(即催眠)、"相脑"(即颅相学)、"心君"(即意志)和"联属"(即联结,association),但其著作中对心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以单字命名者居多,如"觉"(感觉)、"悟"(自我意识)、"记"(记忆)、"思"(思维)、"像"(想象)等,这反映出丁韪良在当时尽量用文言汉字和中国当时的语言习惯去表达心理学概念。虽然丁韪良很有可能知道颜永京的《心灵学》(上本),而且自己的《性学举隅》比《心灵学》(上本)出版晚了近十年,但无论是心理学学科的名称,还是一些具体的术语,都看不出明显的继承关系,目前仅能通过颜永京使用过"心才学"一词及丁韪良曾使用过"灵才"一词看到些许关联,"心才"一词最早见于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一书。这可能与丁韪良侧重通过传播中国人能理解的心理学知识而最终达到传播宗教的目的有关。如前所述,颜永京侧重心理学的应用价值,而非单纯的传播宗教的作用,又如他翻译出版的《肄业要览》中就体现出他对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价值的认同。可以说,颜永京在心理学术语的创制上是为心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而服务的。因此,颜永京在这方面比丁韪良有着更高的历史功绩,而丁韪良则囿于宗教传播的目的未能在这些方面作出更多历史贡献。

第四节 晚清其他心理学著述

一、《灵学略论》

晚清时期的《灵学略论》(*Outline of Mental Philosophy*)是一本汉语印刷体线装册,49 页,近 2 万字,作者佚名。该书内容为精神哲学的大纲性内容,由于是非正式出版物,具体问世时间不详,现收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

馆。根据其内容,有以下三点初步判断:首先,就其翻译的名词术语来判断,该著述大致产生于 1872 年以降。[①] 其次,这本汉语册子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之中,因为文中曾出现“譬一华人素未见夫洋人洋猪洋驼……”字样,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孟子、孝道、阴阳、缠足、东洋等事例或字样,多处出现用华人和西人为例作对比。最后,从书中所附的三页英汉名词对照表来看,该书应为译本,文中也多次出现西方学者的人名,但是所译的底本不详。同时,文中也多处引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素材,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另外,文中多将“faculty”译为“才”,这与丁韪良所用的译语有相同之处。该册子中在多处有遗漏补充性质的手写体汉字,以及少量地方将印刷文字置换译语的情况,如印刷体文字中曾将“self-conscious”译为“知己”,但均被手写体汉字改译为“自觉”,以及“抱怨”变更为“申冤”一词,因此存世的这本线装册可能是译者曾经稍作订正的自存本。

《灵学略论》一书虽然带有一定的神学性质,但是其涉及神学的内容很少,而是以心理学(精神哲学)内容为主体,因此它是一本心理学的专著。其内容按照知、情、意三分法将心才(mind,心理)分为思悟之才(intellect)、情欲之才(sensibility or motive faculty)和定志之才(will)。

就思悟的功能而言,“专司乎知,内则知诸心思,外则知诸事物”。思悟之才可分为七种:良知良能之才(instinct)、原知之才(intuition)、自觉之才/知己之才(self-consciousness)、觉物之才(presentation faculty)、合一之才(correlating faculty)、复历之才(representative faculty)、思索之才(reflective faulty)。良知良能之才是指人的本能。原知之才是指直觉,即“当物触心之际,能生一切原念者”。这些“原念”包括知地(空间)、知时(时间)、知是非(对错)、知数(数目)、知动(运动)、追原(原因)、究委(结果)等。自觉之才即人的自我意识,能起到“贯通心内诸才”的作用。觉物之才即表征,依靠五官获得对外物的特征或属性。合一之才是指联结、整合作用,即“人心时受内外之感,赖此才则能以思念之理贯之,自属数相属之感,能生清明纯一之思念”。复历之才是指记忆、再现,“所作之事,所想之念,一一存记

① 《灵学略论》中出现过“显微镜”,该词曾收录于 1872 年出版的《英华萃林韵府》词典。出现的“炭气”(一氧化氮)、“轻气”(氢气)、“养气”(氧气)、“淡气”(氮气)则出现于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所著的《博物新编》(1855)中。

不忘，异日能复显现于心，如重历然”，包括“缅怀”(memory，记忆)和“生发幻影”(imagination，想象)。思索之才是指反思、反省，“人之溯源究委，引申触类，悉赖思索之才”，“人于天下事物之理，凡能因故知新，自近悟远，由一源而得万派，即粗迹而通奥旨，且因事物之当然而究其所以然，皆凭思索之才”。思索之才其用有四：专注(concentration of thought on single object)、截取(generation)、推类(reasoning)、推论(syllogism)。专注是指将思维集中在某个对象上，截取是指归纳，推类是推理，推论是指三段论，又分为正意(major premise，大前提)、副意(minor premise，小前提)、推意(conclusion，结论)。

情欲之才是人所以喜忧好恶之才，共分三类：身体之嗜欲(bodily sensibilities)、悟才之喜好(intellectual sensibilities)和是非之好恶(moral sensibilities)。身体之嗜欲指生理性的欲求，或求获益或求免于损失；悟才之喜好是指求知过程欣喜之心，即今日心理学中所称的理智感；是非之好恶是与道德相关联的情感。一些重要的情欲之才包括身体之嗜欲、良爱(natural affections)、为己之喜好(self-interested affections)、为人之喜好(benevolent)、奉上之敬尊/敬上之情(reverence)、待下之慈爱/慈下之情(compassion)、感恩之情(gratitude)、伸复冤之情/报怨之情(retribution for evil)、好美之情(love of the beautiful)、恶陋之情(dislike of the ugly)、好森严之情(love of the majestic)、好嬉笑之情(love of the ludicrous)、好理义之情(love of the justice)。

定志之才是指“心中之妙能以断定其言行之如何，亦能令人奋力以成所断定者”，“为人心自主之妙能”。定志行为分为选择之志(choice)和循行之志(executive volition)。选择之志即“心中自主之能，随动心之因由以定其言行之准”，循行之志是选择之志的功效，“选志一动，若无所阻碍，循志亦必随之而动以成选志所定之旨”。定志行为体现着人心理的自主性，而不是出乎自然，“假令定志为情欲所役，人则只为灵明之兽耳”。定志是心理中最为尊贵之才，“所言所得行皆以定志为端倪”，人如果没有定志之才，“虽驯良如鸽，不足为善；凶猛如狮，亦不得为罪”。定志行为的缘由有三种：兴事之由(subordinate)、成事之由(ultimate)和总归之由(supreme)。兴事之由即“心中所求之益，此益为他益之造端”，如人饥饿思食，思食就是兴事之由。成事

之由是指心中所求远大之益，如读书以求名位，求名位就是成事之由。总归之由是人一生追求希望达到的“大益”，被视为“万益之上益”。

《灵学略论》呈现了较为完整的心理学(精神哲学)的知识体系，其创制的心理学术语整体上较容易理解，虽然目前还无法断定其作者身份和问世时间，以及当时其传播的状况，但可以肯定这是晚清时期西方心理学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部重要著作。

二、《格致汇编》的心理学知识介绍

《格致汇编》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创刊于1876年2月，该刊是最早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的中文科学杂志。1877年《格致汇编》发表了长达6万字的译文《格致略论》，该文译自钱伯斯兄弟公司(W. & R. Chambers)出版的《钱伯斯教育丛书》(*Chambers's Educational Course*)中的《科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格致略论》共分301节，其中第282至301节为“论人之灵性”(mental nature)。该文首先阐述了灵性(mental，心理/精神)与大脑的关系，即“人之智慧灵性莫不出乎脑也，然灵性虽出乎脑，而脑实非灵性，脑体不过为灵性之府”。思念(consciousness，意识)“不但在曾经知觉之事，又另有意中可有之事而尚未见过者，又有断不能有之事”，即意识的内容可以是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也可以是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情。灵性可以分为多种性情，而且人的性情也不相同，有人性情悍而强，有人性情软而弱，人的性情分为才智之性情(faculties of intellect，智能)和恃血气之性情(affective or sentimental faculties，情感)。其中才智之性情分为知觉(knowing faculties，理解力)和思念(reflecting faculties，反省、思索)。前者涉及明了他人的意思，并能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别人，还包括对物体属性(如形状、尺寸、地位、方向、数目等)的认识。思念包括比较(comparison)和明理(reason，分析)，其中“明理”是才智性情中最宝贵者，人正是具有明理之性才有别于动物。恃血气之性情分四等：第一等中有恭敬、仁爱、良心；第二等中有有益于人的性情、忍耐的性情、怪僻的性情、戏谑的性情；第三等中有自重的性情、自好的性情、谨慎的性情；第四等中有爱生畏死亡的性情、爱食物爱儿孙朋友爵位的性情、驳人或攻击人的性情、报仇害人的性情、喜爱财物爱工作的性情以及常思一类事物的性情。“论人之灵

性"的部分内容为结合人的性情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导,如才智之培养可通过以下途径:专心(attention,注意)、觉悟(perception,知觉)、记性(memory,记忆)、思念(conception,概念)、幻想(imagination,想象)。文中提出"人行其本业合法须用其才智之性情"、"妨闲下等之性情"、"谨慎所作之事"、重视"上等之性情"并经常笃行之。[①] "论人之灵性"一文对心理学知识的介绍相对比较完整,而且还有依据相关心理学知识对人行为进行指导的内容。

三、《格致小引》和《格致总学启蒙》对心理学的介绍

《科学导论》(*Science Primers: Introductory*,1880)系赫胥黎为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科学初级读本》(*Science Primers*)丛书写作的一个导论。《科学初级读本》是一套科学丛书,包括化学、物理学、地理学、心理学、天文学、植物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等卷,*Introductory* 为其首卷。该卷第四章第 66 节(*Mental Phenomena*)和 67 节(*The Order of Mental Phenomena: Psychology*)专述心理现象和心理学。1886 年,《科学导论》一书在中国出现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罗亨利(Henry Brougham Loch)口译、瞿昂来笔述合作翻译出版的《格致小引》,另一个是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译撰、总税务司署印的《格致总学启蒙》。关于心理学的介绍,两个译本使用了不同的名称,《格致小引》使用"性情学",《格致总学启蒙》使用"心性学",两文中分别将"mental phenomena"译为"性情"和"心性"。[②] 后一译本所用的"心性学"要早于颜永京所译《肄业要览》(1882)中使用该术语,两者或许有一定的继承性。

《格致小引》将《科学导论》第四章第 66、67 节专述心理学的部分译为:

> 第四章　论无体质之物
>
> 第六十六节　……此外更有性情之学,性情无体质如闻臭与声,不能量其多少,权其轻重,喜乐不能行动,爱恶无形体无轻重亦无速率。凡心之所发与知觉等俱无体质,故谓之性情学。

---

① 格致略论[M]//格致汇编(第 1 年第 12 卷),1877:5-7. 赵中亚.《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D].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9.

② 王扬宗. 赫胥黎《科学导论》的两个中译本[J]. 中国科技史料,2000(3):207-221.

第六十七节　性情学有定理　凡有知觉与情之所生必有故，非偶然也，与有体质之物同理。况有体质之物与性情有关系，如闻臭，必有体质之物发其臭；以针刺臂，觉痛，必有体质之针刺之而痛；羽毛之软、白粉之白，皆觉其软与白。既有觉，即生情。天地间祗此有体质之物与无体质之物二者而已。各种学，惟论此二者之相关而已。[①]

《格致总学启蒙》则译之为：

论无形象之物

第六十六节　论属心性诸事……目有所视，耳有所闻，口有所尝，手有扪，乃为身外物，与使心有所觉之视听闻尝有别。心内之觉所以不同于身外物者，如鼻已闻其味，试问审得其味之闻，有大小体段乎？有轻重分两[②]乎？耳聆之声响，目视之光明有可以升斗尺寸丈量之体格乎？不惟是也。余等人恒云散步于郊野山林以解散心闷矣，未识前之固结于心，今之散出者果为解出能入能出能行能解之物耶？

世人尝言之七情六欲中，亦无分毫形迹体格式样也，即如爱人之爱，恨人之恨，并无可权之分两，可见形状与运动之势。且余等心中分辨推究之时，相继续有不能已之思维推想，亦不属乎有形象之各物类也。

如是思之，是心中凡有所忧乐，有所喜怒，有所知晓，有所觉悟，均属无形无象，有神在内为之筹画主持也。

第六十七节　属心性之喜怒哀惧爱恶欲发动各有因由次序，总归于心性学。

凡属有形象之物，所有之一切变化，均有节制次序，绝非无故偶发，举属触动有因而始生也。而属乎心性之诸事，亦如是之均有次第。有所感动始生，且喜怒哀惧爱恶欲之属心性者，与属形体者，互有感照。盖触之使发者在形，而有触斯发者在神耳。则且以实事征之，以针刺

① 罗亨利，瞿昂来，译. 格致小引[M]. 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86：23.
② 原文如此，分量之意，下同。

肉,心觉疼痛;手抚羽毛,心觉柔软;目视石灰,心觉有明显白色,皆属有形色之物在外,方能如是之感触心性使觉也。举凡心性中之觉有喜怒忧思悲恐及贪嗔痴爱各类发动,均可归于心性学内。无论其各类发动相继之前后次序若何,各事与其因,各因与其事,互相牵连关涉,而属于形体之诸类事与因,与属于心性之诸类因与事有何关涉,尽在心性学内也。①

显然,这些内容是针对心理现象的特点、心理学的对象与范围界定的简略性介绍。比较来看,《格致小引》的译文明显删略了一些解释说明性的文字,但是文笔较为流畅;《格致总学启蒙》的译文比较忠实于原著,属于逐字逐句的对译。这两个译本出现的心理学知识均是晚清时期较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汉字文本,同时将述及的心理学知识与化学、物理等并列作为独立科学("格致")的一门,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理解其学科性质有着积极意义。

四、《治心免病法》

《治心免病法》(1896)译自美国人乌特亨利(Henry Wood)著的 *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1893)一书。乌特亨利多年探索身体疾病与心理、宗教信仰的关系,主张通过"疾病不存在"的信念进行心理治疗。该书于 1896 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译成中文,上海格致书室发售。该书章节目录如下:

序;

卷上 第一章 论有益之新法难行;第二章 论人身;第三章 论思念之力;第四章 论知觉级层;第五章 总论;

卷下 第六章 论治心诀要;第七章 治心诀要并说与用法。

乌特亨利的原著不是一部心理学概论性著作,而是一部心理治疗手

① 艾约瑟,译.格致总学启蒙[M].上海:总税务司,1886:88-90.

册，同时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试图以宗教信仰作为心理暗示、冥想的内容，通过心理效应达到治疗的效果。傅兰雅将乌特亨利的这套具有宗教色彩的心理治疗方案称为“治心免病法”。他一直有心帮助中国人戒除鸦片瘾，同时该书兼有科学性和宗教性，很符合当时他在中国的科学传播和传教士的角色，于是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发行。傅兰雅在翻译此书时并没有完全忠于原文，甚至为该书增加了原著中不存在的乌特亨利的自序。他经常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加以创造性发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进行翻译，如用“心力”、“天心”、“爱力”等新语翻译心理学中的名词。

《治心免病法》作为心理学应用性著作反映了英文世界中心理学在临床实践中有了较大的应用和发展，但同时也经常被放置在宗教背景之中以表达著述者个人的思想和观念。该书认为心是身的主宰，坚定的宗教信仰和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于身体或精神疾病可以起到治疗和康复的作用，书中用《圣经》内容编制了二十七个“诀要”，如“天父无不在”、“天父在我心”、“静心听天语”、“天爱满我心”、“治心亦格致”、“心治身即愈”，等等，利用这些口诀可以起到冥想、自我暗示的作用，有利于发挥个体生理、心理潜能以战胜疾病。又如书中称“人心常思有病则其害必至，反之其益亦必至”，[①]即疾病不存在的信念会有益身体康复，这是身心关系中心理因素对生理产生影响的表现。但是，该书明显夸大心理因素的作用，如声称“将来医不用药，全恃治心之法”[②]，同时也过于将宗教信仰的作用凌驾于心理因素的作用之上。

《治心免病法》作为第一部传入中国的心理治疗性著作，其影响更多体现在心理学之外。傅兰雅在该书中使用的“以太”、“心力”、“爱力”等概念对谭嗣同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其吸收进他的“仁学”思想体系，继而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新青年们常常通过阅读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以达到“锻炼心力”的作用。[③]

---

① 乌特亨利. 治心免病法[M]. 傅兰雅，译. 上海：上海格致书室，1896：8.
② 同上 4.
③ 龚昊. 传科学的传教士——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107.

第五节 文化背景下“心理学”的创制与传播

一、“心理学”名称在日本的变迁及其确立

(一) 非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上学”(“心理学”)的出现

日本学界是以西周于1875—1876年出版译著《心理学》(明治八年和装本)为创制“心理学”一词的重要标志,但西周并不是此时才开始使用“心理”这样的字眼。1870年冬,西周在其创办的私塾(育英舍)中开始讲授《百学连环》,内容是大致属于百科全书性质的知识。西周《百学连环》的讲义当时并未正式出版,后世根据其学生永见裕(饶香)的课堂笔录进行整理,后收入1981年出版的《西周全集》。

在这门课程上,西周将西方近代的知识体系划分为“普通学”(common science)和“特殊学”(particular science)。“特殊学”分为“心理上学”(intellectual science)和“物理上学”(physical science),“心理上”作为一个词对应翻译“intellectual”,“心理上学”在日文中常写为“心理上ノ学”、“心理上の学”和“心理の学”。在日文中,“心理上学”包括神理学(theology)、哲学(philosophy)、政事学·法学(politics, science of law)、制产学(political economy)和计志学(statistics)等多个学科。可见,西周在这里使用的“心理上学”并不是专指某一个独立的学科。以“心理”为“物理”的对应词汇,是西周术语体系下“心理”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名称关键词的逻辑起点,“psychology”被西周视为哲学的一部分,并在一段时期内将其译为“性理学”。如西周所说:“psychology(性理学)之字,希腊之 ψυχή,英之 soul(魂)也。此名为魂者,皆属人身上之魂、心、性也。此三者皆为同一物,人身之主宰。自其生活上言之曰魂;作用之源曰心;作用有常之源曰意。其曰魂,曰心,曰意,皆从其所据而异名而已,唯同一物也。故将称‘魂’之字译作‘性理学’(英文词之后括号内文字为原著者用字,下同——引者注)。”①

① 西周,述. 百学连环[M]//大久保利谦,编. 西周全集(第四卷). 东京:宗高书房,1981:149.

另外,《西周全集》收录的《百学连环》也曾出现过三字词“心理学”三次,分别出现在《百学连环》“总论”初稿本和修补本的同一段落同一位置上,初稿本中出现两次,修补本中仅出现一次,这两个版本都出自永见裕之手,因此可以认为三字词“心理学”在永见裕课堂笔记中仅出现一处,而且这里“心理学”并没有进行专门的术语界定,仅仅是作“心理上学”的同义语而使用。如西周讲道,“学又分为 intellectual (心理上)science 与 physical(物理上)science。欧罗巴(即欧洲——引者注)中,此心理上之学,古有多种,而无一定,或为 mental(心性学),或为 moral(礼义学),或为 spiritual(精神学),或为 metaphysical(物理外之学)等。其中以称物理外之学为最得宜之题号,但此亦乃古学派,方今则属陈腐。凡物理外之学,或皆为心理学,故于此学中的内容,则非有限定也。”①

结合前面提到中国人“执权居士”于 1872 年首次使用过“心理(学)”一词来看,有三点需要明确指出: 第一,从传播学角度上讲,难以看到“执权居士”是受到西周讲义中使用 “心理上学”影响的痕迹,毕竟西周当时仅仅在私塾授课的过程中使用“心理上学”,在学生中有所流传,并没有在知识界公开发表。第二,《百学连环》中作为“心理上学”同义词仅在一处出现的“心理学”不一定是西周的本意,可能是其学生永见裕笔录西周讲课内容的过程中产生。第三,西周早期用“性理学”来翻译“psychology”。

(二)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在日本的确立及其学术体制背景

在日本,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名称最早出现在 1873 年成立的东京开成学校。该校设置了“心理学及论文”科目,1874 年 12 月的一份任课教师名簿中就有“心理学”课程,其任课教师是美国基督教牧师帅福守(Edward W. Syle,1817—1891),此人曾在中国传教布道。1875 年 4 月,西周在译著《心理学(第一卷)》的注释中称:“mental philosophy,兹译为‘心理上之哲学’,约译为‘心理学’。”②西周此处使用“心理学”是一种图方便省事的做法,后来西周在著述中仍然经常使用“性理学”来指称“心理学”,另外,西周使用“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也可能受到当时开成学校已经设置“心理学”科目的

---

① 西周,述. 百学连环[M]//大久保利谦,编. 西周全集(第四卷). 东京: 宗高书房,1981: 68.
② 西周,译. 心理学(第一卷)[M]. 东京: 文部省,1875: 1.

影响,他是出于相互一致的目的,但是“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在日本还是逐渐得到认同。西周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心理学”对于心理学学科名称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与日本当时的学术体制背景密不可分。第一,当时日本正积极、广泛地引介西方的科学知识,一旦一门新知识出现,就能够迅速获得知识界的关注。第二,西周翻译海文的《精神哲学》一书,是受当时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委托,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一次翻译西学的工作,自然其确立的“心理学”的学科名称能够更容易获得日本知识界的认同。第三,西周不仅是日本明治时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其贡献之一是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诸多概念引入日本近代文化语境之中。① 其确立“心理学”的影响对于学界自然会比较大。

二、康有为与“心理学”名词

康有为(1858—1927)早在19世纪70—80年代主张通过翻译日文书籍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并委托在日本经商的同乡购买日文书籍。他在1896年得到大批日文书籍,开始编辑《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②《日本书目志》共收录心理学书25种,当时,日文中是以汉字“心理学”翻译“psychology”。可见,康有为在1896年接触并接受了“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日本书目志》由创立于1897年10月至11月间(光绪二十三年九月至十月间)的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③,但是未见出版日期。据《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的广告,《日本书目志》列于《孔子改制考》(此书中康有为所署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即1898年1月22日)之后,可推知《日本书目志》刊于1898年春。④ 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的《时务报》上发表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文中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自序”全部引用,如:“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况生、物、心、伦、哲、化、光、电、重、农、工、商、矿之有专学新书哉?”梁启超自己写道:“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

① 金钟哲.西周的启蒙思想与日本近代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94-196.
②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322.
③ 汤志均.戊戌变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3.
④ 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三集编校说明:1.

而研精……”①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其思想的积极拥护者，很可能在《日本书目志》正式出版前就读到书稿，并在报刊上借康有为的文字正式认可“心理学”这一术语及其学科。② 另外，大同译书局于1898年春还出版了日本森本藤吉述、翁之廉校订的《大东合邦新义》一书，该书中也使用过“心理学”一词：“今据心理学以推究之”，后有附注称：“心理学研究性情之差别，人心之作用者也。”③此书为日本学者用汉语而写，并非由日文译出，经删改编校而成，梁启超为之作序。这也反映出在康有为掌控下的大同译书局出版的书籍，为“心理学”一词的广泛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三、1902年的心理学

（一）梁启超与“心理学”的确立

自1900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较为广泛地承认心理学这一西方学科，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写道：“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逊于欧西”④，正式区分了“心理学”与“哲学”这两个名称。但是，当时学界对“psychology”与“philosophy”两词的翻译时有混淆，如《新世界学报》共设18门类的学科，梁启超认为其中的心理学和哲学两个学科门类被混淆了。他说：

> 此报凡分十八门，曰经学，曰心理学，曰伦理学……其分类有颇欠妥惬者，如其中心理学者一门，最为鄙意所不敢苟同，统观三号，其心理学门皆论哲学也。日人译英文之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方之语源相吻合……吾度著者……其意以为一切哲学，皆心识之现象也，故……不从东译而定此名，鄙人窃以为误矣。哲学之大

---

①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52,54.

② 阎书昌.“心理学”在我国的第一次公开使用[M]//杨鑫辉.心理学探新论丛(2000年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0-241.

③ 森本藤吉.大东合邦新义[M].陈高第，定校.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9.

④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3.

别,有唯心与唯物之两派,物者,正心之对待也。今惟以心学名之,不几将唯物论全行抹杀乎?若以为所研究之客体虽有心物之殊,而能研究之主体,惟在人心,故定以此名。然则宗教学、政治学、法律学乃至一切无形有形之学,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然则并此诸学而名心理学可乎?且既以 philosophy 冒此名,则于 psychology 又将以何语译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psychology 与 ethics(即伦理学)皆为 philosophy 中之一门,吾以为宜立哲学一门,而以心理、伦理皆入之,似为得体矣。①

(二)服部宇之吉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讲授心理学

1902 年 9 月,服部宇之吉(1867—1939)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着手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的教学计划、规章、设施建设等工作,并出任讲授心理学、教育学、论理学等课程的教习,并以"正教习"的身份对师范馆的教学进行督导工作,他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所授心理学课程的讲义由当时的助教范源濂译述,但是这套《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见图 2-2)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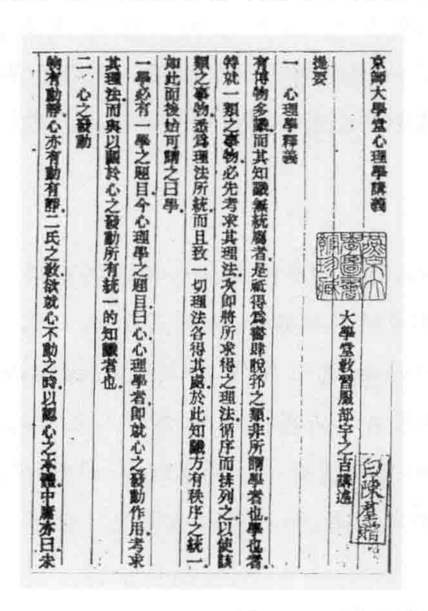

京師大學堂心理學講義
大學堂教習服部宇之吉講述
提要
一 心理學釋義
有博物多識而其知識無統屬者是祇得為書肆脫邪之類非所謂學者也學也者
特就一類之事物必先考求其理法次即將所求得之理法循序而排列之以使該
類之事物悉為理法所統而且致一切理法各得其處於此知識方有秩序之統一
如此而後始可謂之曰學
一學必有一學之題目今心理學之題目曰心心理學者即就心之發動作用考求
其理法而與以關於心之發動所有統一的知識者也
二 心之發動
物有動靜心亦有動有靜二氏之教欲就心不動之時以觀心之本體中庸亦曰未



图 2-2 《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

① 绍介新著[N]. 新民丛报,1902,18: 3. 壬寅新民丛报汇编[M]. p. 861. 此文没有署名,但是《新民丛报》早期几乎一直是梁启超主笔撰文,尤其此文中对心理学和哲学的划分有如此深刻见解者恐非梁启超莫属。

世很少,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着一册线装本,只有“提要”部分和第一编“知之作用及其理法”的三章内容,而且没有具体的出版时间,依照相关材料判断,其出版时间是1902—1903年。

(三) 王国维译著《心理学》

1901年王国维(1877—1927)开始从事译述西方学术的工作。在这一年,教育世界社开始印行的《教育丛书》系列中,王国维翻译了一些日本和英国的教育与哲学著作,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一些心理学知识。1901年秋王国维赴日本学习。1902年6月开始翻译日本文学博士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当年编入《哲学丛书》初集,由教育世界社印行出版。①

(四) 报刊上涌现心理学的文章

继“执权居士”之后,1902年9月15日的《申报》上再次出现含有心理学学科名称的文章,这是录自1902年8月31日《京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拟定直隶小学堂并师范学堂暂行章程》一篇文章,该文列出几十门课程名称,其中有心理学课程。从这些课程名称中可以看出日本教育中的学科设置对中国当时教育的影响。在1902年之前,只有《清议报》上发表过井上哲次郎的一篇《心理新说序》。而到1902年,当时几份重要的报刊出现了多篇心理学的文章,《普通学报》发表了亚泉的《心理学略述》,《新世界学报》设立了“心理学”专栏,相继发表了《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德国哲学思想之变迁》、《大大同说》、《田川大吉郎之学说》等文章,《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宗教心理论》。以心理学为主题的文章开始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开来。

在1902年,“心理学”的名称得以明确定制,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得以开展,以“心理学”命名的译著得以出版,以“心理学”命名的文章在报刊上开始广泛传播,因此1902年可以视为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上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年份。1903年,《新尔雅》出版,这是由留日学生编纂的近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新语词词典,在“释教育篇”中出现“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旧的心理学”等15个词汇。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规定,心理学在高等

① 据王国维父亲王乃誉1902年6月19日的日记载:“辰,观静译《心理学》,弥见东人心思之细,推勘愈微。”谢维扬,房鑫亮,编. 王国维全集(第17卷)[M]. 杭州/广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306.

学堂、大学堂中或为选修课,或与辩学合为一门课。自此之后,以“心理学”命名的这一学科获得学科地位,并正式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1908 年,清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致力于各个学科学术名词的厘定与统一。学部编订名词馆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机构。学部编订名词的工作历时三年,至 1911 年,整理了很多学科的名词对照表,其中便包括《心理学名词对照表》(该书版心题名为《心理学中英名词对照表》),共收录 251 个心理学名词。其编订心理学名词的原则是,对于心理现象比较重要的,以及心理学著作中常见者,对于使用较少的名词则未录入。《心理学名词表引》中称:

> 心理学之成一科学在欧洲近数十年间,顾其为学问也,虽新而其为事实也。甚古人类肇生虑灵,毕具有生不能无欲,有欲不能无求。官物相接而有知觉,利害相感而生忧娱,近取诸身皆可观察。百代文学多载其事实,三古哲人或阐其理论。周秦经典印度律论具穷心性之微,不乏参积之料。然古人之言,大抵有为而发,或传哲学之色彩,或带宗教之臭味,或因一人而施教,或为一时而立言,与近世科学区别矣。以例言之,如“reason”一语以儒家之语译之,则当为“理”。“sensation”一语以佛家之语译之,则当为“尘”。今览“理”字不无崇敬之情,睹“尘”字便有鄙夷之意,然二者皆心中之事实,无美恶之可言,望文生义差以千里,举此一端,余可三反然,使务去陈言,悉资新造。则东西言语本异渊源,彼此范围各有广狭,上文所论已尽其概,故在近日有可攻之学,而无尽善之名,盖可识矣。①

由此可以看出,“有可攻之学,而无尽善之名”,这是当时心理学名词审定的历史背景。当时严复等人在编制心理学名词时也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资源,但是由于东西语言还是有着较大差异,一些心理事实本没有好坏之分,如果单纯使用中国文化中的一些词语,可能会导致误解,因此才使得严复等

---

① 学部编订名词馆,编. 心理学名词对照表[M]. 第 1 页. 该表为学部编订名词馆所编《中外名词对照表》的一部分。《中外名词对照表》当时并未公开发表,请参见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13052871/.

人“务去陈言,悉资新造”。严复等人在当时是有意识地在造制新的心理学名词。《心理学名词对照表》中关于“psychology”的定名理由是对已经发生的过程的解释,而且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因此不宜视作心理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性年份。心理学在中国真正确立的年份要更早些,那就是1902年。

四、“心理学”名称变迁的分析

(一)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碰触下的名称变迁

19世纪最后30年时间里,中国知识界不断触及心理学这一学科。“执权居士”于1872年首创“心理(学)”,“真实之士”当年使用“性理(学)”;狄考文于1875年使用“心灵学”作为课程名称;1880年《申报》使用“心学”一词指代颜永京讲授的心理学课程;颜永京于1882年创制“心才学”;1886年《格致小引》中的“性情学”和《格致总学启蒙》中的“心性学”;颜永京在1889年使用“心灵学”命名了第一本心理学译著;丁韪良于1898年使用了“性学”;康有为、梁启超于1897—1898年正式引入“心理学”。其间,还有年代和著者不明的《灵学略论》中的“灵学”一词。这一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与这一学科接触过程中对其名称所作的种种选择。其中“心灵学”和“mental philosophy”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心理学界最终选择接受“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而颜永京和丁韪良在宗教领域内分别使用的心理学学科名称“心灵学”、“性学”则逐渐被淘汰了,尽管“心灵学”作为心理学学科名称在宗教领域又曾延续多年,但最终改称为“心理学”。在当代学科体系中仍存在“心灵学”、“心灵哲学”和“性学”等名称,但是它们已经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成为心理学之外的学科名称。

(二)“心理学”接纳的传播学分析

当从日本输入的汉语词汇与当时汉语语境中创制且已经稳定下来的汉语新词发生冲突时,往往前者被淘汰或者仅在很小范围内使用,而后者被汉语接受。[①] 1872年“执权居士”所用的“心理(学)”似乎是昙花一现,随即被“真实之士”用“性理‘学’”“纠正”。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学”这一学科没有

①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179.

随即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否则“心理(学)”就有可能在中国更早地被采用。另外，无论是颜永京使用的“心才学”，还是丁韪良使用的“性学”，以及他人使用“性情学”、“心性学”、“灵学”来指代“心理学”，都没有达到在汉语中稳定使用的程度，如颜永京创制的“心才学”目前仅见他曾在1893年第50册《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日使文学汇集・译序》中再次使用。这是“心理学”作为日语词汇输入中国最终成为该学科名称的部分原因，而那些曾用来指代心理学学科的“心才学”、“心灵学”、“性学”等术语或者未被继承，或者成为其他学科的名称。

(三)“心理学”名称演变与中国文化

“心”字作为汉语中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其本义为“心脏”的符号，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逐渐衍生出“精神”的含义。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此处就表示不可见的精神的变化。再如《管子・心术》中“心也者，智之舍也”，即指心是智慧之所。《礼记・大学疏》中“所包万虑谓之心”，《易经・系辞》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均是用心来表示人的思想、情感、态度、意志等精神世界的东西。“心”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之丰富，足以构成一个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体系。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在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的知识分子面对一门描述和探讨精神世界的知识体系时，“心”字因其内在文化内涵之丰富和重要而成为学科名称的关键词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据台湾熊钝生主编的《辞海》(最新增订版)称，“心”与“理”连缀或连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后汉书・左雄传》中“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言文无句读，致使后人因对这句话断句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理解，此句亦可点逗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东晋诗人陶渊明在诗句中曾写道：“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梁代刘勰写过“是以联辞结彩，将欲明[经]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王廷相写过“心理贵涵蓄，久之可以会通”。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与“理”建立巩固联系的功劳当推以“心学”著称的陆象山。他写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此后，“心”与“理”二字在中国文化中形影相随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际，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深化，异族以及异域文化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文化冲击，中国人在不断

感慨“心同理同”的过程中，“心”与“理”二字连用的情况经常出现在当时中国人与西方传教士的互动之中，其现代含义在不断地萌生着。《明清间耶稣会士著译提要》一书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一迹象。如张星曜在《天教明辨》自序中写道：“此象山有云：‘东海西海圣人出焉，心理同也。’”“心”与“理”二字在这里虽然连用，但仍然是两个词，仍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李之藻在《天主实义重刻序》中写道：“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许胥臣在《西学凡·引》中称：“吾闻西国书言，大抵千里一译，距我中华，虽心同理同，而语言文字别有天地，敻不易知。”很明显，在这里是将“心理”与“言语文字”相对应起来，而且是将“心理”视为“言语文字”背后的东西。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中称：“又论人记含之所悉在脑囊。乍聆之未免创论可駴(古通‘骇’——引者注)，然人当思索时瞑目蹙眉，每向上作探取状，且二东方言以不能记者谓‘没脑子’，此亦足征其持论不诬，而东海西海理相符契者矣。”此处“理”的意义就是一般意义的“道理”、“规律”，不再是陆九渊思想体系中的哲学范畴，尽管仍能看出与他的联系。高一志在《譬学自引》中写道：“如云：‘德照心，目照身。’目照身之理，显于德照心之理，故此由彼可以明矣。”① 此处将“身”与“心”对应，而且还指明“心”是有“理”的，也就是说“精神”是有规律的。张耀翔曾写道：“‘心理学’三字在中国古籍上似未在一处排列过，就是‘心理’二字相连的时候也很少。”②心理学这个学科名称的产生脱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互动的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下的古籍自然中是找不到的。“心”与“理”二字连用在中国古籍中虽然很少出现，但是依然构成了中国的“执权居士”在独立学科意义上创用“心理(学)”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尽管中国古籍中这种“心”与“理”二字连用的情况在被后人进行解读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这种文字形式，是中国晚清时期传统知识分子所能耳濡目染到的。再如，在晚清时期，“究心理学者”、“潜心理学者”、“存心理学者”、“留心理学者”这样连缀的字眼经常出现在一些书籍之中。当面对“psychology”进行术语创制的时候，中国文化中的这些资

① 徐宗泽，编.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91，224，232，255.
② 张耀翔.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J]. 教育心理研究，1940(3)：16－31.

源自然有被借鉴的可能性。因此,“执权居士”首创“心理(学)”脱离不开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同时,日本学者西周确立“心理学”名词也没有脱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他在确立“心理学”名词之前使用过汉字“性理学”,这也是地道的中国文化产物。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中日各自产生“心理学”名词的过程中具有一点共性,那就是都各自出现过用“性理学”和“心理学”指代同一个学科。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心理学”名词出现的影响。对于汉语中接受“心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①

中日相继使用“心理学”三个汉字命名或定制学科名称,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继承。“心”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密切的联系。②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儿玉齐二认为,西周对心理学学科的命名最早可以追溯到“性理学”一词,尽管西周翻译出版了《心理学》之后,还曾继续用“性理学”来指称心理学学科,但是“心理学”一词作为学科名称的影响超过“性理学”,由此可见,“心”字出现在这个学科名称中被人认同的程度更高。另外,心理学这门学科在与中国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产生了“心学”、“心才学”、“心灵学”、“心性学”、“性情学”、“性理学”等多个学科名称,其中出现较多的字眼就是“心”字,这跟“心”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底蕴丰富密不可分。

关于“心理学”一词长期以来存在“外来语”说和“出口转内销”说这两种观点,一定意义上来讲并没有严格的对立,因为它们各自表述的是不同方面的事实。“外来语”说强调的是日本自西周于1875年确立“心理学”一词之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个学科迅速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及其学科地位的确立。虽然“执权居士”早在1872年就创制了“心理(学)”一词,但是心理学学科引介到中国却一直处于缓慢前行的状态:1875年山东登州文会馆设立“心灵学”课程;1877年《格致汇编》杂志上发表了带有科普性质的《格致略论》一文,其中“论人之灵性”部分粗略地介绍了心理学的体系和知识;1882年颜永京牧师创制了“心才学”一词用以翻译“psychology”;1889年颜

① 钟年.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J].心理学报,2008:748-756.
② 燕国材.“心理”正名[J].心理科学,1998(1):97-101.

永京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汉译心理学著作《心灵学》(上本);1898年丁韪良出版了心理学著作《性学举隅》。这些事件都没有起到像在日本那样学科确立的作用,而中国知识界是到19世纪末才从日本正式引入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学科及其"心理学"这个学科名称,随之这个学科在中国确立了学科地位。

"出口转内销"说强调"心理学"一词在日本的确立是西周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与"理"的内涵,可以说是西周深厚的汉学素养促成他确立了"心理学"一词。这里所说的"出口"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目前发现"执权居士"早于日本学者西周创立"心理(学)"这个名称,也没有发现证据表明西周是受到"执权居士"的启发而确立"心理学"这个学科名称,只能说是他们都是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下,各自独立地创造性地使用了"心理(学)"这个名字,只是"执权居士"更早地原创性地使用了这一词,但是他并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那样迅速地确立起一个学科的名称。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对西学的接受要比中国更为积极主动,更为开明。当中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日本为中介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时候,心理学这个学科及其名称才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和采纳,但是在当时乃至目前的中国学界一直没有注意到,中国比日本更早地创立过"心理(学)"这个学科名称。继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黄胜、黄宽三人于1847年在美国学习精神哲学课程,传教士罗存德使用"灵魂学"翻译"psychology"之后,"执权居士"文中提及的"心理(学)"很可能是中国人在汉语语境中首次触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文化内涵为基础对"psychology"的原创性翻译。

第三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学科初创（1902—1918）

第一节　教育近代化背景下日本心理学的输入

一、京师大学堂与心理学

近代以来，为挽救处于危难时刻的民族和国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要变法自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京师大学堂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诞生的。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7 月 3 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9 月 21 日爆发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而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而保留，但举步维艰。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爆发，大学堂难以维持，于 8 月 3 日被下令停办。1902 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张百熙请出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聘请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 1862 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大学堂。12 月 17 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大学堂首先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1902 年，吴汝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后赴日本作了为期近 4

个月的教育考察，推动了清政府聘请日本教习到中国任教的政策。

服部宇之吉是京师大学堂聘请的日本教习之一。他曾于1899年为研习汉学留学中国，此后一直对儒学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儒学的传播。1902年9月，服部宇之吉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出任讲授心理学、教育学、论理学等课程的教习，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二、近代师范教育与心理学

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法定学校系统和师范教育的起始建制。1904年重新颁布并推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和优级。《奏定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在"教育原理"课程中要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奏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优级师范学堂的公共科和分类科都要将心理学设为必修课程，其中在分类科中，第一学年设普通心理学课程，第二学年设应用心理学课程。另外，加习科中设有实验心理学课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预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在第二学年要学习心理学课程，但其中那些有志于从事中国经学的学习者可以免修心理学课程。①

随着心理学课程在师范教育中的设置，心理学书籍以及教师需求不断增加，进而译自日本的心理学教材不断增加，留学日本研习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学生也日渐增多。国内于1901—1905年出版的译自日本的心理学译著主要有：1901年樊炳清译、林吾一著的《应用心理学》；②1902年久保田贞则编纂的《心理教育学》；王国维译、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1903年张云阁译、大濑甚太郎和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上海时中书局编译的心理学讲义《心界文明灯》；沈诵清译、井上圆了著的《心理摘要》；③田吴炤译、高岛平三郎著的《教育心理学》；1905年出版的大久保介寿著、湖北师范生陈邦镇等编译的《心理学》(内页署为《教育的心理学》)，此书为师范教科丛编之一。其中明显带有教科书性质的心理学书籍有以下几种。

---

①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70，684－692，562，564.

② 王绍曾. 清史稿艺术志拾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534.

③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27.

久保田贞则编纂的《心理教育学》,1902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译者未署名,仅书末所附校勘表署名黄葆恒。书中开篇为总义(教育的意义、定义与区分)、其后十二章分别为心意(mind)总论、心身关系、心意发育论、注意力、感觉力、知觉力、记忆力、想象力、概念力、断定力、推理力、教授法。可见,此书带有心理学在教育中应用的性质,是一本教育心理学著作。该书列为《教育丛书》第一种,书前有赵必振(1872—1956)撰写的"教育丛书序",序中写道:"生存竞争,风潮烈哉,何以生存,曰惟教育;何以竞争?曰惟教育。……教育其生存竞争之枢纽哉。……立于生存竞争之世,教育尤不可缓矣,群雄耽耽,万国骋逐,有教育者存,无教育者亡,教育而完全者强,教育而不完全者弱,世界之觇国者所公认也。"①由此可见,出于教育救国,改革旧教育的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将《心理教育学》翻译出版并列为《教育丛书》第一种,以供教育者使用。

1903年出版的由张云阁译、大濑甚太郎和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由直隶学校司编译局印行。该书目录为:绪论、第一篇心象泛论;第二篇知识(上,直观;中,观念;下,思考);第三篇感情;第四篇意志;第五篇个性及自我;结论。该书序言中称"西国著名教育家最重心理学,心理学精深奥博,吾国人士多未之讲",表明当时我国教育不发达,还不清楚心理学的重要性。从该书经直隶学务处鉴定,并由直隶学校司编译局印行来看,当时的教育部门开始关注并重视心理学这一学科。此外,此书还有另外一中译本,是1905年由江苏通州师范学堂出版的,译者为顾绳祖。由此可见,此书作为师范学堂教本使用得比较广泛。②

1903年由上海时中书局编译的心理学讲义《心界文明灯》。此书明确指出"是书为心理学讲义",该书共十回(章),简要目录为:第一回心理研究之材料;第二回意识及注意;第三回就精神现象之要素及其分类;第四回就精神现象之总合及分解;第五回论认识作用;第六回认识作用(续);第七回论感情之现象;第八回欲望及意思(志);第九回人格论;第十回社会心理及结论。③

---

① 赵必振.教育丛书序[M]//久保田贞则.心理教育学.上海:广智书局,1902:1.
② 杨鑫辉,赵莉如.心理学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29-130.
③ 同上:131.

田吴炤译、高岛平三郎著的《教育心理学》,是一部经由总理学务大臣审定的师范学校教科书。该书共分五篇,第一篇绪论、第二篇觉性之心理、第三篇悟性之心理、第四篇理性之心理、第五篇心理法及自我。前面有高岛平三郎作于1899年的序言和田吴炤作于1903年的例言。例言中称:"是书专就教育说明心理学,所谓应用心理学也。"可见,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学的应用性问题。又称"此书与已刻之初等心理学相辅而行,互证参观,可得普遍应用之益"。说明在此之前,还印行了一本《初等心理学》,关于此书的记载又见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初等心理学》,无卷数,日本岛秀太郎著,田吴炤译,光绪二十八年移山堂丛书本,中译。"①但未访得此书。

1905年出版了大久保介寿著、湖北师范生陈邦镇等编译的《心理学》(内页署为《教育的心理学》)。此书原著为日本高等师范教授小泉所编,大久保介寿在湖北师范"参酌群书,阐发精义"口授之后,经过学生陈邦镇、范维藩、郭肇明、胡鹏翥、傅廷春五人编译而成,由湖北学务处发行,在日本东京印刷。共分绪论、第一编心的现象泛论、第二编知的现象、第三编情的现象、第四编意的现象、结论六部分。此书列出的九本参考文献中就有冯特的《心理学大纲》和海甫定的《心理学概论》。

这些心理学教科书在师范学校的广泛使用为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展示了日本心理学在中国早期接受西方心理学的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第二节　西方心理学的间接输入

一、服部宇之吉:开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科学心理学的教学活动

如前所述,清朝末期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早期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教会学校,但是在19世纪末以前,严格来说,这所学校的基本性质还属于中等教育,而且登州文会馆的教育是为宗教服务的。颜永京于1879年在上海圣约

① 王绍曾.清史稿艺术志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534.

翰书院以海文的《精神哲学》为教材开设了心理学课程,但是无论是教材本身,还是作为传教士的教学活动,都带有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性质。日本教育家服部宇之吉于1902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讲授心理学课程,为心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服部宇之吉所授心理学课程的讲义是由他当时的助教范源濂译述,但是这套讲义留世很少,此线装本没有具体的出版时间,有可能出版于1902—1903年。服部宇之吉的讲义经过润色修改后于1905年在日本以中文出版。该书版权页标明此书于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日本印行,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四由东亚公司发行,也就是于1905年11月出版发行。作者在此书"心理学讲义凡例"文末所署日期为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在"凡例"中作者提到,"本书系因予所讲授清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之稿本而增损润色者"。由此可见,此书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线装本的修订版,而且特别注明是全册,应该是针对非全本的线装书而言。《心理学讲义》形成于服部宇之吉自1902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授课的讲义,然后在日本以中文形式印刷,同时它的读者群又是中国人,因为此书版权页上注明是在上海发售,尤其在正文中并列提到中国和日本时,也是把"中国"置于前,"日本"列在后,这是由日本学者在中国教育背景下撰写的一部心理学著作,因此它是中日心理学早期交流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讲授该教材的过程开启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科学心理学的教学活动。因此,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一书在中国近代科学心理学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心理学讲义》共分四部分:

> "提要",共分八节:心理学释义、心之发动、心身之关系、心之发动与心识、心理学与他学之关系及异同、心理学之门类、心理学研究法、讲义之次第。第一编"知之作用及其理法",先列有"提要"部分,其后共分四章:第一章感觉(总论、味觉及嗅觉、听觉、视觉、筋肉感觉、感觉之主观性,附妄觉、感觉之发达)、第二章知觉(总论、触觉的知觉、视觉的知觉、时间知觉、幻觉附妄觉、融会作用)、第三章想象(不分节)、第四章思想(总论、概念、断定、推测、思想之发达);第二编"情之作用及其理法",先列有"提要"部分,其后共分九章:恐怖及忿怒、同情及爱情、自我之

情、异性相爱之情、情之简单者进化而成复杂者之理、社会的情及道德的情、宗教的情、悦美之情、知的情；第三编“意之作用及其理法”，此编不分章。①

服部宇之吉在《心理学讲义》中对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意义的阐发，展示了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初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图景。服部宇之吉在讲授心理学过程中，凡能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讲解心理学学理的地方，就“说明之或疏证之”，这样一方面可以增进中国学生的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学术的进步。从这里可以看到心理学在中国传播之初，走的是与中国文化相互沟通的道路，具有一定的中国化倾向。到底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对现代心理学有没有借鉴意义呢？固然如服部宇之吉所言“中国古来学术与心理学相发明者不少，但语而不详者多，又不合于心理学之理者亦往往而有”。服部宇之吉一百年前就认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心理学讲授能够“助学术之发达”，他不但自己“讲授心理学实用此法”，还认为“后之讲此学者，其亦致意于此”，②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心理学讲义》中以孔、孟、尧、舜、盗跖、道、释、《中庸》、《大学》、《学记》等的大量观点或内容为例讲解心理学知识。例如：以《乐记》中“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说明知与情感的关系；《大学》中“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孟子》中“心之官则思”，这里的见、闻、知味、思描述的都是人的心理活动；“今见洪水，想陶唐氏九年之水时，又并想鲧殛死及禹治河之绩是也”、“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来说明“因全体与一部之关系之联络”，即整体与部分的联想；以“从来经易水，谁不念荆轲”来理解“因接近之联络”，即接近联想；又如用天下“九州说”和“以日月之蚀为人君失德之所致”的观点解释何谓“断定不精”，即判断错误。③ 服部宇之吉用“孟子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来论证利他心理具有本能特征。服部宇之吉认为，心理学知识可以帮助解决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争论。例如，运用知觉的理论就可以

① 服部宇之吉. 心理学讲义[M]. 东京：东亚公司，1905：1-5.
② 同上，凡例：1.
③ 同上：82，83，110.

很好地攻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又如中国古代性善与性恶之争,其实各自讨论的是道德和本能,是讨论对象的不同导致一直聚讼不断。

服部宇之吉在《心理学讲义》中利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在同一时期汉语心理学著作中是很少见的。服部宇之吉多利用中国文化作为其心理学知识的注脚,但是作为一百年前的学术形态,对其评价不能脱离历史发展阶段。进一步分析来看,服部宇之吉引用的材料多属于中国古代对某一心理事实的认识和描述,彰显出中国古代对心理现象的深刻洞察力,固然中国古代心理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心理思想仍然是我们在当代建构中国心理学体系过程中必须汲取的文化营养。当然,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解释心理学的过程中,服部宇之吉的某些解释也是值得商榷的。①

二、王国维:多元途径输入西方心理学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是推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18岁以前接受旧教育,18岁这年(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他开始知道有所谓的新学,即西方科学文化知识。22岁他赴上海追求西学,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日文和英文,后来对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产生浓厚兴趣。1901年王国维开始从事译述西方的讲义和书籍。在这一年,教育世界社开始印行的《教育丛书》系列中,王国维翻译了一些日本和英国的教育与哲学著作,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一些心理学知识。1901年秋赴日本学习,1903年起先后到通州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当教员,讲授心理学、论理学、社会学等课程。此后他逐渐致力于文学与史学的研究。1907年王国维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主管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务。1923年他被召为故宫“南书房行走”,成为废帝溥仪的老师,并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投昆明湖自尽,终年50岁。王国维在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心理学的著作翻译与教学工作

他翻译了三部心理学著作:日本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1902)、

① 阎书昌.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J].心理学报,2009(5):464-470.

丹麦海甫定著的《心理学概论》(1907)以及美国禄尔克原著、日本柿山蕃雄和松田茂合译的《教育心理学》(1910),同时王国维早年还曾任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①] 王国维最初翻译日本心理学著作,随后直接从英文翻译了欧洲的心理学,最后从日文中翻译了美国心理学的著作,反映出王国维从多种途径输入西方的心理学,推动了心理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

元良勇次郎(1858—1912)生于日本摄津国(今兵库县)。1883年赴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88年在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指导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890年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是日本最早的心理学教授。他著有《心理学》(1890)、《心理学十回讲义》(1897)等。《心理学》作为元良勇次郎博士毕业后仅两年的早期著作,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更带有比较强的美国心理学的取向。一定意义上来讲,这是美国心理学经由日本向中国的传入。王国维翻译元良勇次郎心理学著作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其讲授心理学课程的需要。

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共分五编,其简要目录如下:

> 第一编总论:原理;第二编感觉,分为三章:感官、感觉之结合、意识之性质;第三编主观的观念,分为五章:观念之再生、幻影、概念、想象、理想;第四编苦乐之感,分为八章:苦乐之学理、音乐、绘画、美丽之学理、律、笑、爱情、社会的感觉;第五编观念之刺激的性质,分为七章:注意、习惯及本能、自觉之性质、欲望、表出、意志、伦理的感觉。[②]

此书心理学体系涉及近代哲学、美学、论理学的内容,比较符合王国维

---

① 在《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第307页收录有王国维著的《心理学》,为教育世界社出版,87页,22开,出版时间不详。书的卷端书名题为《心理学大意》,封面印有"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字样。该书分绪论、知识、感情、意志、个性及自我、结论6章。可惜目前查找不到此书。王国维1903—1905年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如果他确实编写了这本讲义并出版,这将与陈榥1905年自编的教科书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另外,此书目录又与大濑甚太郎、立柄教俊合著的《心理学教科书》(该书曾在江苏通州师范学堂作为教科书,并由顾绳祖译出发行)目录很相似。由于原始文献未面世,只能付之阙如。

② 王国维,译.心理学(元良勇次郎著)[M]//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第17卷).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310-467.

的学术兴趣。书中提出“心理学者,研究所谓人者也”,研究人的精神、身体及两者之关系。“观念者,精神现象之本体。心理学之宗旨,即在研究观念之性质、起原及其活动之法则。”“心理学与哲学大异”而“与科学之关系颇甚亲密”,尤其重视心理之生物学的基础,如谈“美丽之学理”,则提出“三要质”:“眼球筋肉之感”、“色之调和”、“由同伴法(即联想——引者注)所惹起主观之观念”。这些论述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理解心理学有着积极意义。同时王国维在书中往往加入按语,引用我国古代诗句来解释某些心理现象,如用“离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解释“心物相关”的学理,用“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来解释“乐天然之美时,不若不交以人之作用而乐之”,等等。王国维在书中多次使用按语或直接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诗句或典故解释心理学的内容,如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解释意识问题,利用孟子和告子的争论解释概念的抽象性问题,等等,这些内容体现出王国维在翻译心理学著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文化蕴含心理学思想和观点的价值。

王国维所译《心理学概论》的原著者是丹麦哲学家海甫定(Harald Hoffding,1843—1931),原著为1882年丹麦文版,1886年译成德文,1891年由龙特(Mary E. Lowndes)从德文译成英文《心理学概论》(*Outlines of Psychology*)。英文版经原著者校对和加注,补充了一些当时新的科学发现。[①] 此书可以看作是欧洲心理学向中国的早期输入,此书因是当时师范学堂用书,在当时的教育领域广泛应用。截至1935年,此书曾经印行数次,它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译著。全书共有七篇,内容十分充实。其简要目录如下:

> 第一篇心理学之对象及方法(分九节);第二篇精神及身体关系(分八节);第三篇意识与无意识之关系(分十二节);第四篇心理的原质之分类(分七节);第五篇知识之心理学,第一章感觉(分七节)、第二章观念(分十二节)、第三章时间及空间之理会(分十节)、第四章实在之事物之理会(分五节);第六篇感情之心理学,第一章感情及感觉(分四节)、

①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16.

> 第二章感情及观念(分四节)、第三章利己的感情及同情的感情(分九节)、第四章感情之生理学及生学(分三节)、第五章相对律之于感情中之确实性(分九节)、第六章感情之及于知识之影响(分四节);第七篇意志之心理学,第一章意志之根本性(分六节)、第二章意志及意识中之他原质(分五节)、第三章个性(分四节)。①

《心理学概论》明确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心理学,并介绍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心理的生理机制,因此,从心理学的体系来讲,此书明显比元良勇次郎著的《心理学》更接近现代心理学。《心理学概论》作为师范学堂用书,首次印刷于1907年,其后多次再版,作为一本有着较严密心理学体系的著作在当时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王国维于1906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所拟的"经学科"、"理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等四科的学习科目中都规定有心理学课程,②可见王国维当时对心理学十分重视。

美国禄尔克著的《教育心理学》,由日本柿山蕃雄、松田茂合译成日文,王国维于1910年重译出版,由清学部图书局印行。全书共有226页,其目录如下:

> 除绪言外,有四篇分别论述精神现象之分类,精神之物质基础,精神、意识,精神活动之条件;有七篇论述知力(包括感觉、记忆、判断、想象),感情(包括情绪、感应、欲望),意志等。各篇均先阐述心理学原理,然后联系教育上的应用,便于教师实践。有六篇论述领受力、推理力、表出力、创造想象和意志之修养等。最后三篇:第一篇为心理学之于形式教育上之应用,形式教育问题,包括教育机关制度、学校制度及其行政,对学生贯彻体育、智育、德育以及学校管理法;另两篇为方法论和精神研究之方法及记述。

① 海甫定.心理学概论[M].王国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10.
②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M]//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23-829.

《教育心理学》是由禄尔克在自己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深知心理学对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专门为普通教师撰写的著作。王国维从翻译偏哲学的心理学著作,到从英文翻译更接近现代心理学的著作,再到翻译具有应用价值的教育心理学著作,大体上表明了他的学术兴趣以及对心理学应用性的重视。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独自一人翻译出版了三部心理学著作,而且其中两部著作直接源自西方心理学,这对于当时学术界更好地理解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学术术语汉译的观点

西方学术术语的汉译,即“新语”翻译问题。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对学术术语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他认为中国人的特质是讲究实际的、通俗的,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擅长抽象并精于分类,因此在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际,中国学术界不得不创制新名词。王国维探讨了evolution(天演/进化)、sympathy(善相感/同情)、idea(想念/观念)、conception(共名/概念)译词的优劣,主张沿用日本已通行的术语,认为“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而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两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①]王国维的学术术语的翻译理念,再加上他几部心理学译著的广泛传播,使得他对后世心理学术语的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心理学应用于社会实践

王国维1907年发表了《人间嗜好之研究》,这是明显带有研究性质的心理学论文。王国维将“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活之事业,亦骛而趋之”者称为嗜好,王国维以意志论、痛苦说、悲观者学说论述了嗜好的心理、生理原因和理由,其核心主张在于倡导以高尚的嗜好取代低级的嗜好。“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不然,则必有溃决之一

---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M]//王国维遗书(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99-101.

日。此又从人心活动之原理出，有教育之责及欲教育自己者，不可不知所注意焉。”①王国维还曾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过鸦片嗜好及其治疗的方法(即宗教与美术)，虽然他的观点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偏颇性，但是王国维在当时尝试用心理学理论为工具分析人的嗜好，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对于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三、陈榥及其《心理易解》

陈榥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版，三十二年六月再版)编辑出版了《心理易解》一书，此书被学界认为是我国学者最早自编的心理学书籍。该书由日本东京同文印刷会印刷，总发行设在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内的教科书译辑社，在国内由上海会文堂发行，其出版的著作在国内很受欢迎。陈榥(1872—1931)，字乐书，义乌(今浙江金华)人，是浙江求是中西书院的高材生，1898年4月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兵工科学习。1904年在日本参加过光复会和同盟会。民国时期，他在国内为发展军火工业作出了贡献，并参加过民国时期的革命。他曾任北京大学数理教授，1922年返回家乡专心著述。他在日留学时对心理学并没有专门研究，在一次生病期间，以心理学自娱而编成《心理易解》。② 他说：“甲辰秋，予因病辍学一年，养病日本相州之平塚，海滨孤寂，药炉茗椀，相对无聊，以心理学书自娱，非素所治者也，稍辑译之，积日而成秩，遂以付梓。”③全书分总论、分论和决论三部分：

> 总论部分为四章：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意识、神经系统。分论部分为三编：第一编为知识，分三章为觉性、念端、悟性；第二编为感情，第一章嫌恶，第二章感情及感觉，第三章记忆、想象及悟性所结合之感情，第四章感情之相对律，第五章感情及于知识之影响；第三编为意志，分四章为总论、意志之原始、知识感情发达后联结之意志、意志实验法。决论部分为人格论。④

---

① 王国维. 人间嗜好之研究[M]//王国维遗书(三).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584-585.
②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34.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近现代人物录[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08-209.
③ 陈榥. 心理易解[M]. 东京：教科书译辑社，1906，序文：6.
④ 同上，目录.

陈榥在"辑言十则"中称,此书主要参考日本心理学书籍,英文书籍仅参考了马厄(Michael Maher,1860—1918)的著作 *Psychology: Empirical and Rational*(1900)。由于心理学著作中诸说纷繁或无定论,因此他在编辑此书时按照自己的思路而采纳其中一种观点,对学术之争都未写入。这本书定位于中等师范教科书的水平,对于心理学的历史以及心理学的分科都没有详细介绍,因此这本书带有普通心理学的性质。

陈榥同样遇到用汉语翻译心理学术语的问题。他书中所用术语名词多沿袭了日文的用词,但也有一些词略加改动,如把"观念"改为"念端"、"概念"改为"浑念"、"思想"改为"思虑"、"把住"改为"蕴积"、"本能"改为"良能"。虽然陈榥自认为读者阅读他略加改动的词仍能知道日文中是何词,但是从现在来看,他修改后的术语都没有被后世的心理学接受,反而是日文中的汉字心理学术语多沿袭至今。陈榥在该书中还大量使用了中国典故、谚语、诗词说明心理学的现象和规律,例如:用汉高帝、张良、诸葛亮等人的事例说明没有事情做觉得时间长,有事情做则会觉得短的时间知觉问题;用"百闻不如一见"来说明视觉的重要性;用岳飞的《满江红》说明达到目的产生快感的心理现象;用"喜鹊叫后有喜事"说明"偶然继续律",如果将偶然的关系看成是因果的关系,则成为迷信。同时,陈榥在此书中的一些事例也引用了大量中国历史、地理相关的知识。另外,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也经常被陈榥引用。陈榥不仅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素材作为心理学知识的注解,而且还对中国古代具有心理学内涵的思想进行了一定的阐发,如中国古代的"省心克己平心养气说"、"良心说"。可以说,陈榥自觉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学进行讲解,但是还没有自觉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

四、蒋维乔及其两部心理学教科书在教育中的作用

蒋维乔(1873—1958),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佛学家。清末时期,身处教育界的蒋维乔秉承"救国之本还在教育"的宗旨,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的实践,即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蒋维乔在其教育实践过程中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蒋维乔的心理学著作主要有两部：第一部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心理学》，于1906年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名义编译，由蒋维乔校订，截至1914年，8年时间内先后印刷了四版，可见这是当时使用很广泛的一部著作。该书第四次印刷时编译者已经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为蒋维乔。另一部著作是《心理学讲义》，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外封署名为蒋维乔编，内页写明是由蒋维乔和日本学者长尾槙太郎合述。此书是教育部审定用书，是当时师范讲习社的师范讲义。此书初版于1912年，1913年再版。蒋维乔还校订了张子和的《广心理学》和张毓骢、沈澄清撰的师范学校教科书《心理学》。

蒋维乔编译并校订的《心理学》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是早期心理学著作之一。此书共分二十八章，其各章目次分别为：

> 绪论，感觉、嗅觉、味觉、听觉、视觉、触觉、筋觉、体觉、知觉、观念、观念之联合、观念之类化、记忆、想象、判断、概念、推理、感情感应、情绪、情操、冲动、本能、欲望、意志、意志及习惯之关系、心身之关系、个性。其中从第二章“感觉”至第十八章“推理”为“知”，第十九章“感情感应”至第二十一章“情操”为“情”，第二十二章“冲动”至第二十八章“个性”为“意”。①

由此可见，此书秉承了自康德以来的心理三分法体系，这种体系也是当时共识性的心理学体系内容。蒋维乔和长尾槙太郎合述的《心理学讲义》章节目次分为三大部分：

> 通论(心理学界说、心理学之分派、心理学研究方法、精神之生理的基础、精神现象之分类)、各论(意识、注意、感觉总说、感觉各说、知觉、观念、记忆、思考、感情总说、感情各说、欲望、运动及意志、品性)、结论(心之发达、个性气质及人格)。②

---

①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 心理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1－5. 此书第4次印刷时作者署名为蒋维乔。

② 长尾槙太郎. 心理学讲义[M]. 蒋维乔，编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1－2.

比较这两部著作会发现,《心理学》的体系章节目次有些混乱,可见中国引入和接受心理学早期状态的情形。而《心理学讲义》的体系明显更为清晰,可以说心理学的引入过程截至清末民初已经初步具有清晰的体系框架,并为民国时期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同时在《心理学讲义》书后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的广告页中提到:"教育部新定师范学校章程,特设小学教员讲习科,分一年、二年两类,毕业后得充当小学教员。……本馆出版各书最为适用。"其中二年制心理学教科书是蒋维乔编的《心理学讲义》,这也是经教育部审定的一部心理学教科书,一年制用的是蒋维乔1906年编译的《心理学》,可见蒋维乔的这两部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师范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蒋维乔从事心理学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倾向,这决定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近代学科的引入也是出自清末当时"教育救国"运动的需要。蒋维乔从事心理学工作是为教育服务的,其最终目的是将心理学的理论和规律应用于教育。1903年5月,蒋维乔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国文教科书编辑,开始了他的教科书编辑生涯。自1904—1906年出版了由蒋维乔编撰的十册《最新国文教科书》。其后蒋维乔与同仁们相继完成修身、习字、算术、历史、地理等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对中国新教育的开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蒋维乔遵循着教育学原则以及心理学规律,使这一系列教材反映出新式教育的要求,满足了时代的要求。蒋维乔为了更好地进行教科书的编写,广泛研究国外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一方面进行心理学的研究和论述,另一方面在教材编写和教育工作中进行心理学实践。

按照儿童心理特征编写和编辑教材,是蒋维乔最为突出的教育思想。首先是教科书的形式,以《国文》教科书为例,"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宜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其次是从材料方面,"杂采各种材料,以有兴味之文字记述之。……各课排比,以各种材料彼此交互错综,无形中前后联络,以便儿童记忆。各课皆附精美之图画,图画布置须生动而不呆板,处处与文字融合。凡图画与文字,皆同在全幅之内,不牵涉后页。"①可见,蒋维乔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运用了材

① 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M]//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138-145.

料难度与记忆、材料性质与兴趣、材料之间关系与记忆、学习材料直观形象性以及整体性关系的一系列心理学原理与规律。这是心理学在引入中国之后第一次在教育中有意义的、成功的实践。在这个历史时期，其他学者，如王国维，还基本上停留在引介和传播心理学的阶段，还很少亲自从事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实践工作。蒋维乔在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写过程中的心理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09年，蒋维乔和汪炳台就心理学的体系与术语展开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讨论。蒋维乔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心理学术语解》，认为“教育必以心理学为基础，……舍曾受师范教育者外，多忽视此学。偶有研究者亦苦于术语之难解……”，因此，“取心理学术语，一一浅譬解释之。”[①]解释的心理学术语包括心的现象、意识、注意、知的现象(直观、感觉、体觉、特殊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普通感觉、筋觉、触觉、压觉、温觉、知觉、幻觉、错觉、观念、记忆、想象、类化、思考、概念、断定、推理)、情的现象(感应、情绪、情操、知的情操、美的情操、德的情操)、意的现象(自发运动、反射运动、本能、运动、愿望、意志)、个性、气质(胆汁质、黏液质、神经质、抑郁质)、品性。与蒋维乔编校的《心理学》的体系相仿，这里的术语分类也是按照知、情、意三分法进行的。汪炳台随后对蒋维乔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四点批评意见：[②]首先是用三分法的知、情、意来涵盖和解释心理学，会让人忽视知、情、意之间的联系。其次是心理学应包括“普通”、“特别”二派，不宜只称“心理学者，研究人之心的现象者也”。第三，断定应该先于概念的形成，所以概念不宜列于断定之前。第四，直观不能仅仅解释为“物体映于吾人之眼官”，而是涉及多种感官。

对于第一点批评，蒋维乔认为出于论述的需要而使用三分法，不是从理解和研究的角度去割裂其间的联系。对于第二点批评，蒋维乔认为，心理学的派别和“心理学之意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于第三点，蒋维乔认为“思考之得以成立，全由概念、断定、推理三者而成”，许多心理学著作无不是这样进行排列论述的。第四点，蒋维乔接受了汪炳台的批评，承认误

① 蒋维乔．心理学术语解[J]．教育杂志，1909(13)：1－12．
② 未检索到在蒋维乔这篇文章之前汪炳台提出这些质疑观点时发表的文章，这些内容列于蒋维乔的文章之中。

用“眼官”二字，于是将“直观”改释为“物体接触于吾人之觉官，直受而得其全部之谓也”。①

汪炳台对蒋维乔心理学术语的学术批评没有构成很大的挑战，但是这次有关心理学的学术讨论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价值。一方面心理学刚刚引介进来，对其内容与体系的认识肯定存在种种偏差，这次学术论辩对于更好地理解心理学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此期间，蒋维乔发表了《心理学术语解》(1909)和《答汪炳台驳心理学术语解》(1910)，汪炳台则发表了《心理学术语比较考》(1910)、《心理学术语之比较》(1913)和《心理学术语浅释》(1915)三篇文章，尤其最后一篇长文达数万字，涵盖了心理学的众多术语。这些工作对规范心理学术语以及心理学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另外，汪炳台还曾根据日本的心理学教科书编辑出版过《心理学问答》一书，由南通书局发行。②

蒋维乔自1908年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最后于1914年撰成《因是子静坐法》，并开始深入钻研佛学。蒋维乔致力于中国传统静坐法，他为其奠定了较为科学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使其摆脱奇异之术的错误看法。他认为静坐与心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心意尤能影响于肉体”，如“愧耻内蕴，则颜为之赤；沉愁终夜，则发为之白；此精神之影响于形体一也。愉快时则五官之所见所闻皆美，悲哀时则否；此精神之影响于形体二也。快感起时，则食欲增进，不快之时则食欲减少；此精神之影响于肠胃也。忿怒嫉妒等不正感情起时，能使血液及各部组织中，发生毒素；此精神之影响于血液也。”③

第三节　中国近代心理学先驱蔡元培与陈大齐

一、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

① 蒋维乔. 答汪炳台驳心理学术语解[J]. 教育杂志，1910(5)：5-8.
② 陈旭麓. 宋教仁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271.
③ 阎书昌. 蒋维乔的心理学实践与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J]. 常州工学院学报，2008(3)：33-36.

院编修,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作为中国新文化科学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先驱、倡导者与扶持者。他曾两次赴德国留学,研习实验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是当时13个研究所之一,这一切为他在中国近代心理学上的先驱地位奠定了基础。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创立上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五点。

(一) 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唯一的中国学生

在留学德国以前,蔡元培就对西方的文化科学有所涉及,包括文史、政经及自然科学,而且翻译了日文著作《生理学》、《妖怪学》等。[①] 这里的"妖怪"是指人们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生理与心理产生的某些奇异现象,"妖怪学"即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论述"妖怪"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哲学、生物学等因素,解说产生这种迷误的原因,即"解说迷误之学"。"妖怪学"第五类即为心理学方面的现象,包括心象篇(幻觉、妄想、迷见、谬论、精神作用)、梦想篇(梦、奇梦、梦告、梦合、眠行、魇)、凭附篇(各种动物、神灵附体现象)、心术篇(动物电气、告理、棒寄、自眠术、察心术、降神术等)。[②]《妖怪学讲义录(总论)》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讨论心理学的主题。由此可见,蔡元培当时已经对心理学有相当多的接触和了解。

蔡元培曾于1907年5月至1911年11月、1912年9月至1913年6月分两次赴德国留学。他学习心理学课程是在第一次留学期间的1908年10月至1911年11月,第二次留学记录中未见到他听心理学课程的相关文献记载。目前莱比锡大学冯特档案馆仍保留着蔡元培的学籍档案资料。在三年的学习期间他听了8门心理学课程,其中包括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讲授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三门心理学课程,还有利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讲授的心理学原理,勃朗(Brahon)讲授的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威斯(Wilhelm Wirth,1876—1952)讲授的心理学实验方法,迪

---

① 蔡元培.《杂记》手稿[M]//高平叔.蔡元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11,12.其中《妖怪学》为日本学者井上圆了著,全书八卷已译出六册,由亚泉学馆购印。但因该学馆失火,此书译稿五册被焚毁,仅余《总论》一册,后由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妖怪学讲义录(总论)》之名印行。

② 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录(总论)[M]//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52.

特里希(Ottmar Dittrich,1865—1951)讲授的语言心理学、现代德语语法与心理学基础。当时冯特的课程在莱比锡大学很受欢迎,许多外国学生有多遍听课的踊跃现象,蔡元培就听了三遍冯特的实验心理学课。这些心理学研习活动,对蔡元培心理学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先驱的专业基础。蔡元培深受冯特在实验心理学上开创性工作的影响,在回国后积极推动创建心理学实验室和心理研究所,在教育领域推进心理学的应用。[①] 蔡元培接受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这是不同于中国近代心理学早期多是自学成才的其他人物之处,也是他具有中国近代心理学先驱地位的原因之一。

(二)扶持创建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和第一个心理研究所

蔡元培采取的两个重要措施对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一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于 1917 年支持陈大齐在哲学系内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虽然它仅仅有一间房子和少量的仪器设备,但它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1926 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心理学系,陆续添置心理学仪器和图书期刊,从而确立实验方法在我国近代心理学中的地位。二是蔡元培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于 1929 年倡导并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这样,既有培养心理学人才的教学机构,又有专门研究心理的科研机构,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人才与组织基础。1921 年蔡元培到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科研机构时,曾专门参观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心理学实验室演示试验感觉(包括色盲)的仪器设备,以及生物学实验室和动物心理实验所。由此可见,蔡元培对心理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重视。1929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心理研究所,聘任唐钺为所长,聘请汪敬熙、朱鹤年、蔡乐生、卢于道等一批专家开展研究。蔡元培对心理研究所的工作很重视,他在《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和《中央研究院之过去与将来》等报告中,都对心理研究所的工作有总结和未来计划。蔡元培还积极推荐心理学著作的出版,如推荐过陈德荣翻译的《儿童的语言与思想》和《儿童的判断与理解》。逝世前一年,他还亲自审阅了商务印书馆拟列为大学丛书的《心理学》译本(美国兰费德、波林、卫

① 杨鑫辉.蔡元培在现代中国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J].心理科学,1998(4):293-296.

尔德合编)。可见,蔡元培虽然主要贡献在于教育,但是他一直在关心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并为之付出心血。①

(三)关于心理学性质、方法及应用性的思想

蔡元培继承了冯特关于心理学强调科学方法的思想,认为"从前有许多不是科学的,如心理学从前附属于哲学,现在应用物理的方法、生理的方法来研究它,便成为科学了"。② 这就是说心理学的实验科学性质是由它采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来决定的。同时,蔡元培认为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是比较难以划定的,不能简单地归属。"例如,心理学向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自从科学家通过实验研究,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了人类心理状况以后,他们又认为心理学应属于理科。"③他还认为,精神科学、社会科学都可以用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心理学(他当时具体指民族心理学)既有自然科学性质的方面,又有社会科学性质的方面。该思想对中国心理学后期发展中形成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性质的观点具有重要影响。

蔡元培作为教育家,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他一改冯特关于心理学纯科学的倾向,而是非常重视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并有理论贡献。首先,他强调必须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建构实验教育学。他说:"实验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自实验心理学出,而尤与实验儿童心理学相关……其试验之也,或以仪器,或以图画,或以言语,或以文字。其所为比较者,或以年龄,或男女之别,或以外界一切之关系,或以祖先之遗传性,因而得种种普通之例,亦即因而及种种差别之点。"④其次,重视教育对人格的养成。蔡元培说:"所谓健全人格,分为德育、体育、知(智)育、美育四项。"⑤主张把智育、德育、美育看作是心育。再次,强调按照儿童发展进程进行教育,并且要求教育者重视个性的发展,"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⑥上述思想无一不是以心理学原理为指导的,对当时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

---

①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J].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171.
③ 同上:10.
④ 蔡元培.蔡元培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59.
⑤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5.
⑥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08.

(四) 文艺与美育心理思想

蔡元培从心理学视角论述过文艺与美育的问题，因而他的文艺与美育心理思想是其心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元培认为："文化是意志活动的现象。意志的活动，恃有两种能力：一是推理力，以概念为出发点，演成种种科学；一是想象力，以直观为出发点，演成种种文艺。"[①]可见，他将文艺看作是人的一种直观的、充满想象力的意志活动。他还指出艺术的种类，不外乎视觉的和听觉的两大类，而文学则是综合视听两种感觉。蔡元培非常关注美育，也就是美感教育，并最早译出"美育"一词。"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是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有待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②]他还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提倡美育破除迷信。他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类的三种精神作用，即知识的要求、意志的愿望和情感的需要。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昌明，知识作用和意志作用逐渐与宗教脱离，只有宗教庙宇、音乐和舞蹈等的美术作用还结合在一起，通过情感产生影响。"在宗教的仪式中，就丢掉了智德体三育，剩下的只有美育，成为宗教的唯一原素。"[③]而美育与宗教有分合两种情况，"应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④]从心理学来看，人总是受某种信念、信仰支配的，以美育取代宗教的思想是积极的，蔡元培的文艺与美育心理思想开创了我国文艺心理学与美育心理学的先河。

(五) 主张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蔡元培关于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直接论述很少见，但是，1927 年蔡元培在《真善美》的讲演提纲中写道："心理学(性理，唯识，□□之轮回说)。"很显然，这里的"性理"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唯识"指唐玄奘创立的"万法唯识"宗的思想，"轮回说"是印度佛教思想。从这个演讲提纲中可以看出，所列"心理学"是指他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西方心理科学，括号里面的文字则表示他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中的思想纳入其中，并

---

① 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8：455.
② 高平叔，编. 蔡元培教育论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66.
③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M]//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蔡元培美学文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80.
④ 同上：163.

结合起来。蔡元培是清朝翰林出身,又留学西方学习现代科学,主张中西文化结合是一种必然的思想,而且认为“必须首先领会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它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这可以作为诠释他主张将西方心理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思想的根据和佐证。蔡元培这方面的思想对今天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仍有指导意义。①

二、陈大齐

陈大齐(1887—1983),号百年,浙江海盐人,中国心理学家。1903 年夏赴日本,在东京进补习学校学习日语,并补习数理等学科三年。1906 年夏考入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用了三年时间学习英语、德语、法律和经济。该校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毕业后可直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1909 年陈大齐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之后,受到日本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的影响,对心理学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于是选心理学为主科,以理则学(亦称论理学,即逻辑学)、社会学等为辅科。1912 年夏天毕业获得文学学位后旋即回国。是年秋天回国担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任职约半年。1913 年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预科教授,讲授心理学和逻辑学。1914 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之聘,赴北京大学任教,最初讲授哲学概论、心理学、逻辑学,后来讲授认识论、逻辑学和陈述心理学等课程。1921 年陈大齐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西方哲学。曾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与教务长,并曾兼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教职。1929 年初北京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陈大齐出任院长。北京大学恢复原校名之后,陈大齐在蔡元培未赴任之前于 1929 年 9 月至 1931 年 1 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31 年至 1948 年在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任职。1949 年到台湾后,曾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主讲逻辑学,他在印度因明和中国名学方面有丰富的著作。② 陈大齐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有以下五方面重要贡献。

第一,1917 年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陈大齐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近代心理科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① 杨鑫辉.蔡元培在现代中国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J].心理科学,1998(4):293-296.
② 陈大齐.八十二岁自述[M]//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浙江近代学术名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188-198.周进华.经师人师:陈大齐传[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7-8.

事件。

潘菽在报告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情况时,曾侧面描述了北京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创建的相关情况:

> 我记得民国六年初到北京大学去的时候,就看见在图书馆的前面有一个房间常是锁着,门上有一块牌子标题写着心理仪器标本室几个字。当我每次到图书馆去经过那门时,便发生一种新奇的感想,不知里面藏着许多什么。到下一年,陈大齐先生便开了一个短的学程心理学实验,并另辟一个房间专供学生实验之用。我也就莫名其妙地选上这一门功课。所做的实验虽然只有很简单的几个,但在我却是得未曾见。所以讲到心理学的实验室,就理应推民国六年时的北京大学为始祖了。①

由此看来,陈大齐此时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是供演示实验所用,利用实验室开展心理学创新研究的条件还不成熟。陈大齐说自己在大学"之所以选心理学为主科,因为当时的心理学已渐渐摆脱哲学的羁绊而步入科学的范围"。② 心理学的科学性质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陈大齐在日本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学学科训练,为他回国后建立实验室、开设心理实验课程奠定了基础。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德国也学习过专业的心理学课程,也对心理学实验室的建设给予扶持。陈大齐后来研习兴趣转移到其他领域,最终放弃了心理学。他自己解释道:"其所以放弃心理学,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主观方面,我的生理学知识太差,在心理研究上增加了许多困难。在客观方面,任教的学校当时还没有心理实验的设备,无从做实验的研究。"③ 陈大齐对心理学的研究强调具有基础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的研究手段。虽然陈大齐没能一直从事心理学研究,但是他建立的第一个实验室为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北京大学心理学实

---

① 潘菽.本校的心理学系[J].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2):139-153.潘菽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22.

②③ 陈大齐.八十二岁自述[M]//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浙江近代学术名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60.

验室能够用于专门的研究是在 1926 年之后，此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已独立，陆续添置了实验仪器，可供 30 名学生同时使用，“而教授亦可进行专门的研究了”。①

第二，出版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第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心理学大纲》。该书是陈大齐利用多年教学的讲义修订而成的，在十年间印刷了 12 版。它以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和新式标点符号，较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当时西方科学心理学的丰富内容和最新成就，包括各经典实验的数据、图表以及假说、学说、原理和定律。该书突出阐明了心理学的科学定义，认为“心理学乃研究心作用之科学，即研究精神作用之科学”。他指出：

> 精神作用无形无声，不可以目见，不可以耳闻；故心理学之规定研究对象也，非若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可以指实物以示人之明且便也。虽然，精神作用乃人人所同具，学者试内求诸心，当无不恍然悟者。……凡此构思凝神喜笑悲啼思得思免皆吾精神作用之一端，合其他诸作用，汇而成吾精神作用之全部。心理学即就此精神作用，研究其结构之状况、活动之功用、发达之程序，而为之立普通法则者也。②

由此可见，他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作用的结构、功能、发展过程和普遍法则的科学。“心理学特定义为科学者，明其非常识，非哲学也。”③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开展心理学科研必需的“假定事项”：心理学研究对象(精神作用)是真实常住之事实，而绝不是幻妄虚无的；这种精神作用是可以用我们的精神作用进行观察而研究的；精神作用都是遵循一定法则的，绝不是庞杂纷乱、无法则可言的。④

《心理学大纲》一书还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略同，以归纳法为主，但其主要有内省法、外观法(即观察法)和实验法三种方法。“实验之法，本为现今心理学之普通研究法，故自广义言之，一切心理学

① 樊际昌. 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概况[J]. 中国心理学报，1936(1)：84－85.
② 陈大齐. 心理学大纲(第 13 版)[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4.
③ 同上：5.
④ 同上：7.

莫非实验的心理学。"①同时,《心理学大纲》博采众长,代表着当时心理学最前沿水平。全书主要采用了德国冯特和美国威廉·詹姆斯的学说。另外,该书直接评述了构造心理学和机能心理学两派的短长,还涉及精神分析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如"盖无意识的精神作用亦当为心理学所研究"、"行动学之定义,为近时一派学者所主张,但此义过泛,易与生理学之对象相混淆,故亦未得一般学者之称许"。②

第三,五四运动时期,用心理学科学知识反对神灵迷信思想。《辟"灵学"》和《心灵现象论》③两文,是陈大齐以科学心理学理论反对宣扬迷信思想的战斗檄文。《辟"灵学"》力图依据心理学的原理对当时扶乩之风加以剖析,指出沙盘中所书,若非有意作为,则是出于扶乩者下意识(subconsciousness)的自动作用,是不自觉的,并非真有"圣贤仙佛"的降临。而《心灵现象论》评析了西方心灵研究会搜集的三类材料及其实验情况:(1)自动作用(automatic action),包括魔摆、占棒、测思术;(2)隔离知觉(telepathy),也叫做"思想传达"(thought-transference,又译为"精神感应");(3)远隔移动(telekinesis)。在评析这些心灵现象的同时,陈大齐指出其中有真有假,有的实验不严密,有的是灵媒(medium,即所谓"通灵"的人)的诈术,这些都不能作神秘力的证明,不能作鬼神的凭据。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④ 陈大齐曾于1923年夏天在山西发表过一个演讲,后来以《有鬼论成立的一大原因》为题发表,称鬼的实在问题其实是人们希望有鬼存在,是活着的人对逝者的一种情感寄托,"古人想象中的鬼便变成事实上的鬼,而有鬼的希望变成了有鬼的主张,所以有鬼论渊源于古人的想象,及既成立以后,则世代相传,成为社会上的一般信仰,益以现代人底希望为之拥护,于是更根深蒂固,不易剪除了。"可以看出,陈大齐用带有文化心理学的观点对有鬼论进行了批驳。⑤ 陈大齐的文章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心理的实质,对于倡导心理科学、破除迷信、发扬唯物论思想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今仍有

---

①②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第13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10.

③ 陈大齐.辟"灵学"[J].新青年,1918,4(5):370-385.心灵现象论[J].北京大学日刊,1919-5-15至7-26(陆续刊载).两篇文章均收入《迷信与心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2年再版本.

④ 徐彦之在《新潮》第2卷第2号上以《心灵现象论》为题发表文章专门介绍陈大齐的《心灵现象论》。

⑤ 陈大齐.有鬼论成立的一大原因[J].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12-1,p.27.

借鉴意义。

第四,陈大齐较全面地评价了当时心理学的发展状况,其较详细的心理科学分类促进了近代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现代心理学》是陈大齐于 1918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所作四次学术演讲的内容。它简要评介了心理学七大领域的新进展：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当时的“新心理学”在三个方面不同于“旧心理学”：(1) 它脱离哲学的束缚,努力成为精确的科学;(2) 说明心的作用,必推究与其相关联的身体作用,即用生理学的说明诠释心的作用;(3) 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使“心理学益臻于精确科学之域”。他还对心理学历来的智(知)、情、意三分法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分法已经不能成立。陈大齐还用示意图具体介绍了华生应用“迷路盘”(即迷津)进行的动物实验,该实验是华生由机能主义者转向行为主义者立场的一个重要实验：通过多次实验排除了老鼠学走迷津过程中视觉、嗅觉的作用,发现老鼠学走迷津靠的是感觉机关(即皮肤关节肌肉及耳中半规管)的感觉来记忆通往食物的道路的。①

陈大齐在《哲学概论》的第一编第二章“心理学”中阐述了“科学心理学”、“心理学根本概念之变迁”、“心理学之研究方法及分类”、“心理学与哲学”四个主题,主要论述心理学未独立之前受哲学束缚,而现代心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则成为所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陈大齐表现出明显的经验主义取向,认为经验主义心理学之外并没有心理学,至于理性主义心理学,它讨论的问题属于哲学范畴,而不再是心理学关注的主题。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是随着历史上关于心的概念变迁而变动的。陈大齐秉承了当时欧洲心理学的观念：

> 所谓生理的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严密言之,非有特别之对象,不过明示其研究方法以表白其应取之态度耳……生理的或实验心理学为一切心理的研究应取之态度,非心理学特别之门类,故心理学之分类

① 陈大齐.现代心理学[J].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4 月 15 日至 5 月 19 日(陆续刊载).转引自：迷信与心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2：123－189.

中,不宜有此二种。①

以精神作用的"或常或变"为标准,把心理科学分为常态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两个部类。常态心理学又分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和团体心理学(collective psychology)两大类。这两大类又各分为普通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和发生心理学三个亚类。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体的发生心理学中又细分为:"(1) 个体发生心理学。研究婴孩之精神作用渐次发达,以底于成人,及成人之精神作用渐次衰退,以底于老耄。(2) 种族发生心理学。研究最下等动物之精神作用逐渐发达,以底于最高等动物之人类。"在团体心理学的差异心理学中,又细分为:"(1) 人种心理学(ethnic psychology)。研究各人种精神现象之差异。(2) 阶级心理学(class psychology)。研究各种阶级各种职业精神现象之差异。"②

第五,陈大齐率先在我国进行心理调查研究,可视为心理学应用研究的先声。他采用问卷法于1918—1919年间开展过关于"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的研究。这项于1918年上半年计划并实施的针对儿童道德意识的调查,是在浙江、江苏、江西、直隶(河北)、山西五省的小学进行测试。此文是他仅结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225人的数据进行的统计,并就调查目的、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撰写的论文。该调查问卷共计九个问题:(1) 什么事情是顶好?(2) 什么事情是顶不好?(3) 别人无端侮辱你时,你怎样对付他?(4) 古人中你最佩服谁,为什么佩服他?(5) 你大了想做怎样一种人?(6) 什么事情顶可怜?(7) 什么事情顶可羞?(8) 谁的说话你最听?(9) 你顶爱的东西是什么?③ 另外,他发表了论文《民族心理学之意义》④和《儿童被暗示性》(《教育杂志》,第18卷第7号),翻译了德国符茨堡大学马尔比(Karl Marbe,1869—1953,旧译马勃)的《审判心理学大意》(1922)、高五柏(Robert Eugen Gaupp,1870—1953)的《儿童心理学》(1925)等译著。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向逻辑学。至晚年又转

① 陈大齐.哲学概论(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26.
② 同上:26-27.
③ 陈大齐.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J].北京大学月刊,1919,1(4):23-52.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458-482.
④ 陈大齐.民族心理学之意义[J].北京大学月刊,1919,1(2):27-33.

向先秦名学研究,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先驱,陈大齐在日本接受了心理学专业训练,回国后开展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工作对我国早期心理学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为我国心理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公众知识分子对心理学的传播

一、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人物之一。19世纪90年代他认识了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并深受其译著《治心免病法》的影响。谭嗣同研读了许多译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历史、地理、政治类书籍,以及基督教教义、神学等著作,后来写成其代表性著作《仁学》。谭嗣同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他的《仁学》、《以太学》、《论全体学》等著作。

(一) 人贵论

谭嗣同借用近代物理学术语"以太",[①]认为它是形成宇宙的物质,并且运用进化论观点描述了以太形成天体、生育万物、衍化人类的历史进程,从而肯定人由物质的进化而产生,是最高级的,也是最智慧的:"……禽至猩猿,得人之七八。人之聪秀,后亦胜前。"[②]而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语言和智力。谭嗣同说:"尝论人为万物之灵,所以能著其灵者,于语言声音著之。"[③]"犹太古初生,先有蠢物,后有灵物;物既日趋于灵,然后集众灵物之灵而为人。今人灵于古人,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纯用灵魂之人。"[④]谭嗣同认为,荀子所说"人……以其能群"仅是人与禽兽差异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但为人之智力所能为而禽兽所

① 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物质,是一种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被认为无所不在。
② 谭嗣同.仁学[M]//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330.
③ 谭嗣同.管音表·自叙[M]//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253.
④ 谭嗣同.仁学·四十六[M]//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364-365.

不能为者,无不可以学而学会而会且通为一学一会也"。① 也就是说,人区别于动物之处重在人有智力,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知识。可见,谭嗣同的心理学思想中,在人贵论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唯物主义成分。②

(二)生理心理学思想

谭嗣同的生理心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有关大脑结构与功能的观点上,在这些方面,谭嗣同主要借助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展开对人类大脑的认识,以及对某些心理现象及其生理机制的探讨。

其一,大脑的结构。谭嗣同说:"身之分为眼耳鼻舌身。眼何以能视,耳何以能闻,鼻何以能嗅,舌何以能尝,身何以能触,曰唯'以太'。""'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其别有六:曰大脑、曰小脑、曰脑蒂、曰脑桥、曰脊脑,其分布于四肢及周身之皮肤曰'脑气筋'。" ③ 这里所说的"脑气筋"即为神经。

其二,大脑的功能。感知觉(即心理)的源泉是外界刺激,感觉、知觉、思维的器官是人脑,知觉、思维、意识都是人脑的功能。如:"有物骤而与吾身相切,吾知为触;重焉,吾知为痒为痛。孰知之? 脑知之。"④外物刺激身体之后,"脑气筋"(即神经)将信息传递到脑,然后才会产生触觉、痛觉等感觉。知觉则是"皆合全体之脑气筋而显,以我之脑气筋感我之脑气筋"的结果。"中国言心主思,西国则谓心不能思,而思特在脑。脑分大小,大脑主悟,小脑主记及视听之属。"⑤

其三,思维、感觉差异产生的机制。思维如何产生呢? 谭嗣同提出"心与脑交相为用"说,阐述了思与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思固专在脑,而脑之所以能思者,全赖心能变血以养脑,是心与脑交相为用也。故思字从囟,从心。脑之主思,古人盖已知之矣。"⑥在意识产生的问题上,谭嗣同则认为,意识是"大脑之用也",由"脑气之动"而产生。睡梦、疯癫则是"脑气之动"出了问题时的表现。

---

① 谭嗣同. 治事篇第九・群学[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443.
②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77-78.
③ 谭嗣同. 仁学・一[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294,295.
④ 同上:295.
⑤ 谭嗣同. 论全体学[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403.
⑥ 同上:403-404.

谭嗣同还提出"质点布列"论解释人感觉的差异问题。"香之与臭,似判然各有性矣,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亦质点布列微有差池,致触动人鼻中之脑气筋,有顺逆迎拒之异,故觉其为香为臭。苟以法改变其质点之聚,香臭可互易也。"①他还运用该原理研究了许多知觉现象,如他对太阳错觉的看法:

> 朝夕之凉,日去人远也。日中之温,日去人迩也。远何以大,迩何以小,朦气之差也。朦气者,可以升高为卑,映小为大,……人目上视,则直线也;旁视,则斜弦也,今以凸面厚玻璃为比例,自其凹处外视,正视则明,旁视则昏,此直线斜弦之差也。②

谭嗣同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作出了新的推进,如心理器官的"主脑说"。但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科学知识贫乏和生理学发展水平低下等条件的限制,他的一些描述多出自主观臆想,牵强附会,没有科学依据。

(三)"天理人欲俱善"论

谭嗣同继承龚自珍的宥情说,明确主张"天理人欲俱善"论。他写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③同时,谭嗣同主张人们应该科学认识情欲,并争取学会对自己的情欲进行恰当的调节和控制,以便成为情欲的主人。在这里,他告诉人们,欲望是情绪情感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求之而不得,盖亦喜怒哀乐已耳"。而情绪的理想状态是"中和","中"是情绪未发前保持的一种平静状态,即"其未发也,不滞于喜,不滞于怒,不滞于哀,不滞于乐";"和"是情绪发出后表现的强度要适当,即"无过不及之喜,无过不及之怒,无过不及之哀,无过不及之乐"。为此,谭嗣同主张个体要通过"增加知识以便明白事理"和"养正气"等方法来调控不良情绪与不良欲望,从而使自己的情欲得到

① 谭嗣同. 仁学・十一[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306.
② 谭嗣同.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124.
③ 谭嗣同. 仁学・九[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301.

升华。他说：

> 惩忿窒欲固其体，极深研几精其用。惩与窒，斯不忧不惧继之矣；极与研，斯尽性至命继之矣。故善养气者，喜怒哀乐视听言动之权，皆操之自我者也。操之自我，而又知言以辨其得失，于是无有能惑之者，而不动心之功成矣。①

另外，谭嗣同已经涉及心理学这门学科。他认为："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②这里所说的全体学是指生理学，心灵学是心理学。但是，谭嗣同用这些知识是为构建其"仁学"体系，为社会变革的政治思想而服务，因此仅停留在对某些心理现象及其生理基础进行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上，尤其是他将佛学、基督教、自然科学知识牵强附会地混在一起，其中有许多不科学的成分。

二、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之一，戊戌变法时期的组织宣传家，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关注和涉猎西方心理学这个学科并运用西方心理学知识的早期人物之一。除在第一章已介绍的他对"心理学"一词在中国传播和使用方面的贡献外，梁启超对心理学还有以下三方面的贡献。

(一) 教育心理学思想

在教育心理学思想方面，梁启超主张按照儿童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年龄特征划分教育期。他说："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今试取日本人所论教育次第，撮为一表以明之。"他在这个教育期区分表中划分出四个教育期：(1)"五岁以下：家庭教育期、幼

① 谭嗣同. 石菊影庐笔识·思篇[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137.

② 谭嗣同. 仁学界说·二十七[M]//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1：293.

稚园期(幼儿期)”;(2)“六至十三岁:小学校期(儿童期)”;(3)“十四岁至二十一岁:中学校期(少年期)”;(4)“二十二至二十五岁:大学校期(成人期)”。[①] 这是从身体发育生理特点,特别从知、情、意三方面和“自观力”(人我相)心理特点加以分期比较的。虽然他对知、情、意以及“自观力”的描述有不够确切之处,但仍具有一定科学性。[②]

在教学心理方面,梁启超主张教学必须将记忆与理解相结合。他指出:

> 教童子者,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何以故?悟性主往(以锐入为主),其事顺,其道通,通故灵。记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钝。是故生而二性备者上也,若不得兼,则与其强记,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以异于物者,为其有大脑也,故能悟为人道之极。凡有记也,亦求悟也,为其无所记,则无以为悟也。悟赢而记绌者,其所记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谓善悟者指此非尽弃记性也,然其所记者实多从求悟得来耳,不可误会)。记赢而悟绌者,蓄积虽多,皆为弃材。惟其顺也,通也,灵也,故专以悟性导人者,其记性亦必随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钝也,故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③]

可见,在记性(记忆)与悟性(理解)的辩证关系中,梁启超更强调“为人道之极”的悟性(理解)。记忆好而理解差,脑中积累下的仅仅是过去的材料而已。在教学中如果以理解教导儿童,其记忆也会随之提高,如果只强调记忆,则理解能力会降低。

(二)社会心理学思想

梁启超认为社会心理在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他大力主张用心理去解释政治和历史。在其史学著作中经常出现“心理”、“社会心理”、“国民心理”、“群众心理”、“国民性”、“个性”、“人格”等概念,他的社会心理

---

①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教育次序第一[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33-36.

② 杨鑫辉,赵莉如.心理学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85.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46-47.

学思想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梁启超认为，要研究历史，必须探求其时代的社会心理状况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历史轨迹的错综复杂是由人类社会心理变化多端导致的。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民众意识在历史中的积极参与就是社会心理在历史中的鲜明表现。“历史为人类心理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发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地也。”①

另外，梁启超说：“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②他认为，研究历史或史迹只有“深入心理之奥”才能发现历史真相，并且还要研究伟大人物的心理，即“历史的人格者”。历史的主要趋势，就是由首先出现的“人格者”慢慢向民众传播，形成群众的“人格者”。因此，抓住伟大人物的心理，就抓住历史的全部本质。这是“英雄传即历史”的史学观，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理论。③

他还用心理去解释政治，“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总是国民心理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因而“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④ 梁启超将心理学应用于研究政治和历史，一方面是受了西方心理历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心理学寄予厚望，满足他学术和政治抱负上的诉求。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许多最初接触西方科学心理学的知识分子，都曾试图将心理学作为一种工具去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或历史问题。

（三）佛教心理学思想

《佛教心理学浅测》是梁启超 1922 年 6 月 3 日为中华心理学会所作的讲演，同时也是受《心理》杂志主编张耀翔之邀撰写的文章。该文集中展现了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学思想，试图从心理学的视角阐释佛教的“五蕴皆空”，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总论佛学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他表示：“我确信，

---

①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5，108，112.
② 同上：113.
③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 2 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88 - 89.
④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附录(先秦政治思想)(1922)[M]//饮冰室合集・专集五十. 北京：中华书局，1988：185.

研究佛学,应该从经典中所说心理学入手;我确信,研究心理学,应该以佛教教理为重要研究品。"第二部分论证佛教的核心内容就是追求"无我我所",其中"无我"是核心,其达到无我境界的途径是"证"和"学",所谓"证"是"纯用直观,摆落言诠,迥然见出无我的圆相";"学"是从学理上说明"我"之所以无,用理暗去破除不正当的理智。梁启超认为,佛教中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如小乘中所说的七十五法、大乘中说的百法都可视为对心理现象的说明。同时,梁启超明确提出,"严格地说,现代欧美心理学和佛教所讲的心识之相范围广狭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别,当然不能混为一谈"。用当代心理学的话语来讲,梁启超应该意识到心理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取向的不同。结合佛教的特点,他体现出强调人内在体验的人文主义心理学观点,也可以说梁启超是将佛教心理学视为人文主义取向的一种心理学了。第三部分论证佛学重视心理学的原因,即把心理状态研究得真切了便可以说明无我的道理。梁启超指出"识之外无'我'体",然而"识"也不过是一种状态。第四部分分析"色蕴"。第五部分分析"受、想、行三蕴"。第六部分分析"识蕴"。第七部分讨论"五蕴不外破除我相",达到"无我"状态。佛教崇尚"无我",其意义不外教人脱离无常苦恼的生活状态,能归到清净安宁的生活状态。而那种精神生活混乱不能统一的状态,即佛教所说的"无明",摆脱"无明"状态,需要靠智慧去"转识成智"。① 佛教中"蕴即是聚",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色蕴"是客观性较强的现象,有实形和实像可对应,即对应着"物",类似于现代心理学中的"表象"。"受、想、行、识"四蕴都是人内在的心理活动,其本身没有实形和实像对应,即"非色",只是一个名而已。其中"受"相当于感觉;"想"相当于记忆;"行"则是除"受"、"想"两蕴之外的一切心理活动,"识"则包括"眼识"、"耳识"、"鼻识"和"意识"等,其中"意识"是指心理活动的统一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一方面尝试用现代心理学的框架和概念梳理佛教的心理学内涵,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佛教心理学是不同于当时欧美的心理学,隐含着他认为佛教心理学是不同于科学心理学的一种人文主义取向心理学的观点。毫无疑问,佛教内

---

① 梁启超. 佛教心理学浅测[J]. 心理,1922,1(4). 转引自: 心理杂志选存(下)[M]. 上海: 中华书局,1932: 508-601.

容是深邃而博大的,梁启超的一些观点对于探讨佛教的心理学内涵和价值颇具启发意义。

三、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曾学习西方医学,掌握了一定的生理学知识,对人的心理与心理学都有所了解,因此孙中山的心理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于1917—1919年著成《建国方略》一书,其中"心理建设"部分论及心理学思想较多,逐渐形成中国近代心理学思想史上极具特色的"心理建设"论。

(一) 孙中山的心理观

孙中山认为,自然界是由"伊太"(即"以太")物质进化来的。同时他采用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说法,认为"气"在"理"先,"太极"这个物质概念是宇宙的本源。他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伊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①他认为,地球形成后,又产生了"生元"(即细胞),进而有了动物、植物,再由动物(猩猩)进化成人,即"由生元之始而至于成人"。

> 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②

>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③

①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M]//孙中山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56.

② 同上:121-122.

孙中山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肯定了人是动物经长期进化发展而来的。但是,他把人特有的性能"知觉灵明"、"动作思为"、"主意计划"、"良知良能"都归之于细胞,错误地把"细胞"看成具有"知觉灵明"等作用。在这里他忽视了人与一般生物的本质区别。同时他提出:"人的精神不能创造"、"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①在这里他肯定了精神为人类所特有,从而说明人与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

但是,孙中山过于夸大了人的心理作用。如他说:"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他用"心理"来解释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认为政治、经济、革命、建设、文化和道德、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等一切社会事物和现象都是人类"心理之现象"的表现。他说:

> 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②

孙中山看到社会心理和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强调其在国家兴衰、事业成败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于"万众之心理"有其进步性,但同时又有夸大和突出心理、精神作用的局限性。人心、万众之心理、社会心理虽有重要作用,都是构成"万事"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不能说成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全部力量。③

(二)知难行易说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在总结多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其原因在于国民心理深受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的毒害,这种"知易行难"是"心理之大敌",其令人产生的畏难心理是实现革命的最大障碍。孙中山说:

---

① 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M]//黄昌谷,编.孙中山先生演说集.上海:民智书局,1926:118.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自序[M]//孙中山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6-117.

③ 杨鑫辉,赵莉如.心理学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90-93.

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传之数千年,习之遍全国四万万人心理中,久已认为天经地义而不可移易者矣。①

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②

为了消除数千年来深入中国人心的“知易行难说”的负面影响,孙中山创立了“知难行易说”作为建国方略之一,以此来说明革命理论和建设知识的重要性,号召革命党人都来重视并下苦功夫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与科学知识,不怕艰难,敢于从事革命与建设事业。孙中山当时宣传“知难行易说”的道理,对当时的革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又称为“心理建设”,是指国民心理建设,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建设。“心理建设”一词经过孙中山的阐发,在民国时期成为一个重要政治层面的术语,后来经过许多学者及其著作的阐发,逐渐形成富有特色的心理建设理论。

其实“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知和行都各有难易,需要具体分析。因为孙中山认为一般人的心理都是避难趋易的,所以他的“知难行易说”是多从难易上阐述知行的关系。不过,从认识基础来说,他是遵循唯物主义的“行先知后”的。如,他在《心理建设》中举出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项事,详细分析和证明“知难行易”。同时,说明人类的认识是在行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行才能知,知从行中产生并作用于行,而且行可以证明知是否有用。孙中山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的“行先知后”的见解,并进一步提出注重“实行”、“试验”等新观点,这种以“实践为主”的思想确实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知行关系问题的一种贡献。知行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心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心理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人的心理产生于实践、发展于实践这一重要的心理学思想,可以说在孙中山的知行观中是极有意义的。③

---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自序[M]//孙中山选集(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18.

② 同上:117.

③ 杨鑫辉,赵莉如.心理学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94-96.

第五节　辛亥革命后心理学的发展

一、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和陈大齐的交往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蔡元培收到回国电邀之后，于11月4日在莱比锡大学注销学籍，拿到证明已修课程的证书，①并于13日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1月3日蔡元培被推任为教育总长。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此后多年中，蔡元培一直致力于中国教育的革新，而其接受过的心理学训练，尤其是聆听过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也使蔡元培具备为中国近代心理学作出贡献的可能性。陈大齐自日本毕业回国之后，1912年7月被聘任为浙江高等学校校长，此时定能感受到蔡元培主持教育改革带来的新风气，因为此时学堂改称学校，负责人改称校长。陈大齐与蔡元培在1912年前后是否有交往呢？目前未见史料有所记载，但陈立先生曾称蔡元培"延揽陈大齐"，②可以推测，这一阶段蔡元培和陈大齐有过联系，均曾经受过专业心理学训练这样的学术背景使两人的进一步合作成为可能。蔡元培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教育改革，暂时无暇顾及心理学学科的推动工作，但是他肯定在关注心理学人才并延揽之。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学校长的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赴北京大学上任。1917年陈大齐在北京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于第二年开设实验心理学课程，开展了一些教学性心理学实验。这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事情，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蔡元培与陈大齐创建心理学实验室的关系，但是心理学界基于蔡元培的校长身份以及二人的密切关系，一般认定是蔡元培于1917年扶持陈大齐创建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二、"壬子癸丑学制"确立心理学学科的独立地位

辛亥革命之后，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被废止。1912—1913年颁

---

①② ［德］康拉德·雷施格.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J].应用心理学，1996(2)：56-60.

布的"壬子癸丑学制"进一步确立心理学的学科地位。其中,《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的中国哲学门类和西方哲学门类下均设有心理学课程;《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将心理学作为本科类学校五种通习科目之一;《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设有普通心理学课程;《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设有心理学课程。① 心理学在"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前者中心理学课程在大学的哲学门类下独立设置,而在后者中心理学或是作为选修课,或是与"辨学"合为一门课程在非师范类学校中设置。"壬子癸丑学制"有关心理学在师范学校中的设置是对"癸卯学制"的继承和发展。

三、教育部审定心理学教材

1911 年之前的心理学教科书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在华日本教员的讲义;二是翻译日本的教科书;三是留日学生编撰和师范生整理日本教员授课笔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的心理学几乎都是对日本心理学的引介,唯一例外是王国维翻译的《心理学概论》是自英文译出,并被用作师范学堂用书。因此说,这一时期心理学教科书的编撰是对国外心理学的简单移植,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新学制的实施,心理学学科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随着教育革新的进行,心理学教材的需求更为明显。在 1912—1915 年短短几年内就出版将近 10 种心理学教科书,当时教育部承担起心理学教材审定的工作。目前能找到的经过教育部审定的心理学教科书有四种:蒋维乔的《心理学讲义》(1912)、张毓骢和沈澄清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心理学》(1915)、顾公毅的《新制心理学》(1915)、樊炳清的《师范学校用心理学要领》(1915)。这些心理学教科书多属于带有创作性质的编撰,不再是简单的移植,同时也多参照了英文心理学书籍,不再仅仅依赖于日本心理学书籍。可以说,通过这些心理学教科书,中国心理学开始广泛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知识和体系。教育部对心理学教材的审定充分体现对心理学这一学科的重视,并通过对

①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中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45,718,723-741.

教科书的审定进一步推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自主性。

四、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日本心理学曾是中国输入西方心理学的桥梁，但直接决定中国心理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力量还依赖大批直接接受西方心理学训练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国学生大批留美始于1908年的“庚款留学”。经清政府批准，1911年成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华学堂因战事及经费来源断绝停顿半年之久，至1912年5月学堂复校，改称“清华学校”。由于“教育救国”运动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留美教育得以延续。在这次留美大潮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以心理学作为主修专业，为此后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积累了专业人才，主要有：王长平(1909年考取首批庚款留学生，1912年赴美学习教育心理学，1915年回国)、唐钺(1914年赴美)、陈鹤琴(1914年赴美)、凌冰(出国时间不详，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张耀翔(1915年赴美)、廖世承(1915年赴美)等。[①] 张耀翔于1913年投考清华学校，插入高等科三年级，两年后毕业，被保送赴美留学。张耀翔在赴美前夕与同学廖世承商讨学习专业时，认为强国必须强民，强民必须强心，决心以身相许祖国的教育事业。1915年张耀翔在当年拍摄的个人照片后面题写一首诗：“湖海飘零廿二年，今朝赴美快无边。此身原许疗民瘼，誓把心书仔细研!”[②]由此可见，辛亥革命之后青年人的强国意愿对其学业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张耀翔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到心理学是教育科学的基础，他就下定决心毕生从事心理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有一些在美国选修过心理学课程的留学生为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作用。例如，赵元任是首批庚款留学生之一，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听过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冯特的嫡传弟子)和兰菲尔德(Herbert Sidney Langfeld，1879—1958，斯顿夫的嫡传弟子)的心理学课程，[③]并在1915年国内创刊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一文，回国后赵

---

① 胡延峰. 留学生与中国心理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43，5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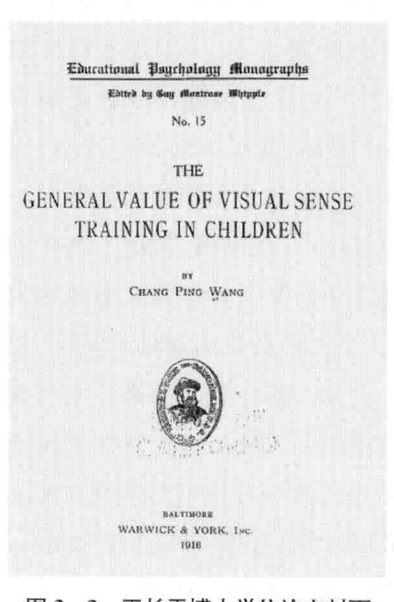
② 程俊英. 耀翔与我[M]//张耀翔. 感觉、情绪及其他：心理学文集续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09.

③ 赵元任. 赵元任全集(第15卷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54.

元任也曾从事过心理学教学工作。

心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传播基本上经历了两次传播主体的转换。第一次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由早期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心理学转换为由接触过日本或西方心理学的学生或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传播。第二次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此时心理学传播主体转换为在西方或日本接受过专业心理学课程训练的中国留学生。接受过专业心理学训练的中国留学生不仅仅是承担传播西方心理学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即将承担起创建和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使命。这批留学生中有很多人接受过西方著名心理学家的指导,回国后以扎实的专业基础,在心理学诸多分支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王长平(1889—1962),名长平,字鸿猷,山东济南人。他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心理学博士。他于1909年北京汇文学堂毕业,同年考取清末首批庚款留美生,1912年赴美,先入惟士米安高等学校,翌年转入密歇根大学教育系,修习教育心理学,191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美博士第一人。1915年归国,历任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雅礼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河北大学、北京大学、齐鲁大学等校教授。王长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儿童视觉训练的普遍价值》(*The General Value of Visual Sense Training in Children*)(见图3-3),以迁移的程度、数量和方式为研究主题。他以22名10岁左右的儿童为被试,分成视觉训练组和控制组,研究发现视觉分辨(visual distinguishment)感觉训练后的提升相当缓慢。显然,王长平的研究是以当时桑代克的迁移理论以及官能心理学理论为背景的。1916年该博士论文被列入惠普尔(Guy M. Whipple)主编的《教育心理学单行本》(*Educational Psychology Monographs*)第15册。惠普尔在主编序言中指出,感觉训练在蒙台梭利方法中相当流行,王长平的



Education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Edited by Guy Montrose Whipple

No. 15

THE

GENERAL VALUE OF VISUAL SENSE TRAINING IN CHILDREN

BY

CHANG PING WANG

BALTIMORE

WARWICK & YORK, INC.

1916

图3-3 王长平博士学位论文封面

研究对于了解感觉训练的价值很有意义。①

五、作为思想武器的心理学

(一) 陈大齐对“灵学”和迷信的反击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军阀篡夺之后,封建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在其庇护之下,鬼神迷信之说在社会上广为散布,甚至还成立“灵学会”,并出版《灵学丛志》。陈大齐认为:“心理学在这一点上——打破迷信——是和别种科学同样重要,或更重要些。”②他以科学心理学为思想武器,用心理学科学知识对“灵学”和扶乩迷信活动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分别发表于1918年和1919年的《辟“灵学”》和《心灵现象论》这两篇文章,是陈大齐以科学心理学反对宣扬迷信思想的战斗檄文。

(二) 孙中山的“心理建设”论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于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随后由于反革命军阀窃取了领导权,革命遭受失败。孙中山在总结多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认为,其原因在于国民心理深受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传统思想的毒害,这种“知易行难”是“心理之大敌”,令人产生的畏难心理,是实现革命的最大障碍。为了消除数千年来深入中国人心的“知易行难说”的负面影响,孙中山创立了“知难行易说”,旨在强调国民心理建设,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形成了“心理建设”论,并作为其《建国方略》之一部于1918年出版,以此来阐述革命理论和建设知识的重要性,号召革命党人都来重视并下苦功夫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与科学知识,不怕艰难,敢于从事革命与建设事业。③ 孙中山将“知难行易说”命名为“心理建设”,由此来看,“心理”这一术语被孙中山赋予了革命的意义,经过此番阐发,在民国时期,“心理建设”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层面的术语,“心理建设”论是民主革命家以西方心理学知识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逐渐发展出的一个具有本土特

---

① Wang, C. P. (1916). *The General Value of Visual Sense Training in Children*. Warwick & York, Inc.

② 陈大齐. 迷信与心理·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4.

③ 孙中山. 心理建设·自序[M]. 上海:一心书店,1937:1-4.

色的心理学理论。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将唯一聆听过科学心理学创建者冯特的心理学课程的中国人——蔡元培推上了历史舞台。虽然他在民国之初以教育改革为主业,但是他接受的心理学训练为他延揽心理学人才(陈大齐)、推动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之初的新学制继清末新政时期心理学课程在学校中开设之后,进一步确立了心理学课程的独立地位。另外,民国教育部对心理学教科书的审定,以心理学著作的创作性编纂替代了对西方、日本心理学著作的简单移植,增强了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独立性,这些变革为教育领域中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同时,辛亥革命也为大批中国心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并使之成为心理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新主体。民国之初,大量有志青年带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到美国广泛学习心理学知识,回国之后以心理学为主业投身于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些心理学专业人才最终成为中国心理学学科创建的中坚力量。

心理学虽然是一门自然科学,但由于心理学以人的精神、思想为研究对象,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也充当起革命武器(孙中山创立"心理建设"论)和思想武器(陈大齐用心理学知识同当时的封建迷信作斗争)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涉猎心理学知识,并自发地或自觉地结合东西方文化传统构建、阐发并实践心理学理论和知识。从这一点来看,心理学在中国逐渐走出教育领域,进入政治、思想领域发挥其实践价值。同时,孙中山的"心理建设"论也代表着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心理学理论的萌芽。

第四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制度建设（1918—1937）

第一节　留学生与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形成

20世纪五四运动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日本学者和留日中国学生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过程中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个时期的心理学在中国主要还是停留在学科引介、教学的层面上，还谈不上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形成，仅有陈大齐所做的一些研究带有较强的专业性质。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出现。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出现，发端于辛亥革命之后多批学生被派遣留学欧美。五四运动之后，这些留学生从海外研习心理学、教育学之后纷纷回国，为心理学在中国近代的跨越性发展打开了局面，他们积极开展了心理学学科早期的制度建设。截至抗战爆发，中国心理学的专业队伍基本形成，为心理学学科得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留学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

1918—1937年，大约50人留学于欧美学习心理学或教育心理学，在此期间相继有70余名回国任教（包括1918年之前去欧美留学的学生）①，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大多从事与心理学相关的教学工作。因抗战爆发，派遣留学的学生数量迅速减少。抗战前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心理学留学生则成为

① 胡延峰.留学生与中国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54-61,67.

1949年之前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业队伍,并成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还有不少学者的学术生命延续到1949年以后。

在这些心理学留学生选择求学的大学中,以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为多,将近有一半的留学生毕业于这两所院校,其他的主要大学还有斯坦福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以上学校都有3人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大学基本上是美国心理学的重镇。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广义机能主义学派的重镇,代表人物有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1874—1949)、伍德沃斯(Robert S. Woodworth,1869—1962,旧译吴伟士)、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芝加哥大学为狭义机能主义学派的重镇,代表人物有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安吉尔(James Rowland Angell,1869—1949)、卡尔(Harvey A. Carr,1873—1954)。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以构造主义者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为主要领导者。斯坦福大学则是以推孟(Lewis Madison Terman,1877—1956)、迈尔斯(Walter Richard Miles,1885—1978)等人为主要领导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有着行为主义传统,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在1920年之前在此任教。多位中国早期留学生在西方留学期间就学于著名心理学家门下,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当时心理学最前沿的知识和体系。例如,董任坚在康奈尔大学师从铁钦纳,潘菽在芝加哥大学师从卡尔,陈鹤琴师从桑代克,刘绍禹师从安吉尔和卡尔,郭任远受业于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Edward Chace Tolman,1886—1959)。黄翼师从格塞尔(Arnold Gesell,1880—1961)学习儿童心理学,也曾受到当时在美国访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的指导。周先庚师从实验心理学家迈尔斯,他在从事汉字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也曾得到考夫卡的指导。陈立师从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1863—1945),吴定良师从统计学家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王徵葵师从瑟斯顿(Louis Leon Thurstone,1887—1955),林传鼎师从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中国第一位心理学女博士李昂师承盖茨(Arthur Irving Gates,1890—1972),并接受过桑代克的指导①,等等。再如,李济曾受

① 根据袁同礼的著作,李昂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但是据《郭延以口述自传》称,李昂晚于陆志韦(1922年)两年回国到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后在返回美国途中"蹈太平洋"而英年早逝。

到来华的瓦尔科特(Gregory Dexter Walcott,1869—1959)的影响,1918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心理学重镇克拉克大学学习,1919年6月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心理学)。当年7月5日至8月15日,李济到铁钦纳所在的康奈尔大学参加该校心理学暑期讲习班,学习内省心理学。后在社会学家汉金斯(Frank Hamilton Hankins,1877—?)的指导下,李济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二年,即研究生阶段开始学习人口学和社会学课程。后来又在克拉克大学老校长霍尔(Clark Leonard Hull,1884—1952)的建议下转攻人类学。李济在1919—1920年曾跟随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1886—1968)学习过系统心理学课程,1920年转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21年曾跟随本能论者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教授做了一年心理学实验——教小白鼠在水迷宫中学习游泳并将习得的本能遗传给下一代的实验,1922年年中停止实验,并将实验数据提交给麦独孤。① 李济后来没有继续从事心理学研究,而是从事人类学研究,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其中受了霍尔的影响,霍尔的心理复演理论就具有较强的人类学取向。另外,李济协助麦独孤进行过的心理学实验研究,其成果后来被麦独孤引证用于他同郭任远的论战之中。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不仅接受心理学训练,而且积极参与到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之中。其中功绩突出的留学生是郭任远(1898—1970)和萧孝嵘(1897—1963)。郭任远于1916年入复旦大学,两年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主攻心理学,他勤奋善思,勇于质疑权威,因而得到他导师行为主义者托尔曼的赏识。他还是大学四年级学生时,于1920年就写了一篇题为《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的文章,并发表在美国《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1921年第18期上,从而成为最早最彻底的反对本能论的心理学者。这篇文章的问世极大地震惊了当时的西方心理学界,挑战了当时的心理学权威、本能论者麦独孤。麦独孤写文章对郭任远予以反驳,并将他描写成"超华生的华生"(Out-Watsoned Mr. Waston)。郭任远还对华生提出反对意见,称不是不赞成他的行为主义革命的主张,而是反对他的柔弱性、革命

---

① 李光谟.李济先生学行纪略(未定稿)[M]//北京大学考古系,编. 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94-397.

的不彻底性。华生在读过他的文章之后,曾对郭任远说:"我赞成你大部分的主张,但我不能如你的极端。"①郭任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反对本能的存在,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具有完全不同于美国文化的中国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使得他能够"免疫于徘徊在欧美心理学之中万物有灵论的幽灵"。②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郭任远身上的中国文化因素透过其行为主义主张部分地影响了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进程。郭任远作为当时国际上著名的激进行为主义者,为发展行为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使行为主义心理学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详见第五章第一节)。

萧孝嵘1926年就学于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次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即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格式塔心理学。1928年8月返回美国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并于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伯克利分校的主攻方向是儿童心理学发展,其间与导师一起创立至今仍负有盛名的哈罗德·琼斯儿童研究中心(Harold Jones Child Study Center),并且曾经与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一起设计使用迷津对动物进行实验。另外,他自德国研习格式塔心理学返回美国之后,于1928年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格式塔心理学评论》(*A suggestive review of Gestalt psychology*),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发表了《1926—1927年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Some contributions of Gestalt psychology from 1926 to 1927*),通过这两篇文章向美国心理学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格式塔心理学的主要观点和贡献。此前美国心理学界对格式塔心理学一直存在着较多的误解,因此萧孝嵘对格式塔心理学的介绍受到美国心理学界的重视,并且受到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波林的赞誉。

二、留学生的心理学博士论文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研习心理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见表4-1),既是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心理学体制中接受专业训练的成果,是西方心理

① 郭任远.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郭任远心理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局,1928:116.

② Kantor, J. R. (1971). In memoriam: Zing Yang Kuo 1898-1970. *Psychological Record*, 21: 361-383.

学发展史上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属于中国心理学专业研究的起点,正是基于在这些专业训练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陆续开展心理学的教育与科研工作,开创了中国近代心理学的一个辉煌时期。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未曾在欧美获得博士学位但回国后在心理学领域同样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留学生,如张耀翔、谢循初、章益、王雪屏、王书林、阮镜清、普施泽、黄钰生、胡秉正、高文源、费培杰、董任坚、陈雪屏、陈礼江、陈飞鹏等人。

表 4-1　1919—1949 年中国心理学留学生博士论文题录

序号	姓　名	英文名字	博 士 论 文	时间	学　校
1	凌冰(1894—1993)	Ling Ping	Publics schools and the war	1919	克拉克大学
2	刘廷芳(1891—1947)	Lew Timothy Ting-Fang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Chines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by mean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of some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1920	哥伦比亚大学
3	唐钺(1891—1987)	Tang Yueh	Affective factors in perception	1920	哈佛大学
4	陆志韦(1894—1970)	Luh Chih-Wei	The conditions of retention	1920	芝加哥大学
5	廖世承(1892—1970)	Liao Sze-Chen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non-intellectual demands	1921	布朗大学
6	庄泽宣(1895—1976)	Chuang Chai-Hsuan	Tendencies toward a democratic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22	哥伦比亚大学
7	刘湛恩(1896—1938)	Liu Herman Chan-En	Non-verbal intelligence tests for use in China	1922	哥伦比亚大学
8	王祖廉(1896—?)	Wang Tsu-Lien	The influence of tui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	1922	芝加哥大学
9	郭任远(1898—1970)	Kuo Zing-Yang	A behavioistic experiment in inductive inference	1922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
10	周学章(1894—1945)	Chou Henry Hsueh-Chang	The measurement of composition ability	1923	哥伦比亚大学

① 1923 年,郭任远因拒绝根据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对其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并且在已经安排口头答辩日期的情况下未予参加而是返程回国,故未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候选人资格保留到 1927 年。1936 年郭任远赴美期间,在其导师托尔曼(Edward Tolman)的帮助下重新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并获得博士学位。参见: Blowers, G. H. (2001). To be a big shot or to be shot: Zing-Yang Kuo's other career. *History of Psychology*, 4(4): 367-387.

(续表)

序号	姓　名	英文名字	博 士 论 文	时间	学　校
11	汪敬熙(1897—1968)	Wang　Ging-Hsi	The relation between "spontaneous" activity and estrous cycle in the white rat	1923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2	杜佐周(1895—1974)	Tu　Horace Tsou Chow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rrangements the Chinese language upon speed and comprehension of silent reading	1924	衣阿华大学
13	蔡翘(1897—1990)	Tsai　Chia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tention curves for motor habits	1924	芝加哥大学
14	李昂(1898—1925,女)	Lee Ang Lanfe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reten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intelligence	1925	哥伦比亚大学
15	艾伟(1890—1955)	Ai　Joseph Wei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1925	乔治·华盛顿大学
16	潘菽(1897—1988)	Pan　Shuh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conditions upon learning and recall	1926	芝加哥大学
17	沈有乾(1902—2005)	Shen　Eugene Y. C.	The reading of Chinese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xes: An experimental study by means of photographic recording of eye movements	1926	斯坦福大学
18	吴定良(1893—1969)	Woo Ting-Liang	Dextrality and sinistrality of hand and eye	1928	伦敦大学
19	郭一岑(1894—1977)	Kuo　Itzen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Aubertsche Phänomen	1928	杜宾根大学
20	蔡乐生(1901—1992)	Tsai　Loh-Seng	Gradual versus abrupt withdrawal of guidance in maze learning	1928	芝加哥大学
21	何清儒(1901—1985)	Ho　Ching-Ju	Personnel studies of scient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8	哥伦比亚大学
22	孙国华(1902—1958)	Sun　Kuo-Hua	A study of visual and auditory reactions in infants	1928	俄亥俄州立大学
23	胡毅(1904—1994)	Hu　I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reading habits of adult Chinese	1928	芝加哥大学
24	叶麐(1894—1978)	Yeh　Ling	La psychologie de l'intérêt	1929	里昂大学
25	吴冕/吴南轩(1895—1980)	Woo　Mien	Learning theory: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trends	1929	加利福尼亚大学
26	程乃颐(1902—1970)	Cheng　Nai-Yi	The relation of retroactive effect to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1929	芝加哥大学
27	陈选善(1903—1972)	Chen Hsuan-Shan	The comparative coachability of certain types of intelligence tests	1929	哥伦比亚大学

(续表)

序号	姓 名	英文名字	博 士 论 文	时间	学 校
28	周先庚(1903—1996)	Chou Siegen Keng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1929	斯坦福大学
29	卢于道(1905—1951)	Loo Yu-Tao	On projection fibers of the forebrain of the virginian opossum	1929	芝加哥大学
30	萧孝嵘(1897—1963)	Hsiao Hsiao-Hung	The status of the first-bor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lligence	1930	加利福尼亚大学
31	黄翼(1903—1944)	Huang I	Children's explanations of strange phenomena	1930	耶鲁大学
32	潘渊(1892—1974)	Pan Yuen	The relation of feeling and con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edonic and hormic theories	1930	伦敦大学
33	杨震华(1893—1969)			1931①	巴黎大学
34	王徵葵(1902/1904—1974)	Wang Charles Killord Athen	The significance of early personal history for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	1931	芝加哥大学
35	左承恩/左任侠(1901—1997)	Tso Cheng-En	La mesure scientifique dans l'education en Chine	1931	蒙彼利埃大学
36	欧阳翥(1898—1954)	Ngow Yang Gu	Die cytoarchitektonische Felderung des Gyrus rectus	1932	柏林大学
37	朱鹤年(1906—1993)	Chu Ho-Nien	The diencephalon of the opossum, Didelphis virginiana: A study of the cell masses and fiber connections	1932	康奈尔大学
38	朱光潜(1897—1986)	Chu Kwang-Tsien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A critical study of various theories of tragic pleasure	1933	斯特拉斯堡大学
39	程克敬(1899—1982)	Chen Willam Ke-Ching	The influence of oral propaganda material upon students' attitudes	1933	哥伦比亚大学
40	包志立(1902—1978,女)	Bao Dji-Lih	Plateaus and the curve learning in motor skill	1933	密歇根大学
41	陈立(1902—2004)	Chen Lih	Oscillation at threshold and in mental work	1933	伦敦大学学院
42	倪中方(1906—1974)	Ni Chung-Fa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punishment for errors during learning upon retention	1933	芝加哥大学

① 目前能确认杨震华的导师是法国心理学家瓦龙(Henri Wallon,1879—1962),但未查到杨震华的法文名字以及博士论文题目。

(续表)

序号	姓　名	英文名字	博 士 论 文	时间	学　校
43	王凤喈(1906—1994)	Wang Fung-Chiai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eye-movements in the silent reading of Chinese	1933	芝加哥大学
44	臧玉洤(1901—1964)	Tsang Yu-Chuan	The functions of the visual areas of the cerebral cortex of the rat in the learning and retention of the maze	1934	芝加哥大学
45	胡寄南(1905—1989)	Hu　Chi-Nan	The effects of brain injury upon retentiveness in the rat	1934	芝加哥大学
46	张肖松(1901—2008,女)	Djang Siao-Sung	The role of past experience in the visual apprehension of masked forms	1935	密歇根大学
47	骆传芳(1903—1969)	Lo　Chuan-Fang	The affective values of color combinations	1935	芝加哥大学
48	齐泮林(1901—?)	Chi　Pan-L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ersonality rating	1936	芝加哥大学
49	戴秉衡(1899—1996)	Dai　Bingham	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	1937	芝加哥大学
50	敦福堂(1910—1985)	Dun Fwu Taring	Aktualgenetische Untersuchung des Auffassungsvorganges chinesischer Schriftzeichen	1939	耶纳大学
51	林平卿(1908—?)	Ling Bing-Chung	Form discrimination as a learning cue in infants	1939	密歇根大学
52	张孟休(1911—?)	Chang Meng-Hsiu	A topological theory of learning	1942	多伦多大学
53	朱锡侯(1914—2000)	Tchou　Si-Ho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physiologie des cellules nerveuses chez l'aplysie	1942①	里昂大学
54	张锺元(1907—1988)	Chang Chung-Yuan	A study of the relative merits of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es in reading Chinese print	1943	哥伦比亚大学
55	夏　云(1904—1968)	Hsia　Yun	Whiteness constancy as a function of difference in illumination	1943	哥伦比亚大学
56	徐恩锡(1911—?)	Hsu　En-Hsi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st for measuring character traits	1943	天主教大学
57	陈汉标(1906—1982)	Chen　Han Piao	Speech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A quantitative study	1946	衣阿华大学

① 朱锡侯于1942年获得里昂大学生理学博士学位,因抗战爆发滞留法国后遂赴巴黎大学心理学院就学于皮埃隆(Henri Pieron,1881—1964)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参见:朱锡侯,口述.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M].朱新地,整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53.

(续表)

序号	姓　名	英文名字	博 士 论 文	时间	学　校
58	张香桐(1907—2007)	Chang Hsiang-Tung	Segmentation, lamination and topographical projection in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ail of Ateles	1946	耶鲁大学
59	胡先晋(1910—1984)	Hu Hsien-Chin	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1948	哥伦比亚大学
60	吴江霖(1914—1995)	Woo Chiang-Lin	Conformity in custom behavior: An investigation of seven male custom behavior, in eleven situations, by the use of the J-curve theory and method	1948	雪城大学
61	曹日昌(1911—1969)	Tsao Jih-Chang	Time intervals in learning and memory	1948	剑桥大学
62	吴坤淦(1917—1989)	Woo Kun-Kan	Learning theory: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trends	1949	科罗拉多大学
63	林传鼎(1913—1996)	Lin Chuan-Ting	Les réactions chez les nouveau-nés avant et après le repa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génétique des émotions	1949	鲁汶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袁同礼编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16－1961*(《中国留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中国留学欧洲大陆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并根据其他资料进行了补充。此表的信息未截至1937年,而是涵盖1949年之前中国留学生心理学博士论文情况。根据一些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的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同样参与了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情况,对其博士论文情况也进行了收录。

虽然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研习心理学完成学业之后,在海外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甚至有些留学生旅居海外,但是以他们获得学位时间为基点,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心理学领域的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年度分布情况(见图4－1),以1937年为节点,1919—1937年共有49人获得博士学位,年均约2.58人,1938—1949年共有14人,年均约1.17人,明显可以看出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异,尤其是前一时期近20年时间里,除1927年没有人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外,其他年份中都在1人以上,1928年、1929年、1933年人数

各有 6 人。而 1938—1949 年这 12 年间有六个年份中没有人获得博士学位,人才储备中“断档”现象明显,严重阻碍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抗战结束之后的 1948—1949 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数有所恢复。



图 4-1 1919—1949 年各年度中国心理学留学生完成博士学位情况

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大部分都活跃在心理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因为兴趣转向而最终主要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但是他们自身的心理学背景依然成为他们学术拓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如朱光潜从事美学研究,吴定良从事人类学研究。另外,从这些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情况来看,多位心理学留学生的研究,尤其与教育测验相关联的教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结合了中国教育的情况,如胡毅的《中国成年人阅读习惯的实验研究》(*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reading habits of adult Chinese*)、左任侠的《中国教育中的测量方法》(*La mesure scientifique dans l'education en Chine*)、庄泽宣的《中国教育迈向民主体制的趋势》(*Tendencies toward a democratic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等。这说明这些留学生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积极关注,试图用先进的科学方法促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刘廷芳、周先庚、杜佐周以中国汉字/汉语为研究对象开展心理学实验研究,体现出对中国自身文化内容的关注。

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整体而言,这些留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展的课题在回国之后大部分没能继续开展下去,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科学

技术水平整体落后,心理学事业还处于开拓阶段,无论是心理学理论建设还是心理学研究技术都难以与西方心理学较快地接轨,使得这些心理学留学生回国后开始寻求心理学和中国社会、教育的结合点,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开创心理学事业。

三、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形成

这些在海外学习了心理学的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任教于国内的各大高校,承担起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参与各高校心理学系科、心理学实验室,以及心理学研究所的创办,同时积极倡导或参与中华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等各专业学会的创建以及《心理》、《中国心理学报》等杂志的创办和撰稿。

心理学留学生作为中国心理学的主力军,也逐渐在世界心理学的大舞台上亮相。1929 年艾伟、沈有乾、汪敬熙、郭任远、孙贵定作为中国心理学家的代表参加了在耶鲁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当时在美国求学的蔡乐生和周先庚也参加了这次学术大会。[①] 沈有乾受邀整理中国心理学家的信息情况,提交后被收录于《心理学人名录》(*Psychology Register*),1929 年出版第 2 卷时收录了 11 名中国心理学家,1932 年出版第 3 卷时共收录了 32 位心理学家,[②]都是从海外学习心理学或教育学之后在国内开展工作的心理学者。

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几乎心理学学科的每项实践活动都有这些心理学留学生的身影,他们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核心力量,同时这个群体的科研水平也代表着当时中国心理学的水平。中国心理学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出现的"黄金时期",也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与这一批心理学留学生的努力和开创精神分不开的。

---

① 据沈有乾称,这次大会至少有 6 位中国人参加,目前能确定参会名录中有 7 位中国人,或许有中国心理学者提交了会议文章,并未实际参加这次会议。参见:沈有乾. 各国心理人才统计[J]. 人文月刊,1931(2). Cattell, J. M. (1930)(Ed.).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Proceedings and Papers*. Princeton, NJ: 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Company. 另外,国内心理学界存在着一种说法,即朱希亮也曾参加这次大会并聆听过巴甫洛夫的演讲,并在演讲后与巴甫洛夫交流过,但这次大会会议记录的参会名单中未能查到朱希亮的名字,朱希亮应该是以其他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② 沈有乾. 心理学人名第三集[J]. 人文月刊,1934(4).

第二节 心理学研究的专业组织

一、中华心理学会[①]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暑期教育讲习会。在讲习会快要结束时，有许多学员认为心理学与教育关系密切，于是签名发起组织中华心理学会，征求多位心理学教授参加。几天之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临时大礼堂举行了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心理学会简章，投票选举张耀翔为会长兼编辑股主任，陈鹤琴为总务股主任，陆志韦为研究股主任，廖世承、刘廷芳、凌冰、唐钺为指导员。会上决议，总务股和研究股的办事处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华心理学会总会和编辑股办事处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中华心理学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心理学实验室办公，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杂志也在这里编辑出版。

1921年9月，张耀翔在北平一方面开始组织学会会刊编辑部，另一方面联系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经过四个月的筹备，1922年1月我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问世。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后举办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学术活动。如：1922年6月邀请梁启超进行演讲，其演讲内容后来以《佛教心理学浅测》(又名《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为题发表于《心理》杂志。1923年曾有苏联心理学家叶勒索夫(Erchoff)在中华心理学会演讲，介绍苏联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当年5月，邓萃英在中华心理学会进行了学术演讲，并以《儿童之宗教的意识》为题于5月27日至31日连载在《晨报副刊》上。中华心理学会自成立后，会员每年都有增加，最盛时多达235人，其中大学教授20人，中学教职员52人，其余都是专科及大学学生，但是由于学术活动未能经常举行，组织逐渐涣散。随着1927年《心理》杂志的停刊，中华心理学会也就没有任何活动了。1931年有报纸报道：“近有京沪平大学教授，鉴于心

---

① 1918年4月18日第16223号《申报》，曾有如下文字：“中华心理学会新译新记忆术亦已出版，昨承见赠一册，书此谢谢。”1919年11月16日第16792号《申报》已有“中华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字样，可见当时已经有人组建了所谓的“中华/中国心理学会”，只不过1919年之前，自海外研习心理学回国的人还比较少，所谓的中华/中国心理学会是此间对心理学有过涉猎的知识分子使用的称呼，实际上并不存在专业的心理学学术团体。

理学日益发达，而国内研究者亦逐渐加多，急应组织学会，共谋心理科学之发展进步，因集同志筹备中华心理学会，将于七月八、九日，假上海北京路50号清华同学会会所开会宣读论文，讨论进行一些事务。并闻有多起提案，均关于切实发达研究心理学之事业，于中国学术界前途，当有一番贡献也。”①出席中华心理学会筹备会的有郭一岑、艾伟、郭任远、萧孝嵘、沈有乾、吴南轩、陈鹤琴、陈选善、董任坚等共15人，并拍照留念(见图4-2)。但是后来因为“九一八”国难发生，此事被搁置，中华心理学会就再也没有恢复。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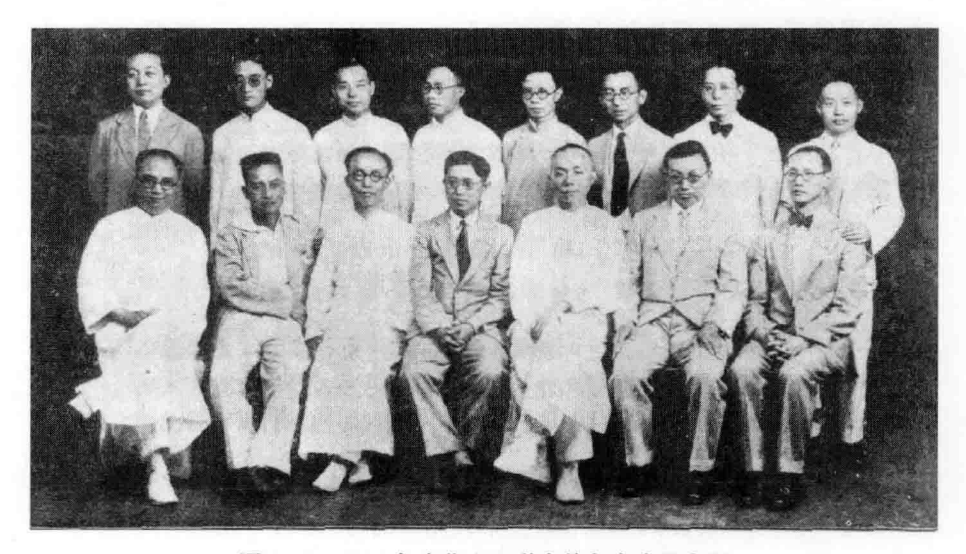


图4-2　1931年中华心理学会筹备会成员合影

后排左起：萧孝嵘、谢循初、董任坚、王书林、樊际昌、章益、陈选善、陈鹤琴
前排左二起，左一身份未确定：郭任远、黄觉民、郭一岑、吴南轩、艾伟、沈有乾
(资料来源：《心理季刊》1936年第4期，转自《中国心理学会80年》)

二、中国心理学会

上海心理学界的人士自1936年上学期开始有一个非正式组织，每月聚餐一次，商讨推进心理学学术的各项问题，该团体开展活动半年之后感到无正式组织，也没有固定负责人，对于开展活动有很多不便，于是在10月份聚会上决定组织一个正式团体，定名为“上海心理学会”，该会于1937年1月10日正式成立，推举张耀翔、章益和章颐年为学会的干事。该学会成立后开

① 中华心理学会筹备会[J]. 申报，1931-7-7(第20925号).
② 编后记[J]. 心理季刊，1931(3)：183-186.

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心理学会员,系统地举行学术演讲,总题目为"心理学与人生",共有十讲,很受社会公众的欢迎。

从1934年7月开始,北京各大学的心理学者每月聚餐一次,讨论中国心理学的现状及将来出路等问题,都认为提倡心理学的应用是当务之急。第一次聚餐(1937年7月24日)由周先庚主持,参加者有北京大学的樊际昌、陈雪屏、潘企莘,北平师范大学的程克敬、朱希亮,辅仁大学的王徵葵、高文源,燕京大学的刘廷芳、陆志韦,清华大学的孙国华、叶麐①以及包志立和瞿璐(法国里昂大学心理学硕士)两位女士。后来又有陈立加入聚餐活动。北京各大学心理学者聚餐会作为当时中国心理学界非正式的学术群体还承担起与国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如第九次聚餐会是由刘廷芳和陆志韦主持欢迎哈佛大学教授坎农(Walter Braford Cannon,1871—1945)博士,1935年12月第十三次聚会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克兰伯格(Otto Klineberg,1899—1992,旧译柯蓝博)博士参加。1936年6月第十九次聚餐是为克兰伯格送别而宴请各位同仁。②

在1935年11月份的聚餐会上,陆志韦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北京大学樊际昌、清华大学孙国华、燕京大学陆志韦被推为章程起草人。三人拟定的"中国心理学会章程草案"经过讨论修改后向各地心理学工作者征求意见,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认为建立中国心理学会是当务之急。1936年11月心理学界人士32人发出由陈雪屏起草的学会组织启事,正式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启事中首先提出,"现在有重新组织心理学会的必要":

> 同志们在国内外曾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曾先后为提倡心理学的效用而努力,但中国的心理研究在国际上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地位,心理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且有日趋没落之势,一般人对于心理学应用的价值更是漠不关心。我们的失败,正因为过去缺乏合作。社会上流行的成见,障碍心理研究的发展,本是普遍现象,在我国这样的情形尤见严重。我们更需要坚强的合作,来排除这个障碍。……让我们各尽其责,用热心

① 原文为叶石子,疑为印刷错误。
② 周先庚.北平心理学界同仁聚餐记略[J].中国心理学报,1936(1):87-89.

与毅力,共同奠定中国心理学会的基础,发扬中国的心理学。[1]

1937年1月24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大礼堂举行了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见图4-3)。会上公推陆志韦为主席,会上票选陆志韦、萧孝嵘、周先庚、艾伟、汪敬熙、刘廷芳、唐钺为理事。同时将《中国心理学报》归为学会管理,正式成为学会刊物。正当中国心理学会各种活动相继开展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学会活动和刊物都被迫停止。



章　益　陈礼江
艾　伟　王书林　杜元载　张君俊　谢循初　胡寄南　卢于道
孙贵定　王凤喈　潘　菽　萧孝嵘　欧阳翥　樊际昌　吴定良　程迺颐　陈　立
高　翰　刘廷芳　蔡乐生　张肖松　陆志韦　唐　钺　郭一岑　章颐年　赵　演

图4-3　1937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大会合影

(资料来源:《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3号)

三、中国测验学会[2]

中国的科举选士制度存在1 300多年,至清末1905年废除。随着西学

① 周先庚,陈汉标. 心理学界消息[J]. 中国心理学报,1936(2): 174.

②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176-187.

的传入,如何选拔人才成为民国初期教育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伴随着西方心理学的传入,心理测验也随之输入中国,其肇始是1915年克雷顿在广州开展的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项的心理测验,以及1918年瓦尔科特在清华学校用推孟修订的智力量表测验学生。1920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测验课程,以心理测验测试学生。他们于1921年出版了《智力测验法》,介绍了智力测验的用处、历史、标准、方法等内容,标志着科学心理测验在中国的正式开展。

廖世承1915年进入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在校期间他经常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暑期学校,还被自己老师介绍给该校的几位教授相识,博士毕业后于1919年回国。[①] 陈鹤琴于191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硕士,打算攻读心理学博士未果后于1919年回国。哥伦比亚大学正是心理测验创始人卡特尔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美国心理测验推广工作的重镇。而廖世承和陈鹤琴与哥伦比亚大学都有学术渊源,这促使他们回国后首先开展了心理与教育测验的课程设置和实践工作。

1921年之后,心理测验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西方的一些量表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与测验相关的文章,使当时学界认识到人类的心理有较为科学的技术手段可以对其进行测量。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被人们接受,如何科学地应用于实践的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可以明显看到广泛应用前景的心理测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迅速获得当时人们的认可和追捧。

当时教育部门对心理(教育)测验的重视和提倡,对于测验的普及和推广也起到重要作用。当时教育领域对心理测验的需求成为测验工作在当时迅速普及和传播的重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大批心理学者、教育学者参与智力测验、教育测验的工具编制,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测验工作。但是,在20年代后期心理、教育测验工作受到很大冲击,主要是由于对测验的过度崇拜,滥用、夸大、歪曲等现象时有发生,致使社会上对测验产生反感,同时也令一些心理学者感到有必要组建专业的研究队伍,共同致力于原理研究和技术改进。

---

① 廖世承.我的少年时代[J].良友,1935(109):12-13.

1930年秋,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鉴于测验作为考试制度的一种,有意发起组织测验学会。当时国民政府党部设有测验科,由吴南轩主持工作。吴南轩会同史维焕、赖琏两人开始做初步的筹备工作。截至1930年12月15日共征得57人的同意做发起人,通过通讯方式选举出吴南轩、艾伟、易克櫄、陈鹤琴、史维焕、顾克彬、庄泽宣、廖茂如、邰爽秋为筹备委员,陈选善、陆志韦、郭一岑、王书林、彭百川为候补委员,指定吴南轩为筹备召集人,选举吴南轩、彭百川、易克櫄为常务委员。[①] 1931年6月2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致知堂召开成立大会(见图4-4)。1932年7月17—20日在北平燕京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年会,1933年12月29—31日在中央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年会。



图4-4　1931年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大会合影

(资料来源:《测验》1932年第1卷1期)

中国测验学会的宗旨为研究各种测验学术、推行测验方法,主要工作为:(1) 编造及修订各种测验;(2) 编译及刊印关于测验及教育统计的书报;(3) 调查各地实施测验状况;(4) 办理各机关委托研究事项;(5) 宣传测验之功用。该会创办了会刊《测验》杂志,自1932年5月创刊至1937年1月停止,共出版九期。中国测验学会多次举办(筹办)学术年会,研讨会员在各个领域开展的测验工作,如量表编制的理论、方法、问题,以及测验名词术语的审查工作。测验学会对于规范测验在中国的开展功不可没,并取得很大的成绩。随着抗战的爆发,《测验》停刊,测验的团体协作性工作受到冲击,但是测验的具体工作仍然被一些心理学者在教育、人事等领域继续推行,一直未终止。

---

① 第二届中国测验学会年会[J].申报,1933-12-29(03)(第21809号).

四、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1908年康复了的精神病患者比尔斯(Clifford Whittingham Beers,1876—1943)出版了《一个找回自己的心》(*A Mind That Found Itself*),①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吁改善精神病患者的待遇和开展预防精神病的活动。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读过比尔斯的书稿后,写信鼓励和支持他开展的运动。当时的精神病学家梅耶(Adolf Meyer,1866—1950)建议比尔斯使用"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这一术语。在各界的支持之下,比尔斯推动的心理卫生运动得以发展。1908年5月成立康涅狄格心理卫生协会(The Connecticut Society for Mental Hygiene),这是全世界心理卫生运动中的第一个组织,也可以看作是心理卫生运动全面开展的发端。比尔斯于1909年又创办美国心理卫生委员会,并引发国际上对心理卫生的关注,各国纷纷成立心理卫生委员会。经过多年的酝酿和筹备,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于1930年在华盛顿召开,并正式成立国际心理卫生委员会,我国临时指派五位代表参加,并由汪敬熙在大会中报告我国心理卫生的情况。我国当时的卫生署署长刘瑞恒(1890—1961)被大会推举为名誉副会长。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国内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此项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心理卫生在中国需要有组织地开展,就需要人们积极地去推动。1933年,在心理卫生运动25周年之际,刘瑞恒在寄给美国心理卫生基金会和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1850—1934)的贺信中提到,当下中国还没有开展心理卫生运动,但是自从参加了1930年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之后,自己经常会想到心理卫生工作,并打算翻译出版比尔斯的个人传记,②无疑这将会引起对心理卫生运动必要性的公众兴趣。最后刘瑞恒写道,"我由衷地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

---

① 胡寄南193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一些大学曾担任过心理卫生课程,并于1938—1939年将比尔斯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交给吴南轩,后来资料下落不明。1938年第22期《西风》月刊以《一个疯子的自传》发表了许成翻译的比尔斯自传部分内容。20世纪80年代胡寄南重新主持将此书第41版译为中文《一个精神病人的自叙》。参见:胡寄南心理学论文选(增补本)[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324-327.

② 刘瑞恒是比尔斯哈佛大学的校友,称10年前就阅读过比尔斯的自传,在收到韦尔奇之邀为比尔斯的心理卫生运动写祝词之际,重读该书后的印象比初读时更为深刻,称可能由于自己正身兼卫生署署长之责的缘故。1933年心理卫生运动25周年纪念会晚宴上比尔斯还戏称将来要读读这本中文版的传记。

一位中国的比尔斯”,[①]由此表达出需要有人在中国积极地推广和开展心理卫生运动的强烈愿望。

我国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从美国引进心理卫生的相关知识,一些大学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如章颐年于1930年在暨南大学首先开设心理卫生课程,也曾在大夏大学讲授此课程。燕京大学心理系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夏仁德(Randolph C. Sailer,1898—1981)在1932年讲授心理卫生课,1935年他出版了《人格与日常行为》(*Personality and Everyday Behavior*),并用作心理卫生课程的讲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人们对“担负解纾国难与恢复国家地位之人民,宜如何身心健全,以肩荷大任”[②]的问题深感焦虑,认为心理卫生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工作。如吴南轩曾著文写道:

> 我国近日正当国难严重之际,举国上下方力谋振作,以期民族复兴。但民族复兴及基本条件不是心理建设吗?国民精神若不健康,心理若不健全,心理建设何从实现呢?不提倡防止心理失常和保持精神健康的心理卫生,国民健康的精神与健全的心理又何能达到呢?故我们若甘自暴自弃,坐待灭亡则已,否则我们如果诚欲实现心理建设,以复兴民族,解纾国难,则必提倡研究心理卫生,努力推行国民精神保健的工作,即是参加这个轰轰烈烈的国际心理卫生运动。[③]

如章颐年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缘起》中说:

> 国于大地,必有兴立,立国基本之道为何?民心或民族之精神而已。无论任何国家,其民心健全者国必强盛,民心堕落者国必衰微,民心者实一国国力兴衰升降之寒暑计也。故先哲皆以心地为本,治学者以治心为先,治军者以攻心为上,治国平天下者以诚意正心为主。心之

① Cross, W. L. (1934). *Twenty-Five Years After: Sidelights on the Mental Hygiene Movement and Its Found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Company, Inc. pp. 441-442.

②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缘起[M]//章颐年. 心理卫生概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32.

③ 吴南轩. 国际心理卫生运动[J]. 教育丛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1935.

为用大哉,操则存,舍则亡,个人如此,一国民族尤然。①

心理卫生运动逐渐国际化,由美国传到加拿大,由美洲传到欧洲,再到亚洲、非洲、大洋洲,许多国家在积极推行心理卫生运动。为了“保持与促进国民之精神及防止国民之心理失常与疾病”,“研究心理卫生学术及推进心理卫生事业”,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同仁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1935年10月开始筹备,向全国心理学界征求意见,经过教育界、心理学界、医学界等各界共231人的酝酿和发起,并得到146位知名人士的赞助,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1936年4月19日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见图4-5),并通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简章》。该协会的宗旨是保持并促进精神健康,防止心理的、神经的缺陷与疾病。研究有关心理卫生的科学学术,倡办并促进有关心理卫生的公共事业为该会主要工作。



图4-5 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大会合影

(资料来源:《心理季刊》1936年第1卷第3期)

1936年5月经过投票选举艾伟、吴南轩、萧孝嵘、陈剑脩、陈鹤琴等35人为理事,周先庚、方治、高阳等15人为候补理事;陈大齐、陈礼江、杨亮功、刘廷芳、廖世承等21人为监事,梅贻琦、章益、郑洪年等9人为候补监事。6月19日举行的第一次理事会议,推举吴南轩(总干事)、萧孝嵘、艾伟、陈剑脩、朱章赓为常务理事,同时对协会的各部门进行人事安排,从而构建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内部完整的组织结构,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这

① 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1.

次会议通过的年度工作计划涉及九个方面的工作：征求会员、筹备基金；编印杂志、丛刊；介绍书报、举行演讲；举办儿童幸福讨论会；推广心理医学教育；征集材料；调查精神病院低能儿童；实施测验；培养人才；筹办精神健康咨询处、指导儿童所及参加第二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等等。①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中列有一项为“编印心理卫生丛册”，今见有其丛册第2号为吴南轩著《问题儿童之心理卫生》、第18号为《国际心理卫生运动》。身为理事之一的章颐年在1936年出版《心理卫生概论》一书。此书与夏仁德的《人格与日常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时中国心理卫生理论与实践的框架和体系。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组织工作被迫停止。

第三节 心理学专业期刊

一、《心理》

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于1922年1月出版会刊《心理》(见图4-6)，英文刊名为*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1927年1月终刊。这是我国第一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由张耀翔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编辑部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实验室的中华心理学会总会。《心理》杂志创刊号上的“本杂志宗旨”首先声明，该杂志为中华心理学会的“言论机关”，又称：



图4-6 《心理》

> 中华心理学会是专为联络中国心理学专家和素有研究的心理

①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190-191.

学者而设。

中华心理学会会员承认心理学自身是世上最有趣味的一种科学。他们研究,就是要得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办这个杂志,是要别人也得同样的快乐。

中华心理学会会员承认心理学是世上最有用处的一种科学:不但可用在教育上,还可用在实业、商业、医术、美术、法律、军事、日常生活上。他们研究,就是为求这许多的应用。办这个杂志,是要让别人也得这些应用。

中华心理学会会员研究心理学是从三方面进行: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办这个杂志,是要报告他们在这三方面研究的结果给大家和后世看。

这是本杂志的宗旨,也可做他的发刊词、宣言书。①

《心理》杂志共出版14号(期),1922年出版第1卷第1号,1927年7月出版第4卷第2号之后停刊。该刊总共发表论文163篇,其中具有创作性质的论文至少50篇。该杂志的栏目设有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儿童心理、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心理学史、各家心理、应用心理、教育心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心理界闻等,并辟有历史、传记、介绍、通讯、读者论坛等。《心理》杂志还设置"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栏目,是当时我国一些著名杂志发表心理学著作的摘要,这些杂志包括《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界》等二十多种。汇集的心理学论文除了为"传播旧作,唤起新作"的目的之外,还可作为讲授心理学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心理学爱好者自学研究的资料,用以解决资料匮乏的局面。《心理》杂志每期还附有插图,如著名心理学家的照片、错觉图、知觉实验图、诵读时眼球跳动实验图等共计22种。

《心理》杂志问世后,立即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日本各教育机关、学者,纷纷来函购订或要求交换,并有数种日本杂志专为该杂志作了相关的介绍。日本此前已有以心理学名称出版的杂志,但是刊物上同时还刊登其他学科的论文,因此这些杂志并不是心理学专业期刊,如1912年在东京创刊的《心

① 本杂志宗旨[J]. 心理,1922,1(1).

理研究》、1919年出版的《日本心理学杂志》。京都帝国大学心理研究室的同名刊物《日本心理学杂志》于1923年1月创刊出版，提出新的办刊方针，从而成为日本首个心理学专业期刊。作为心理学专业期刊，我国《心理》杂志早于《日本心理学杂志》问世，因此《心理》杂志是东方第一种心理学杂志。① 这说明我国第一代心理学者较早地形成了心理学的专业意识和学术群体。

《心理》杂志一方面汇集了当时我国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开创了中国心理学研究的新局面，它是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留给后世的珍贵学术遗产。1932年张耀翔从《心理》杂志选出比较精粹的50篇文章汇编成《心理杂志选存》(上、下)，由中华书局再次发行于世。1927年，周先庚以《1922年以来中国心理学旨趣的趋势》(*Trend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interests since 1922*)为题向西方心理学界介绍了刊发在《心理》杂志上共分为21类的110篇论文。② 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界的研究成果第一次集体展示于西方心理学界，促进了西方心理学界对中国心理学的了解。

二、《心理半年刊》

《心理半年刊》(见图4-7)由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编辑，③英文刊名为 *The N. C. Journal of Psychology*，艾伟任主编，于1934年1月1日在南京创刊，至1937年1月1日出版第4卷第1期后停刊，共出版7期。其中后5期均为"应用心理专号"，可见当时办刊宗旨是指向心理学的应用。该刊总共载文88篇，其中译文21篇。为该刊撰写文章的心理学者以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教师为主，如艾伟、萧孝嵘、吴南轩、潘菽、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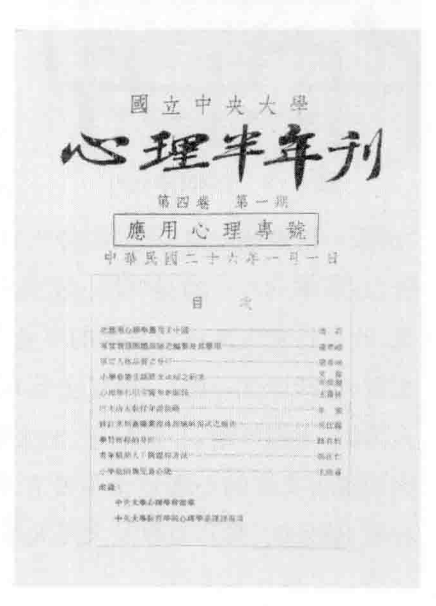


图4-7　《心理半年刊》

①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06.

② Chou, S. K. (1927). Trend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interests since 192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3): 487-488.

③ 该刊封底为英文刊名和目录，最末一行文字中称，该刊由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会(the psychology society)出版。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会是该系师生于1932年扩大心理学系同学会而成立的。

剑脩、郑大源等,还有一些是该校毕业生或学生完成的论文或译文,其作者有吴福元、韩进之、丁祖荫、丁瓒、曹飞、张德琇、吴江霖、孙运仁、吴襄等,郭任远在海外发表的英文文章即由吴襄译为中文发表在该刊上。

三、《心理季刊》



图 4-8 《心理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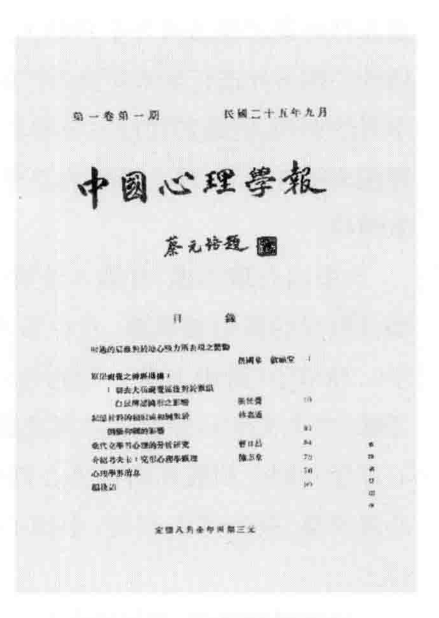
《心理季刊》(见图 4-8)由上海大夏大学心理学会出版,1936 年 4 月创刊,1937 年 6 月终刊。该刊的口号是“应用心理科学,改进日常生活”。它是当时国内唯一一份关于心理科学的通俗刊物。该刊主任编辑为章颐年。关于创办此刊的缘起和目的,编者在“创刊话”中首先对“发展到如今的心理学派别分歧议论纷纭”的状况做了概括分析,认为“正因为议论纷纭,才显得这门科学是在进步之中”。但是由于国内以单独研究心理学而编印的杂志凤毛麟角,因而感到当时迫切需要“出版一份篇幅较多、比较能持久的单纯研究心理学的杂志”,所以编印了这份《心理季刊》,目的是“使一般人认识心理学,使大家应用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进日常生活以及自己的事业”。① 《心理季刊》共出版 6 期,发表 87 篇文章(包括译文 4 篇)。栏目主要有理论探讨、生活应用、实验报告及参考、名人传记、书报评论、心理消息、论文摘要等七个栏目,还有插图照片 25 帧。为该刊撰写文章的心理学者主要有章益、郭一岑、张耀翔、陈选善、章颐年、沈有乾、蔡乐生、樊际昌以及大夏大学心理学会成员。②

四、《中国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报》(见图 4-9)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编印,

① 创刊话[J]. 心理季刊,1936(1):1-3.
②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 2 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12-213.

1936 年 9 月创刊，1937 年 6 月终刊，后成为中国心理学会会刊。主任编辑为陆志韦，编辑为孙国华和周先庚。蔡元培为该刊题写了刊名。该刊第 1 卷第 1 期的编后语中，追念 20 年代张耀翔主编的《心理》杂志，称这次出版“名曰《中国心理学报》，亦以继往启来也”。该刊英文名字为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与《心理》杂志英文名字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把《中国心理学报》看作是《心理》杂志的延续或新生。同时，《中国心理学报》在当时也承担起不同于 20 年代“鼓吹喧闹，笔阵纵横”拓荒期的责任，不再是宣传各家学说，而是进入扎扎实实地开展心理学研究的阶段，从事“系统之建立”，“以树立为我中华民国之心理学”。① 这是自主发展中国心理学的最强音。


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中國心理學報

蔡元培題

目錄

图 4-9　《中国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报》共出 4 期，1936 年 9 月第 1 期、12 月第 2 期，1937 年 3 月第 3 期、6 月第 4 期，因抗战爆发而停刊。1937 年 1 月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后，该刊自第 3 期归属中国心理学会，成为会刊。该刊总共发表文章 24 篇，其中实验报告 14 篇，系统论述文章 4 篇，书评 3 篇，其他有关实验仪器的介绍、统计方法等 3 篇。每期都有一个专栏“心理学界消息”，用来登载国内及美国、欧洲、日本心理学界的一些信息。该刊主要撰文者有陆志韦、孙国华、曹日昌、夏云、周先庚、陈汉标、樊际昌、卢于道、沈迺璋、沈有乾、张民觉、郑沛瞟。虽然该刊发行时间短，文章总量少，但是这些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遵循着严格的学术规范，代表着当时中国心理学的最高水平，尤其是该杂志使用中英文双语，国内外发行，对于中外心理学的学术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当时有多份国内外的杂志与《中国心理学报》进行刊物交换，国内有《心理季刊》、《科学》、《教育研究》，国外有日本的《心理学研究》、意大利的《意大利心理学档

① 陆志韦. 编后语[J]. 中国心理学报，1936(1)：90.

案》(*Archivio Italiano di Psicologia*),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心理学与哲学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等。同时杂志社还偶尔得到国外学者赠书。无疑,《中国心理学报》在当时起到与国内外心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作用。尽管《中国心理学报》是作为中国心理学界的期刊,但是其刊行完全靠心理学界同仁的赞助以及编辑部成员自掏腰包来维持,足以看出当时的心理学家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表现出的奉献精神。

《中国心理学报》自第3卷期由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接办,并成立由六位委员组成的新的编辑部,六位委员为沈有乾(浙江大学)、周先庚(清华大学)、孙国华(清华大学)、陆志韦(燕京大学)、蔡乐生(北平师范大学)、萧孝嵘(中央大学),并称将来刊发的研究报告以英文撰写为宜。这可见当时心理学界同仁积极面向世界心理学的心态。但是因为抗战的爆发,《中国心理学报》被迫停止刊行,中国心理学界同仁的学术热情再次受到严重打击。

抗战爆发之前,我国出版的心理学刊物还有以下几种。①

《测验》,是1932年5月由中国测验学会创刊的专业性杂志,专门发表关于测验的学术论文,共出版9期,于1937年1月出版最后一期之后停刊,发表100余篇文章。该刊主要作者有艾伟、萧孝嵘、陈选善、王书林、左任侠、吴南轩、潘菽、杜佐周、章益、周先庚、沈有乾、郑丕留等人。

《心理附刊》,是中央大学日刊中每周一期的两页周刊,1934年11月20日发刊,中间多次中断,1937年1月14日以后停刊。该刊载文多为译文,由该校"心理学会同仁于研习攻读之暇所主持",其宗旨是"促进我国心理学正当的发展,提倡心理学的研究和推广心理学的应用"。该刊共出版45期,发表文章59篇,其中译文47篇,多数文章都是分期连载。该刊著译者主要有韩进之、张德琇、丁祖荫、吴福元、张义尧和王书林等人。

《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是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印行的一种不定期刊物,专门发表动物学习和神经生理方面的实验研究报告或论文,共出版5期。同时该研究所还出版《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刊》,共发行10

① 杨鑫辉,赵莉如.心理学通史(第2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09-212,217-226.

期。这两份刊物每一期为一专题论文,载文的作者有唐钺、秦拱、臧玉洤、卢于道、朱鹤年、张香桐、蔡乐生等人。这两份刊物发表的文章均用英文撰写,其中多篇研究报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心理教育实验专篇》,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实验所编辑发行的一种不定期刊物,专门发表心理教育实验报告,共出版 7 期,1934 年 2 月出版第 1 卷第 1 期,1939 年出版第 4 卷第 1 期,此后停止刊行。

第四节　心理学的教学研究机构

一、高校心理学系

(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心理学系

1920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设立心理学系,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学系。1921 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1921 年秋,东南大学成立心理学系,仍属教育科,教育科除心理学系外,还有教育学系。当时中国的大学有独立心理学系的只有东南大学。陈鹤琴曾任该校教务长,廖世承任教育科教授,心理学系在陆志韦指导下发展较快,有"国内最完备的心理学系"之誉,东南大学心理学系配有仪器和设备先进的心理学实验室(见图 4 - 10)。东南大学心理学系的课程分为普通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类。普通心理学类的重要课程有实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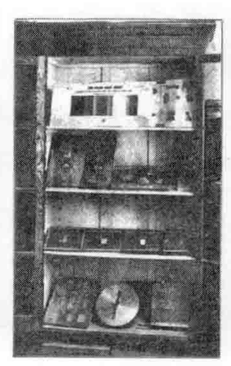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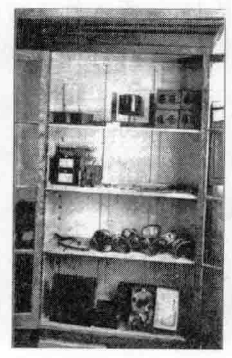





图 4 - 10　东南大学心理学实验室配备的仪器设备

(资料来源:《心理》1922 年第 3 期)

理学、心理学生物基本、儿童心理学研究法、动物心理学研究法、宗教心理学、中国人之美术观念、系统心理学、问题研究;应用心理学类的重要课程有教育心理学、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变态儿童之研究、应用心理学入门、商业心理学。①

1927年,江苏几所高校合并成中央大学。该校在心理学方面承袭东南大学心理学系的仪器图书,原注重理科的学科组成心理学系,隶属于理学院;原注重教育的学科组成教育心理组,隶属于教育学系。1929年,教育心理组扩充为教育心理学系,隶属教育学院。列为系内基本课程必修类的有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知觉心理学、学习与工作、心理测验、系统心理学、问题研究。另有选修学课程十余种。心理学系还开始招收研究生,各课程由潘菽、艾伟、郭一岑等任教。潘菽任理学院心理学系系主任。1931年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主任为艾伟。1932年,以上两系合并成为心理学系,隶属教育学院,但系内仍分普通心理与教育心理两组。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在1936年抗战前夕,为推进心理学的应用已经相继开展了量表的修订、统计原理、学习心理、儿童心理、变态心理、实业心理的研究。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为源头,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为主体,心理学在这里得到较大发展。从师资上来讲,众多心理学留学生曾在这里任教,如艾伟、张耀翔、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王祖廉、潘菽、郭任远、郭一岑、萧孝嵘、王书林、吴南轩、陈剑脩等人,可以说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有一支国内最强的心理学师资队伍。从课程设置上来讲,经过多年的发展,由1920年仅有3门课程,到1936年开设18门课程,设有普通心理学实验室和应用心理学实验室,各3间屋,各自可供30人进行实验。这足见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课程设置齐全、完备。同时中央大学培养了众多的心理学后备力量,如欧阳翥、卢于道、雷肇唐、郭祖超、费景瑚、吴福元、丁祖荫、张德琇、丁瓒、韩进之等人,这些学生后来在中国心理学界作出各方面的贡献。

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教育学院改组,心理学系隶属理

① 潘菽.本校的心理学系[J].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2):139-153.也见:潘菽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23.

学院。1939年中央大学创立教育心理研究所，艾伟任所长。他还招收研究生，开办教育心理实验班进行实验研究。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回迁南京。

（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1926年北京大学正式建立心理学系。早在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将学门改为学系，并在实行选科制时，对大学本科各学系分为五个学组，第三学组为心理学系、哲学系、教育系，当时只有哲学系存在，其他两系未能成立，有关心理学的课程都附设在哲学门(系)。从1918年北京大学哲学门购置的54本外文心理学书目来看，有冯特、铁钦纳、麦独孤、霍尔、屈尔佩、鲍德温、梅耶、霭理士等当时许多著名心理学家的著作，其内容涵盖心理学的许多领域。[①] 1926年心理学系成立，陆续添置实验仪器，心理学实验室开始初具规模，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学习使用，而且可以满足教授进行专门的研究。1929年11月6日公布的心理学系毕业生4人，分别是魏春芝、冯定远、萧从方和潘文生。

1929—1931年曾开设普通心理学(樊际昌)、实验心理学(樊际昌)、生理心理学(梅卓生)、动物心理学(陈映璜)、变态心理学(樊际昌)、晚近心理学趋势(陈德荣)、心理学史(陈德荣)、应用心理学(韩述祖、朱希亮)、社会心理学(樊际昌、陈德荣)、教育心理学(刘廷芳、邱椿)、民族心理学(黄镛、朱亦松)、智慧测验(刘钧)、精神病学(刘钧)、特殊儿童心理(刘钧)、心理统计学(傅斯年[②])、完形主义的研究(Gestalt psychology)(马师儒)、麦塞尔心理学(童德禧)、英文心理学选读(樊际昌)、初级动物心理学(孙国华)、儿童心理学(朱希亮)、初级心理研究(叶麐)、行为主义的研究(陈德荣)。[③]

1934年心理学系并入教育学系，成立心理学组。历年担任各种课程者有陈大齐、唐钺、樊际昌、汪敬熙、陈雪屏、潘渊、刘廷芳、陆志韦、孙国华、周先庚、叶麐等人。1936年，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所设课程为普通心理学、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精神

---

① 王垒，朱滢.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简史(征求意见打印稿). pp. 15 - 16.

② 傅斯年1920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著名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学习实验心理学。

③ 心理学系课程(十八年度至十九年度)[J]. 北京大学日刊，1929 - 9 - 23. 心理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度至二十年度)[J]. 北京大学日刊，1930 - 10 - 24. 同一门课程不同学期会由不同的教师讲授。

卫生、情绪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等,由樊际昌、陈雪屏、潘渊三人分别担任。普通心理学和心理实验为教育学系和哲学系的必修课程。当时已具备不少实验仪器,杂志有19种,书籍择优购置新出版的名著,足供参考研究之用,并开始系统地研究有关学习问题以及几种仪器装置的改进方法。①

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撤离平津,协商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因战局影响又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改为哲学心理学系。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回迁北京。

(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1922年,庄泽宣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当时是清华学校时期)开始讲授普通心理学课程。1926年,清华大学将教育学和心理学并重而成立教育心理系。1928年3月1日开始出版由教育心理系师生合编的刊物《教育与心理》(半年刊),主任编辑朱君毅(时任系主任兼教育学教授),编辑牟乃祚、傅任敢。1928年秋天成立心理学系,隶属于理学院,唐钺任心理学系系主任。1930年起孙国华担任心理学系系主任(1936年出国休假期间,周先庚代理系主任)。1932年秋设立心理研究所(后改称研究部),并开始招收研究生。截至1937年心理学系的历任教师有唐钺、臧玉洤、孙国华、叶麐、陆志韦、樊际昌、周先庚、米景沅、陈汉标、敦福堂、张民觉、陈立、郑沛畛(郑丕留)。截至1937年6月,共有18名毕业生:1930年的牟乃祚、邬振甫、洪保林,1931年的陈汉标、米景沅,1933年的敦福堂、张民觉、陈邈,1934年的郑沛畛、赵婉和、范钟鋆,1935年的曹日昌、张龄佳、栗明瑛,1936年的沈迺璋(研究生)、雷肇唐(研究生),1937年的傅梅芳、匡珍。② 这些毕业生有10人留学国外,后来大部分从事心理学或相邻学科的工作,有些学生,如张民觉、郑沛畛则后来在各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规模不大,但课程设置门类较齐全。必修课有心理学概论、初级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心理学史,选修课有高级实验心理学、新意思讨论会和心理问题,1932年增设理论心理学、心理实验设备、生理心理学、心理学观点等选

① 樊际昌.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概况[J].中国心理学报,1936(1):84-85.
②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

修课,1935—1936 年增设心理测验、心理生物学、工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法律心理学。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建立了一个在当时设备比较先进、完善的心理学实验室(见图 4-11)。清华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在唐钺任首届系主任时就开始建设,并历经孙国华系主任、叶麐代系主任的后续建设和指导,颇具规模,设置在当时新落成的生物学馆的第一层,拥有整整一层的楼馆。清华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建设与规模在当时中国心理学界内是数一数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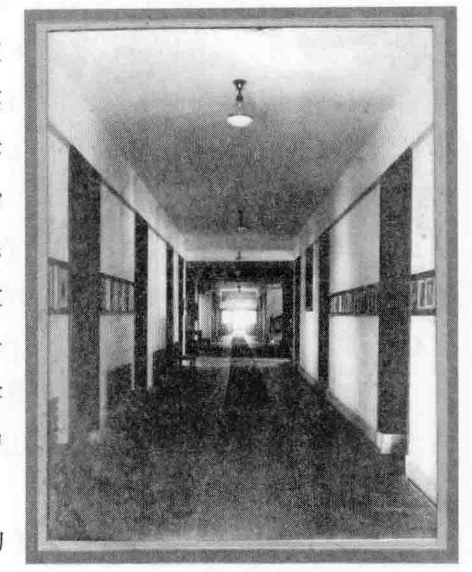


图 4-11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及心理学实验室走廊(生物馆一楼,走廊两侧为心理学家图片)
(资料来源:周先庚个人档案,周广业提供并授权使用)

清华大学心理学实验室最初购置的实验仪器,要追溯到庄泽宣于 1924 年前后在美国斯都尔汀(Stoelting)和德国齐默曼(Zimmermann)公司购买过两批价值不菲的实验仪器。1926 年成立教育心理系之后,唐钺正式开设心理实验班,在 1927—1928 年间再次购置实验仪器。1929 年,孙国华先生自德国齐默曼公司购置多件仪器,又向施密特(Schmidt)买入大批解剖用具。下半年臧玉洤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商议之后,向大华仪器公司买入一批电气器械,又在齐默曼、斯都尔汀两家公司购置一批心理仪器。在 1930 年臧玉洤经过和叶麐协商,继续添置心理学实验室仪器,这一年度添置心理学仪器五十余件,皆作高级实验或专门研究用的。① 由上述仪器添置过程来看,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对心理学实验相当重视,并投入大量的财力。抗战前,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进行的工作多属于动物实验、人类实验以及工业方面的心理学应用研究。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长沙,后至昆明与其他院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哲学心理学系,周先庚负责该系心理学组的行政工作。

---

① 周先庚. 清华心理实验室[J]. 清华周刊,1931(11/12):108-118.

(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1923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其前身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9月张耀翔受聘于该校讲授心理学课,包括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并创建了一个可容纳十人进行实验的心理学实验室,可称得上中国第二个心理学实验室。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张耀翔曾任教育研究科主任,他在此任教八年。增办教育系之后于1933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教育系的课程中分设有教育心理组,其课程有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和心理测验、儿童及青年心理、学科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动物心理、实验心理、生理心理、系统心理学(即心理学学派)。朱希亮、程克敬、刘卓生、余天休等曾在此任教。抗战爆发后,北京师范大学转移到大西北后方去,并一再迁徙,校名数次变更。

(五) 复旦大学心理学院

1923年,郭任远受聘于复旦大学讲授心理学。当年秋季招收十余名学生,成立心理学系,隶属于理科,初设人类行为之初步、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心理学审明与翻译四门课程。1924年唐钺受聘讲授心理学史,蔡乐生自金陵大学毕业后被聘为应用心理学助教。郭任远曾将几百本心理学书籍杂志用作心理学系的图书资料,并募集资金添置实验仪器、动物和书籍杂志,其中动物就有鸽、狗、兔、猴、鼠等多种,以供研究和实验所用。至1924年,该系已经拥有心理学、生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中外书籍2 000余册,杂志50余种。1925年郭任远募集资金盖了一幢四层楼房,名为子彬院(见图4-12),将心理学系扩建为心理学院,并出任心理学院主任,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心理学院。心理学院拟下设生物学系、生理学及解剖学系、动物心理学系、变态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系、儿童心理学系、普通心理学系和应用心理学系等八个系,并计划将来变态心理学系附设精神病院,儿童心理学系附设育婴医院,应用心理学系附设实验学校。子彬院大楼内设有人类实验室、动物实验室(见图4-13)、生物实验室、图书室、演讲厅、影戏厅、照相室、教室等。心理学院曾开设普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动物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商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高级心理学研究、智力测验、心理卫生、心理发展、心理学史、心理的遗传、神经学、比较心理学等课程。1925年9月,郭任远创办心理学院附属实验中学,用于进行教育心理实验,并兼任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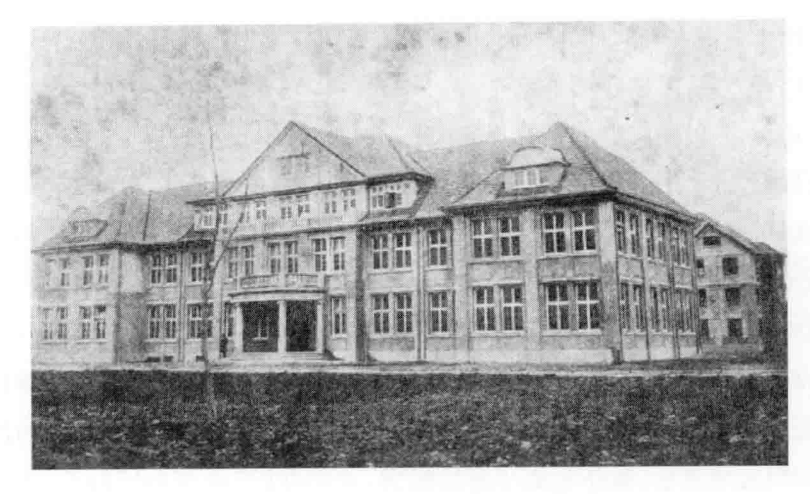


图 4-12 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子彬院)
(资料来源:《教育杂志》1926 年第 18 卷第 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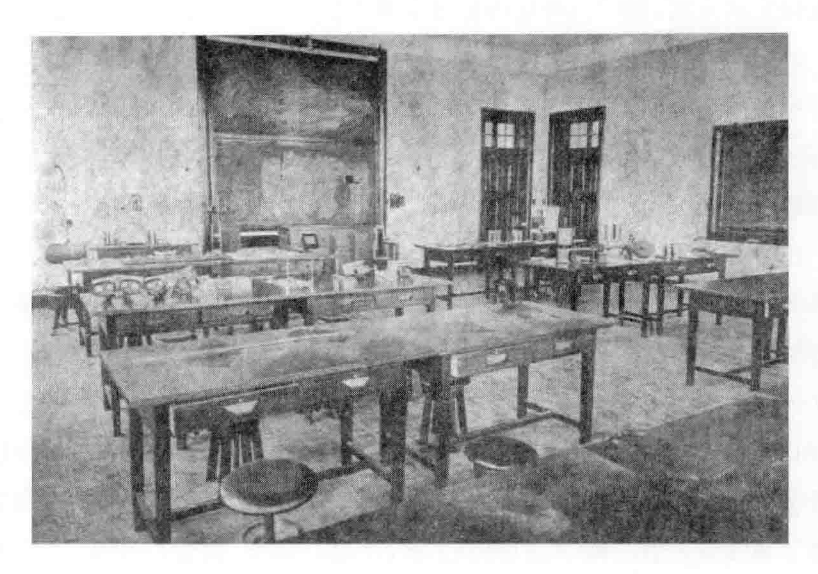


图 4-13 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实验心理学实验室
(资料来源:《教育杂志》1926 年第 18 卷第 2 号)

验中学主任。1926 年,心理学院改为生物学科。1927 年,郭任远辞职离开复旦大学。① 郭任远雄心勃勃,对复旦大学心理学院有着庞大的发展计划,

① 胡寄南. 二十年代复旦大学哺育我成长[M]//胡寄南心理学论文选(增补本).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5: 290-292. 杨家润,陈丽萍. 中国心理学先驱——郭任远[J]. 上海档案,2003(1): 57-58. 荆其诚,傅小兰. 心·坐标: 当代心理学大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3-181. 另有部分资料来源于当时《申报》的报道。

但是由于该院存在时间并不长,很多计划停留在纸上,未能得以施行。

(六)大夏大学心理学系

1924年9月大夏大学在上海成立,最初在文科设心理学系,教育科设教育心理组,并有心理实验室。1936年,教育科教育心理组扩充为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章颐年任系主任。当时该系办得好,教育部特拨款添置设备,扩充实验室,增设动物心理实验室,并相继开展了多项动物心理研究。大夏大学心理学系很重视实践,自制或仿制实验仪器,并为其他大学心理学系代制心理仪器;还印制心理学家照片和情绪判断测验用照片,供心理学界同仁使用。该系师生还组织成立心理学会,非常活跃,经常举办辩论会和演讲会、组织实地考察、创办儿童心理诊察所,并创办以"应用心理科学,改进日常生活"为宗旨的《心理季刊》。可以说,大夏大学心理学系在心理学的应用和走向生活方面,属于当时国内心理学界的佼佼者。

(七)燕京大学心理学系

燕京大学最早于1919年设立心理科,但是其业务及行政部门则是合一的,直到心理学独立成系。1920年刘廷芳赴燕京大学教授心理学课程,1921年经刘廷芳建议,心理学与哲学分家独立成系,由刘廷芳兼任系主任,直至1925年。1926年燕京大学进行专业重组,心理学系隶属文学院。刘廷芳该年度赴美讲学,陆志韦离开辅仁大学赴燕京大学就任心理学系系主任和教授,夏仁德任副教授。刘廷芳在美期间为心理学系募款,得到白兰女士(Mrs. Mary Blair,1861—1924)巨额捐助,心理学系的图书仪器设备得以充实,实验室因此命名为"白兰氏心理实验室"(Blair Psychological Laboratory)。陆志韦一直任系主任至1940年,在他1935—1936年赴美期间由刘廷芳任系主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曾设普通心理学、心理卫生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等课程。至1937年拥有一间大的实验室,五间小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可供开展普通实验之用。1937年之前的历任教师有刘廷芳、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陆志韦、夏仁德、吴天敏。其中博晨光是来自哲学系的兼课教师。夏仁德于1923年来系任教,曾讲授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等课程,于1930年前后开始讲授心理卫生课程,颇受欢迎,并很快闻名全国。夏仁德还结合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进行过咨询与教育的实践。1935年他出版了《人格与日常

行为》用作教材。该系主要研究有陆志韦指导的中国语言在思想上的影响，以及儿童行为的观察研究。① 陆志韦和夏仁德合作在美国《社会心理学杂志》1933 年第 2 期上发表《中国大学生的自我估计》(*The self-estim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一文。

(八) 辅仁大学心理学系

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成立于 1929 年，首任系主任为德国人葛尔慈(Fr. Joseph Goertz)教授，他曾师从德国实验心理学家林德渥斯基(Johannes Lindworsky，1875—1939)，林德渥斯基则是科学心理学之父冯特的学生。葛尔慈继承了德国实验心理学派的研究思想，在辅仁大学建立了一流的实验室，其实验仪器均是购自国外最先进的设备。该系十分重视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学生要接受一年普通心理实验的学习，三年高等心理实验的课程训练。建系早期开设的课程有普通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心理实验及测量、高等教育心理、孩童心理研究、青年心理之研究、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理性的心理学、生物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神经学等。该系早期任教教师有葛尔慈、王徵葵、卢华民、高味根、蔡乐生、沈迺璋。② 1930 年心理学系分为普通心理学组、教育心理学组和儿童心理学组，至 1937 年心理学分组办法逐渐取消，以教育心理和应用心理为侧重点。

(九)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

1927 年 8 月，中山大学成立心理学系，隶属文史科，并创建心理研究所，聘汪敬熙为系和研究所的主任。汪敬熙曾开设心理学概论、心理学论文选读和科学方法专题等课程，1928 年 4 月曾为民俗传习班讲授“心理学与民俗学”。1927 年 2 月汪敬熙在美国留学期间，受戴季陶和傅斯年的邀请回国创办心理研究所，随即着手订购仪器。心理研究所创办时“已购有值毫银万元之仪器，堪足为生理心理学及动物行为的研究之用，在设备上，在中国无可称二，即比之美国有名大学之心理学实验室，亦无多愧”。该所除了汪敬熙，还有助理员鲁子惠，研究生潘荣基，差遣(办事员)为刘保。至 1928 年度，该系开设的课程有心理学概论、心理学导论及实验导论、心理学实习、心理学

① 陈仲庚. 心理学系[M]//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154 - 168.
② 孙昌龄. 心理学系[M]//北京辅仁大学校史.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230 - 236.

名著选读、近代心理学史、皮肤电反射、心理学重要发现选读等七门。1929年4月,心理学系改属理科。此后,汪敬熙为心理学系和心理研究所增开了心理研究,动物心理、行为之神经基础。另外,还为哲学系、教育系讲授心理学导论、实验心理、科学方法等课程。① 1931年汪敬熙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鲁子惠随其赴任。心理学系随后并入研究院教育心理研究部,主任为许逢熙、蔡乐生、高觉敷等也曾担任主任。

1937年之前,国内还有许多大学尽管没有成立心理学系,往往在教育学系下开设有心理学课程,甚至创建有心理学实验室,因此这些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力量同样也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以湖南大学教育学系的心理学和金陵大学的心理学为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生梁培德、吴长生,清华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倪中方,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张君俊等曾在湖南大学教育学系讲授心理学。尽管该校当时的心理学专业隶属于教育学系,仍开设较为齐全的课程,如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卫生、心理测验、学习心理、学科心理、发展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等课程。该校设有一间面积较大的心理学实验室,能同时容纳24名学生进行实验,实验仪器购自美国、德国,亦有购自国内或自制的;还积极和其他医学院的生理系进行协作,以解决生理方面材料不足的问题;还曾有设置动物心理实验室的计划。②

金陵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由汉密敦(Clarence Herbert Hamilton,1886—1986)博士开设,他于191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此后至1927年在金陵大学任哲学、心理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汉密敦开设过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1919年左右他从美国带来许多心理学仪器,采用伍德沃斯和蒲分白(Albert Theodor Poffenberger,1885—1977)编写但还未出版的《实验心理学手册》(*Text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为教本,并用蒲分白编制的活页手册做实验教程,教授学生做过几十个实验。可以说,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生接触到的西方心理学最前沿的知识,对1919—1923年就读于此的蔡乐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

---

① 黄义祥.著名心理学家汪敬熙教授[M]//李尚德.凝聚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245-251.

② 倪中方.湖大心理学最近概况[J].湖大季刊,1937(1):132-134.

其选择以心理学为业,大学毕业后考取复旦大学郭任远的研究生,成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个心理学专业研究生,1926 年被授予科学硕士学位。这些最初没有成立心理学系的大学的心理学课程及教学依然开展得相当有活力,同时也展示出没有相应建制的情况下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张力。

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①

1928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心理研究所为下属十三个研究所之一,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心理学的专门机构。1928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之后,心理研究所着手筹备,筹备委员会包括唐钺、汪敬熙、郭任远、傅斯年、陈宝锷和樊际昌。② 1929 年 4 月中央研究院决定成立心理研究所,于 5 月在北平正式成立,唐钺为所长。建所初期开展的研究计划包括唐钺与李维嵘、秦拱主持的“大声惊扰对于习得行为的影响”,唐钺和臧玉海主持的“粮食种类与学习速度的关系”,其中第二项研究因心理研究所场地和条件所限,而借助协和医学院的场地开展。另外还计划由朱鹤年主持用组织学的技术检查粮食不同是否对白鼠神经系统产生不同影响,以及由陆志韦和吴天敏开展对北平、天津一带儿童进行比纳-西蒙智力测验,为制定智力测验的标准而准备。③ 1933 年 3 月,心理研究所南迁上海,汪敬熙任所长,此时工作重点侧重神经生理方面的研究。1935 年 6 月,心理研究所又由上海迁往南京。1935 年,心理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合作,增设工业心理学研究,在平绥路机厂以及京沪一带纱厂做实地考察研究,1936 年工业心理学由心理研究所专办。心理研究所还出版丛刊和专刊,用以发表研究成果。在抗战前夕,心理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和实验设备条件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基础研究,侧重在生理心理、神经心理方面,同时也注意到应用研究,联系当时实际,开展工业心理学的研究。④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心理研究所迁往长沙,后到湖南南岳,又由南岳经

---

① 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最初称“心理学研究所”,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经“心理学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的变更,或者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名称,现在定制为“心理研究所”。

② 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名录[J]. 大学院公报,1928(1): 159.

③ 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J].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1929(2): 273 - 295.

④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 2 卷)[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26 - 228.

桂林至阳朔,1940 年冬至桂林南部的雁山村稍微安定,才恢复了科研工作。

第五节　心理学名词的统一与审定

作为一个学科,心理学专业术语的定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从颜永京在《心灵学》(上本)一书开始较为系统地创制心理学专业名词以后,汉语心理学名词的统一工作一直不断进行。1908 年,清学部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致力于各个学科学术名词的厘定与统一。学部编订名词馆是我国第一个审定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机构。1909 年,蒋维乔与汪炳台就心理学的体系和术语展开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伴随着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心理学名词术语的定制工作不断地开展和深化。

一、庄泽宣与心理学名词审查

庄泽宣(1895—1976),中国教育家,浙江嘉兴人,祖籍常州。1916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7 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其导师是华伦(Howard Crosby Warren,1867—1934),系冯特的学生。1922 年归国历任清华学校(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广西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和教育系教授及主任等职。

庄泽宣回国之后发现心理学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各人所用的心理学名词各异,使得他在为商务印书馆翻译何林华和蒲分白著的《应用心理学》时感到很不方便。1922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教育心理测验专家麦柯尔(William Anderson McCall,1891—1982)来华讲学并主持编制多种测验。麦柯尔曾邀请朱君毅把统计和测验的名词进行了审查。随后麦柯尔又提出要开展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并打算邀请张耀翔来做这件事情,但后来把这件事情委托给庄泽宣。庄泽宣也声称利用这次机会,钻研一下中国的文字适用于科学的程度如何。

庄泽宣首先利用华伦著的《人类心理学要义》(*Elements of Human Psychology*,1922)一书的心理学名词表,并参照其他书籍进行了增减,然后

对所用的汉语心理学名词进行了汇总。本来当时计划召集京津附近的心理学者进行商议，但是未能促成。庄泽宣在与麦柯尔商议之后，就开始“大胆定译名”，最后形成译名草案，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在1923年7月印制之后分别寄送给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的心理学家，以征求意见。虽然最后获得几份很有价值的反馈意见，但是反馈意见的心理学家并不多。最后庄泽宣将这份心理学名词发表在1923年第2卷第4期《心理》杂志上，以广泛征求心理学界的意见。① 最后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4年正式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心理学名词汉译》一书。

从庄泽宣审查心理学名词的经过来看，这项工作主要由少数几个人来推动，没有得到国内心理学的集体参与和协商。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华心理学会虽然成立，但是在各项工作的推动上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如果说庄泽宣的心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得到国内心理学界支持的话，可能就是《心理》杂志发表了这份心理学名词，使之得到当时很多心理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

继庄泽宣开展心理学名词审查之后，1931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孙国华领导心理学系及清华心理学会全体师生着手编制中国心理学字典。此时正值周先庚归国，告知华伦的心理学词典编制计划在美国早就公布了，而且规模宏大，筹划精密，两三年内应该能出版。中国心理学字典的编译工作可以暂缓，待华伦的心理学词典出版之后再开展此项工作。1934年该系助教米景沅开始搜集整理英汉心理学名词，共计6 000多词条，初选之后为3 000多词条，并抄录成册，曾呈请陆志韦校阅，为刊印英汉心理学名词对照表而准备。② 而此时由国立编译馆策划，赵演主持的心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开始了，一改过去个人或小规模进行心理学名词编制工作的局面，组织了当时中国心理学界多方面的力量进行这项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二、赵演与心理学名词审查

赵演(1905—1937)，字涵川，云南昆明人，北京大学毕业，获教育学学士。1937年因飞机失事受伤不治而逝。他曾任广西教育厅编译处主任、江

① 庄泽宣. 审查心理学名词的经过[J]. 心理，1923，2(4).
② 周先庚，陈汉标，辑. 心理学界消息[J]. 中国心理学报，1936(2)：178－179.

西省立第二中学师范科主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云南省立师范教授、国民政府编译馆人文组编译,参与了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建,著有《本能论》,编译《心理学名词》,翻译《人类心理学要义》、《弗洛特心理分析》、《天才心理与教育》、《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概论》等心理学著作。其中《人类心理学要义》原著者华伦亲自为赵演和汪德全翻译的中文版作序,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心理学家对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关心。

1935 年夏天,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划心理学名词的审查工作,由赵演主持,左任侠协助。商务印书馆计划将心理学名词分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和心理学仪器与设备五部分分别审查,普通心理学部分的名词是最先进行审查的。赵演首先利用华伦的《心理学词典》(*Dictionary of Psychology*)搜集心理学专业名词,并参照其他书籍共整理出 2 732 个英文心理学名词。此前商务印书馆有过一个更为庞大的英文心理学名词的搜集整理计划,试图从 380 部重要英文心理学著作中进行选定,并且发动国内许多心理学家进行名词统计和筛选,但是终因方法迂回,不如利用国外英文词典更为可行,而最终放弃。

在整理英文心理学名词之后,赵演根据 49 种重要的中文心理学译著,整理出心理学名词的汉译名称,又将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汉译名词补入,整理出 3 000 多个。此后又将这些资料分寄给国内 59 位心理学家,以及 13 所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征求意见,之后收到 40 多位心理学家的反馈意见。这基本上反映了国内心理学界对这份心理学名词的审查意见。其中潘菽在反馈意见中提到,心理学名词的审查意味着标准化,但应该是帮助标准化,而不能创造标准。心理学名词自身需要经过生存的竞争,待到流行开来再进行审查,通过审查进而努力使其标准化。另外,汪敬熙、唐钺、沈有乾、郭一岑、张耀翔等都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经过此番的征求意见之后整理出 1 393 条心理学名词,随后成立以陆志韦为主任委员的普通心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共 22 名心理学者,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均为教育部正式聘请。赵演还整理出心理学仪器名词 1 000 多条,从中选择了重要的 287 条仪器名称同普通心理学名词一并送审。1937 年 1 月 19 日在国立编译馆举行了由各审查委员会成员参加的审查会议,以期对二次审查后的心理学名词作最后的决定。在四天半的时间里,召开了九次会

议,通过了对2 000多条普通心理学名词,100多条心理学仪器名词(后来并入普通心理学名词)的审查(见图4-14)。1937年3月18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审查通过的普通心理学名词。① 1939年5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普通心理学名词》。因赵演过世,原本拟定的变态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中止了,同时抗战爆发也是此项工作未能继续的部分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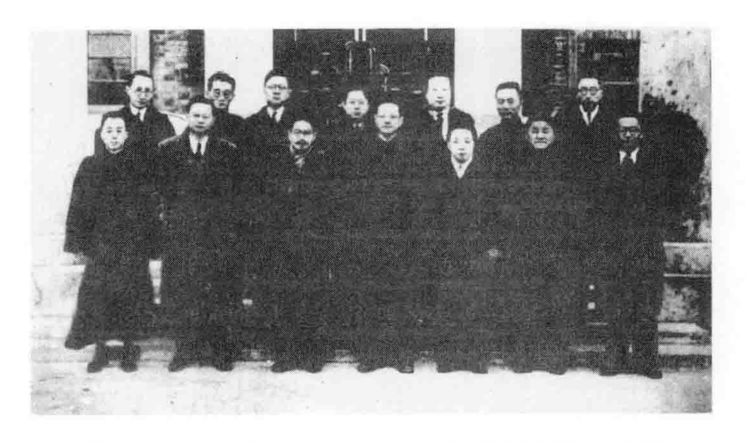


图4-14 1937年1月22—23日心理学名词审查会合影

后排左起:沈有乾、谢循初、周先庚、郭一岑、萧孝嵘、潘菽、樊际昌
前排左起:程迺颐、孙贵定、唐钺、陆志韦、蔡乐生、许逢熙、赵演
(资料来源:《教育杂志》1937年第27卷第3号)

同庄泽宣所做的心理学名词审查工作相比较,由赵演主持的审查工作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正是这三方面的不同,使得赵演的心理学审查工作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效果:第一,以商务印书馆为组织者和财力保障者。基于当时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必要的财力支持对于其完成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获得当时教育部的支持,成立了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于心理学名词审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学术层面的支持,几乎调动了当时国内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审查工作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这项名词审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经历筛选、函件审查和会议审查等环节,最后一次审查会议开了四天半。赵演负责的这项工作自始至终都体现出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① 赵演.国立编译馆编订普通心理学统一译名之经过[J].教育杂志,1937,27(6):79-86.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庄泽宣于1923年开展名词审定工作时心理学界的大环境并不甚理想,中华心理学会刚刚成立,《心理》杂志刚刚创刊,可以说中国心理学专业队伍初具雏形,很多留学海外的心理学留学生还没有回国,开展通力合作的心理学审查工作还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尽管如此,庄泽宣开展的心理学名词审定工作仍具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五章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主要成就（1918—1937）

第一节　心理学学派的输入与传播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心理学界学派林立、竞相争鸣，此时正值中国第一代心理学者在国外求学之际。他们学成归国后，对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积极开展介绍和传播的活动。“构造派、机能派、完形派、心理分析派都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心理学也形成了一个开始繁荣的局面。”[①]30 年代左右，苏联心理学也逐步被介绍到中国来，促使国内心理学者尝试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心理学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国内并不仅仅是传播，我国的心理学者在国内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经参与到国际心理学界中去，构成行为主义心理学运动的一部分。

一、西方心理学学派的输入与传播[②]

（一）构造主义心理学[③]

我国最早接触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人是蔡元培，他曾于 20 世纪初在德国

① 潘菽，陈立，王景和，陈大柔. 威廉・冯特与中国心理学[J]. 心理学报，1980(4)：3－12.

② 西方心理学在中国传播早期，许多心理学家人名以及心理学术语均无定制，出于方便检索原始文献的原因，本文中均采用原始文献的译称，不做一致性的修改。如冯德、文德为冯特；吴伟士为伍德沃斯；弗洛特、弗洛伊特、佛洛特、弗洛、佛洛依德、佛洛以特、弗劳得、茀罗乙德即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解心术即精神分析等。

③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冯特与铁钦纳的心理学体系有较大差别，但是由于 20 世纪上半叶英文世界对冯特的理解，主要依赖铁钦纳对冯特德文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其中有铁钦纳对冯特个人化的解读，甚至曲解，故当时一般将他们都理解为构造主义心理学学派，而中国学者引进和传播过程中也受到如此影响。

聆听过冯特讲授心理学课程。在陈大齐出版的《心理学大纲》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也受到冯特心理学思想的影响。曾任教北京大学的唐钺,1914 年曾赴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和哲学,并完成硕士学业。因此,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成为传播冯特和铁钦纳心理学思想的重要基地。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著作有冯特著的《心理学导言》(吴颂皋译,1923)、铁钦纳著的《心理学》(删节本,金公亮译,1931)。发表的重要著作有康符的《冯德之生平及其学说》(《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 号,1921)、黄公觉的《近代心理学大家文德史略暨著述》(《心理》,第 1 卷第 2 号,1922)、陈大齐的《德国心理学派略说》(《心理》,第 3 卷第 2 号,1924)、谢循初的《铁钦奈的心理学》(《暨大教育季刊》,第 1 卷第 3 期,1930)、高觉敷的《冯特的生平及其心理学的系统》(《勷勤大学师范学院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34)。另外还有多篇文章也介绍了构造主义心理学,如李石岑的《心理学之派别》(《教育杂志》,第 14 卷第 5 号,1922)、王平陵的《现代心理学的派别及其研究法》(《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9 号,1922)等。构造主义学派在中国传播,对中国心理学早期建设有一定的影响。在教材方面,我国早期对心理学对象和方法的界定与冯特的观点相似。在实验研究方面,也大多偏重神经生理,即冯特开创的生理心理学领域。①

(二)机能主义心理学

机能主义心理学是在美国本土形成的一个心理学学派,其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达尔文进化论。早在 1906 年,张东荪、蓝公武就曾将机能主义心理学者詹姆斯的《心理学简编》前三章内容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教育》第 1 期第 1、2 号上。1919 年 5 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教育学权威、机能主义心理学派的奠基人杜威应邀来华讲学,杜威虽然没有专门发表心理学方面的演讲,但是他在华的一系列演讲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杜威访华给中国带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对于机能主义心理学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留美的中国学生也深受美国当时盛行的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他们信奉机能主义甚于构造主义,回国后他们积极从事机能主义心理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

---

①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 2 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33.

机能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詹姆斯、杜威、桑代克、伍德沃斯的专著被大量翻译出版，其中部分原因是当时许多心理学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这些机能主义者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深受其影响。如詹姆斯的《心理学简编》(伍况甫译，1933)，杜威的《儿童与教材》(郑宗海译，1922)、《思维与教学》(孟承宪译，1936)，伍德沃斯的《动的心理学》(潘梓年译，1924)、《心理学》(谢循初译，1933)、《适应与娴熟》(张孟休译，1937)，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概论》(陆志韦译，1926)、《人类的学习》(赵演译，1934)和《成人的学习》(杜佐周译，1933)。

黄公觉发表了《近代心理学大家詹姆斯传》(《心理》，第 1 卷第 1 号，1922)。高觉敷发表了《心理学的现状》(《学生杂志》，第 1 卷第 17 号，1930)，介绍了行为派、完形(格式塔)派、构造派和机能派心理学。沈有乾的《吴伟士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各派》(《图书评论》，第 1 卷第 8 期，1933)介绍了伍德沃斯的《心理学》及《现代心理学》两部著作。萧孝嵘发表了《桑戴克“相属原则”之解剖》(《教育丛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机能主义相对构造主义更强调心理的功用和意义，比较关注教育和学习，符合当时中国改良教育的社会需求，从而促进了机能主义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三）**行为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心理学界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原因在于有一位中国心理学者带领其学生参与了国际上轰轰烈烈的行为主义运动，他就是激进行为主义者郭任远。郭任远在美国发表激进行为主义观点并产生巨大影响，他于 1923 年完成学业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郭任远对行为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中国本土任教期间(1923—1936)开展“胚胎行为”实验研究，发明鸟类蛋壳开窗技术，在学术界被称为“郭窗”(Kuo window)。“郭窗”解决了当时此领域中用以直接观察活体胚胎发育过程的技术困境，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而且多位西方学者在利用“郭窗”技术的基础上获得丰硕研究成果。郭任远在国内开展的多项研究成果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有着较大的国际影响。同时郭任远在国内也积极宣传他关于行为主义的主张，出版了多部教材和著作，如《人类的行为》(1923)、《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1931)、《行为学的基础》(1929)、《心理学 ABC》(1931)、《心理学与遗传》(1929)、《行为的基本原理》(1935)、《高级中学教科书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1933)。

在郭任远在国内传播行为主义主张的同时,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的著作也多被翻译出版。如:《行为主义的心理学》(臧玉淦译,1925)、《一九二五年心理学》(内有三章为华生的著作——《育婴室与本能》、《情绪发生的研究》和《情绪遗失及变更之最近实验》,前两章谢循初译,后一章朱君毅译,1928)、《行为心理学大意》(谢循初编译,1928)、《情绪之实验研究》(高觉敷译,1934)、《华生氏行为主义》(陈德荣译,1935)、《行为主义论战》(黄维荣译,1940 年再版)。《行为主义论战》一书收录了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新注释》和麦独孤的《心理学的原理——行为主义的批评》,这是他们之间关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观点的辩论,前有郭任远作的序,后有麦独孤的跋文。

此外,朱光潜发表了《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改造》,第 4 卷第 3 号,1921)和《行为主义》(《留英学报》,第 3 期,1929)。汪敬熙译《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新潮》,第 3 卷第 2 号,1922),赵演译《行为主义是什么》(《民铎》,第 8 卷第 2 号,1927),林仲达译《行为主义之论战》(《教育杂志》,第 21 卷第 3、4 号,1929),高觉敷发表《行为主义》(《学生杂志》,第 17 卷第 2 号,1930),阮镜清发表《行为主义心理学批判》(《教育论坛》,第 2 卷第 3、4 期,1933)等。这一系列论文在当时广泛传播了行为主义心理学。

(四) 格式塔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也得到中国心理学界的重视和引介。对于"Gestalt"一词的翻译,1926 年朱光潜用过"完形",1927 年赵演仿照"logic"译为"逻辑"一词的方式,将其翻译为"格式",同一年高觉敷使用"基斯塔",1928 年萧孝嵘使用"格式塔",可以看做他吸收了赵演和高觉敷的译名而成,"格式塔"一词在国内沿用至今。

郭一岑(1894—1977)早年留学德国攻读心理学,他师从格式塔学派创始人之一苛勒,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另外,1929 年第 5 期《光华期刊》载有《德国心理学之最近趋势》一文,此文系由格式塔派的学者彼得曼(Bruno Peterman)教授讲授,张君劢翻译,姚兆胜记录。由此分析,彼得曼有可能到过中国并发表了这次演讲。①

---

① Bruno Peterman 曾于 1930 年出版过德文著作 *Die Wertheimer-Koffka-Köhlersche Gestalttheorie und das Gestallproblem* 一书。

国内格式塔学派的译著主要有高觉敷译的《儿童心理学新论》(考夫卡著,1929)、《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苛勒、考夫卡著,1935),傅统先译的《格式心理学原理》(考夫卡著,1937)。

介绍和传播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章主要有:朱光潜的《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6);高觉敷的《完形派心理学与行为主义》(署名高卓,《东方杂志》,第23卷第21号,1926),《基斯塔心理学》(《教育杂志》,第19卷第4号,1927),《对基斯塔心理学之批判》(《教育杂志》,第19卷第5号,1927),《基斯塔说的儿童心理学》(《教育杂志》,第21卷第4号,1929),《对完形派攻击构造主义之批判》(《教育杂志》,第22卷第11号,1930),《苛勒完形心理学》(《民铎》,第11卷第1期,1931);赵演的《格式心理学》(《民铎》,第8卷第5号,第9卷第1、2号,1927);萧孝嵘的《格式塔心理学的鸟瞰观》(《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1928);岱如德《基斯塔心理学概观》(《湖南大学期刊》,第8期,1933);杨同芳的《完形心理学派对于学习之贡献》(《心理季刊》,第2期,1936)和《完形心理学派之理论根据及其批判》(《心理季刊》,第3期,1936);陆志韦的《介绍考夫卡:完形心理学原理》(《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1期,1936)。

朱希亮(1900—1978)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期间,正值考夫卡赴美担任该校访问教授,受其影响,他对格式塔心理学有一定的研究,完成了硕士论文《逆联想学习之量的研究》(*A quantatitive study of serial learning in terms of backward association*),并发表在1929年第12卷第3期《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研究专刊》上。1932年在第31卷《耶鲁大学心理学研究专刊》上发表《完形心理学及条件反应》(*Gestalt psychology and conditioned reactions*)。1931—1932年朱希亮还在北京大学讲授《完形主义的研究》的课程(1929—1930年度由马师儒讲授),①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黄翼(1903—1944),字羽仪,福建厦门人,他22岁到加利福尼亚,就读于斯坦福大学。1927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黄翼和周

① 心理学系课程(十八年度至十九年度)[J].北京大学日刊,1929-9-23.心理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度至二十年度)[J].北京大学日刊,1930-10-24.

先庚曾经参加过考夫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暑期课程班(Summer Session),亲聆过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课程。1927年在推孟和迈尔斯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出于对儿童心理学的兴趣,黄翼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格塞尔学习儿童心理学。考夫卡正在此校做访问教授,在考夫卡的指导下,黄翼完成博士论文《儿童对奇异现象的解释》(*Childrens explanations of strange phenomena*),这篇论文是反驳皮亚杰关于儿童物理因果思维的主张,支持格式塔学派立场的系列实验研究报告,发表于格式塔心理学的机关报《心理研究》第14卷上,这篇文章在西方心理学界很有影响,曾被伍德沃斯编著的教科书引用。黄翼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考夫卡曾有意留下他继续做一些真正的格式塔心理学研究工作,但是黄翼选择了回国,就聘于浙江大学,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①] 在国内,黄翼对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宣传发挥过积极作用,如杨同芳在《完形心理学派之理论根据及其批判》一文中认为格式塔心理学"完全藐视分析"和"于感情意志诸问题,甚少论及",黄翼认为这是误解,并依据具体资料进行了纠正,从而对于当时心理学界正确理解格式塔心理学起到了一定作用。[②] 1944年10月黄翼不幸病逝,格塞尔于12月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刊出讣告以纪念这位优秀的科学家。文中称,黄翼在一封只有一页纸的信中记述了炮火轰鸣的残酷状况,但接着便讨论起格式塔学派重视的知觉恒常性问题。[③] 可见,身处艰苦的条件下,黄翼还是一直关注和思考格式塔心理学的问题。

(五) 精神分析心理学

精神分析心理学将传统心理学忽视的潜意识(unconsciouse)引入心理学的殿堂,并从全新的角度诠释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从而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精神分析心理学也很早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和引介。

传播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早期文章有钱智修所写的《梦的研究》(《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期,1914)、胡愈之译的《梦中心灵之交通》(《东方杂志》,

---

① 陈立.一个心理学家之成就与失败:敬悼黄羽仪(翼)先生[M]//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770-773.

② 黄翼.浙江大学黄翼教授的来信[J].心理季刊,1936(4):195-196.

③ Gesell, A. (1944). I. Huang: Obituary. *Science*, 100 (2060): 512-513.

第15卷第1期,1918)、张东荪写的《论精神分析》(1921)、汪敬熙写的*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本能与无意识》,《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和《心理学最近的趋势》(《新潮》,第2卷第5期,1920)、署名为Y的《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余天休的《分析心理学》(《心理》,第1卷第1、2号,1922)、吴颂皋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第20卷第11期,1923)、旨修的《佛洛心理学》(《教育研究》,第15、16期,1934)、叶青的《佛洛伊德梦论批判》(《新中华》,第2卷第8期,1934)、吴福元的《佛洛以特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及其对于教育上的贡献》(《心理半年刊》,第1卷第1期,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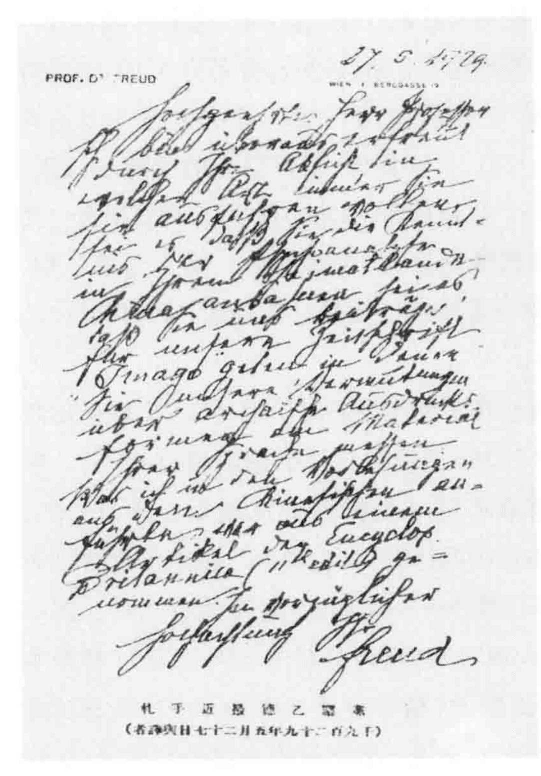
高觉敷是我国引介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主要心理学家之一,他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1936)、《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6)。弗洛伊德理论的其他译著还有《群众心理及自我分析》(夏斧心译,1929)。国外学者阐述和评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译著有《心理学与精神治疗法》(布拉文著,华超译,1929)、《弗洛特心理分析》(B.勒著,赵演译,1929)、《解心术学说》(福录格尔著,陈德荣译,1934)、《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奥斯本著,董秋斯译,1940)。[①] 张东荪出版的《精神分析ABC》(1929)较系统地评介了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人的学说。美学家朱光潜早年翻译过《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变态心理学》(1933),并著有《文艺心理学》(1936),对精神分析心理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传播作用。高觉敷不仅翻译了弗洛伊德的代表性著作,还发表了一系列评介性文章,其中主要有《谈谈弗洛伊德》(《一般杂志》,第5卷第2号,1928)、《弗洛伊特的心理学》(《学生杂志》,第17卷第6期,1930)、《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之批判》(《教育杂志》,第23卷第3期,1931)、《弗洛伊德说与性教育》(《中学生》,第22期,1932)。

章士钊也是早期接触和介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学者之一,他于1930翻译出版了《茀罗乙德叙传》,即弗洛伊德自传,该书中影印了弗洛伊德写给章士钊的亲笔信,"这是至今所知弗洛伊德给中国人所写的唯一的一

---

① 此书曾以《精神分析学与辨证唯物论》(读书出版社,董秋斯译,1947年)书名出版;另一不同的译本为《弗洛伊特与马克思》(世界书局,楚之译,1940年,书前有迭肯撰写的《精神分析与唯物史观》)。

封信”。这封信是用花体德文写成(见图 5-1),其译文如下:



PROF. Dr FREUD

WIEN IX. BERGGASSE 19

27.5.1929

Freud

弗羅乙德授近手札

(千九百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與譯者)

图 5-1 弗洛伊德致章士钊的亲笔信

(资料来源:章士钊译《茀罗乙德叙传》)

尊敬的教授先生:

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为我们的《意象》杂志撰文,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个辞条。

顺致崇高敬意

你的弗洛伊德

1929.5.27.①

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章士钊曾经致信弗洛伊德探讨过学术问题,并希望在中国开展精神分析研究,而弗洛伊德则欢迎用中国的语言素材考察其学术思想。

另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中也体现出被中国传统文化接纳的一些特征,如对其名字“Freud”的翻译过程中曾出现“佛洛依特”、“福洛得”、“弗劳得”、“沸洛特”等 20 多种翻译,其中以“佛”、“弗”、“福”字开头者居多。这些不同的译法反映出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心态,如以“佛”字开头作为弗洛伊德的翻译,可以表明人们对精神分析的看法类似于对佛教的看法。以“福”字开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渴求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实现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以“弗”字开头则复杂得多,郭任远曾经著文

① 余凤高.“心理分析”与现代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6.

称,“最近弗劳得(S. Freud)一派之所谓下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等都是骗人的鬼话,……要根本打到弗劳得派……”[①]他要批判精神分析,要打倒弗洛伊德的学说,因而将其名字翻译为“弗劳得”,取其讥讽之意。但“弗”字通假为“祓”,有除灾求福之意。“弗”字既有否定又有希望的两种意思,也许恰恰表明当时中国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态度:认为他的理论既有合理的、正确的成分,又有一些荒谬的东西,令人难以接受。[②]

作为一种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性技术的精神分析传入中国,以戴秉衡为开端。戴秉衡初习社会学,后师从社会文化学派精神分析学家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学习过会谈技巧,并在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索尔(Leon Joseph Saul)的分析,同时由精神分析学家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进行督导。[③] 戴秉衡 1935—1939 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神经科任职,当时脑系科主任是莱曼(Richard Sherman Lyman, 1891—1959)。在协和医学院,戴秉衡的主要工作包括看诊,负责疗养院的精神治疗,为同事与住院医师讲授精神治疗课程,并且对其中少数成员进行短期“训练治疗”。在接受这些训练之后,一个由六个人(其中有丁瓒、赵婉和)组成的核心小组计划在中国成立第一个心理治疗师学会(Society of Psychotherapists),但是日本侵略者攻占北平使得此类工作的深入开展难以为继。[④] 戴秉衡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进行了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化中实践性应用的开拓工作,在当时形成一个小的学术团队,为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化中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苏联心理学的输入与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探索

(一) 苏联心理学的引介

1921 年 8 月,中华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其后不久就邀请苏联心理学家叶勒索夫做了有关苏联心理学最近发展的演讲。这次演讲是我国心理学界对苏联心理学的早期接触和了解。20 世纪 20 年代末,潘菽、高觉敷、郭一岑

---

① 郭任远. 变态的行为[J]. 东方杂志,1927,24(23): 65 - 74.

② 职雍.《东方杂志》(1904—1948)所载精神分析文献之研究[J]. 精神分析笔记,2002 年夏季刊.

③ 王文基. “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J]. 新史学,2006,17(1): 91 - 142.

④ Bingham Dai.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before the Revolution: A Letter from Bingham Dai. *Current Issues in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1987, 3(1): 99 - 102.

等不约而同地开始介绍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1929 年潘菽翻译了鲍罗夫斯基(V. M. Borovsky,1882—1963?)的《苏维埃联邦的心理学》,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 1 卷第 3 期),鲍罗夫斯基的观点强调"要根据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原理建立一种心理学,以与唯心的哲学和心理学中的主观主义相反对"。[①] 1929 年高觉敷翻译了同一篇文章,以《苏俄的心理学》为题发表于第 21 卷第 12 号《教育杂志》上。苏俄科尼洛夫(Konstantin Nikolaevich Kornilov,1879—1957)曾为《1930 年的心理学》写过一篇文章,此文经郭一岑编译之后,发表为《苏俄科尼洛夫之心理学》(《教育杂志》,第 23 卷第 10、11 号,1931)一文。另外,陈汉标根据哥伦比亚大学麦克法兰德(Ross A. McFarland)对苏俄考察之后撰写的英文文章,于 1936 年发表了《苏俄的心理学》一文,向国内介绍苏俄儿童心理学、双生子研究、工业心理学、精神病治疗以及巴甫洛夫的相关研究。[②]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时对苏联心理学的引介基本上是以英文文献为媒介的,也就是说,中国早期主要借道英文学术界对苏联心理学进行消化和吸收。

(二)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的探索者

郭一岑翻译发表的《苏俄科尼洛夫之心理学》[③]一文中强调辩证法则、发展法则,他对这一观点很推崇,并进行积极宣传。当郭一岑于 1932 年到中山大学讲授心理学时,即完全站在这一立场以阐明心理学上的种种问题,"使困顿在传统心理学及机械唯物主义的行为主义窘途中的学者获得一条出路"。[④] 正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阮镜清(1905—1995)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一文(《教育论坛》,第 1 卷第 11 期,1932)。文中指出,心理发展的动力在于主体内部的矛盾运动,事物的发展在于固有矛盾;从量到质的转化、渐变到突变、否定之否定等方面系统地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这是国内学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说明有关心理学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

① 潘菽. 苏维埃联邦的心理学[J]. 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3):253 - 263. 也见:潘菽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37.

② 陈汉标. 苏俄的心理学[J]. 中华教育界,1936,23(10):11 - 16.

③ 该文原文是柯尼洛夫的英文稿 Psychology in the light of dialectic materialism,收录于 Murchison Carl 编著的《1930 年的心理学》(*Psychologies of 1930*)一书中。

④ 阮镜清. 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J]. 教育论坛,1932,2(11):10 - 25.

郭一岑于1934年编译了巴甫洛夫等著的《苏俄新兴心理学》,随后于1937年出版了《现代心理学概观》一书。他在批判了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在立足点上的二元论与机械唯物论之后认为,“他们还只是有意或无意地在黑夜茫茫的大海中远远地瞥见几点灯光而已,至于真实的航线他们还没有摸索到”,“心理学之将来”寄希望于心理学正确的基础,即“心理学必须是新哲学的”、“心理学必须是人类的”、“心理学必须是社会的”。这里所说的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①] 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心理学著作。

第二节 心理学基本理论建设成就

一、心理学的学科性质[②]

随着心理学在国内的发展,对于其学科性质,国内学者多有阐发。就他们阐发的观点来看,均将心理学界定为一门科学,这与他们在海外留学目睹了心理学在西方发展的情形有着密切联系。同时由于他们各自立场的差异,他们对心理学学科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一) 陈大齐:“心理学乃研究心作用之科学”

针对心理学的学科性质,陈大齐在《心理学大纲》一书中作出如下表述:

> 心理学之定义,学者不一其说;或曰,灵魂(soul)之学也;或曰,意识(consciousness)之学也;或曰,行动(behavior)之学也。……今为最普遍最简单之定义曰:心理学乃研究心作用之科学,即研究精神作用之科学也。……精神作用无形无声,不可以目见,不可以耳闻;故心理学之规定研究对象也,非若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可以指实物以示人之明且便也。虽然精神作用乃人人所同具,学者试内求诸心,当无不恍然悟者。……凡此构思凝神喜笑悲啼思得思免皆吾精神作用之一端,合其

---

① 郭一岑.现代心理学概观[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16-136.

② 此部分的撰写对汪凤炎教授的著作多有参考,谨致谢忱。汪凤炎.中国心理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616-623.

他诸作用,汇而成吾精神作用之全部。心理学即就此精神作用,研究其结构之状况、活动之功用、发达之程序,而为之立普通法则者也。①

由此可见,他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作用的结构、功能、发展过程和普遍法则的科学。"心理学特定义为科学者,明其非常识,非哲学也。"②书中还进一步提出开展对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必需的"假定事项":心理学研究对象(精神作用)是真实常住之事实,而绝不是幻妄虚无的;这种精神作用是可以用我们的精神作用进行观察而研究的;精神作用都是遵循一定法则的,绝不是庞杂纷乱、无法则可言的。③ 尽管在《心理学大纲》一书中可以看到陈大齐的观点受冯特、铁钦纳构造主义心理学思想影响较为明显,但是也可以看到其吸收机能主义心理学思想("活动之功用")的迹象。

(二)郭任远:心理学"是生物科学之一种"

郭任远作为一名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主张将心理学完全纳入自然科学的行列,将心理学视为属于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学是研究有机体全部行为的科学。心理学是要采用其他科学一样客观的实验法来研究人类行为,以求其公理和定律,用于社会预测和控制行为。人类作为一个有机体,对于其环境常常发生种种反应,自身与环境相适合。行为就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交涉、相关系时发生的反应,因此,心理学可以说是研究有机体对于环境发生的种种"顺应动作"的性质和定理的科学。因此,在郭任远眼里,心理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中"生物科学之一种"。

许多心理学者都认它是生物科学之一种,因为心理学……是研究有机体顺应环境的活动——行为——的科学,故与一切生物科学关系最密切,而且它现在已经达到物观(即客观——引者注)的实验法和算学计算法的地位,所以也不愧为精确地自然科学之一种了。④

---

①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第13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3-4.
② 同上:5.
③ 同上:7.
④ 郭任远.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2.

> 现在的心理学家的地位实在是极其自相矛盾：要做科学家，就不应该保存“心灵”或“意识”，要保存这二者，就不必想登科学之堂。这种地位是数十年来实验心理学失败的缘故，也是心理学被人家瞧不起的主因。这种情境迫得一部分有科学训练的心理学家——行为学者——忍无可忍，遂大兴革命之师，一方面宣告旧有心理学的破产，一方面建设一个新的科学——行为学。①
>
> 心理学的立脚地是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等相同的。换一句话说：心理学是一个物观的科学。他研究的对象是物观的现象——行为，所以其他自然科学所用的物观的观察法和物观的实验法，心理学亦皆采用。科学最注重精确，故心理学的研究也以数学的计算与测量为当务之急。这样讲起来，心理学也可称为精确的科学之一了。②

郭任远代表着激进行为主义者的观点，他竭力排斥反科学的心理学，努力把心理学引进自然科学中生物科学的大门，并完全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它。这样的观点使其对非科学取向的心理学派持有相当深的偏见，如他对精神分析心理学便是持不屑的态度。郭任远的观点虽有其偏激性，但是这样的主张对于保持心理学的科学性仍有积极意义。

（三）郭一岑：“心理学必须是社会的”

作为一名心理学者，郭一岑较早地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指引着他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用于心理学研究，进而影响了他对心理学学科的认识。郭一岑主张心理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强调人类的行为和动物的行为不仅有量上的差异，更有本质的不同；相信人类的行为随社会而发展，社会关系决定人类的行为。个体的行为随环境而改变，人的社会生活决定着人的意识。比如，研究发现：“劳苦阶级的儿童……心理上有种种与上流阶级儿童不同的特性，这就是说明人类的智慧可因个人的社会

① 郭任远. 一个心理学革命者的口供[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局，1928：11－12.

② 郭任远. 心理学的真正意义[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局，1928：5－6.

经济条件而决定。""还有一点所要知道的,就是现在的人类社会是包含若干万年的人类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切历史的遗产,所以我们对于人类行为的考察不可忽略了他的历史性。"①由此可见,郭一岑主张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社会科学。

(四)潘菽:心理学是三大"基本的科学"之一

潘菽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自然现象可以分为迥然不同的三种:物理的现象、生物的现象和心理的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三种基本的科学:物理的科学、生物的科学和心理的科学。

>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现象的基本原理的,所谓人类现象就是指人的种种特殊的活动,譬如科学的研究,艺术的欣赏与创造,言语的应用,社会化的生活等都是人类动物特有或特别发达的现象。研究这种现象所以能成立的基本原理的便是心理学。对言语、艺术、科学方法、政治、经济等现象,固然都各有专门的研究。但每种研究都就其研究的对象的自身而止,研究政治的绝不问言语是什么和艺术是什么。但我们要知道这许多现象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它们成立的基础大半都在人类自己方面。换句话说,它们是有一种共通的原理的。我们必须先了解这种共通的原理,然后我们能彻底地了解人类的种种现象。所以,心理学是经济、社会、艺术等研究的基础。②

潘菽强调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心理学研究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坚持科学的态度则要求心理学的研究应坚持客观化原则。基于此,潘菽甚至认为心理学最好改称"人理学"。"心理学并不研究什么心或心的生活(mental life)的。心固然没有这种东西,心的生活也很费解,又一般人的误解大半从心理学这个名词而起,所以心理学这个名号实在是颇有问题的。照作者看起来,心理学最好称为人理学,这和它的内容最相适合,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现象的基本原理。"这也就和物理学、生理学对应起来:"人

① 郭一岑.现代心理学概观[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33,134.
② 潘菽.心理学概论[M]//潘菽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50.

理学和生理学及物理学并峙而为三种基本的科学，研究三种不同的自然现象的基本原理。这样一来我们的科学也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①

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②

(一) 陈大齐:“心理学以精神作用为其唯一之对象者也”

陈大齐明确指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作用”。

> 心理学乃研究心作用之科学，即研究精神作用之科学也。……精神作用无形无声，不可以目见，不可以耳闻；故心理学之规定研究对象也，非若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可以指实物以示人之明且便也。虽然精神作用乃人人所同具，学者试内求诸心，当无不恍然悟者。……凡此构思凝神喜笑悲啼思得思免皆吾精神作用之一端，合其他诸作用，汇而成吾精神作用之全部。心理学即就此精神作用，研究其结构之状况、活动之功用、发达之程序，而为之立普遍法则者也。③

陈大齐以博采众长的态度来探讨心理学的定义，在他看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精神作用，这种精神作用也应包括无意识。同时他对行为主义者将“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表达了不同见解，认为“行动学之定义，为近时一派学者所主张；但此义过泛，易与生理学之对象相混淆，故亦未得一般学者之称许”。④ 这一观点基本反映出当时西方心理学界对行为主义的观点和看法。从整体上来看，陈大齐主张的心理学研究对象是精神作用这一观点背后具有一定的折中主义倾向。

(二) 郭任远:“心理学是研究人类或其他动物的行为或动作的科学”

在郭任远看来，心理学既然是研究有机体全部行为的科学，与此相对应，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行为。

---

① 潘菽. 心理学概论[M]//潘菽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53.

② 此部分的撰写对汪凤炎教授的著作多有参考，谨致谢忱。汪凤炎.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623-625.

③ 陈大齐. 心理学大纲(第13版)[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3-4.

④ 同上：3.

简单讲起来,心理学是研究人类或其他动物的行为或动作的科学。一切动物受环境刺激的时候,往往发生反应(应付这种环境的刺激的顺应作用)。我们所谓行为,就是包括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起居饮食,及隐于内或形于外的种种动作。单就人类方面而言,我们每日关于自身或对社会的一切感情思想,或其他行为皆在行为范围之内,皆是心理学研究的材料。①

行为的定义是很不容易下的——一切科学名词的定义,皆不容易,但是行为的性质却不是难懂的。这个名词在心理学上包含很多,大概我们每日云谓,动作、饮食、卧起、读书、作文、做梦和所谓"思想"等都是行为,都在心理学研究范围之内。②

郭任远所说的"行为"包括"动作、饮食、卧起、读书、作文、做梦和所谓'思想'等",还可以用来指有机体对于刺激发生的反应。同时他还主张:"我们普通所谓心灵或意识,实在都是行为之一种,都是潜伏于体内的运动,都是神经及筋肉变动的结果"。郭任远和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的观点十分接近,如华生把思维看作是喉部肌肉的运动,将意识也看作是一种行为。固然这种将心理、意识用动作和运动来替代有还原论的倾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主张一方面强调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行为在心理活动中的作用,因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价值。

(三) 潘菽、吴绍熙:心理学研究"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

在潘菽和吴绍熙看来,心理学研究"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

人类活动可有多方面,有的生产,有的经商,有的从事科学,有的爱好艺术,有的求神拜佛,如醉如痴,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举之不尽。心理学研究的,不是其中一种任何单独的活动,而是人类共有的种种活动。这种种活动的基本原则,便是心理学研究的目标。

什么叫基本原则呢?无论哪种活动,在表面看来可有种种变化,如

① 郭任远.心理学的真正意义[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郭任远心理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局,1928:4-5.

② 郭任远.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

反应，有迟速的不同，你的反应较我快，他的反应较你快，彼此各别。又有种类的不同，有些反应简单，有些反应复杂等。但反应如何产生，如何消灭，如何改变，如何互相结合，假如分析清楚了便对于一切反应都能了解。这便是反应的基本原则的探讨。①

从潘菽和吴绍熙的观点来看，他们重点强调心理学研究的是社会参与过程中的活动，而且是这些活动的基本原则，即基本规律。他们关注的是活动中多种多样的变化，对这些变化进行分类，进而对这些反应的发生、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以获得其中蕴含的规律，构建心理学的学科基础。

三、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②

心理学传入中国是逐渐由众多领域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引进，逐步过渡到由专业学者从事专业研究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强调，使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参与者由心理学专业队伍掌控，而那些早期推动心理学发展的公共知识分子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建设中国心理学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以下几种重要的方法论。方法论涉及指导思想或哲学立场、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手段三个层面的内容。在讨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过程中，心理学者强调的层面也各有差异。

（一）研究方法多元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大齐和潘菽。陈大齐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认为："心理学之研究以归纳法为主，与其他科学略同；盖观察诸种之现象，合而通之，以求其概括之法则，固惟归纳法是赖焉。然心理学研究之方面既与他科学异，则其研究之法亦不能不有特异之处。"③在此基础上，陈大齐认为，内省法、外观法和实验法是研究心理学的三种具体方法，而且内省法与外观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自从心理学独立于哲学之后，实验法为心理学所倚重，虽然实验法在心理学中的应用还不广泛，但随着研究的深

---

① 潘菽，吴绍熙，编. 教育心理学(第2版)[M]. 上海：北新书局，1947：1，2.

② 此部分的撰写对汪凤炎教授的著作多有参考，谨致谢忱。汪凤炎.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625.

③ 陈大齐. 心理学大纲(第13版)[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7-8.

入,全部心理现象都可以进行实验研究,心理学将会与物理学、化学一样成为“精确之科学”。

潘菽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如他认为:“心理学的方法也和别的科学完全没有两样。基本的方法是详审的观察,观察的境况须控制时便是试验,这是一切科学所同的。心理学上自来有一种所谓特别的方法叫做内省法。但内省法不过就是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动作。……内省法固然有特殊的困难,但所谓外观法何尝不同样地有困难呢?”①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心理学者在国内开展的心理学研究带有开拓性质,往往以人们较为熟悉的研究方法开展某一领域,很少人能做到像郭任远那样激进,信奉一种方法而极端地否认其他的研究方法,因此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上,持多元方法论的心理学者还是比较多的。

(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思想

郭一岑是较早把苏联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心理学者之一。他的《现代心理学概观》集中反映了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现代心理学产生诸多纠纷的根源在于哲学观点的不同、对心神关系的看法不同、对方法问题持有的见解不同、对意识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心理学之将来”在于“心理学必须是新哲学的”、“心理学必须是人类的”、“心理学必须是社会的”:

> 从新哲学来看,精神是物质发展的最高形态。……从物质发展的事实中,以纠正机械唯物论的论点,(并)以说明精神如何从物质发展而成。……物质因为自身的特性及环境的关系,刻刻都是在运动的状态中,……运动的法则最主要有二:1. 由量变到质变。……2. 由矛盾而统一。物质依照这样的法则而运动,同时又借助于物理化学的作用,于是形成各样形态的个体。但是个体的各种形态并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经过了很长久的历史,并且还经过了一定的阶段;先无机物,次有机物,有机物之中先植物,次动物,而动物中人类是最后形成的。动物的机体组织是极复杂的,由这极复杂的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于是产生

① 潘菽. 心理学概论[M]//潘菽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50 - 151.

一种新形态——精神。但是人类的机体组织又比动物的复杂,而人类所处的环境亦比动物所处的复杂,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又成一个新形态。这新形态中的特质就是有意识的思想。这是由物质发展至人类精神的过程。我们还要知道,物质发展成了一个新形态,便有了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对于一种形态的了解不能求之于构成这形态的分子的性质中。……故此,我们对于人类精神的了解,应该着重其特殊性。我们不仅不应将精神还原于生理上的理化作用,也不应该求助于动物的行为。①

郭一岑还论述了"心理学必须是人类的",用动物的行为去说明人类的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人类机体的构造(体态、人手、大脑、发达的发音器官等)和人类的生活(如劳动)都是与动物不同的,因此,以人类为目的的心理学是应以具有特殊性之人类心理本身为研究对象。最后,"心理学必须是社会的"。人是具体地、现实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活动着。人的劳动作用于自然,改变着自然,同时也改变着劳动者的性质,而且,在劳动过程中与其他人发生联系而形成社会,并生活于社会。人类的行为是随社会而发展的,同时社会关系决定着人类的行为,因此,把行为同社会的关系脱离开来,是无法正确理解人类行为的。这些都是郭一岑认为"正确的心理学"必须依据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由物质的辩证逻辑才能把握到行为之发展性、联系性和具体性。"②可见,郭一岑主张,采用"物质的辩证逻辑"的方法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揭示和纠正西方心理学各流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和错误。

(三)客观实验论

受到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深刻影响,郭任远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激进派的立场,极力倡导客观的实验法,反对带有主观性质的内省法。郭任远在心理学界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他观点的激进性,而更在于他所做的研究基本上都有扎实的实验依据。固然不能完全否定本能的存在,但郭任远有实验依据表明,小鸡啄米点头的动作受到胚胎发育过程外在环境或刺激的

① 郭一岑.现代心理学概观[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24-128.
② 同上:128-136.

影响。他也有实验依据表明,猫和老鼠可以处于“大同世界”,猫没有先天捕食老鼠的本能。

> 心理学的立脚地是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等相同的。换一句话说,心理学是一个物观的科学。他研究的对象是物观的现象——行为,所以其他自然科学所用的物观的观察法和物观的实验法,心理学亦皆采用。科学最注重精确,故心理学的研究也以数学的计算与测量为当务之急。这样讲起来,心理学也可称为精确的科学之一了。①
>
> 我是一个科学家,不是哲学家,所以对于本能的讨论,完全以实验的态度及实验的结果为依据。离开了实验室就无所谓心理学。②

在郭任远发表反本能论的观点之后,麦独孤很快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但是郭任远读过他的文章之后就宣布“战争”终止,并说:“我一向认本能做一个实验的和事实的问题,他忽然舍弃事实及实验而讨论哲学的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对 McDougall 宣布停战。我只问事实,只问试验的结果,倘若本能是一种生机力,是神秘不可思议的,也不可以试验的,那么我只能说:如此则本能只为哲学家存在,并不是为科学家而存在的。”③可见,郭任远只承认客观的实验观察方法,拒绝哲学家主观思辨的方法。

在《一个心理学革命者的口供》中,郭任远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认为这些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它们是:(1) 重事实而轻理论,一切理论都以事实为归宿;(2) 不注重演绎法,而以归纳法为探讨自然界真理的真正工具;(3) 以实验室的实验法为根本的方法,观察法为辅助的方法;(4) 一切方法都是客观的,一切实验都是公开、可验证的;(5) 由于感官的不足以及增加观察的精密,实验中往往借助仪器;实验越精细,仪器越复杂;(6) 因注重精确和细微,所以常用数学作为叙述的工具,科

---

① 郭任远. 心理学的真正意义[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局,1928:5-6.

② 郭任远. 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局,1928:107.

③ 同上:118.

学越进步,数学应用越广;(7) 五官当中,以视觉最为有用,科学的观察用眼的地方多,用其他感官的时候少。

四、反本能论

在郭任远1921年于美国的《哲学杂志》发表《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一文之后,国际心理学界曾迅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是一次有中国心理学家参与的国际心理学大讨论,同时也形成中国近代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郭任远的《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的批评锋芒直指麦独孤和华生。麦独孤是作为本能论的代表而受到郭任远的批评,华生虽为行为主义创始人,但其早期理论中还保留着本能概念,郭任远为他的柔弱性和不彻底性而加以批评。郭任远当时作为一个四年级的学生,直接挑战心理学界的两大权威,引起当时美国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震动,随即很多心理学家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郭任远1922年在美国的《心理学评论》又发表了《我们的本能是怎样获得的?》一文。他写道:

> "本能"是一个完结的心理学(finished psychology)——假使我们把本能推原起来,我们知道这是原人的一种概念。原人因为不能解释行为的仿佛神秘的性质,所以就归之于神明。……近世心理学者对于本能的观念,直与原人无异。自然,我们自以为我们对于本能的观念,比原人来得"科学"多了,因为我们已经用了"遗传"两字来代替"神明"。……要言之,本能是已结束的心理学,并且是个实验的发生心理学之障碍物。①

郭任远认为,本能论将行为当作是不学而能的这种观点严重阻碍着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人和动物行为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后来,他于1924年在美国的《心理学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一个无遗传的心理学》,主张在心

① 郭任远.我们的本能是怎样获得的[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郭任远心理学论丛[M].上海:开明书局,1928:72-73.

理学中彻底取消遗传的论点，由此可见郭任远反本能论的坚定立场。郭任远的观点发表之后，在国际心理学界受到包括麦独孤、桑代克、托尔曼等多位心理学家的反驳。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一文又引发国内的本能论战。这篇文章共分为四部分："本能的意义及其在晚近心理学上的位置"；"三年来反对本能运动之经过及其派别"；"本能论心理学者之辩护"；"我最近的主张"。

> 我是极端主张机械论的行为心理学的，我绝对否认一切心灵、意识、精神生活等之存在。我不但反对近来一般旧式的调和派的心理学家，并且很不赞成世界所公认的行为心理学的领袖，华震(即华生——引者注)的许多主张。我不是不赞成他的革命的主张，我是反对他的柔弱，反对他革命革的不彻底，不能完全超出旧式的心理学的范围。这一层对于我之反对本能及一切遗传行为也是很有关系的。
>
> (1) 我根本反对一切本能的存在。我以为一切行为皆是由学习得来的。我不但说成人没有本能，即使是一切动物及婴儿也没有这样东西的。
>
> (2) 我的目的全在建设一个实验的发生心理学。①

郭任远在早期观点中提出"反应单位"说，所谓"反应单位"，是指未出生的胎儿及初生婴儿的种种无秩序的、组织简单的动作。这种动作后来因为学习及环境要求的结果而互相结合成种种复杂的动作。这反映了郭任远早期还是承认存在极其简单的遗传行为(即反应单位)的。但是，随着观点的深入，他逐渐走上彻底否定本能存在的道路，主张彻底的"无遗传的心理学"，鸟类胚胎发育和训练猫不吃老鼠的实验就反映出他对"反应单位"说的自我否定。

郭任远在"反本能"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鸟类胚胎发育和训练猫不吃老鼠的实验研究。他以独特的"郭窗"技术，观察和研究鸡胚胎行为的发展。

① 郭任远. 反对本能运动的经过和我最近的主张[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局，1928：107，113，114，119.

他的实验观察发现,孵化后小鸡点头啄米的动作是其在蛋壳内因为头部受到心跳的刺激而习得的,从而证明根本不存在不学而能的本能,所谓的"本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即"有机体除受精卵的第一次动作外,别无真正不学而能的反应"。这一系列研究相继发表在美国权威杂志上,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① 郭任远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指导助手胡寄南用小猫和白鼠从小同居笼内人工加以喂养一直到长大,结果猫鼠友好相处,并拍了一张老鼠骑在猫身上的照片作为证据,用以告诉人们,养育在隔绝环境中的小猫并没有吃鼠的本能;养育在吃鼠环境中的小猫,其吃鼠行为受母猫的影响,同样还可以将猫训练成见鼠畏惧或逃避。其结论是,通过发育时期生活条件的控制,可以使猫杀鼠、护鼠甚至怕鼠。该实验结果后以《猫对鼠反应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cat's responses to the rat*)为题发表于美国的《比较心理学杂志》(1930)上,同样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好评与重视,也引起社会媒体的关注,争相撰文报道。

据胡寄南的观点,郭任远在反对遗传本能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称所谓的本能都是后天获得的,体现在《取消心理学上的本能说》一文中;第二阶段他主张"不学而能"的动作不能被认为是"遗传的",从实验的观点来看,遗传的反应概念是没有价值的,其观点体现在《我们的本能是如何获得的》;第三阶段他完全废除了遗传动作和习得动作的分别,体现在《没有遗传的心理学》一文中。上述主张反映着郭任远对传统心理学的"破坏"的一个侧面,其"建设"的方面体现在,他的主旨和兴趣集中在一个实验的发生心理学上,他认为我们不援引或涉及遗传,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完全实验的发生心理学。② 可以说,郭任远虽然扬名于反本能论,但是他的目标在于构建其新的心理学主张。之所以要反对

---

① 这一系列论文第一篇和第二篇发表于美国 *Jour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第 61 卷第 2 期、第 62 卷第 3 期,1932),第三、四篇发表于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第 13 卷第 2 期,第 14 卷第 1 期,1932),第五篇发表于 *Psychology Review*(第 39 卷第 6 期,1932),第六篇发表于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第 16 卷第 3 期,1933)。其中第三、四篇中译版发表于《心理半年刊》(第 1 卷第 1 期),第五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2 号),第六篇发表于《心理半年刊》(第 2 卷第 2 期)。第三篇中转述了第一篇的报告内容称:"那头部和身体之被动的振动,均为心跳所引起。在四日至七日的胎,其头部是曲下接近心脏,这样,心的跳动,常常抵触着头部。头部既被刺激,乃发生运动,那是头部转开刺激物——心脏。头部转开心脏的结果,乃依当时情形,或为上举,或向旁旋转。这种头部运动,差不多常常伴着整个身体的运动。"

② 胡寄南.评非本能论[J].民铎,1922,4(3): 4 - 10.

本能,是因为如果让遗传、本能概念继续流行于心理学领域,将会影响其理论观点的基础。

当时国内参与“本能论战”的有严既澄的《非本能论之批评》(《民铎》,第4卷第1号,1922)、胡寄南的《评非本能论》(1922)、李石岑的《本能之研究》(《教育杂志》,第16卷第3号,1924)、丘鹤的《本能问题之纵的观察》(《教育建设》,第4期,1931)、张栗原的《本能问题与教育》(《教育杂志》,第25卷第10期,1935)等。大部分学者并没有接受郭任远那种激进的立场,如以郭一岑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家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谨慎审视“本能”。一方面,他反对机械唯物论者完全抹杀“本能”的存在,而相信人和动物身上的确存在数量不等的“本能”;另一方面,又主张“本能”的“先天性是相对的,它是能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反对唯心论者将本能完全视为一成不变的见解。郭一岑说:

> 譬如关于本能的问题,唯心论者以为本能完全是天赋的,是一成不变的,而行为主义的机械论者则又否认本能的存在。其实两者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只能用静态的孤立的方法去观察事物,所以结果便不能理解事实的真理。假使能用动的逻辑方法,便会看出“本能是基于祖先获得的新性质而构成的物质基础,遗传来的适应的机能”。他具有的先天性是相对的,他是能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这是很具体地从行为的发展性和联系性中把握了本能的事实,而不会像唯心论者模糊事实,或像机械论者抹杀事实。①

科学的指导思想将是理论认识深化的基础,郭一岑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本能”作出了在当时最为明晰的阐述。

第三节 心理学分支领域的研究成就

中国近代心理学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成就了我国

① 郭一岑.现代心理学概观[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35.

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此仅以下面十个不同领域概括和总结其重要研究成果。

一、汉字心理学

汉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产物。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在接触西方心理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唤起本土研究的意识,引起那些接受西方心理学训练的留学生的关注,并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内正在兴起新文化运动,文字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最早开展的汉字心理研究是刘廷芳1916—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六组实验,其中使用了398名中国成年人,18名中国儿童,9名美国成年人和140名美国儿童。[①] 后来于1923—1924年在北京出版的英文杂志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上分次进行刊载,但最终未刊完。1918年张耀翔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过"横行排列与直行排列之研究"(英文稿,未发表)[②],1919年高仁山与查良钊在芝加哥大学开展了汉语和英文阅读中眼动的实验观察,但该论文没有发表。1920年柯松(Wilford Wells Cossum)以中文和英文为实验材料进行了阅读效率的研究,论文亦未发表。[③] 1921—1923年周学章在桑代克的指导下进行"国文量表"的博士论文研究。1922—1924年杜佐周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做汉字研究。1923—1925年艾伟在华盛顿大学研究汉字心理,在此期间,艾伟兼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汉文教师,得以以美国学生做被试,被试中有乔治城大学文学、理学、外交学院的学生,还有艾伟一些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同学参加,共达200人。1925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艾伟一直致力于汉语的教与学的探讨,这些内容将在后文中予以介绍。其专著《汉字问题》(1949)对提高汉字学习效能、推动汉字简化以及汉字由直排改为横排等,均产生重要影响。艾伟汉字心理学的研究,对推动心理学中国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艾伟发现,汉字形与义的联系比形与音的联系保持得更长。

---

① 周先庚.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J].测验,1934,3(1):29-62.
② 艾伟.中国学科心理学之发展[J].教育心理研究,1940,1(3):6-11.
③ Tinker, M. A. (1931).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8(2): 81-98. 陈汉标.中文直读研究的总检讨[J].教育杂志,1935,25(10):53-68.

1925—1927年沈有乾在斯坦福大学迈尔斯的指导下进行汉字研究并发表了实验报告。沈有乾是利用眼动照相机观察阅读时眼动情况的早期研究者之一。他曾介绍观察眼动方法的发展略史,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运用照相机观察阅读时眼动的技术,报告了他在斯坦福大学利用11名中国留学生做被试,对汉语阅读时的眼动进行实验观察。结果发现,直排时眼动停顿时间比横排时略长,每次停顿所读字数直排时比横排时多,因此直排时阅读速度要高一些。该结论与最初认为横排阅读好于直排阅读的假设相悖,作者认为可能是当时中国人"久练直读,横读尚未习惯"造成的,在横读的经验多了之后,可能会比直读更快。① 沈有乾的实验观察报告科学而规范,逻辑性强,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这样的报告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表明,中国这一代心理学家曾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受到专业的心理学训练。

1925年赵裕仁在国内《新教育》杂志发表了《中国文字直写横写的研究》。1926年陈礼江和卡尔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发表关于横直读的比较研究。同年,章益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完成《横直排列及新旧标点对于阅读效率之影响》的研究,蔡乐生在芝加哥大学设计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汉字心理研究,并在1928年与亚伯奈蒂(E. Abernethy)合作发表了《汉字的心理学I:字的繁简与学习的难易》(*The psyc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 I : Complexity of character and difficulty of learning*),其后完成"字的部首与学习之迁移"、"横直写速率的比较"、"长期练习与横直写速率的关系"等多项实验研究。蔡乐生在研究中从笔画多少以及整体性的角度,首次发现和证明了汉字心理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关联性。② 其《汉字心理学》一文1938年发表在《教育通讯周刊》第29期上。

1928—1929年周先庚陆续发表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汉字心理的实验研究结果。周先庚于1925年入学斯坦福大学之后,在迈尔斯的指导下也开展了汉字阅读心理的研究。当时旧金山有一个《国民日报》,报馆在旧金山唐人街上,它是左派的进步报纸,周先庚在报馆地下室排字间自己排印横竖读汉

---

① 沈有乾.诵读时眼球跳动之观察[J].心理,1926,(1).也见:心理杂志选存(下)[M].上海:中华书局,1932:658-672.

② 蔡乐生.为《汉字的心理研究》答周先庚先生[J].测验,1935,2(2).

字阅读心理的实验材料。周先庚关于汉字横竖排对阅读影响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决定汉字横竖排利弊的具体条件。他的研究目标并没有拘泥于汉字横直读的比较问题上，而是探索汉字位置和阅读方向的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字阅读心理问题。如前所述，周先庚曾经于1927年夏天参加了一个暑期课程班，聆听过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课程。受其影响，周先庚采取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从汉字的组织性的视角来审视，一个汉字与其他汉字在横排上的格式塔能否迁移到竖排汉字的格式塔上，以及这种迁移对阅读速度影响大小的问题。最后他提出汉字分析的三个要素——位置、方向和持续时间，其中位置是最重要的要素。[①] 周先庚总共发表四篇实验报告和一篇理论概括性文章，分别发表于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和《心理学评论》上，其中一篇后来译成中文发表于国内《测验》杂志上。周先庚在《汉字阅读中的格式塔》(*Gestalt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一文的致谢中还提到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和黄翼对该文提出评论和建议。[②] 可见，周先庚曾经接受过格式塔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他还热衷于阅读实验仪器的设计与改良，曾发明四门速示器(quadrant tachistoscope)专门用于研究汉字的识别与阅读。

1920年前后，有十多位心理学者从事汉字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其中既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也有国内学者开展的研究，研究的主题多为汉字的横直读与理解、阅读效率等问题，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中革新旧文化和旧习惯思潮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受到东西方文字碰撞的影响，因为中国旧文字竖写，而西方文字横写，两种文字的混排会造成阅读的困扰。这些心理学者在当时开展汉字的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涉及速度记录法、眼动记录、速示法、消字法等多种方法，而且还有学者专门为研究汉字创

---

① Chou Siegen K. (1929).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2): 156 - 177.

② Chou Siegen K. (1929).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2): 156 - 177. Chou Siegen K. (1930).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I).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3(4): 332 - 351. Chou Siegen K. (1930).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II: Judging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3(5): 438 - 452. Chou Siegen K. (1935).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V: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posi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35,18(3): 318 - 347. Chou Siegen K. (1930). Gestalt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37(1): 54 - 70.

制了实验仪器,利用的中国语言文字材料涉及文言文散文、白话散文、七言诗句等,从而在国际心理学舞台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改变汉字此前在西方心理学研究中仅仅被用作西方人不认识的实验材料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同时也为国内文字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正如蔡乐生所说:“我向来研究汉字心理学的动机是在应用心理学实验的技术,求得客观可靠的事实,来解决中国字效率的问题。”[②]他还写道:“……我和亚伯奈蒂合作的《汉字心理学》,这时正待整理。我病中不敢提笔,连家书都懒得写,但这是我对于祖国文字头一篇的实验研究,与汉字改革和简体字运动的问题都有密切关系,我怎肯安心养病,不把实验报告整理发表,以供文字革命家作个参考呢?”[③]这是当时留学生在海外心系祖国而从事汉字心理研究的一种心态体现。

二、儿童心理学

20世纪20年代初期,关于儿童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性文章在国内心理学、教育学等刊物上逐渐涌现,并且有多部译著相继出版。如1922年,李溶翻译了诺斯窝席(Naomi Norsworthy)、魏脱来(Mary Theodora Whitley)等著的《儿童心理学》,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自当年7月8日进行了长达60期的连载。陈大齐翻译高五柏(R. Gaupp)的《儿童心理学》、葛承训翻译华特尔(Charles Wilkin Waddell,1875—1961)的《儿童心理学》(1929)、高觉敷翻译考夫卡的《儿童心理学新论》(1929)等。另外,也有教育学者早期开展的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如萧恩承(1898—?),江西永新人,1921年毕业于美国雅礼会在长沙的教会大学——雅礼大学,在长沙师范学校时曾编著《儿童心理学》用于授课,并于1921年秋天在商务印书馆印行,此后该书印行十多次。萧恩承1922年赴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1927年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30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讲课的同时重新编著了一册《儿童心理学》(1934)。

---

① 例如,1920年赫尔(Clark Leonard Hull,1884—1952)、1923年郭任远都曾利用汉字做过实验素材。

② 蔡乐生. 为《汉字的心理研究》答周先庚先生[J]. 测验,1935,2(2).

③ 蔡乐生. 一个学心理学者的自叙[J]. 心理季刊,1937(1): 135-145.

陈鹤琴(1892—1982),儿童教育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中国儿童心理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陈鹤琴于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并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本打算攻读心理学博士未果,后于1919年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此开始了儿童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陈鹤琴在国内《心理》、《教育杂志》、《新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实践,为儿童心理学研究在国内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20年12月26日,陈鹤琴的长子陈一鸣出生,他以自己的孩子作研究对象,采用系统观察法对其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跟踪观察,以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1925年,陈鹤琴根据教学、研究、观察和实验中积累的材料,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该书内容是对陈一鸣日常生活的系统观察,并辅以80幅生活照片,向读者形象直观地展现了婴儿期儿童的心理发展进程。该书是陈鹤琴的代表性研究著作,是中国心理学界最早运用长期系统观察法获得的研究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继陈鹤琴的研究之后,葛承训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葛承训的女儿惠明于1925年10月30日出生之后,他也采取了系统观察法对孩子进行了长达875天的观察和研究,总结了惠明哭,笑,眼、口、头、肢体和躯干动作,游戏、语言发展的时间及其表现特点,并于1932年出版了《一个女孩子的心理》。后来费景瑚也对自己的儿子均一进行了170天的系统观察和研究,同时将自己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同国外学者如达尔文、莫夫人(Mrs. Moore)、霍夫人(Mrs. Hall)及国内学者陈鹤琴、葛承训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不同学者从不同孩子身上观察到同一个行为出现的时间差异性。① 陈鹤琴、葛承训、费景瑚的这三项案例研究反映出当时学者对系统观察法研究运用的极大热情,以及身体力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为我国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留下宝贵的实证性资料,为将来跨时代对比性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儿童观上,陈鹤琴否定了传统教育中将儿童看成“小大人”的观念,强调儿童的特殊性,尤其是那些独特的心理特点,如好动心、模仿心、好奇心、

① 费景瑚.均一六个月的身心发展[J].心理半年刊,1934,1(2).

游戏心，教育者要尊重儿童的人格，保护和利用儿童各种独特的心理，探讨儿童身心发展的诸多方面。另外，陈鹤琴是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在研究儿童心理与儿童教育的同时又亲自创办幼儿园，而且在家中按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子女进行儿童教育，将学问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儿童心理学家黄翼留学美国期间曾受到过格式塔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并接受过专业训练。1930 年他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课程。在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方面，黄翼曾进行过长期的实验研究，在国外发表过的重要论文有《儿童对奇异现象的解释》(1930)、《儿童的物理因果概念》(*Children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A critical summary*, 1943)、《儿童泛灵论的实验分析》(*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child animism*, 1945)。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有《近代儿童心理学的性质与问题》(1934)、《儿童心理学之过去与现在》(1935)、《神仙故事与儿童心理学》(1936)、《儿童绘画之心理》(1938)和《儿童语言之功用》(1936)、《儿童心理学》(1942)等。其中《儿童对奇异现象的解释》是他的博士论文，他采用皮亚杰首创的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临床法，以一系列实验为依据验证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 5、6 岁以前儿童的因果思维是近于神奇的，5、6 岁—7、8 岁的因果思维近于泛灵论，到 11、12 岁思维是唯实论的。黄翼的研究结果表明皮亚杰所提的思维阶段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他认为儿童思维历程的本质与常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①

黄翼希望通过自己编著的《儿童心理学》来介绍当时科学的儿童心理学的概况，帮助读者能够真正了解儿童以及儿童心理学在教育上的应用价值，同时考虑到此书适用的对象而注重浅显易懂，可以用于幼儿师范学校的教材。此外，该著作十分重视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儿童训育问题，列有专章进行介绍。这些与他关注儿童心理卫生实践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他曾发表过《幼儿心理健康个案研究法》(1935)一文，详细介绍了曾筹建心理实验

---

① 陈立.一个心理学家之成就与失败(1944)[M]//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772－773.

室,并于 1935 年创办了旨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的培育院。黄翼在批评当时传统学校训育中错误的指导思想基础上阐发了心理辅导的基本精神,并深入探讨了儿童心理辅导的内涵,为西方儿童心理辅导在中国的开展做了理论上的开拓。①

萧孝嵘在儿童心理学领域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 1931 年回国后最初开拓的研究领域是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发表了《儿童心理学之方法观》、《儿童心理学最近之发展》、《儿童年的对象》、《儿童心理述要》等文章,并出版了《实验儿童心理》(1933)、《儿童心理学及其应用》(1935)和《儿童心理学》(1936)。萧孝嵘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实验、实证、实践取向。实验取向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实验儿童心理》一书之中。萧孝嵘深感欧美儿童心理学著作要么过于简略,要么选材过滥,要么限于个人化的研究,要么侧重问题讨论,使得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及其研究方法难以掌握,于是他在著作中一方面介绍了重要的理论与事实,另一方面阐明实验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都比较简单易行,对于欲从事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不需要繁难的设备,很多实验能够在教室里面进行演示,可以引发学生研究的兴趣。② 萧孝嵘开展的儿童实验研究,有《内外倾品质与年龄及性别的关系研究》(1936)、《暗示感受性与年龄及性别的关系研究》(1936)。实证性取向体现在萧孝嵘开展的儿童智力测验工具的修订工作上。他相继修订了墨跋量表(Merrill-Palmer Intelligence Scale)(1936)和古氏儿童智力测验(Goodenough Drawing-A-Man Test)(1939),编制了小学儿童智力测验(小学一、二年级,1939)和团体智慧测验甲、乙种(小学三年级至成人,1939)。③ 这些测验工具的修订为开展调查和研究可以提供有力的实证性基础。萧孝嵘儿童心理学研究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其著作名称《儿童心理学及其应用》可见一斑,他注重使读者"得以解决儿童教育之实际问题"。例如,他在阐述儿童心理学研究发现的同时,往往结合实践需要进一步阐述儿童教育的基本原则,使为人父母者,为师者能够用它们解决儿童教育的实际问题。他也将自己多年从事儿童心理研究的成果(例如,目手相应

---

① 范庭卫. 黄翼与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开拓[J]. 心理学报,2009(2):182 - 188.
② 萧孝嵘. 实验儿童心理·自序[M]. 上海:中华书局,1933:1.
③ 郭本禹. 中国心理学经典人物及其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246.

的运动之研究、位置知觉之发展的研究等)以及测验工具的修订工作融汇于该书之中,这从侧面上反映了当时国内儿童心理学研究的状况。①

孙国华(1902—1958)重视比较心理学的研究,专长儿童心理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求学。1925—1926年曾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学习。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院获心理学硕士(1927)和哲学博士(1928)学位。1928年底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1941—1946年间,曾在四川白沙前国立编译馆任编辑兼总务组主任。1926年他在第78卷第2期《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瞳孔反应在四足动物中的比较研究 II》(*Comparative studies on pupillary reaction in tetrapods: The effect of pilocarpine and other drugs on the pupil of the rat*)一文。1930年孙国华与普拉特(Karl Chapman Pratt)、尼尔森(Amalie Kraushaar Nelson)合作发表了《初生儿的行为研究》(*The Behavior of the Newborn Infant*),这是西方儿童心理学领域一篇重要的文献,长达246页,曾单印成册,被列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丛书"。

三、教育心理学

心理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廖世承1919年回国之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开设了教育心理学课程。1921年也有蒋梦麟在北京大学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的记载,《北京大学日刊》载有一则通告称,蒋梦麟因受寒不能授课,暂停讲授教育心理学等课程。② 20年代初期,西方的教育心理学著作相继译介到中国来,如《教育心理学大意》(Colvin和Bagley著,廖世承译,1921)、《教育心理的实验》(Starch著,戴应观译,1922)、《教育心理学》(桑代克著,陆志韦译,1924)、《教育心理学导言》(史屈朗著,朱定钧、张绳祖译,1925)。

1922年全国新学制课程标准中的教育心理学课程标准,即由廖世承起草,其后又提交给江苏师范讲习所课程委员会,最后形成的课程纲要,都主

---

① 萧孝嵘,编著. 儿童心理学及其应用[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② 注册部通告[J]. 北京大学日刊,1921-2-16.

张教育心理学教材要注重儿童研究以及学习方法,包括测验、教法注重参观和实验。历经四年教育心理学的教学实践之后,辅以一些教育心理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廖世承于1924年出版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初、高等教育中教育心理学课程的需要。该著作强调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适合中国国情,强调教育心理学教材的编写要符合教育心理学的原则,这些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廖世承重视心理与教育的结合,努力运用心理学原理来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

教育心理学涵盖的学习心理、学科心理、差异心理、教师心理、学生培养等主题在抗战之前均有所发展。1923年艾伟就在当时的专业期刊《心理》上发表了《中学数学的心理》,开始探讨学科心理问题。《心理》杂志上还刊发了《性与习的调查》(姚仁寿),结合一个案例探讨先天与后天的问题;发表了《习练的移转》(赵乃抟)、《一种矫正几何错觉的试验》(陆志韦)、《研究注音字母四声标法的一个试验》(张士一)、《诵读时眼球跳动之观察》(沈有乾)、《朱子读书法》(余家菊)等文章。从这一组文章来看,既有实验研究、个案研究,也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心理学诠释,可以说当时的教育心理学有着较强的科学实证性倾向,同时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教育心理学思想。由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实践,因而教育类期刊也成为教育心理学发展的重要舞台,一些教育学家或教育工作者纷纷发表教育心理学理论性或实践性的文章。如舒新城的《教育心理学述要》、黄公觉的《教育心理要领》、慈心的《教育心理学最近倾向》等文章发表在当时《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和《教育汇刊》等杂志上。抗战之前教育工作者开展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艾伟自1925年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回国之后就一直致力于教育心理学领域多个主题的研究,如对数学(学习困难、学科教学)、国语(学科教学、文白对照、识字教学)、英文(测验、语法错误)等开展了大量有较强实证性的研究。艾伟在中学生文言文与白话文学习问题的研究中,缜密地分析了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速度等方面,他提出的有关高初中文白教材比例的建议被教育部采纳。1933年编撰出版了《初级教育心理学》一书,此书出版后被广泛使用,多次再版,1935年改版为《教育心理学》(上、下),其中的教学内

容对教育部制定教育心理学的课程标准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沈有乾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编撰了一部《教育心理》,并经教育部审定为师范学校教材。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艾伟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艾伟赴英国跟随皮尔逊学习统计学,进一步促进艾伟在教育实践中使用统计等实证性技术。1934年艾伟和夫人范冰心筹办了万青实验学校(包含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天才儿童教育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到,艾伟的教育心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证性。艾伟1936年相继出版了《教育心理论丛》、《教育心理实验》、《国语科的学习心理》等著作,另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名义下编辑出版了中央大学教育心理讲座研究报告,分别是《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数学成绩与其他学科成绩之相关研究》、《译学问题商榷》、《统计学上机率与机遇的实验研究》、《统计学上均差之研究》、《中学英文教学之初步考察》、《测验学上对减错计算法之研究》、《中学国文理解程度之研究》、《英语教学问题》、《国文横直读之比较研究》共10期,反映出艾伟担任教育心理讲座期间的丰硕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教育心理学在教育实践中得到迅速发展,这体现在学校教育和平民教育中。以艾伟等人为代表的心理学者继续在初、高等教育中开展相关研究,相继发表了《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心理学在学科教学上之应用》(艾伟,《心理半年刊》,第1卷第2期、第2卷第1期),萧孝嵘发表了《组合与区别二种方法对于学习之影响》(《心理半年刊》,第1卷第2期)、《知动学习问题的实验研究》(《教育杂志》,第26卷第9号)、《年龄性别与内外倾品质的关系》(《测验》,第2卷第4期)、《学习心理学中之三大问题》(《教育杂志》,第24卷第1期)、《默读速率与理解关系之实验》(阮镜清,《教育研究》第42期)、《教与学之心理的解释》(杜佐周,《教与学》,第1卷第2期)、《教育心理学之范围与内容》(潘企莘,《大公报》,1936年1月30日)等文章。另外,廖世承和萧孝嵘还在《教育杂志》上编译发表了大量国外教育杂志上的教育心理学文章,曹日昌在《教育短波》上发表了《教育心理学讲话》系列文章。

抗战爆发之前,教育心理学在平民教育领域也有较多的应用和开展。1932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了教育心理研究委员会,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周先庚为委员会主席,在河北省定县主持年龄与学习能力关系的

研究。周先庚整理并分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多年的测验资料，相继发表了《定县历年测验统计结果略述》(1935)、《定县七年新法测验考试之实施结果》(1935)、《平民识字的先决问题》、《平教会施行的智慧测验》等一系列论文。研究结果得出一条7—70岁被试者的识字能力曲线，被当时心理学界称为"周先庚曲线"。这条曲线表明了不同年龄阶段识字能力的变化，周先庚为这条曲线的变化作出了适当的解释说明。周先庚主持的这项研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四、生理心理学与动物心理学

汪敬熙(1893—1968)，中国生理心理学家，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后来转型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1920年被选送赴美留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梅耶分配他在心理生物学实验室跟随里希特(Curt Paul Richter，1894—1988)开展实验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源地，对实证的实验研究比较强调。也正是在这里，"吃了两年多的苦"之后，汪敬熙从一个文学者转型为一名科学家，其博士论文《白鼠的发情周期与"自发"活动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spontaneous" activity and oestrous cycle in the white rat*)，首次用数据证明了卵巢内分泌对行为的影响，后来被收入1923年的《比较心理学专刊》第二册。1924年汪敬熙曾短暂回国任教于中州大学。1927年春他再次回国并受聘于中山大学，至1932年转任北京大学期间，在中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了9篇中英文生理心理学研究报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1) 研究白鼠活动与性周期的关系，发现雌白鼠的活动有四日周期的变化，雄鼠则无。观察证明，雌鼠活动周期的变化是由于性周期所致，而性周期的产生则是由卵巢内分泌的卵巢素引起的。(2) 研究皮肤电反射，证明皮肤电反射是由于汗腺的分泌，而与意识现象毫无关系。皮肤电反射是由各种刺激诱发出的动作电位。他是研究皮肤电反射的先驱者之一。(3) 研究两栖类胚胎行为，将两栖无尾类三种蛙游泳行为的发育分为三期六个阶段，即无动作期、向侧弯曲期、S形反应期、直线向前游泳期、控制游泳方向期、维持身体空间常态期。(4) 他是第一个将电子仪器引入中国并用于脑功能研究的人。早在1934年，汪敬熙便能够利用麦修斯示波器记录猫的视野运动时外膝体内产生的

诱发电位。[1] 1944年汪敬熙出版的专著《行为之生理的分析》，总结了他以往的研究。汪敬熙一直坚持实验的科学和纯粹科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相当重视，先后发表过一系列提倡科学研究的科普作品，并著有《科学方法漫谈》(1938)一书。

汪敬熙1920年曾撰文在《新潮》第2卷第4期上介绍了包括荣格、麦独孤、梅耶(Charles Samuel Myers, 1873—1946)等在内的六位心理学家1919年7月在英国伦敦大学就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潜意识理论进行的大辩论。[2] 后来还发表了《最近心理学之趋势》(《新潮》，第2卷第5期，1920)、《生理电学在心理学上之应用》(《清华周刊》，第38卷第5期，1932)、《中国心理学的将来》(《独立评论》，第40期，1933)、《答潘菽先生"关于心理学的预言"》(《独立评论》，第49期，1933)和出版著作《行为之生理的分析》(1944)。其中汪敬熙和潘菽关于中国心理学发展道路的辩论对当时中国心理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钺(1891—1987)发表过有关白鼠的生理心理学实验研究论文，如与秦拱、臧玉洤合作发表《素食对于白鼠的学习能力之影响》(1)和(2)两篇文章(《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第1卷第1号，1932；第1卷第4号，1934)，于1935—1937年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相继发表了《白鼠的各种位足反应的发展》、《白鼠的单边耳迷路割除的结果》、《白鼠的中枢神经的抵补作用》等研究。

臧玉洤(1901—1964) 192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工作，1925年他翻译出版了华生所著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一书。1926年他从上海转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任助教。1928年他翻译出版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 1871—1945)所著的《痛、饥、惧、怒时的身体变化》(*Bod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ver and Rage*)和帕克(George Howard Parker, 1864—1955)的《脊椎动物的化学感觉》(*Smell Taste and Allied Sense in the Vertebrates*)。1929年他考取河北省的公费名额留美，1930年赴芝加哥大学解剖科，师从神经解剖学家赫里克(Charles Judson Herrick, 1868—1960)，1934年获得博

---

① 高觉敷. 中国心理学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73-374.
② 汪敬熙. 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J]. 新潮，1920(4)：818-827.

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他从事神经解剖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论文(包括博士论文)约9篇。1936年9月,他从美国动身,到英、法、德、意等国进行参观学习后回国,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授。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臧玉淦转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

1933年陶烈出版了《心理生理学序论》一书,讨论了心理生理学的意义、对象和范围问题。1934年吴襄出版的《最近行为研究的两大趋势》介绍了行为的生理研究,涉及内分泌、青春腺、肾上腺、脑下腺与行为等方面探讨。1936年吴绍熙出版了《内分泌与心理学》,探讨了性腺、肾上腺、盾形腺及副盾形腺与心理现象的关系,以及人格发展与内分泌的关系、人类的差异与变态行为等内容。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较早地开展过皮肤电反射研究。1930年左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曾购置了当时新出现的、胶卷照相记录式的皮电机(Wechsler Psychogalvanograph)一架,在1934年又购置了当时最新的溴剂感光照相记录式的皮电机(Darrow Behavior Research Photopolygraph)一架。当时的心理学研究生雷肇唐曾发表过《心理电反射及其史略》(《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7期)介绍了这一领域的情况。[①]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还开展了一些动物心理学、生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心理学报》发表了《暗适应的扁虫对于地心吸力所表现之响动》(孙国华、敦福堂,1936年第1卷第1期),《无头扁虫的食物反应》(孙国华、张民觉,1936年第1卷第4期)、《单眼视觉之神经机构:Ⅰ.切去大脑视觉区后对于单眼白鼠辨认图形之影响》(张民觉,1936年第1卷第1期)等。由此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是当时国内开展动物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与孙国华、周先庚在美国期间在这两个领域接受过训练存在着重要关联,其中周先庚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隶属于生物学院,同时他在博士研究生阶段曾任动物心理实验室的助理。

在动物心理学(比较心理学)领域,抗战之前相继出版了《动物心理学》(周太玄著,1930)、沃尔登(Carl John Warden,1890—1961)著的《动物心理学小史》(郭豫青译,1930)和《比较心理学大纲》(夏斧心译,1932)、摩斯

---

① 周先庚.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关于皮肤电反射生理心理实验研究的经过与现况(1965,未刊稿),藏于北京大学档案馆周先庚个人档案。

(Fred A. Moss,1893—1966)著的《比较心理学》(许逢熙译,1937)。郭任远也在动物心理学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见前),在此不再赘述。胡寄南在郭任远指导下接受了动物心理学研究的训练,他发表了《动物心理学研究法》(上、下)一文,阐明了动物心理学研究的意义,如满足人类好奇心、为人类心理提供比较和参考,以及实际应用等。动物心理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轶事体的方法(如轰动一时的"聪明的汉斯")、观察法和实验法。胡寄南最后指出几项动物心理学研究应当注意的问题,并开列出动物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几部重要参考书目。①

五、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涉及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注意、情绪、动机、个性等基本心理现象的探讨,以及对心理学对象、范围、方法、分类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等问题。由于普通心理学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在这方面当时心理学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多有涉猎和探讨。在《心理》杂志上所设的"普通心理"栏目下,发表了《幻想之心理》、《工作与疲劳》、《杂音》、《文学家之想象》、《释本能》、《语言与思想》、《人生第一记忆》、《韩宁嗅觉试验》、《愤怒》、《记忆》、《意义的意义》等近30篇文章,同时还介绍了大量发表在其他期刊上的普通心理学领域的论文。心理学对象、范围、方法、分类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问题,《心理》杂志上刊文并不多,反映了当时中国心理学学者群体内部对这些问题具有相对的统一性。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在教育领域的期刊上相对比较多,《心理》杂志上以摘要的形式对其进行了介绍,如高卓(高觉敷)的《心理学的对象与方法》(《教育杂志》,第16卷第9期)、《心理学之范围》(朱自清,《新潮》,第2卷第3号)、《心理学研究方法》(志厚,《教育杂志》,第6卷第8号)、《心理的要素之分类》、《论理学与心理学之关系》(梁启勋,《大中华》,第1卷第6号),等等。

张耀翔在普通心理学方面的早期作品有《嗅觉》(《教育与心理》,第1期,1928)、《杂音》(《心理》,第1卷第2、3号,1922)、《人生第一记忆》(《心理》,第3卷第1号,1924)、《天才的特点》(《教育学报》,第1期,1929)、《中国人才产

① 胡寄南.动物心理学研究法(上、下)[J].出版周刊,1934(113,114):1-5.

生地》(《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5日)、《情绪之分类》(《教育建设》,第1卷第3期,1931)、《女子富于情绪说之生理的根据》(《教育季刊》,第3卷第1期,1934)等。张耀翔强调心理学实验结果的重要性,不赞成心理学书籍偏重抽象的原理,忽视具体的事实。后来他总结出版的两部普通心理学著作《感觉心理》(1947)和《情绪心理》(1947),集中反映了他在普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特、铁钦纳、伍德沃斯、亨特、詹姆斯等人的普通心理学或心理学概论性质的著作相继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另外,我国的心理学者开始自己编著相关的著作,如吴康(致觉)的《心理学原理》(1921)、《心理学初步》、《心理学大意》(舒新城编,1923、1926)、《心理学ABC》(郭任远,1928)、《心理学概论》(潘菽,1929)、《普通心理学》(汪震,1932)、《心理学》(沈有乾、黄翼,1933)等。

实验心理学作为研究工具和手段,为心理学的科学取向及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近代一些心理学留学生在西方国家从事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几乎都经历了严格的实验心理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之后由于心理学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较为落后,实验取向的心理学发展路径受到较大的影响。在当时有较强实验取向的大学院系当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实验心理学在这里仍有较好的沿承。首先唐钺、孙国华、周先庚等本身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实验心理学的学习,回国后仍然坚持实验取向的相关研究,对当时实验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人才培养的作用。其中周先庚师从迈尔斯,开展过汉字心理学的研究,他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即汉字心理的各种特定需求而专门设计了四门速示器,用于研究汉字横竖排对阅读的影响,以及汉字阅读和理解的特点。周先庚就四门速示器撰写的相关论文曾在1929年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同年发表于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先庚还在迷津仪器方面作出很多贡献。他设计了通用型手指迷津,即一个模式箱,稍作调制就可以分别用于推孟、麦独孤、考夫卡、迈尔斯各自不同的实验,还可以用于运动测验,供艺术师、设计师、眼盲阅读者使用。甚至在麦独孤建议之下,斯都尔汀公司已经同周先庚进行接触,准备将这种通用型迷津投放市场。周先庚在利用多槽板(multiple grooved board)做迷津实验时,想到如果在迷津沟槽里跑动的不是一只实验老鼠,而是一个滚动的球,让被试调整槽板以使球按照要求避免掉

入沟槽中的陷阱,从出发点到终点,这时测量的当然不是小球的智力,而是测量被试的技能熟练与否,而且这是一种真正的追求型(pursuit)迷津 ,这种实验过程不仅生动、自然、具有挑战性,而且新颖、易学、有趣,适合学前儿童。[①] 周先庚这一组心理学实验仪器的研制和改进的文章均发表在美国权威杂志上,有着较大的国际影响。1932 年周先庚与牟乃祚编写了《初级心理实验》,共编录了 46 个心理学实验,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铅印供学生使用,这是目前所知国内编著最早的心理实验手册。1933 年方旦明以英文心理学实验手册为蓝本,编写了一部《普通心理实验手册》,包括 60 多个实验,可供初级、高级心理实验班选用。实验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心理学实验室在国内的发展息息相关,凡是实验室建设比较完备的心理学院系往往在实验心理学领域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如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建设了当时国内最为完备的实验室,复旦大学心理学院也有较为完备的心理学实验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心理学者的一些实验心理学研究往往是在西方国家留学期间完成的,这与当时国际上实验设施、条件比较完备有关。

曹日昌(1911—1969)是中国心理学家,他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948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任教。他曾进行过心算问题的实验研究,并在总结有关珠算教学方面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于 1934 年写出论文《二十年来国人对于珠算的研究述要》和著作《珠算教学研究》。《珠算教学研究》试图改革传统的珠算教学法,开创了心算、笔算、珠算三算结合实验教学的先声。1936—1937 年曹日昌从事成人学习的心理学研究,对桑代克学习心理学学说及其实验材料与方法进行了分析评论。1936 年发表的《桑代克学习心理学的分析研究》(《中国心理学报》,第 1 卷第 1 期)一文,批评桑代克用以研究学习现象的材料多数是日常生活和教育中不常见的,因此,可以说桑代克的研究是理论的探讨而不是应用的研究。最后曹日昌提出学习心理理论的研究应当与应用学习心理的研究区分开来,前者需要在实验室内深入研究,后者要在实际应用的场合做广阔的研究。他在定县的小学中试用了鲍德斯迷津测验,以期获得简易的、非

① Chou Siegen K. (1929). A multiple groove board for testing motor skil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3): 249 - 253.

文字的智力测验用于在乡村研究成人学习和记忆心理学,后发表《试用鲍德斯迷津测验初步报告》(《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3期,1937)。他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有差异,他认为测验结果可能因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主试者和受试者的关系及测验程序的不同而不同,但该迷津测验经过修订是适用的。

汪敬熙1936年曾发表《八年来中国实验心理之研究》一文,简要地评论了当时国内实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所指的"实验心理"是不包括应用心理和纯粹理论在内的研究。当时实验心理的研究机构包括中山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和燕京大学心理学系(部分已经停办)。此前的八年中有三十多篇研究报告发表,年均不到四篇,而且这些研究报告中以动物为被试的生理心理研究占多数,仅有陆志韦研究记忆和自由联想,萧孝嵘的"知觉单元"的研究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这是由于当时心理学者多侧重心理或行为现象的生理基础研究,这与当时国际心理学界比较注重这类问题的研究倾向有关。汪敬熙指出,过去的实验心理研究有些过于重视低等动物而轻视人类,但同时这些研究报告中有多项研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需要指出的是,汪敬熙这里所称的"实验心理研究"准确地讲是指以实验法开展的实验室实验研究。

六、心理卫生①

民国初期,蒋维乔(号因是子)曾倡导践行静坐法以促进人的心理卫生与健康。1915—1924年刘仁航出版了两卷本《乐天却病法》,阐述了心理疗病法,其内容包括心灵能力与疾病寿命的关系,乐天却病实习法、呼吸静坐,文明病痛与解脱、动物生活及人类生活的意义,转心法,等等。蒋维乔为该书作序一篇。这些心理卫生与健康的探讨是面向社会人士、社会生活的。1916—1917年丁伟东翻译了日本守内喜一郎的《优等儿童及劣等儿童之精神卫生》发表在《京师教育报》第33、34、37期上。学校教育中较早对心理卫

① 当时,"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精神卫生"、"精神健康"可以视为同义语,本书中不作严格区分,其英文为"mental health"或"mental hygiene"。

生的探讨有郑宗海的《吾国学校精神卫生几个问题》(《新教育》,第4卷第5号,1922)、《问题儿童与心理卫生》(周尚,《教育杂志》,第30卷第9期,1923),前者指出我国学校妨碍学生精神卫生的因素分别为课程及其组织者、教法与教师,以及物质环境三个方面,并各自分析制定解决的策略,期望各地教育者予以关注,后者分析了精神薄弱(体格的、情绪的)儿童、逃学儿童、顽皮儿童、迟钝儿童的情况以及教育对策。例如迟钝儿童,即学业失败的儿童不只是心理缺陷或智力低下的结果,也有可能由生活上的情绪疾患或冲突导致。1928年赵演发表了《精神卫生》和《精神健康的基础及一般原则》两篇编译文章,分别介绍了精神卫生的目的及其与教育的关系,精神健康的基础(即人格统一),一般原则等问题。艾伟也在心理卫生方面发表了《情绪的卫生》(《妇女》,第15卷第2号,1929)一文。

20世纪30年代,沈有乾发表了《心理卫生》(《华年》,第4卷第1期,1932),陈宗仁发表了《心理卫生与心理学》(《清华周刊》,第38卷第10、11期),张耀翔发表了《心理卫生》的演讲(《大上海教育》,第1卷第2期,1933),黄翼发表了《青年心理卫生问题》(《教与学月刊》,第8卷第1期,1935),沈子善译《学校中之心理卫生》(《教与学月刊》,第6卷第1期,1936)等论文。

中国心理卫生运动的摇篮是南京的中央大学,1932年度下学期由吴南轩在该校首开"心理卫生"课程,1935年他又开设"儿童心理卫生问题"课程,1937年由王书林开设"心理卫生原理"课程,后来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还出版了"心理卫生丛刊",最后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建议的提出与筹备,直至1936年4月份成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吴南轩原名冕,1919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9年以论文《学习理论:其历史发展与当前趋势》(*Learning theory: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trends*)获博士学位。吴南轩是当时心理卫生运动的重要鼓吹者和组织者,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相继发表了《心理卫生运动底起原和发展》(《旁观》,第16期,1933)、《心理卫生意义范围与重要性》(《教育丛刊》,第2卷第1期,1934)、《国际心理卫生运动》(《教育丛刊》,第2卷第1期,1934)、《问题儿童之心理卫生》(《教育丛刊》,第2卷第1期,1934)、《儿童的心理卫生》(《教育杂志》,第25卷第12期,1935)、《心理卫生之遗传》(《心理半年刊》,第2卷第2期,1935)、《中国心理

卫生运动之回顾与前瞻》(《教育通讯》,第36期,1938)、《中学生之情绪卫生》(《播音教育月刊》,第1卷第5期)、《今后二年制心理卫生教育》(《建国教育》,第1卷第2期,1939)等一系列文章。吴南轩曾被推为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理事会总干事。潘菽发表了《儿童变态行为的发展及心理卫生》(《教育丛刊》,第2卷第1期,1934)、陈剑脩发表了《心理卫生与人类正常的愉快的生活》(《教育丛刊》,第2卷第1期,1934)、萧孝嵘发表了《心理卫生之基本原则》(《教育丛刊》,第2卷第1期,1934)。《教育丛刊》由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主办,成为当时该院心理学者倡导心理卫生运动的舞台。章颐年主编的《心理季刊》1936年发表了《人格和心理卫生》(萧传文,第1期)、《问题儿童的心理卫生》(章颐年,第1期)、《怎样培养儿童心理健康》(吴梅君,第2期)等文章。1935年第23卷第7期《中华教育界》上发表了《儿童的心理卫生》(徐则敏)、《心理卫生运动及其首倡者》(吴福元)、《心理卫生之起源及其发展》(方东澄)。另外,当时的《教与学月刊》发表了《儿童习惯态度的心理卫生》(浦漪人,第1卷第1期,1936)、《青年心理卫生教育》(纪芊睽,第2卷第3期,1936)、《儿童教育》发表了谢循初的《儿童心理及心理卫生纲要》(1936),等等,这些教育类杂志都发表了多篇文章,积极参与到心理卫生运动之中。

周先庚与米景沅在1932年利用瑟斯顿的"烦恼调查单"在北平、济南、太原调查了大约600名大学生和高中生,发现中国大学生在情感方面的障碍(神经症倾向)比美国大学生严重得多。他认为当时中国学生即使有心理疾病却也因无处医治而仍然滞留在学校中,这些人被看似安全但实际上最困惑地生存着。这些学生的存在导致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中情感障碍者比美国多得多。① 西方心理卫生运动兴起之后,学校均有"心理卫生"选修课,也有心理学专家负责心理卫生指导工作,周先庚认为要效仿西方这些教育制度,并按照发展的层次提出了以下设想:(1) 最低限度上,学校要设置有教师担任的学生辅导制度。(2) 学校要设置关于心理卫生的课程。(3) 如有可能应当设置学生辅导员科或人事部,专门负责学生辅导责任,能有精神病学者、应用实验心理学者或德高望重而有经验的长者辅之以心理

① 周先庚.学生"烦恼"与"心理卫生"[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40(2):707-727.

学专业的学生来施行调查、指导。(4) 最理想的办法是设立一个“心理卫生部”,由一位精神病学家主持,此外可由一位诊断心理学家或实验应用心理学家,以及一位职业指导员协助工作。但是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周先庚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也就是第五点设想。(5) 设立一个委员会,由教务长、秘书长、校医、德高望重而有兴趣的教授与实验应用心理学教授等人组织,并以最后一位专负其责。具体做法就是增加心理卫生课程,并举办心理卫生类的公开演讲,增加学生与教师的接触机会,要调查学生个人详细情况并存档。①

章颐年的专著《心理卫生概论》(1936)是大学丛书之一,论述了心理卫生的意义、发展史、心理疾病及其治疗、心理卫生实施原则及条件与实施等问题。这一著作反映了当时的学者致力于心理学的应用以及在学校教育中的实践。郑小杰、李为曾跟随吴南轩学习,对心理卫生有所专攻,1936 年他们合作出版了《心理卫生概论》一书,内容包括心理卫生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小史、健康心理的发展及其含义、人类活动的本源及其适应、心理疾病及其治疗、心理卫生的实施原则及实施条件、心理卫生的实施(上、下)共八章内容,并由汪懋祖、吴南轩各作一篇序文,其中汪懋祖还提到其妻子袁世庄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硕士期间,曾跟随其导师到精神病院进行观察,随后就产生了救民疾苦的志向,并有了从事心理卫生相关著述的想法,虽然最后并未成书,但她在教学中会遵循心理卫生的原则。②

抗战爆发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会所以及图书室都毁于战火,这使得轰轰烈烈的心理卫生运动受到了重创,但是由于当时心理学者将心理卫生运动和抗日救国(例如,当时一个观点认为汉奸的产生与心理失常有关系)、心理建设联系在一起,因此战火并没有把心理卫生运动的热情浇灭,反而使得中国心理学者在抗战时期继续推动和开展心理卫生运动的宣传和实践。

七、心理与教育测验

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一直重视心理测验工作,测验一直和教育

① 周先庚. 大学生的训育问题[J]. 独立评论,1935(165): 10 - 14.
② 郑小杰,李为. 心理卫生概论[M]. 南京: 正中书局,1936: 序.

有着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它逐渐向其他领域不断扩展。20 世纪 20 年代的《心理》杂志上刊载了智力测验类文章 14 篇，教育测验类文章 11 篇，心理测验类文章 3 篇，职业测验类文章 1 篇，另外还介绍其他杂志上测验类文章 57 篇。这反映了 20 年代初期国内心理学界、教育界心理与教育测验发展的迅猛。其中张耀翔相继发表了《智力测验缘起》、《教育测验缘起》、《科提士之算学测验》、《八卦测验》、《识字测验》、《见闻测验》等文章。

廖世承与陈鹤琴开拓了中国现代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事业，大力倡导、践行心理与教育测验工作。廖世承著有《智力测验法》(1921)。在团体测验编制上，廖世承贡献较大，他编制了道德意识测验(1922)、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1923)、廖世承图形测验(1923)、廖世承中学国语常识测验(1923)等。1921 年陈鹤琴发表了心理测验方面的演讲《心理测验》(《教育杂志》，第 13 卷第 1 期，1921)，论文《智力测验的用处》(《心理》，第 1 卷第 1 号，1922)，出版了专著《测验概要》(1925)、《教育测验与统计》(1932)等。心理与教育测验在中国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美国心理学者麦柯尔 1922 年来华开展心理测验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见本书第八章第一节)。

1924 年，陆志韦从中国实际出发，主持修订了《比纳-西蒙量表》，并公布了《订正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1936 年，陆志韦与吴天敏合作，再次修订《比纳-西蒙测验说明书》，这次修订扩大了量表的适用地区、改进了评分方法，也修订了一些试题，保证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修订后的测验，简便易操作，可信度高，为测验在我国的实践应用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2 年，《测验》杂志创刊，对心理与教育测验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该杂志上有许多讨论测验对中国教育的价值和功用的文章发表，心理测验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批教育测验的成果，如周先庚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育测验成果，艾伟编制的大、中学英文、国文、代数的测验，萧孝嵘所主持的智力测验、XO 测验、军官智慧团体测验、邬马个人事实表格等成果。《测验》杂志还发表了测验过程所使用的计分和统计方法的文章，如常态曲线、取样误差、相关、加权，等等。《测验》杂志还组织了一期“新法考试专号”，发表了《什么是新法考试》(吴南轩)、《旧式考试与新式考试的比较》(陈选善)、《实行新法考试之先决条件》(潘菽)、《编制新法考试题的方法》(龚启昌)等文章。

艾伟从1925年起编制了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测验、儿童能力测验及智力测验，如中学文白理解力量表、汉字测验等共八种，小学算术应用题、高中平面几何测验等九种，大、中学英语测验等四种。这些测验的编制，既是中国编制此类测验的开端，也为心理测量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艾伟还于1934年在南京创办试验学校，直接运用测验于教育，以选拔儿童，因材施教。

萧孝嵘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事各种心理测验的研究。1934年着手修订"墨跋智力量表"，他指导当时中央大学心理系部分学生参加这项工作，培养了他们心理测验的基本技能。在这期间，他还修订了古氏(Florence Laura Goodenough，1886—1959)"画人测验"、普雷塞(Sidney Leavitt Pressey，1888—1979，今译为普雷西)"XO测验"、莱氏(Donald A. Laird)"品质评定"和马士道(William Moulton Marston，1893—1947，今译为马斯顿)"人格评定"等量表。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他订正数种"挑选学徒的方法"，编制几项"军队智慧测验"等。萧孝嵘强调个体差异，重视心理测验在教育、实业、管理、军警中的应用，他的一部分文献收录于《人事心理问题》(1944)和《心理问题》(1949)。

八、工业心理学

职业指导作为工业心理学或实业心理学的一部分，在中国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如1920年《教育与职业》刊发"职业心理学专号"，编译了哥伦比亚大学何令华(Harry Levi Hollingworth，1880—1956)的著作《职业心理学》(*Vocational Psychology*)，1921年研制职业心理测验器械(包括目力、手力、眼之力、远率辨别等测验)等。另外，1918年天民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职业适任之心理学的研究》(第10卷第7—8期)，杨贤江也专文介绍了何令华的专著《职业心理的研究》(*Vocational Psychology*)(《教育杂志》，第17卷第1期，1925)，刘湛恩撰文《欧洲今年工业心理学及职业指导事业之发展状况》(《教育与职业》，第86期，1927)。

进入30年代之后，工业心理学有了较大的发展。1931年高祖武翻译出版了《工业心理学浅讲》(B. Musico原著，*Lectures on Industrial Psychology*)，这是国内工业心理学最早的译著。郑汉文编译了《德俄的工业心理学》(《职业教育》，第133—135期，1932)。汪敬熙在《中国心理学之将来》(1933)一文中曾指

出,工业心理学在中国是一条可走的路,但是"尚无人走"。周先庚为回应汪敬熙"至于工业心理研究的一条路,现在是尚无人走"的观点,发表了《发展工业心理学的途径》(《独立评论》,第135期,1935),文中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早就有应用心理学课程,并且多半都注重工业心理学,并梳理了此前国内工业(实业)心理学领域所刊发的文章,如萧孝嵘的《实业心理技术之几种尝试》、《各国实业心理学之发展》、《实业心理学之功用及其背景》,周先庚还提出鉴于中国工业水平较低,应该首先注重工业效率,不宜效仿发达国家发展佣雇心理技术。1935年周先庚还发表了《英国十年工业心理技术建设之教训》(《教育杂志》,第25卷第4期)以及对《工业心理学》(*Industrial Psychology*)(S. Morris原著)的书评(《教育学报》,第10卷第3期)。1936年周先庚与陈汉标合写《中国工业心理学之兴起》,发表在《中国心理学报》第1卷第2期上,内容包括绪言、教育界之职业指导运动、工商界之注意科学管理人事管理和工业安全、政府机构之颁布劳工法令提倡行政效率及调查专门人才、心理学家之普遍宣传与实地研究、中国工业心理学应注意的几点、总结、附录(中国工业心理学发展大事纪)。"中国工业心理学应注意的几点"部分是周先庚阐述开展中国工业心理的看法,如联合教育家、工商界、政府机关和心理学家,以谋求共同发展中国工业心理学;赶快多多训练富有经济及工程知识、心理生理技术,熟悉工厂实际状况的工业心理研究人才;应当选择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而且最能表现工业心理学之机能的研究工作等这几个方面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文章后面附录的"中国工业心理学发展大事记",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早期工业心理学的发展史,是极为珍贵的史料。[①] 1934年《心理半年刊》第2卷第1期为"应用心理专号",刊载了《关于疲劳的几种研究》、《实业心理学之功用及其背景》、《心理学与工作效率》、《环境对于工作者之影响》、《特种能力测验:工作中的心理分子》、《瑞士之实业心理学》、《比利士之职业指导与职业研究》、《英国国家实业心理研究所与各机关之合作事业》、《实业心理与农业》等一组工业心理学领域的文章,对于工业心理学在中国的宣传和普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王书林还翻译出版了柏耳替(Harold Ernest Burtt,1890—1991)著的《心理学与工

① 周先庚,陈汉标. 中国工业心理学之兴起[J]. 中国心理学报,1936(2):140-166.

作效率》(1935)。

周先庚于1935年开始与陈立、陈汉标、郑沛缪等人合作,进行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心理调查实验研究。当年夏天,南京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汪敬熙时任所长)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合办工业心理学研究室。7月初,周先庚拜访陶孟和接洽工业心理学研究事宜。陈立自国外接受过工业心理学的培训并从事相关研究工作之后回国,在周先庚的推荐下,被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联合聘为工业心理学研究员,1935年8月24日抵达清华大学,开始参加工业心理学调查。1935—1937年,周先庚主持和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工业心理研究合作计划,在北平南口机车厂进行了关于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的调查研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摸索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途径。这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心理实验研究。他后来撰写了多篇报告,如《平绥铁路南口机厂考察后记》(与陈立、陈汉标、郑沛缪合著)、《平绥铁路南口机厂建议制度之试行》(与陈立、陈汉标、郑沛缪合著)、《平绥铁路南口机厂建议制度试行之结果报告》(与陈立、陈汉标、郑沛缪合著)、《平绥铁路南口机厂建议制度试行之简易报告》(与陈立、陈汉标、郑沛缪合著)等。《工人心理考察:平绥铁路南口机厂试行建议制度初次简易报告》和《工厂建议制度》在抗战结束之后经过整理得以发表,这两篇文章分析与探讨了建议制度在工厂实施的情况以及对于工厂效率的影响。在《工厂建议制度》一文中周先庚系统阐述了建议制度的价值、发展、内容、组织与管理等问题,并指出:"建议制度即是改变旧看法的新措施,认为工人、厂主、工头都一起是生产分子,关于生产的事,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民主精神,扩大到生产部门里面去。……总之,建议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看谁用?如何用?"①

陈立(1902—2004)是中国工业心理学家,英国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1863—1945)的及门弟子,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陈立1932年暑期曾在剑桥大学师从巴特利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1886—1969)研究实验心理学,并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德里安(Edgar Douglas Adrian,1889—1977)学习神经生理学。抗战前他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调查了许多工厂,如1935年他曾发表《参观南口机厂的杂感》

① 周先庚.工厂建议制度(上、中、下)[N].民国日报,1948-1-24,31:2-7.

(《独立评论》,第182号)一文。1937年他在南通大生纱厂进行实验研究,先集中选择工人进行训练,同时改良工作环境,仅半年时间就使该厂产量有大幅度提高。他还在清华大学筹建疲劳研究实验室,着手调查劳动环境对生产的影响,试图改善工人劳动条件。陈立于1935年出版了《工业心理概观》,这是第一本中国人撰写的工业心理学专著。该书讨论了工作环境与工作效率的关系,研究怎样减少生理疲劳、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效率,工业事故的原因何在及如何免除,健全的组织有何条件,心理因素如何策动工作效率等问题。不仅如此,他还着重于谋求增加工人自身的幸福,研究如何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使人们在温暖和爱的氛围中相互谅解,友好相处。陈立认为:"工业心理学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谋增加工人自身的幸福,另一方面又谋生产的效率。……工业心理学的特征就在将这两种目标糅合为一。"①此外,陈立的博士论文《在感觉阈限上和智力活动中的起伏》以及《一套智力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A factor study of test battery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1948),是我国最早采用因素分析方法的研究。后者还证明了因素组成随年龄而简化,批评了他的业师斯皮尔曼能力二元理论中关于G因素(即一般能力)不变的论断。

九、社会心理学

1920年陶孟和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心理学课程,曾将演讲的稿子发表出来以供学生参考。② 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就一直受到我国心理学者如陈大齐、陈鹤琴、高觉敷、潘菽、张耀翔、陆志韦、萧孝嵘等的重视。相继翻译出版的社会心理学著作有法国黎朋(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群众心理》(1920)、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绪论》(上、下册,1923)、华莱士(Graham Wallas,1858—1932)的《社会心理之分析》(上、下册,1933)、法国巴朗德(Georges Toussaint Léon Palante,1862—1925)的《心理社会学》(1937)等。群众心理(即群体心理)方面,发表了《个人心理与群众心理》(徐彬彬,《新中国》,第1卷第12期,1919)、《群众心理之特征》(章锡

① 陈立. 工业心理学概观[M]//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357.
② 陶孟和. 社会心理学[J]. 北京大学日刊,1920:706,708,716,773.

琛,《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1921)、《群众的行为》(松山,《东方杂志》,第19卷第1期,1921)、《吕邦的"群众心理"》(胡汉民,《建设》,第1卷第1期,1919)、《洛士的群众心理》(谢承训,《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等文章。章益发表的《社会心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安徽教育》,第1卷第3期,1929)讨论了社会心理学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朱亦松发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两个途径》(《社会研究》,第1卷第1期,1935)讨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另外,张国桢发表的《社会心理学之演进及其派别》(《现代读物》,第3卷第2期,1938),介绍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和各个学派的情况。

张耀翔(1893—1964)是我国最早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他留美时(1919年)就在《留美学生季报》(第23号)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爱情衡》一文,将爱情的五个要素,即道义、才学、年貌、势力、财产予以分析和解释,并用积分法标明各要素的价值。此法虽不一定科学,但是开创了用心理学统计方法研究择偶心理的先河。他回国后,1922年在国内首次进行"民意测验",以"窥探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写就的论文发表在《民意测验》(第2卷第1号,1923)上。他还研究过不少社会心理学问题,如《国人之迷信》(《心理》,第2卷第2、3号,1923)、《商人心理浅测》(又名《北京商店之招牌》,《心理》,第3卷第4期,1925)。前者搜集了我国民间流传的迷信共685条,从中分析迷信的起源和中国旧社会的心理状态。后者是借店面的招牌探测当时国人的心理。高卓(觉敷)发表了《社会心理学概说》(《教育杂志》,第18卷第2、4、5期,1925),陈德荣发表了《取消社会心理学》(《民铎》,第7卷第3期,1926),认为本无社会的行为,因此主张取消社会心理学。

陆志韦于1924年编著《社会心理学新论》,这是我国学者评述社会心理学的第一部著作。他采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立场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承认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现象,无须有特殊方法,认为这只是对普通心理学里一个问题的分析。该书最后一章专论何谓社会心理学,他把各家的定义合录在一起,并与自己的界说加以比较。

潘菽著有《社会的心理基础》(1930)一书,该书共包括社会成立的心理基础、心理的人格及其发展、社会行为的性质和形式、社会的刺激、个人反应

的同化和异化、几种主要社会现象的心理的解释等六章内容。潘菽指出社会是个人交互影响的动力过程,了解社会必须先了解形成社会的个人的行为。他区分了从心理学观点了解社会的两种方法,即心理的解释和心理的分析。前者是要从人类所具有的特性去寻找社会成立和变迁的原因。后者以社会环境中的事实为对象,去找寻出这种行为的发生和改变的法则,以说明种种的社会现象。后者也是当时社会心理学领域出现的新趋势。所谓个人反应同化是指个人因社会影响而发出和他同样的一种反应,如暗示、模仿等。所谓异化是指个人的反应受社会的影响,但反应的形式却是一种特殊的或创造的,如发明、反感(受他人影响却未表现出所期望的反应,而是相反的反应)。潘菽还对社会组织、社会变迁以及文化等社会现象进行了心理学的分析。该书有着比较明显的社会学取向社会心理学的特点,反映着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基本状况。该书被收录于孙文主编的《社会学丛书》。

十、理论心理学与历史

在西方接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们,基本上都是借助实验研究走入心理学领域的,在他们回国之后不得不面对心理学学科基础薄弱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历史的探讨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的发力之处。其中,潘菽是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中国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他最为关注的是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并且一直在探索改革旧心理学和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途径。潘菽早期也是比较注重心理的实验研究,希望以此积累科学资料,促进心理学的发展。① 后来他逐渐感到,要通过这一途径来取得进展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潘菽发表了《心理学的过去与将来》(《学艺》,第 2 卷第 1 号,1927),文中除述评各心理学派之外,还展望了“将来心理学应走的路及其重要性”,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见解。

高觉敷(1896—1993),曾用名高卓,中国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他于 20 世纪 20 年代就开始将西方心理学理论和流派引介到中国,翻译的一系列

① 《潘菽全集》全集编委会. 潘菽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总序:2-3.

西方心理学重要著作有《儿童心理学新论》(考夫卡,1929)、《社会心理学》(扬琴巴尔,1930)、《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1933)、《情绪的实验研究》(华生、1934)、《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弗洛伊德,1935)、《格式塔心理学之片面观》(苛勒,1935)、《实验心理学史》(波林,1935)、《形势心理学原理》①(勒温,1944)。这一系列译著开拓了我国西方心理学史研究的领域。他对麦独孤、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精神分析等学派都有过评介与研究,著作甚丰,特别是他对精神分析学派有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他第一个将弗洛伊德的理论译为"精神分析",并逐渐被学界所接受。高觉敷在民国时期的西方心理学史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心理学名人传》(1933)、《现代心理学》(1935)等著作,以及《心理学的无政府主义》(1927)、《行为主义》(1930)、《主观的原子心理学》(1934)、《客观的原子心理学》(1934)、《拓扑心理学》(1937)、《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的批判》(1931)等论文中。

中国学者早期的西方心理学史论文还有张松年的《近代心理学》(《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陆志韦、吴定良合写的《心理学史》(《心理》,第1卷第1、4号,1922;第2卷第1号,1923),全文共分34节,评述了从柏拉图到20世纪初的美国心理学。郭任远的《心理学的史略及其最近的趋势》(《民铎》,第4卷第1号,1923)等。早期的西方心理学史专著有1922年陶孟和编译的《现代心理学》,1926年崔载阳的《近世六大家心理学》,1935年郃爽秋的《心理学的派别》以及1937年郭一岑的《现代心理学概观》。

中国学者较早地开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史和近代心理学发展史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有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学浅测》(《心理》,第1卷第4号,1922)、程俊英的《中国古代学者论人性之善恶》(《心理》,第1卷第3号,1922)、《汉魏时代之心理测验》(《心理》,第1卷第4号,1922)、金抟的《孟荀贾谊董仲舒之性说》(《新教育》,第4卷第1号,1922)、林昭音的《墨翟心理学之研究》(《民铎》,第4卷第3期,1923)、汪震的《戴震的心理学》(《晨报副刊》,1923)、《王阳明心理学》(《心理》,第3卷第3号,1924)、余家菊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心理》,第4卷第1号,1926)、万家淑的《关尹子之心理思想》(《师大教育丛刊》,第2卷第3期,1931)、

① 形势心理学即勒温的拓扑心理学。

张耀翔1940年在《学林》杂志第1辑上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

第四节　“中国心理学”与心理学中国化的早期实践

一、何谓“中国心理学”

何谓“中国心理学”？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仔细审视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这又成了一个问题。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心理学虽然属于中国心理学的一部分，但这仅仅是西方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已。20世纪上半叶大量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与研究的心理学也很难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只处于中国对西方心理学的学习阶段。张耀翔称：“‘中国心理学’可作两解：(一)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不拘理论或实验，苟非抄袭外国陈言或模仿他人实验者皆是；(二)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凡一切翻译及由外国文改编，略加议论者皆是。此二种中，自以前者较为可贵，惜不多见，除留学生数篇毕业论文(其中亦不尽为创作)与国内二三大胆作者若干篇‘怪题’研究之外，几无足述。”[①] 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值得注意，张耀翔看到当时(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无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果，有人仅以不足200字的篇幅描述为“此中国之心理学”的情况，遂撰写文章梳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表现出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力图彰显中国心理学取得的成绩的责任意识。

从心理学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之间存在交融与互动的边界，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西方传教士和心理学者在中国进行的心理学传播以及开展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中国早期留学生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心理学工作都是心理学国际传播过程中交融与互动的体现，均可以视为中国心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具有真正内涵的“中国心理学”，即中国人创造的心理学，应该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早期中国心理学者对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的探索；二是早期中国心理学者利用西方心理学的理

---

① 张耀翔. 从著述上观察晚近中国心理学之研究[J]. 图书评论，1933(1)：3-7.

论与研究方法开展的自主研究。这两者都是研究实践,而这些研究实践要仰仗中国早期心理学者产生建立和发展中国心理学的本土意识的出现,这种建立和发展中国心理学的本土意识在《心理》杂志的发刊词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华心理学会会员研究心理学是从三方面进行:一,昌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办这个杂志,是要报告他们三方面研究的结果给大家和后世看。""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这一点为中国早期心理学者提出了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乃至今日,它也是当代中国心理学者应努力的方向。

二、早期中国心理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探索

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后遇到的是中国文化,遇到的是生活在东方文化之下的中国人。古老而悠久的中国文化成为任何一个心理学者所不能忽视的研究对象。中国早期的心理学者很快就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那一代心理学者很少使用"心理学思想"一词,直接用"心理学",将之视为心理学研究。如余家菊的《荀子心理学》、汪震的《戴震的心理学》和《王阳明心理学》、无观的《墨子心理学》、林昭音的《墨翟心理学之研究》、金抟的《孟荀贾谊董仲舒诸子之性说》、程俊英的《中国古代学者论人性之善恶》和《汉魏时代之心理测验》、梁启超的《佛教心理学浅测》等,[①]另外还有徐益棠的《中国古代心理学》(《学灯》,第5卷第3册,1923)、徐剑缘的《荀子的心理学说》(《学灯》,第6卷第11册,1923)、陈登元的《荀子之心理学说》(《国学丛刊》,第2卷第2期,1924)、王荣会的《荀子心理学研究》(《学术世界》,第1卷第8期,1935)等。

景昌极于1922年发表了《中国心理学大纲》(此文未完待续,但未见发表的下文)一文,力图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他更为强调中国"固有"的心理学:"所谓中国心理学者,指中国固有之心理学而言,外来之佛教心理学等不与焉。"[②]可见,景昌极表现出的本土意识更为强烈。在汪震《王阳明心理学》一文中提出:"我们研究中国一家一家心理的目的,就是想造成

① 张耀翔.从著述上观察晚近中国心理学之研究[J].图书评论,1933(1):3-7.
② 景昌极.中国心理学大纲[J].学衡,1922(8):31-44.

一部有系统的中国心理学。我们的方法是把一家一家的心理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出来,然后放在一处作一番比较,考察其中因果的关系,进一步的方向,成功一部中国心理学史。"[①]他研究王阳明心理学所用的方法是将王阳明关于心灵方面的话一句一句地搜集出来,分为几类,再一类一类地归纳,找出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构造一个有系统的心理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将古代哲学家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直接看作是一种心理学,而且需要研究者进行建构,才可以形成系统化的心理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杨鸿烈于1924年发表了《自心理学观之〈人物志〉》一文,从"论人性差别之成因表现及其优劣"、"差别的人性适用于诸种事业上"、"观察性之方法及诸种困难与错误"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将《人物志》一书视为一部应用心理学的专著。刘劭则成为"中国空前的应用心理学家",他在中国心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人物志》一书较早地得到国内心理学者的关注,并将其界定为一部心理学的专著。同时,这部著作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于1937年被施瑞奥克(John Knight Shryock,1890—1963)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而且在英文心理学界得到了评介,刘劭甚至被施瑞奥克认为可以视为一个行为主义者。[②] 服真士女曾对《关尹子》中梦的心理进行过整理和分析,认为该书中的一些论述"剖析毫厘,丝丝入扣,虽没有科学的说明那样精透,但也可钦佩著者心理思想的深厚",并称该书"在中国心理学思想史里实在是算一部很重要的著作"。[③]

三、面向中国人生活文化与实践的心理学考察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固然以翻译和引介西方心理学为主,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和漠视中国早期心理学者本土意识的萌生,进而促进中国心理学的自主发展。[④] 中国心理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

---

① 汪震. 王阳明心理学[J]. 心理,1924(3).

② Garrison, K. C. (1939). 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 (Re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3): 501.

③ 服真士女. 一个古人对"梦的心理"的研究[J]. 新科学,1939(1/2): 67 - 74.

④ Blowers, G. H., Cheung, B. T., & Han, R. (2009). Emulation vs. indigenization in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psychology in Republica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hinese psychology journals (1922 - 193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45(1): 21 - 33.

进行文本性研究的同时，还从多个维度开展了面向中国人生活文化与实践的心理学考察和研究，为构建中国人的心理学或者说中国心理学做出了早期探索工作。在此对《心理》杂志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作初步分析以展示面向中国人生活文化的心理学考察和探索。

张耀翔曾开展过多项具有本土特色的心理学研究，他开展过一项《八卦研究》(心理，第1卷第2号)，以中国的八卦和阿拉伯数字为研究素材，用来测验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字的能力。张耀翔在这项研究中选择八卦为素材，是因为它最接近中国汉字的字形。在《癖》一文中，通过列举和分类中国古人的特殊嗜好，并结合当事者个人生活史的分析，认为患癖与生活经历、变态行为、不良生活习惯等存在着关联性。这是一项以文本资料开展的变态心理学研究。在《北京商店之招牌》一文中，张耀翔搜集了北平五千多商店招牌上所用的字，从中选择出使用最多的20个汉字，即"兴华和义成顺丰天聚同泰源祥盛恒昌大公裕隆"，反映出商家祷祝(如"泰"、"恒")、广告(如"大"、"丰")、躬行(如"兴"、"和"、"顺"、"恒"、"公"、"同")的心理。另外，陶德怡在《善恶字汇》一文中调查了《康熙字典》中形容善恶的汉字，并予以分类、比较，由此推测国民对于善恶的心理，以及国民道德的特色和缺点，并提出了改进国民道德的建议。显然这是沿承了高尔顿、奥尔波特的词汇学假设开展的研究，同时张耀翔还将这种研究赋予了对中国人生活实践的应用价值。他提出中国人道德的根本理想是动机主义和性善主义，民国道德的特点有注重私德，重视人品，对人恭敬有礼，为人谨慎和顺等，缺点方面包括评判过于注重动机、轻视女性、团体道德观念薄弱、对生物的道德观念较少等。这项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张耀翔还曾在《麻雀牌之注意价值》(《心理》，第3卷第4号)一文中展开对麻雀牌(麻将)的心理学价值的探讨，认为其能唤起人最耐久的注意与兴趣，可以给人以美术、理智、感觉的生活。罗志儒的《出名与命名的关系》一文对1 600多中国名人的名字进行等级评定，分析了名字笔画、意义、词性以及是否单双字与出名的关系。关于中国人才地域、年龄分布的研究也是早期中国心理学者的关注点之一，这一主题还吸引着非心理学者的关注，如《现代中国人物之地理教育与职业之分布》、《中国人才产生地》、《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就历史上研究名人之事业及其年龄》等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并不是单纯的文本分析,既有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料为研究素材开展的研究,也有利用现实生活的资料为素材,探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即使我们说这些仍属于模仿西方的研究,但是它们已经触及中国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探讨,隐含着早期心理学者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关注和探索,某种程度上也彰显着中国开展心理学研究对文化和历史给予重视的价值和意义。

迷信之风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颇为盛行。心理学者拿起心理学知识为武器对这些迷信现象展开了批评,相继发表了张耀翔的《国人之迷信》、李蠡栓的《算命迷信的理解》(《心理》,第 4 卷第 1 号)、萧树棠的《史籍迷信随笔》(《心理》,第 2 卷第 3 号)、愈之的《迷信与近代思想》(《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5 号)等文章。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心理学知识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的运用和实践。另外,心理学知识还被用于政治文化层面的实践,如民意测验。张耀翔于 1922 年在北京进行过一次有关总统选举的民意测验,并被很多人在各地纷纷仿效,如罗志儒发表过《"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第 2 卷第 2 号),开启了民意测验在中国的应用之路。面向教育的实践是当时中国早期心理学者开展工作最多的领域。如中国学生心理研究、心理(教育)测验研究,择业心理研究以及汉字横直读、识字、汉字错字辨识研究,等等。其中大部分研究固然带有"仿效"性质,但不能忽视这些仿效性研究背后是早期中国心理学者面向中国现实的实践精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经阶段。

从整体来看,中国早期心理学者开展的大部分研究是面向实践领域的研究,纯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与当时心理学实验室建设相对落后、设备不完备有紧密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到生活实践领域,利用可以运用的条件去开展相关研究。实验室建设相对较好的学校是开展纯粹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复旦大学郭任远主持的心理学实验室,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实验室,以其良好的实验条件取得过很好的心理学实验的研究成果,以郭任远在行为遗传学方面开展的系列研究为典型代表,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自省式考察

截至 1937 年,中国心理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

早期的心理学者开始不断地总结过去20年间发展的经验和不足,这是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一种自省式考察,为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参考框架。首先开展这项工作的是张耀翔。他先是发表了《四年来中国心理学》一文,介绍了1927年至1931年6月间国内心理学发表论文的著者、出处等基本信息,并提出了八点希望。张耀翔编辑出版了《心理学论文索引》,涵盖了67种刊物自创刊至1931年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汇集了文章的基本著述信息以及内容提要。其后又发表了《从著述上观察晚近中国心理学之研究》,分析对象包括书籍和论文。从134种书籍上来看,1922—1926年是当时心理学发展的兴盛时期,每年都有10部以上的心理学著作出版。所有书籍中教科书的比重最大,达到83%,专著只有23部,这其中又仅有8部是国人撰写的专著,其余皆为翻译的著作。这是当时心理学者"重推广而不精深"的真实写照,也反映着心理学者热心教育的实践精神。从论文发表的情况来看,张耀翔划分了1917—1921年(平均每月发表2篇)、1922—1926年(平均每月发表7篇)、1927—1931年(平均每月发表5篇)三个阶段,其中1922—1926年间是论文发表的兴盛时期,一方面由于当时专业期刊《心理》的刊行,促进了心理学论文的发表,另一方面也与心理学书籍出版的兴盛时期相吻合,反映着心理学在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处于比较迅猛的阶段。张耀翔共搜集了851篇文章,作者人数为431位,其中女性约10人,其中有些作者是当时对心理学十分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如王国维、胡小石、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张耀翔还总结了中国心理学发展中的三次论战,即心灵论战、本能论战、测验论战,[①]反映出当时中国心理学者活跃在心理学大发展的舞台上。

继张耀翔之后,张德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先是编辑出版了《心理学论文引得》一书,汇总了国内学界自1930年7月至1934年6月发表的心理学论文,以此为基础发表了《从近四年杂志论文上观察中国心理学的趋势》一文。张德培发现,在这四年间平均每月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数量达到20篇,比张耀翔分析的三个阶段月均发表论文数量都要高,因此可以视为第四个阶段。其研究结论是各种类型论文的数量依次为编著最多,翻译、创作、报告(测验、实验、调查)依次渐少,批评的最少。其中以教育心理学论文为最

① 张耀翔.从著述上观察晚近中国心理学之研究[J].图书评论,1933(1):3-7.

多，当时刊载心理学论文的刊物以《中华教育界》为最多，可见在当时心理学专业期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教育类刊物承担起了心理学论文发表的重任。张德培指出，中国心理学者缺乏深刻的研究，没有长期的实验，批评性文章较少等弊端，提出了六点希望：希望国家多设立心理学的独立机构，以便心理学者能够从事专门的研究；多出专业性期刊；多开展实验工作；早日统一术语名词；多开展应用方面的研究，将心理学应用到各项社会事业中去；引介美国心理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对欧洲各国心理学的介绍。①

五、中国心理学发展道路的选择

在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心理学中国化的思想表现为如何在中国建立符合自己文化传统与本国国情的心理学体系的观点。我国早期一些心理学家在这个领域的探索和开拓是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

关于中国心理学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在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曾有过一次激烈的讨论，由汪敬熙首先发表文章《中国心理学的将来》提出问题，并进行探讨，随后潘菽、周先庚等人相继参与辩论。汪敬熙认为，中国心理学有两条路走不通，一是教育心理学家的测验，二是专门研究动物，即白鼠走迷津。他认为可走的两条路可分为理论和应用的，即胚胎行为研究和工业心理学。他还提出理论研究有两条有希望的道路：一是利用动物生态学的方法或实验研究方法去详细地记载人或其他动物一生行为的发展，这是心理学必需的基础；二是利用生理学知识和方法去做行为的实验分析。② 汪敬熙的研究思想及成果对我国心理学的生理基础领域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潘菽则认为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教育心理测验和动物研究，完全抹杀这些领域的研究价值，会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③ 潘菽在《心理学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曾提出了“将来心理学应走的路及其重要性”，认为将来的心理学应该有独立的观点和方法；将来心理学不应该有什么主义，所由的观点和所用的方法应该随时随地而适应，研究者不能局限于

① 张德培.从近四年杂志论文上观察中国心理学的趋势[J].师大月刊，1934(16)：135－145.

② 汪敬熙.中国心理学的将来[J].独立评论，1933(40)：13－16.汪敬熙.答潘菽先生“关于心理学的预言”[J].独立评论，1933(49)：17－18.

③ 潘菽.关于心理学的预言[J].独立评论，1933(46)：10－13.

某一种观点;将来的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种种现象的基本原理,心理学应该成为最基本的科学,在各种科学中应该处于较高的位置。[①] 这篇文章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幅心理学发展的远大前景。心理学历史上的学术辩论,其意义在于各自申明立场和观点,从而推动已有领域的深化以及新研究领域的拓展,这次学术辩论对于当时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意义。

潘菽是较早意识到心理学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的心理学家之一。1927 年潘菽在美国学习心理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一直从事心理学的教学、研究与组织领导工作。为改变当时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存在脱离中国国情的毛病,他大力主张结合中国国情来研究心理学,并逐渐形成心理学中国化的思想,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和《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两篇文章中。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一文中,潘菽提出:"我们所要讲的心理学,不能把它当作一种超然的东西,不能把它和实际社会脱离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德国的或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心理学尽量搬了来就算完事。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该如此。"只有"研究中国所有的实际问题,然后才能有贡献于社会,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应用心理学在中国发达起来……我们以后应该提倡应用的研究,但提倡的并不是欧美现有的应用心理学,而是中国实际所需要的应用心理学"。[②] 在《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中,潘菽从"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叫作中国化"、"如何中国化"、"对于旧学术怎么办"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学术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他所提的是学术中国化,但对于心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同样也是适用的。在探讨"如何中国化"中,潘菽提出要透彻地吸收各种学术;要注意实际问题,植根于实际问题的学术才会有生命力;要推进理论研究;勿以立异为高以及留学政策、著作奖励等方面政策的设置与实施。[③] 另外,潘菽也提出了"对于旧学术怎样办"的问题,他认为把旧的变成新的是最合理最妥当的办法,因为旧的学术里也有很多可贵的成分。所以,一方面要努力于西方学术的中国化,同时把中国旧的学术提高成新学术,这是最正确

① 潘菽.心理学的过去和将来[J].学艺,1928(1):4-26.
② 潘菽.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J].心理半年刊,1937,4(1).
③ 潘菽.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J].读书月报,1939(3):111-118.

的方法。

如前所述,中国早期心理学家较早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学思想的价值,并致力于将其提升为新学术思想。在这个方面,张耀翔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一方面,他在自己创办并任主编的《心理》杂志上发表了几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后来的此类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发表了文章《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这是一篇系统阐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内容及其价值的开山之作。《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的主要思想观点和贡献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该文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整体面貌作了一个较贴近其本来面目的评价。张耀翔从中国"心理"二字的出现,谈到西方心理学的引入,并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深入的阐发。张耀翔说:"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习,且极注重应用。他们称这种研究为'性理'为'心学'。"第二,该文简要勾勒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演变的人物线索以及近代心理学输入中国的发展线索和特征。他从周朝老子、孟子、荀子等,到汉代董仲舒、王充,再到唐宋明清的一些思想家,简要概括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演变。同时张耀翔还就自清末兴办新教育以后,西方心理学输入中国的历史资料和发展轨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他就当时久负盛名的《科学》杂志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数量很少的现实,提出"心理学难道不是科学的一门么"的质疑。第三,张耀翔提出了发展中国心理学的九条建议。在第一条中张耀翔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发扬中国固有心理学,尤指处世心理学,斯对世界斯学有所贡献"。其他各条分别涉及设置心理学教学及研究机构、编纂心理学辞书、鼓励心理学实验研究以及研制心理学仪器、设置心理学留学生名额、译介西方心理学名著、鼓励心理学的创作和专题研究、创办分科心理学杂志以及大力提倡应用心理学研究,满足社会需要。① 张耀翔的论述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张耀翔的这篇文章固然存在某些史实资料的失误和个人学术视角的偏差,但是它的学术价值至今仍不容忽视。

---

①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J].教育心理研究,1940(3):16-31.

第六章 抗战时期的中国心理学
(1937—1945)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心理学事业遭受到了全面的破坏，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心理学系在内迁的过程中，正常的科研和教学难以为继，这些都成为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难以抹去的记忆，使得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跌入了低谷。但是，中国心理学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停步不前，而是在困境中筚路蓝缕，艰难地前进着。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心理学研究机构及刊物

一、心理学研究机构

（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于8月迁往长沙，10月迁至衡山南岳。1937年底，又由南岳经桂林迁往阳朔。1938年广州、汉口相继沦陷，12月心理研究所又经柳州迁往三江县丹洲乡。1940年在桂林南20里的雁山村，心理研究所与广西桂林科学实验馆合建一楼，于4月全所由丹洲乡迁入。1940年冬，又新建图书室和外科手术室各一间，至此才稍稍恢复了科研工作。1941年春心理研究所曾借予西南联合大学的书籍、杂志自昆明运回，放置于新图书室。抗战开始后的头三年间，心理研究所大部分时间都在迁徙途中，各方面的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944年夏天，日军入侵湘桂，心理研究所再次搬迁，先由雁山迁到八步

的西湾,很快又回到桂林,沿着湘桂、黔桂铁路线迁往贵阳。心理研究所大部分书籍及仪器在此次迁移中遭到炮火而损失。1944年冬天,研究所又迁至重庆北碚。1945年1月,心理研究所改称心理学研究所,1945年夏天借得教育部前实验剧队故址的楼房为所址。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9月心理学研究所迁至上海,并开始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二) 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

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成立于1940年11月,所址设在重庆北碚,郭任远任所长,聘童第周、沈霁春为研究员。该所原为教育部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合办,后来因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经济困难中途停止经济补助,同时因为该所不是国立机构,教育部每年只能以补助的名义给该所拨付经费。该所成立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所长郭任远正在英美讲学,为了便于在国外物色研究人员并在美国开展研究,于是在国内只保留一个办事处,工作中心以及设备都在美国。该所在美国购置了数百册的图书以及各种与心理学和生理学有关的杂志40多种,同时在美国还购买了价值4万美金的仪器,在印度购买了7 000多卢比的器具。在美国的研究人员还有沈诗章、夏云、刘燕平,他们均曾以该所的名义发表学术论文。因为国内研究条件不足,致使研究工作未能充分开展。1946年应聘到该所的胡寄南,曾着手准备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①] 郭任远在国外讲学期间,曾由吴南轩代理主任至1946年底。当年郭任远移居香港,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也就停止运行了。

二、大学心理学系

(一) 西南联合大学心理学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将相近的专业进行了合并,其中哲学专业和心理学专业的师生合并为哲学心理学系,系主任为汤用彤,内设哲学组和心理组。心理组均为原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其中孙国华曾断续在

① 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概况,1946年11月(无出版者信息)。

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国立译书局工作。心理组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周先庚主持，任课教师还有陈汉标(后赴美)、敦福堂、曹日昌。一些课程不得不由师范教育系的教授来兼任，如普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由樊际昌兼任，应用心理学、心理测验由倪中方兼任，儿童心理学由陈雪屏兼任。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自1943年之后恢复了理科研究院的心理学部，并招收研究生，周先庚任主任。招录的研究生有1942年度的美国人皮克(A. J. Peeke)，1943年度的彭瑞祥、王启文，1944年度的张世富、朱宝光、范祖珠，1945年度的倪连生，[①]但是最终能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学生并不多。皮克系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系1940年的毕业生，参加了美国空军部队来华，但是因为视力不适合飞行员工作，同时又不想抛弃心理学专业，故赴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就读心理学研究生，并办理了正式入学手续，经过了教务长潘光旦和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批准。但因当时心理学研究部并未正式招生，皮克只能以特别研究生名义在读。因皮克是半工半读的性质，再加上课业较难，皮克就读半年后就退学了。[②]

心理组自1938年秋开始招本科生，一部分生源是因其他大学内迁(如北平师范大学)而肄业的学生，一部分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未完成学业的学生。前者属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后者仍属于清华大学学生。当时每年招录的学生很少，基本上是学生人数比教师的人数还少。

表6-1　西南联合大学心理组毕业生及毕业论文情况[③]

序号	年级	姓　名	论文性质	毕　业　论　文
1	1939	王洪藩	研究	《错觉之例释》
2	1939	林宗基	研究	《动物心理研究论文之统计》
3	1940	李家治	实验	*Dark-adaptation of the gold-fish*(《金鱼之黑暗适应》)
4	1940	田汝康	实验	*The ability to judge sex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handwriting*(《从汉文和英文笔迹评判男女性别的能力》)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520-535.

② 资料来源：周先庚个人档案资料。

③ 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资料整理而成。

(续表)

序号	年级	姓　名	论文性质	毕　业　论　文
5	1941	戴寅		该年度免作论文
6	1941	刘钊		同上
7	1941	舒子宽		同上
8	1941	关梦非		同上
9	1942	倪佩兰	研究	《颜色嗜好的研究》
10	1942	杨嘉禾	翻译	《三百天才早年之心理特性》(C. M. Cox, *Early mental traits of three hundred genius*, 1926)
11	1942	毛韵笙	翻译	《评判各人性格》(C. M. Cox, *Early mental traits of three hundred genius*, *Character Rating*, 1926)
12	1943	马德华	翻译	《心理冲突的性质》(A. R. Lewin, *The nature of human conflict*, 1932)
13	1943	彭瑞祥	翻译	《说谎侦察测验》(W. M. Marston, *The lie detector test*)
14	1943	马启伟	研究	*Sensitivement*(《敏感论》)
15	1943	王启文	统计	《汉字俗字之心理的分析》
16	1943	曾本准	研究	《神经过敏者》
17	1943	张精一	翻译	《桑代克对于学习心理学的贡献：效应律》(R. T. Rock, *Thorndike's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1940)
18	1944	张世富	研究	《工厂建议制度》
19	1944	陈世则	翻译	《如何解决个人问题》(*Solving personal problem*)
20	1944	敖淑秀	翻译	《儿童的社会化》(P. Blanchard, *The child and society*, 1928)
21	1944	刘伯英	研究	《工业心理浅说》
22	1944	刘民婉	翻译	《军人心理》(*Psychology for the fighting man*, 1943)
23	1944	孙际良	研究	《军官心理测验》
24	1944	李宗蕖	研究	《神话与精神生活》
25	1945	蔡孔德	翻译	《人格的内在表现》(Murray,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of personality*)
26	1946	魏鋹	实验	《想象测验》(Murray,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的心理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对心理学保持着较高的学术追求，尝试开展学术研究，建立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见图 6－1)①，共设有五间实验室，同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个心理学会，维系

① 目前云南师范大学唯一保留下来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舍遗址即为当年心理学系心理学实验使用过的房间。

着师生们对心理学的热情。实验室的建立反映了当时以周先庚为代表的教师们对心理学自然科学性质的认同,同时也对当时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和训练突出了科学倾向性,这对他们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该心理学实验室不仅供本系学生使用,而且还曾供其他学校心理学专业学生参观学习,增进了学生对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理解。如1943年秋周先庚曾执教当时昆明昆华师范学生的教育心理学,他于当年12月10日带领该校三十七班、三十八班的学生参观了该实验室,学生们被多件实验仪器吸引,深刻理解了做教师应该以科学的方法去了解学生心理的重要性。① 1942年度心理学会共有周先庚、敦福堂、曹日昌、郑丕留4位教师,李家治、倪佩兰2名毕业生以及19名本科生参加。心理学会召开一些座谈会或演讲会,邀请一些老师进行演讲,如樊际昌曾经进行过一场"思想与言论方面的心理问题"为主题的演讲。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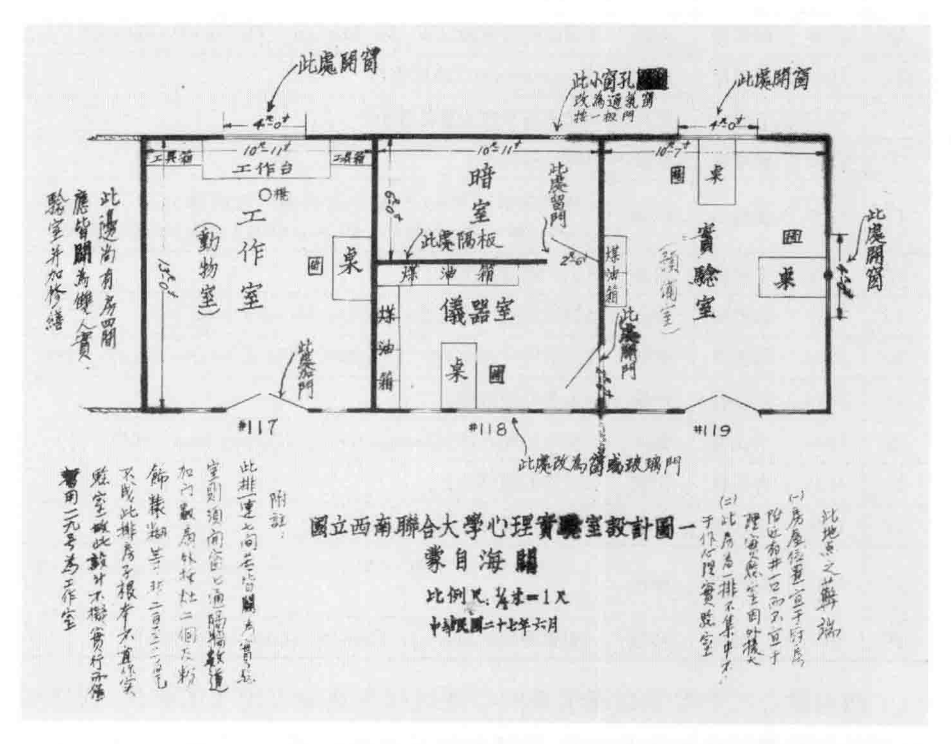


图6-1 周先庚手绘西南联合大学心理学实验室设计图

(资料来源:周先庚个人档案资料,周广业提供并授权使用)

① 周先庚,撰. 联大心理实验室参观后记(手稿),1944-8-21.

②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资料。

(二) 中央大学心理学系

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自1921年创立,历经坎坷,成为国内少有的心理学系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迁至重庆。当时许多大学的心理学系纷纷停办或并入其他院系,而独立成系且维持正常教学和科研的差不多只剩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了。

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为萧孝嵘,其他任课教师有潘菽、艾伟、王书林、吴南轩、郑大源。每个学期都开设10门左右的课程,其中基础课程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统计学、心理与教育测量等,还有心理生理学、军事心理学、学科心理学、异常儿童心理学、心理卫生原理、审美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儿童及青年心理、学习心理学、国语阅读心理学、英语阅读心理学、心理学问题等偏应用性课程。[①] 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还继续致力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主要包括军警心理学研究,大、中、小学生心理学研究、实业心理学研究、变态心理学研究、学习心理学研究、纯粹(基础)心理学研究、发展心理学研究及其他研究,截至1942年已经完成及正在进行的研究有83项之多,可谓收获颇丰。[②]

1939年中央大学还创立教育心理研究所,艾伟任所长。他还招收研究生,开办教育心理实验班进行实验研究。1940年教育学院改组,心理学系隶属理学院。

(三) 金陵大学哲学心理学系

1937年金陵大学迁至成都华西坝,蔡乐生兼任文学院哲学系主任。金陵大学于1940年成立了哲学心理学系,[③]蔡乐生任系主任,至1942年哲学心理学系有教授3人,副教授1人,学生20多名。为了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该系除了开设必修课程,还特设有军事心理、应用心理等选修课。心理学课程在当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外院、外校学生选课的人数众多。美国著名杂志《心理学摘要》主编亨特(Walter Samuel Hunter,1889—1954)还邀请蔡乐生出任助理编辑。蔡乐生此时开展的工作有两项,其一是扫除文盲的具体方案,另一项是航空心理的研究。1941年蔡乐生出任教育部成立的成

① 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历年课程表[J].教育心理研究,1941(3):100.
②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工作[J].教育研究,1942(108):86-88.
③ 蔡乐生.一个学心理学者的自叙[J].心理季刊,1937(1):135-143.

都区学术演讲会的主任。

三、心理学刊物

(一)《教育心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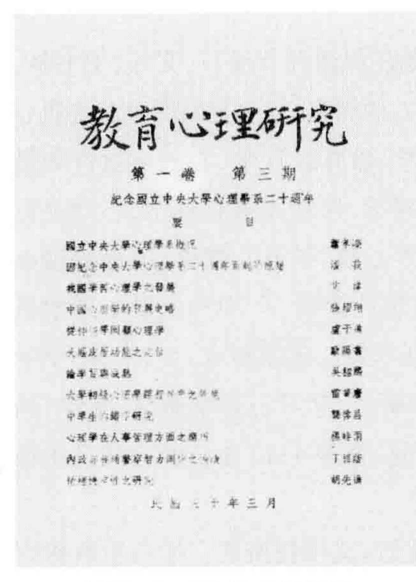


图 6-2 《教育心理研究》

《教育心理研究》(见图 6-2)于1940年3月在重庆创刊,由中央大学研究院师范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编辑,艾伟任主编。这是一份"阐发教育心理学学术报告实验研究结果,并讨论教学上之一切问题及科学方法为宗旨"的刊物。此刊除发表心理学论文外,还发表教育学、生理学、神经学、统计学等方面的论文。1945年6月之后该刊停刊,共出版了三卷十期,发表了92篇文章。该刊创办之初的两期,刊有少量的翻译作品,自第三期开始就很少使用翻译文章,这也反映了当时作为创办者艾伟乃至教育心理学界的学者开始自觉地致力于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该刊在抗战时期,由于物资匮乏,印刷资费颇为拮据,但是艾伟克服种种困难继续维持刊行杂志,而且还另外刊行了四期的英文简篇,分别寄往英美各国用于换取英文学术刊物,以解决当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考资料匮乏的困难。虽然因当时通讯不畅而未能获得大量的交换期刊,但还是获得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教育系主任汤姆森(Godfrey Hilton Thomson,1881—1955)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普莱西(Sidney Leavitt Pressey,1888—1979)教授、《咨询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杂志编辑西蒙兹(J. P. Symonds)女士等的回信,他们认为在世界大战的氛围下,在几乎不可能的状况中竟然刊行了一份教育心理学杂志,让人不得不表示敬佩。①

抗战结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刊难以为继。艾伟在得到《教育杂志》

① 艾伟. 写作教育心理研究专辑之前[J]. 教育杂志,1948(4):1-2.

帮助的情况下,于1948年4月刊行了一期《教育心理研究专辑》,发表了多篇教育心理方面的学术论文。

(二)《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自1942年11月创刊至1943年10月,共出版1卷5期,40篇文章。该刊并不是专门的心理学学术刊物,而是当时"中国心理建设学会"的会刊,它以宣传和发扬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为宗旨,以研究"力行精神"和"民族气节"为重点。该杂志反映了我国抗战期间心理学与政治形态相结合的状况。该刊刊发了很多关于中华民族和民族气节方面的文章,亦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含义予以阐述的文章,如宁建功的《儒家心理学说史略》,其写作"一是建立心理建设之哲学基础,二是整理儒家哲学史,其目的在于求民族心理之建设,民族道德之发扬"。①

四、心理学研究中的抗日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国心理学者致力于心理学应用性研究,如军事心理学。当时也有少量纯学术性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依然站在心理学的前沿上,探索着未知的心理学知识。在这些心理学基础研究中,也仍然渗透着抗日精神,反映出当时心理学研究的时代特色。田汝康关于笔迹心理学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

1940年7月,田汝康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并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其毕业论文是在周先庚指导下完成的一项实验研究,题目为*The ability to judge sex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handwriting*(从汉文和英文笔迹评判男女性别的能力)。该论文讨论到,自从国外关于笔迹的理论提出之后,相继很多研究探索有哪些笔迹特征可以区分出来,例如笔迹与诚实是否有关联,但是后来也出现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田汝康则选择了笔迹书写者性别的判别为研究主题,并评述了当时西方心理学界多项以英文笔迹判断性别的实证性研究。田汝康选择了男女大学生各12名,分别用毛笔、钢笔、铅笔书写了12个汉字的一句话,另外还让一些大学生用钢笔书写了一句英文,总共96句中英文的句子,分成四组作为实验材料,让150名

① 宁建功.儒家心理学说史略[J].心理建设,1943(5):34-39.

(男、女生各半)被试对这些材料书写者的性别进行判断。其结果发现,男生、女生所做的书写者性别的判断在正确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男生的判断正确率仅比女生好那么一点点。田汝康还发现,英文笔迹的性别判断的正确率要高于对汉字笔迹的判断,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写汉字爱模仿书法家,从而导致汉字笔迹的性别判断不容易准确,而英文书写中不存在模仿书法作品笔迹的情况。由此文可以看出,田汝康在周先庚的指导下受到了严格的心理学训练。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开展这项研究的时候,田汝康并没有忘记身边抗战的硝烟,他给被试提供的12个汉字的书写材料为"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①]这是浸透着抗战热情的纯学术研究!在该手稿正式封面上的英文标题后面列有一个罗马数字"Ⅰ",显然,田汝康在当时有可能计划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第二节 心理学在军事与人事领域的发展

一、周先庚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与思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全民抗战,周先庚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战争。周先庚1925年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选择心理学专业之后,师从迈尔斯。迈尔斯作为心理学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心理学研究工作,将心理学应用于军事。例如:他参与研究过防毒面具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问题,其研究结果影响了后来防毒面具的模式;参与研究过空军飞行员的能力倾向;研究过士兵处于长期营养不良状态下身心机能的变化与恢复问题。周先庚先后于1928年、1930年在迈尔斯指导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周先庚追随迈尔斯的学习经历,为其后来在军事心理学领域做出开创性工作起到了两方面作用:其一是当军事上出现对心理学的需求时,周先庚会积极地响应;其二是周先庚接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训练,

① You-Kang Tien. *The ability to judge sex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handwriting*. 档案号1RW0192002-0190,北京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7盒;田汝康的英文名字亦拼作Ru-Kong Tien。

为其后来参与和开展军事心理学工作在方法与技术上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时期军官心理测验所的筹办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筹办了军官心理测验所。当时国民革命军将领邱清泉任该军军长。邱清泉,字雨庵,1922年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1934年公派赴德国留学,先后在工兵专门学校和柏林大学受训;1937年回国后担任教育总队参谋长;1943年初任第五军军长。军官心理测验所的筹办应该归功于邱清泉首先提出这一想法,然后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邀请周先庚赴军中考察并着手筹办军官心理测验所。邱清泉产生创办军官心理测验所的想法受益于他在德国的留学经历。周先庚称邱清泉曾于1936年亲自参观过柏林陆军中央心理实验所。[①] 可以说,邱清泉对德国军事心理学的了解对其萌生创办军官心理测验所的想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时期,周先庚担任哲学心理学系心理组的行政负责人。1943年冬,应邱清泉的邀请,他亲自赴军中考察军事心理问题,并为之筹划创办军官心理测验所。[②]邱清泉在昆明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我国军官学校及部队对军官的要求,仅依其学术品行能力等等,作一般之品定,而对心理之要求缺乏科学上的测验方法,致许多军官心理上缺憾特多,影响于治军作战者实甚大。”“英美德法各国之选拔军官,必先要求心理上之健全条件,此乃要求其学术科,各军管区皆设有军官心理测验所,每当选拔干部,皆先就其测验,以为取舍之标准焉。”继提出中国军官心理测验这一想法之后,邱清泉又提出了军官心理测验的内容、方法,以及指导官应注意的事项。[③] 周先庚随后谋划了军官心理测验所的草案。1944年,周先庚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邱清泉的做法,认为他提出的军官心理测验规划大纲是熔学识和经验于一炉的产物,邱清泉作为第一个在军队中倡导心理测验的实际行动家,军官心理测验大纲的实施,将会开启心理学在中国应用的新纪元。周先庚还认为,邱清泉所提的对中国军官气魄、性格、同情心、生命力的测验内容,体现着中国人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心理测验很符合中国人的习

①② 伏生. 军官心理测验之商榷[N]. 扫荡报(昆明),1944-3-13,20. 伏生系周先庚的别名。
③ 雨庵. 军官心理测验之研究[N]. 扫荡报(昆明),1943-11-19,20,21. 雨庵系邱清泉的字号。

惯。同时,邱清泉倡导采用行为观察法的心理测验,非"纸上谈兵"(纸笔测验)的方法,这将是中国军官心理测验的佳音。[①]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个有开展军官心理测验设想的军人同一个具有开展军官心理测验专业能力的心理学家走到了一起,军官心理测验的工作具有了可能性。

(二)军官心理测验所设计草案

周先庚受邀开展军官心理测验之后,随即着手设计军官心理测验所的草案,现根据周先庚遗留下来的文字性材料,将"军官心理测验所"的筹备试办草案简要呈现如下:

军官心理测验所的名称,在军本部称之为"心理实验所",在师、团、营本部称之为"心理实验室",而临时性的活动卡车板室被称为"心理测验站"。由此可见,心理测验所在整个第五军内将是系统性的设立。设置地点的要求是最好在城内或近郊处军师团营本部的办公室内。房舍大致需要 18 至 20 间,其周围环境应安静适中。在设备各方面还涉及电力、家具、仪器、卷册、实验材料消耗品等诸多方面。整个过程分为试办期和推广期。其中试办期分为七个阶段:第一阶段,1943 年 12 月 19—21 日,赴杨林视察;第二阶段,12 月 22—25 日,计划草案;第三阶段,12 月 26—31 日,视察选定测验所的地址;第四阶段,1944 年 1 月 1—17 日,修缮布置测验所;第五阶段,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按照邱清泉在其《军官心理测验之研究》一文中的设计方案实施军官心理测验,第六阶段,2 月 22 日至 6 月 19 日,继续测验,整理上期结果,充实设备;第七阶段,6 月 20 日至 9 月,继续测验,同时报告示范,并研究前几期实施得失拟定扩充方案。推广期为第八阶段,1944 年 9 月起,略作宣传推广工作以引起各方的注意。[②]

周先庚在筹办军官心理测验所之初就作出了这样长期的规划,可见他对这项军事心理学工作的重视以及精心谋划的程度,而且他在一封信中也写道:"今晚双方仍有意举办(测验所),庚自当竭尽力量筹办之,必定有始有终。"[③] 事实表明,周先庚在军官心理测验所这项工作上确实做到了有始有终。

---

① 伏生. 军官心理测验之商榷[N]. 扫荡报(昆明),1944-3-13,20.

② 以上资料见"第五军'心理实验所'筹备试办草案·(简本)原稿",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 1111 盒第 2 号。

③ 周先庚 1943 年 12 月 31 日"致梅校长信函"。见: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 1111 盒第 3 号。该档案题签为"致汪校长信函",经考证应为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函。

军官心理测验所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官心理测验工作,选拔出优秀(模范)军官。周先庚认为,邱清泉拟定的军官心理品质是邱清泉作为军事将领根据自身经验提出的结果。既然是专门测验中国优秀军官应具备的品质,那么其理论根据必然与欧美军事家拟定品质的理论不同。至于东西方军队组织如何不同,为何需要不同性质的军官心理品质,这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隐含着周先庚提出的军官心理测验应契合不同文化的理论问题。军官心理测验工作设置为两种形式,即先施行纸笔或团体测验,然后选择每种心理品质处于两极端(好或差)的军官进一步实施个别测验。这要涉及纸笔与团体测验工具和个别测验工具的编制。从心理测量学的意义上讲,周先庚还讨论了军官心理测验内容的选取和测验信度的问题,其具体评判方法是图示估量法和评判量表。周先庚甚至还设想了在实验室内使用的自动测验机,其设计思想与今天在计算机上呈现心理测验的过程几乎没有差异。自动测验机具有易引起受测者的兴趣、快捷方便、测验结果反馈及时等优点。周先庚拟定的工作纲要涉及编制测验问卷和量表、设计测验机器和挂图,同时提出要编印宣传册子分发给军官,以及请政治部出墙报加以宣传。[①]

1943年末至1945年3、4月份,周先庚都是在与邱清泉商讨着搞陆军方面的军官心理测验。这一时期,军官心理测验所基本上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心理测验活动。这可能与滇西缅北战役爆发有关,因为1944年8月至1945年初邱清泉率部参加了这一场战役,自然他当时无暇顾及具体实施军官心理测验的活动。

(三)伞兵选拔工作

1945年,美国华盛顿收到一封电报,请求为中国一项士兵选拔工作派驻测验人员。该项目计划在中国部队里成立一支伞兵突击队,选拔出几千人并由盟军的战略服务局[②](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负责训练,然后将伞兵突击队投放到日本侵略者防线的后方进行战斗或情报工作。这支伞兵突击队将由中国军官领导,由美国盟军做顾问。主题统觉测验

① 以上资料见"第五军'心理实验所'筹备试办草案·工作纲要",清华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1盒第2号。

② "二战"期间的战略服务局,是针对招募、培训从事特殊、秘密任务(卧底、翻译、发报员等)的人员成立的,一批心理学家参与到战略服务局测评(OSS Assessment)项目,开发和利用各种方法技术为军方选拔、培训特殊人才。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简称 TAT)技术主要贡献者,美国心理学家莫里(Henry Alexander Murray,1893—1988,今译默里)1943—1948 年任职于"战略服务局",到中国领导和主持了伞兵选拔工作。[①] 另一名美国测验人员是精神病学家莱曼,他曾在巴甫洛夫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莱曼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任职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脑系科,曾聘请周先庚为名誉讲师到脑系科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美国的测验职员招募工作随即展开,两名符合条件的华裔学者参加了进来,他们分别是戴秉衡和罗伯特·陈(即陈郁立,1918—1990),[②]另外两名美国人戴尼奥(A. P. Daignault)和赫德森(B. B. Hudson)也参加了这项工作。[③] 戴秉衡曾受邀加入莱曼在协和医学院主掌的脑系科。抗日战争爆发后莱曼回国,戴秉衡也一同赴美。[④] 在协和医学院与莱曼一起工作过的几位心理学者戴秉衡、丁瓒、赵婉和等后来成为伞兵选拔测验工作的主要成员。

1945 年 3 月,莱曼自印度给周先庚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与莫里合作为中国国民革命军中选拔伞兵。[⑤]周先庚认为借助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等方法选拔伞兵入伍,这是学术应用的好机会,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就答应带领自己的学生参加这项选拔工作,并担任测验小组的中方负责人。4 月的一天,莫里、莱曼和戴秉衡一行三人亲自到周先庚的住所进行拜访。4 月底,周先庚在他们的带领下到美军位于昆明市郊的驻地填表签订了临时合同,为期三个月,即 5、6、7 月。这属于当时空军方面的第五期伞兵入伍选拔测验。[⑥]

自 5 月份开始,周先庚同莫里等人开始了伞兵选拔工作。周先庚带领的人员多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心理组的同事、研究生或毕业生,如曹日昌、田汝康、范准、马启伟等人。另外还有来自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的丁瓒和赵婉和,后者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1934 年的毕业生(见图 6 - 3)。伞兵选拔测验包括个人生活史、社会关系和心理卫生方面的访谈,以及知觉认识

---

① Henry A. Murray (1967). In E. G. Boring & G. Lindzey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5, pp. 283 - 310).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Crofts.

② 罗伯特·陈,华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中文名字为陈郁立。出生于美国,并在美国接受教育完成学业。1943 年任职于盟军战略服务局。1979 年之后,曾与妻子华裔社会学家沈爱丽(Ai-Li Sung Chin)一起多次访问中国。

③ The OSS Assessment Staff (1948). *Assessment of Man: Selection of Personnel fo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pp. v - vii.

④⑤ 周先庚,撰. 关于伞兵选拔测验的国际、社会关系的初步回忆和认识(手稿). 1968 - 1 - 17,21.

⑥ 周先庚,撰. 参加 OSS 伞兵测验的经过与初步认识(手稿). 1968 - 2 - 19.



图 6-3 莫里、周先庚领导的伞兵选拔测评小组成员合影

右一莫里，右二莱曼，右三周先庚，右四卢濬，右五赵婉和，右八马启伟，右九傅愫斐，右十一田汝康，右十三罗伯特·陈；此照片拍摄者为戴秉衡

（资料来源：戴秉衡的女儿戴美玲提供，取自其母亲 Vivian Dai 的个人藏品；本处经授权使用）

能力和室外活动作业的测查。赫德森博士负责材料整理和统计工作。有时候全体测验人员进行讨论，并最后对每位受选者的智力、受教育程度、情绪稳定性作出鉴定。当时测验伞兵采用的重要技术之一就是莫里的主题统觉测验。莫里使用了他的 30 张主题统觉测验图片，另外，为了适合对中国人进行测试，特从中国报刊上选取了 10 张图片作为测验材料。[①] 由此可见，莫里在中国开展主题统觉测验充分注意到跨文化的效度问题。整个评估程序包括信号阅读(sign reading)，受教育水平测试(数学、写作、普通信息)、抽象智力、观察与记忆(设计、查找、知觉敏度)、群体行动测试(筑桥、传送旗杆、过沟壑)、障碍项目、访谈、整体印象。最后对被测者受教育水平、有效智力、观察与记忆、动机、社会关系、情绪稳定性、领导品质、体能等方面按照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评定。[②] 这次测验工作的实施都是在美国盟军资助下完成

---

① 周先庚，撰．参加 OSS 伞兵测验的经过与初步认识(手稿)．1968-2-19.

② The OSS Assessment Staff (1948). *Assessment of Man: Selection of Personnel fo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pp. 376-382.

的，同时也是主题统觉测验创始人莫里在中国本土上唯一一次实践性应用其技术的情况。另外，莫里等人作为美国盟军的测验小组在中国当时有昆明和西安两个工作站，在西安对40多名朝鲜军官进行了心理测验，戴尼奥和赫德森曾经在西安进行工作。

(四) 军官心理测验的开展

1945年7月底，莫里、莱曼等美国测验人员完成了伞兵选拔工作准备回国，在他们临行前的8月初，莫里受到一名中国将领的邀请，希望他能通过对一组中国国民革命军军官的测验向这名中国将领展示整个测验的方法和程序，这名将领正是邱清泉。莫里称此前的伞兵选拔都是在美国资助下完成的，但这一次测验完全是在中方提供的条件下进行的，测验小组得到了军方的热情款待。邱清泉对莫里等人的测验过程相当感兴趣，常常尽其所能为测验小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且在整个测验过程中他都在现场进行观察。[①]

当时的测验小组成员包括莫里、莱曼、戴秉衡、罗伯特·陈、周先庚、丁瓒、曹日昌、田汝康、黄德才、范准、马启伟、卢濬、赵婉和、傅憬斐、宋宝光、张世富、张绍桂。[②] 测验的对象是从各部门抽调来的30名军官，只是进行心理测试，不会涉及淘汰与否的问题。邱清泉很满意地目睹了整个测验过程。当时测验小组的中国成员也很快掌握了莫里等人的测验程序和方法，学会了有效使用相关技术。此次测验的材料均由盟军以及西南联合大学心理组提供，除盟军的职员以及曹日昌、田汝康出国之外，邱清泉的第五军为参加测试的中国专家和学生们提供了共计185千克军米和国币14万元津贴的酬劳。[③]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邱清泉对军官心理测验技术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支持态度。在莫里等美国专家回国之后，周先庚受邱清泉的邀请，带上林宗基、黄德才等人仿照莫里的方法并加以精简，为第五军、第十八军进行了三次心理测验。[④] 周先庚先后总共对168名受测军官进行了心理测验。

---

① The OSS Assessment Staff (1948). *Assessment of Man: Selection of Personnel fo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p. 382,386.

② 周先庚，撰. 八月份测验工作人员名单. 1945-8-31，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1盒第10号。

③ 周先庚，撰. 八月工作人员军长津贴. 1945-9-14，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1盒第10号。

④ 周先庚，撰. 参加OSS伞兵测验的经过与初步认识(手稿)，1968年2月19日，清华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4盒收藏有自1945年8月1日之1945年9月19日四次心理测验的受测军官的花名册。

(五) 军官心理测验所正式成立

军官心理测验所于1945年8月31日正式成立。周先庚撰写的工作范围包括八项：(1) 所长负责技术，如计划测验、聘请测验官员、制作报告和公开演讲等；(2) 副所长负责交际行政责任，如筹备测验、接洽受测军官和照应职员等；(3) 行政事务经费直接由军部所方负担，测验卷册和纸张文具器材等由所长商派清华大学心理学家负责筹备，实报实销，或根据受测人数，每测验一次，由军部所方预交测验费若干；(4) 团体施测满30人以上者到军师团营连等部举行，测验官员的交通、伙食等一切招待，由所方或受测部队担负；(5) 个别测验到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心理学组进行，每次10人，从上午十时起到下午三时，共5个小时，由受测部队或所方招待一顿简单的午饭和茶水；(6) 测验结果初步分析，简单统计工作由所方军部职员担任，进一步整理报告等工作由所长测验官担任；(7) 测验所应配备吉普车一辆、三轮卡车一辆，摩托车一辆，其他车马费实报实销；(8) 助理员往返城郊的车马费实报实销。① 军官心理测验所人员构成名单详见表6-2。

表6-2　军官心理测验所人员情况②

姓　名	单位及职别	所方职别	兼/专
周先庚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所长兼测验官	兼
黄德才	军官心理测验所助理	助理员	专
倪中方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测验官	兼
胡　毅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测验官	兼
张绍桂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测验官	兼
赵婉和(女)	西南联合大学讲师	研究员	兼
卢　濬	西南联合大学教员	测验员	兼
严倚慈(女)	西南联合大学教员	研究员	兼
范　准	西南联合大学教员	测验员	兼
马启伟	西南联合大学助教	测验员	兼
傅愫斐(女)	云南大学助教	研究生	兼
萧厚德	西南联合大学助教	测验员	兼
宋宝光(女)	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	研究生	兼
范祖珠(女)	西南联合大学研究生	研究生	兼

① 以上资料见“军官心理测验所・工作大纲”，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1盒第4号。
② 以上资料见“军官心理测验所・人事分配”，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1盒第4号，该资料空白处有“作废”二字，可能是因上面勾画潦草，需另外誊清，故该资料中信息的真实性并不能因此予以否定。

周先庚在主持和参加军官心理测验和伞兵选拔测验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为军队和战局服务的任务,而且还利用实践机会培养了学生,并指导学生完成了军事心理学方面的本科生学位论文,例如孙际良的《军官心理测验之实施》。[①] 另外,周先庚指导田汝康和戴寅于1943年,刘民婉于1944年翻译了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和瓦特(Magdalena Hawlik-Van de Water)主编的*Psychology for the Fighting Man*(《战士心理学》),并进行了校对,后来部分内容以《战斗员所应知道的心理学》为题在天津《民国日报》的"心理与教育"周刊中,自1947年4月5日至1948年8月28日共进行了长达70期的连载。这反映出周先庚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心理学的实践工作上,也依然把精力用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上,尤其是利用实践的机会,在满足实践需要、社会需要的同时积极培养学生。

(六) 周先庚"创造中国本位军事心理学"的思想

周先庚不仅在军事心理学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实践工作,而且结合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军事心理学主张,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与军事心理学有关的文章,如《军官心理测验之商榷》(以笔名"伏生"发表)、《智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心理基础》、《智识从军与心理建军》、《军事心理与军事教育》、《心理学在军事上的应用》等文章。其军事心理学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 智识青年从军运动中的心理学应用

结合当时发动智识青年(即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周先庚提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号召智识青年从军,应该将近景动机和远景动机相结合;改革当时军人战绩禁闭制度,使功过随时得到宣扬;征调心理专业人员,进行心理测验,为将来分工派职提供依据;实施心理卫生检查,以此进行筛选;拟定并实施军官心理测验的标准和材料,为进一步科学选拔军官提供凭借。[②]

2. 军官心理测验的目标问题

周先庚在分析当时中、美、德、俄四国的军事心理学之后认为,美国常备军很少,一到有战事,就会招募士兵,这个时候要用到各种心理测验,此时其

① 孙际良,撰."军官心理测验之实施"稿,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111盒第7号;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心理学组历年毕业生论文清单,北京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185号。

② 周先庚.智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心理基础[J].云南日报,1944-12-24.

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兵源入伍从军。德国全民皆兵,注重平时对军官的科学选择与训练,使用军事心理学技术测试官兵,是出于军事教育目的,对其进行积极培养。而中俄相类似,军官心理测试往往在于进行人事调整、妥当安排,这是一种"为人找事",而不是"为事找人"的做法。如此进行军官心理测验,只能让原有的这些军官"调来遣去",对于整个军队并无裨益。①

3. 军事心理测验的组织与方法论问题

周先庚提出,切不可用应考态度来接受测验,否则测验的种种弊病就会产生。以往出现过把测验材料编入课本、以测验方式训练学生、用测验内容人为制造天才的种种笑话。因此,在军队实施测验的机构组织必须强化管理,权力必须集中,心理测验才能收到真正的效果。周先庚提出,军官将领的教育和训练,绝非仅凭室内形式的心理测验就能解决,而要综合利用访谈、调查、观察法等各种技术,同时还可以使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目标是改善领袖(将领)的领导能力,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此来解决它们。"②由此可见,周先庚将问题放在第一位,任何方法都可以为问题服务。

4. 军事心理学的机构建置与研究范围

周先庚提出:"所有陆军大学,中央军官学校及其分校,以及此次智识青年新军,是各主要示范部队、教导团、远征军等,一律加添军事心理学专门课程,聘请心理学者,创立心理实验室筹办心理测验所,增设心理学系,以便适应美国盟军最进步,最开明,最合理之人事组织与军事心理技术,而开吾国特殊军事心理研究之先河。"③只有军事心理学在军队里如此真正制度化,才不至于使军事心理学在中国仅仅是"纸上谈兵"。同时,军事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不能仅仅停留在军官心理测验上,还有许多重要而且容易解决的心理问题,因此要从实际情况入手,然后由易到难,渐谋解决。这反映出周先庚循序渐进的军事心理学发展观。周先庚提出,军事心理学是有文化与地域色彩的,西方军事心理学知识不一定完全适合我国军事组织和人事需要,因此,要实地研究中国特殊的军事心理问题,要"创造中国本位的军事心理学",要"建立'中国军事心理学'之基础,树立其特色之处"。

①② 伏生. 军官心理测验之商榷[N]. 扫荡报(昆明),1944-3-13,20.
③ 周先庚. 智识青年从军运动之心理基础[N]. 云南日报,1944-12-24.

二、萧孝嵘的人事心理学和军事心理学的实践与思想

(一) 发起创办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

西方心理学界对人事心理的关注比较广泛,并设有相关的研究机构,但是使用的术语名词稍有差异,侧重点不同,如美国有“人事研究联合会”,英国有“国家实业心理研究所”,德国有“实业心理技术”、“实用心理”、“工作科学”在各方面的运用,苏联则有“合理化运动对于工作人员训练组织,工作及管理各种方面的贡献”,等等。西方国家均开展以“研究人与人,事与事及人与事之各种关系的适当配合,人得以尽其才,事得以尽其功”为宗旨的人事心理研究。萧孝嵘开始关注人事心理学问题可以追溯到1933年他在《旁观》杂志上发表的《心理学对于人类的生活有一些什么关系》一文。此外,心理学界的学者大量编订测验,周先庚、陈立等人开展工厂的实地调查,以及心理学刊物刊行应用心理学文章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事心理学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萧孝嵘深感人才拣选、工作效率和人事管理等问题的重要性,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便发起创办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希望借此集中人力,从事人事的科学研究。该社于1941年12月6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当时,其成员分基本社员、团体社员、名誉社员3种,设有监事会、理事会。其第一年度的工作内容包括积极提高社会研究兴趣、举行公开学术演讲、在报刊上发表学术演讲及人事心理论文、编制人事心理参考书索引、组织全国人事管理调查委员会等五项工作。第二年度的工作内容除了继续推进上年度未完成的工作之外,还包括出版《人事心理丛书》、编印人事心理论文集、扩大研究范围、促进社会发展、公开征求社员等。该社征求社员安排的联系人的省份包括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在当时号召了全国大部分的心理学力量。

该社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军官智慧、军官情绪稳定性、军官人格品质、政工人品、通信人员甄别、国防工业学徒拣选、交通与刑事警察、警官心理、空军各种人员能力的各项研究,还进行了大、中、小学各阶层心理测验之编造和战时难童之心理研究等。该社除了积极从事研究之外,还积极刊行相关文章和出版书籍。例如在《中央日报》和《时事新报》上发表人事心理论文,在《扫荡报》上设置“军事心理专刊”栏目,在《新世界》杂志中编辑“实业

心理专号”,在《国防月刊》杂志中编辑“国防心理专号”,《军事与政治》月刊编辑“人事心理特辑”两期,另外还编辑出版了《人事心理丛书》和《军事心理丛书》。①

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的成立对推动中国人事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944年萧孝嵘主编出版了《人事心理论文集》,涵盖了人事心理的众多领域,如人事心理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心理卫生、警政工作、领导问题、教师能力倾向、护士事业、技工适性等。其中丁祖荫与当时国民政府有关警政部分合作编制的“普通警察智力测验”、“警察智力测验”、“交通警察智力测验”、“刑事警察智力测验”、“第一种官警品格测验”是我国警察测验领域较早的心理测量工作。

(二)技工适性训练及心理测验

萧孝嵘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提出了测验报考艺徒的普通智慧、机械能力与工作兴趣的测验方法,并设计了专门的仪器用于测验。1942—1944年还开办了两期心理测试主试人员培训班。萧孝嵘、程法泌等人与当时的国防工业委员会技工训练处合作对技工适性心理测验的研究,并于1944年的技工训练班招收中进行了适性心理测验,这些研究和测试工作应是我国在培养技术工人中使用测验技术的滥觞。②

(三)人事心理学思想

萧孝嵘在领导人事心理研究社的同时,还积极从事人事心理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人事心理之使命》、《人事心理之兴起及其范围》、《人事管理之科学基础》、《实业心理之使命》等论文,编辑出版了《怎样领导》(1943)、《人事心理问题》(1944)和《心理建设之科学基础》(1944)三部著作。

《人事心理之使命》一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萧孝嵘人事心理学思想。他指出,人事心理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使人有创造自动之能力,热烈进取之情绪,积极果敢之行动及整齐严肃践履笃实之风气”,其采取的步骤则是“图谋人与事之前当配合,并调整人与人间及事与事之关系,俾使各种工作之效率可以达到顶点,而个人与团体之福利均能充分顾及”。值得注意的是,萧

① 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之兴起及其工作[J].新世界,1944(12):55-56.萧孝嵘.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J].科学大众,1948(9).

② 刘建华.抗战时期技术工人培训中的职业能力测验[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2):45-46.

孝嵘所谓的人事心理范围比西方的人事研究、实业研究等要广泛得多,因为其所说的人不仅包括成人而且还包括儿童,不仅包括工作者而且包括学习者,其所说的事不仅包括职业与任务,而且包括教育与训练。可以说,萧孝嵘所说的人事心理学是广义的应用心理学,凡是指向实践、应用的心理学研究,均为其所称的“人事心理学”。这里也反映出萧孝嵘对心理学应用的强调。也正是如此,他将这种人事心理视为其心理学应用的核心,提出它是“心理建设”的科学基础的观点。

《怎样领导》原是萧孝嵘在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的讲演资料,1943 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人事心理研究社丛书”之一予以出版。全书利用心理学知识探讨领导行为的各个方面,共分三章。第一章分析领导人本身需具备的条件,如创造性、好胜心、生活力(精力充沛)并分别从心理学角度就领导人员应该如何培养这些能力提出意见。第二章叙述领导人员在选拔干部人员时需注意的原则和选拔方法。选拔干部要注重其普通智慧和人格特质的评定,其评定方法往往采用访谈法和量表法,这两种方法各自有优缺点,因此在选择某种方法时要采取适当的原则和方法以避免其局限性。第三章说明领导人员在控制他人行为时需注意的原则,侧重的是领导过程的心理学问题。

《人事心理问题》是萧孝嵘在人事心理研究方面的汇编,作为“人事心理研究社丛书”的第三种,由商务印书馆于 1944 年出版。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般人事心理问题”阐述作者对人事心理的总体理论观点,作者主张要采用实验的方法考察中国人智慧、情绪以及人格倾向心理特征,可见萧孝嵘主张的人事心理学应该以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为基础。人事管理应当以人事心理学为科学基础,要分析工作人员人自身的因素、人与工作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萧孝嵘还分析了精神总动员与心理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军警心理问题”由 13 个具体问题组成,其中理论性问题述评了各国军事心理研究的现状,心理与国防的关系,具体实践性问题涉及如何提高军事效率、军官的智力要求以及人格品质的分析、航空工作的高度问题、空袭警报人员的工作分析以及测验方法、如何选拔优秀的工作人员、如何控制士兵心理、如何维持心理健康以及警政人员的心理测验等。第三部分“实业心理问题”包括实业心理的功用及其背景、人事心理与工作分

析、人事心理与动机控制、实业中的疲劳问题、市场分析等主题。第四部分“教育心理问题”主要介绍了作者的一些实验和测验研究以及对于大学中的人事心理问题的思考，如萧孝嵘主张在大学里要设置一个人事部，其职责包括协助入学考试中的心理技术工作、协助选课指导工作以及协助人格诊断与矫正的工作。

《心理建设之科学基础》于 1944 年编著，作为“人事心理研究社丛书”之一出版。这本书系统整理了作者在人事心理方面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对“人事心理之使命”一文中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深刻系统的理论阐述，是集萧孝嵘人事心理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他进一步阐述人事心理作为心理建设的科学基础的地位，分析心理建设与人事心理的关系，指出“心理建设是人事心理的目标，而人事心理乃是心理建设的方法”。他还总结了人事心理在解决心理建设问题需要考虑的五个因素，即“人的因素、事的因素、人与事间的关系、人与人间的关系、事与事间的关系”。以此为核心，他在书中详尽具体地探讨了儿童期心理建设、青年期心理建设、国防心理建设、政治中的心理建设以及实业中的心理建设等许多具体问题及实践策略。萧孝嵘人事心理研究中蕴含丰富的心理应用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心理学应用领域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四）军事心理学研究

萧孝嵘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和开展了军事心理学方面实践以及研究工作，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军事心理学研究团队，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第一，撰写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军事心理学著作《军事心理》。萧孝嵘在抗战开始以前就开始编制军官测验，并开始撰写《军事心理技术》一书，但是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定稿此书。1939 年，萧孝嵘将其中军事心理常识部分单独抽出付印，这就是 1941 年问世的《军事心理》。萧孝嵘在书中提出，应用军事心理学实为增进军队效率的必要条件，此种科学废而不用，便是国家军备上一种严重的损失。该书分为“领袖之心理分析”、“领导工作之必要条件”、“领袖型之差异”、“军事工作之分析”、“军人之选择”、“军事训练之心理原则”、“军事管理之心理原则”、“军事宣传之心理原则”和“作战之心理原则”九章内容。

第二,翻译了国外军事心理学著作《德国心理战》(*German Psychological Warfare*)。原书为美国的国民意志测试委员会(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所编,其目的在于使美国民众了解"二战"期间德国令人震惊的战斗力与其长期以来坚持运用的心理技术之间的关系,希望能汲取经验教训为战争中的美国国防所用。该书主编为法拉哥(Ladislas Farago,1906—1980),参与者还有奥尔波特、波林等著名心理学家。1943年,萧孝嵘和他的学生丁祖荫将该书翻译为中文,作为"人事心理研究社丛书"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中的很多知识对于处于战争当中急需有关知识经验的心理学界和军方都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很多内容在萧孝嵘的《群众心理》、《士气心理》等军事心理著作及《怎样领导》等人事心理著作中均有反映。

第三,为军官培训撰写内部军事心理教材。抗战时期,为了提高军事效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成立了一个军事心理研究委员会,聘请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以及人事心理研究社的心理学家主持工作,萧孝嵘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从1945年开始,为了向干部训练团的军官传授军事心理常识,这些心理学家编纂了一套军事心理学丛书。这套丛书的内容注重实用,不谈理论,文字通俗,多采用问答形式。当年第一批共出版了十种,萧孝嵘撰写了其中第一种《士气心理》、第四种《群众心理》。《士气心理》共包括三十三个问题,详尽地解答了影响士气的因素以及鼓舞和保持士气的一些基本方法策略。《群众心理》则包含十九个问题,较为详细地阐述了控制各种类型群众团体的影响因素和方法策略。

第四,编制了两套军官智慧团体测验。这是萧孝嵘于1936年利用给部队训练机构培训的机会而编制的,本来该机构注重人格测验而非智慧测验,但是萧孝嵘认为智慧(即智力)是军官所需人格品质之一种,就利用了这次宝贵机会增加了智慧测验,并编制了这两套智慧测验工具。这两套测验每套包括四种材料:迷津、同理补填、组形排列、多方适应。萧孝嵘还以584人的测验结果为这两套测验工具作出了常模,这两套测验有着较好的信度,可以交换应用。萧孝嵘认为,这两套测验的用途至少有五种:(1)确定入军官学校及其他军训机关者之资格,借以减少人力、物力与财力之巨大耗费。(2)根据入军官学校及其他军训机关者之智慧程度划分智慧相等之组,俾使各组得受同等的训练而教学效率遂可因此增进。(3)发现智慧优越者而予

以升迁。(4) 发现智慧低劣者而予以淘汰,或使担任其他之军事工作。(5) 可应用于士兵及军队中其他工作人员,以确定军队中各种工作需要的智慧程度,使人尽其才,使智慧低下者不会影响军队风纪。①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心理卫生与指导工作

如果说抗战爆发之前的心理卫生运动在中国尚属鼓吹宣传阶段,1937年之后心理卫生运动则是在前期发展推动基础上进入宣传与实践并举的发展阶段。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心理卫生被公认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被赋予振兴民族的重任。民族复兴不仅要进行物质建设,而且要进行心理建设,心理卫生则是心理建设的必要前提。心理卫生在中国的发展与国际心理卫生运动的兴起、国家民族复兴、心理建设运动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国际心理卫生的著作相继被翻译引介到国内,如1937年赛门斯(Percival M. Symonds)著的《学校儿童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 of the School Child*)由胡祖荫翻译出版,雪门(Mandel Sherman)著的《心理卫生与教育》(*Mental Hygiene and Education*)由江标翻译、艾伟校订出版,该书还有周尚1939年的译本问世。

一、心理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及关注主题

心理卫生运动抗战期间在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同时心理学者尤为关注了儿童心理卫生、青年心理卫生和战时心理卫生等主题。

(一) 组织建设及活动开展

193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成立之后,吴南轩任第一届常务理事、总干事。当年吴南轩兼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1938年9月11日复旦大学成立了由50多名师生参加的心理卫生研究会,理事成员有吴南轩、金通尹、章友三、温崇信、胡寄南、熊子容、伍蠡甫,吴南

① 萧孝嵘.军官智慧测验[J].新民族,1938(1):8-9.

轩被推为主席。其他大学也纷纷成立心理卫生的师生组织并开展活动。如燕京大学1939年成立了心理卫生讨论会,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或延请学者进行公开演讲。吴南轩相继发表了两篇长文《中国心理卫生运动之回顾与前瞻》(1938)、《今后二年中之心理卫生教育》(1939),以此推动心理卫生运动。在前一文中,吴南轩提出拟向即将召开的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议提交三项议案:(1)建议中学课程中增设心理学课程,大学及专科学校列心理卫生必修课;(2)建议政府考选青年出国研习精神病医学、心理学,并在医校课程中增设精神病学、心理卫生学科目;(3)建议政府筹备病人医院,并在公立医院中附设精神病治疗专科或专所。吴南轩还大力呼吁各学术团体、慈善、宗教机构都能积极参加到心理卫生运动中来。① 在《今后二年中之心理卫生教育》一文中,吴南轩提出了征集心理卫生资料,编订并实施儿童心理卫生测验,调查心理异常的儿童并设立特别班,编辑课本、丛书和刊物,提倡心理卫生人才之培养,提倡"父母会"组织等六项工作,并尤为重视心理卫生人才培养工作。另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还发表了《抗战建国时期中之心理卫生》(1938)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工作报告》(1938),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心理卫生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在当时,心理卫生运动被视为抗战建国时期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社会各个领域建设如家庭、学校、政治、司法、实业、军工国防、医药卫生等都有密切关系。

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心理卫生与健康运动,如1938年上海一个由代表14个国家的17名女士组成的妇女团体联合会委员会发起了精神健康运动。其缘起是当年春夏之交请了一位心理学教授演讲儿童教育与精神卫生,受此激发决定发起精神卫生运动,联合了中国医学会、上海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国际教育会等组织成立了一个上海精神卫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陈鹤琴,秘书是谢里夫(A. W. Sherriff),财务是亨格尔(Van Hengel),医学顾问有朱恒壁、哈尔彭(国立上海医学院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何清儒(全国职业教育会研究指导)、韦斯特布鲁克(沪江大学心理学教授,中文名汪宗海)。该委员会计划:(1)以学校科目、无线电台、广播、演讲、杂志与报纸的文章,对大众宣讲精神卫生教育;(2)以父母教育、导师教育、儿童指导

① 吴南轩.中国心理卫生运动之回顾与前瞻[J].教育通讯,1938(36):12-14.

诊所,创立问题儿童和低能儿童的学校,来改进儿童的精神健康;(3)以精神诊疗的社会工作,帮助治疗神经质、神经官能症、嗜酒、反社会行为等,看护从精神病医院里出来的病人,并创立精神疗法诊所。该委员会着手从上海大学生、教育心理学家、教师、社会工作者中选拔了一批人接受精神卫生学、心理病理学的专门训练,使他们成为精神病方面的社会工作者,待精神疗法诊所成立之后,这些接受过训练的人还可以从事义务工作。① 1940年,在上海精神卫生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心理卫生促进会,其工作内容为介绍促进人类心理健康的科学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指导大众适当的精神生活,防止精神病的发生。该促进会还积极投身实践活动,创办了儿童心理指导所,并与国际红十字会合办了神经系病治疗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心理卫生运动在上海开展得如火如荼,黄嘉音任编辑的《西风》月刊也发表了大量心理学、心理卫生、精神疾病的相关文章,大大推动了心理卫生知识在当时的传播和推广。1936年9月,林语堂、陶亢德、黄嘉德、黄嘉音等人创刊《西风》月刊,以美国《读者文摘》为范本,以"译述西方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宗旨。1938年9月西风社增办了《西风副刊》,由于这两份杂志注重推广新知,成为当时上海最为流行的刊物。《西风》刊载的文章中,与心理学、心理卫生、精神疾病、情绪管理等主题相关的文章170余篇。若加上《西风副刊》上的文章,数量会更大。黄嘉音不仅参与了当时的心理卫生运动的社会推动工作,而且通过《西风》月刊发表心理卫生方面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卫生运动。《西风》月刊设有"心理·教育"专栏,还邀请丁瓒、程玉麐等专家撰写"心理特稿",另外《西风》设有"西风信箱",发表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些来信是曾受益于《西风》所刊载心理学知识的读者来信,涉及心理、精神疾病、行为偏差和心理卫生议题的约有30篇。② 1938年第22期《西风》在"心理·教育"专栏刊发了许成翻译的心理卫生运动推动者比尔斯自传的部分内容。

1945年初,中央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法学院为保持并促进各级学生心理健康,联合组织学校心理卫生促进会。参与该活动的有俞焕文、伍正谊、

① 黄嘉音.精神健康运动[J].西风副刊,1938(1):40-41.

② 王文基.心理的"下层工作":《西风》与1930—1940年代大众心理卫生论述[J].科技、医疗与社会[J].2011(13):15-88.

雷肇唐、郭祖超、程玉麐、严俊清、魏水清、郑林庄、林耀华、周励秋、关瑞梧等医生或教授,学生有陈馨达、万华清。其工作范围包括探讨关于保持并促进学校心理卫生的方法及其原理;普及心理卫生的知识;推行并协助各级学校关于保持心理健康及防止精神失常的实施事项;测验各级学校学生心理健康并予以心理卫生的指导;研究各级学校学生有关心理健康的社会生活予以适当的指导;研究各级学校学生有关心理健康的体格检查并予以治疗;联络国内其他心理卫生机关以利学校心理卫生的推进;选定成都市中等学校作为心理卫生示范区;其他有关学校心理卫生的事项等。同时该筹备会还联络了成都树德中学、蜀华中学计划开展工作。①

(二)儿童心理卫生

1936—1937年《小学教师》半月刊杂志曾连载了顾曾华和吴增芥译、日本阿部政三著的《儿童精神卫生》一书,1937年第17期则推出了儿童心理卫生专号,编者在"关于心理卫生专号的话"中强调心理卫生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健康的心理,是人人可以研究的,不能视之为高深的学问,而不去接近它,反而要尽量研究批判,负起充实这种学问的责任来。心理卫生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其内容的充实有待教师的努力,教师面对无数儿童,一定可以发现很多心理卫生问题并发明一些心理卫生的原则与方法。同时编者还强调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心理卫生,要与生理卫生相联系,心理健康标准要因时因地,培养健康心理要考察环境因素,各方面综合考虑才能达到心理卫生的目的。心理卫生的内容包括消极的救治心理和积极培养健全心理两个方面,其中后者是教师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儿童健康心理的培养是教师责无旁贷的中心工作。该专号刊载了三组文章,第一组文章为"儿童心理卫生概论及原则研究",包括《儿童心理卫生检讨》(王儒珍)、《儿童心理卫生的原则》(方东澄)、《一个小学教师应有的心理卫生常识》(曹仞千);第二组文章为"心理卫生与教育设施关系及其实际问题的检讨",包括《妨碍儿童健康的"教育病"》(沈善芝)、《学校与家庭儿童的心理卫生》(吴缤笙)、《小学教育与心理卫生》(丁祖荫)、《小学实施儿童心理卫生的各方面》(高人端)、《儿童的情绪及其教育方法》(刘哲庵)、《学校训导与心理卫生》(张德琇);第三组文章为

① 中大燕大提倡学生心理卫生[N].燕京新闻,1945-5-9.

"儿童心理缺点及治疗方法等检讨",包括《治疗教育》(顾曾华和吴增芥译、日本阿部政三著)、《儿童心理的病态及卫生方法》(张耿四)、《儿童心理的缺陷及其治疗》(张德俄)、《几个心理病态特殊显著的儿童》(苏兆新)。另外,还有郭祖超撰的《对小朋友讲读书的心理卫生》教材介绍和程曦明撰写的《儿童心理卫生论文提要》两篇介绍性文章。这一组文章涉及的主题从基本理论到实施原则、训导与治疗,再到案例,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儿童心理卫生工作开展的状况,同时,丁祖荫、张德琇、郭祖超均是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毕业生,反映出曾任教于该系的吴南轩作为心理卫生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影响了一批学生走上了心理卫生运动的道路。

其他刊物同样也发表了一批儿童心理卫生的文章,如刘兆清在《现代教育评论》上发表了《儿童心理卫生的重要及其实施原则》(1937),张一飞在《民教通讯》上的《儿童心理健康的培养》(1937),环惜吾在《闽政月刊》上的《儿童心理卫生的基本原则》(1937),钱弗会在《初等教育》上的《儿童心理健康与小学各科教学》,武三多在《教育学报》上的《儿童心理卫生之实施》(1939),支才庸在《浙江教育》上的《儿童心理卫生新论》(1940),黄孝章在《国民教育》上的《小学心理卫生之设施》(1941),张乃璇在《江西地方教育》上的《国民学校儿童心理健康的训练》(1941),傅亮在《师大月刊》上的《儿童的心理卫生》(1942),何寿昌在《妇女新运》上的《儿童的心理卫生》(1943)等。当时心理学和教育学界之所以重视儿童心理卫生问题,是认识到成人心理疾病的根源往往形成于儿童时期,良好的心理习惯态度需要在儿童时期养成,实施心理卫生在儿童时期最为有效,还有一点就是心理不健康使学校中的训育工作不易开展。1936 年方东澄根据赛门斯《学校儿童心理卫生》一书的内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心理卫生与训育》一文。当年 5 月 15 日黄羽仪(即黄翼)曾发表一次演讲,后以《训育与心理卫生》为题发表在第 4 卷第 4 期《湘湖生活》杂志上,黄羽仪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中重训育,轻心理卫生工作,导致只顾一时的校风建设,以仇恨的手段训责或惩罚儿童,会断送儿童大有所为的将来。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程玉麐曾在省立成都实验小学演讲心理卫生,对小学训育有着较多的改进意见,后经记录整理以《心理卫生与训育研究》为题发表在 1940 年第 9 期《国民教育》上。杨同芳 1941 年出版了《中学训育》一书,其中一节讨论了心理卫生与训育的问题,该节内容曾以《心理卫生

与中学训育》为题于1940年发表在《时代教育》。这些都反映了心理卫生运动的兴起对当时学校训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教育工作正朝着促进儿童心理健康的方向上发展。

（三）青年心理卫生

青年时期身心发展迅速,但思想观念还不够成熟,情绪不够稳定,行为习惯未定型,各方面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尤其是抗战期间青年人面对的生活环境又是前所未有的极端恶劣,同时青年一代人又承载着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任,因此抗战时期青年心理卫生问题也是当时心理学者、教育者重视的主题之一。

抗战时期面向青年的一些杂志纷纷刊载文章普及和探讨青年心理卫生问题,相继发表了萧传文的《青年所应注意的心理卫生》(《青年界》,1937年第11卷第5期)、支才庸的《关于青年心理卫生问题》(《新青年》,1938年第12期)、阅灰的《抗战建国时期青年的心理卫生》(《战斗旬刊》,1938年第5期)、陆新球的《青年的心理健康》(《知识与趣味》,1940年第2卷第2期)、谭风的《青年的心理卫生》(《自修》,1939年第68期)、杨天全的《青年心理问题》(《中国青年》,1940年第2卷第6期)、徐步青的《青年的心理卫生》(《青年人》,1941年第3卷第1期)、张广汉的《论青年心理卫生》(《福建青年》,1940年第1卷第3期)、吕爕文的《青年心理的矛盾形态与自我解决》(《浙江青年旬刊》,1940年第2卷第7、8期)、何毓芝的《消弭青年心理冲突》(《浙江教育》,1940年第2卷第10期)、彭志鸿的《青年期的心理卫生》(《湖南青年》,1941年第2卷第7期)、季诚性的《战时青年之心理健康问题》(《黄埔》,1941年第5卷第18期)、柯育甫的《谈青年心理卫生》(《中国青年》,1942年第5期)、朱智贤的《青年心理漫谈》(《青年生活》,1943年第4卷第3期)、陈剑恒的《心理卫生与青年修养》(《中国青年》,1943年第5期)、徐远熙的《青年心理的变态》(《青年时代》,1943年第1卷第2期)、文高的《精神疾病与青年心理卫生》(《学生之友》,1943第6卷第56期)、卜士的《沦陷区青年的心理变态倾向及心理卫生原则》(《新青半月杂志》,1945年第2、3期)、箫树模的《青年的心理卫生》(《社会卫生》,1946年第2卷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另外,张官廉还出版了一本《青年心理卫生》,共十二章,包括心理卫生的重要性、起源、目的,健康人格的标准,心理疾病的界定及起源,

矫正心理疾病的方法,青年心理特征及危害青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如何培养良好的人生态度等内容。①

《抗战建国时期青年的心理卫生》一文中总结和分析了抗战时期青年的十种心理状态,包括爱国热血的澎湃沸腾、求知欲望的炽热、敌寇侵略的恐怖、家庭离散的悲哀、失学失业的愁闷、舒适生活及幸福自由丧失的苦痛、浅识近视对抗战建国前途的悲观、不识不知顺帝之则(顺乎自然法则)的乐观、堕落生涯的沉溺、恋爱的启慕。文中指出一方面可以采取一些一般的心理卫生的方法,如注意休息、饮食,减少恐怖的因素,设法减少失败的可能,以使精神得以升华,解除心理上的冲突,等等,另一方面还需要增进修养,如确定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正确而坚定的信仰,深切了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②《青年心理的矛盾形态与自我解决》总结影响青年心理矛盾的因素,包括情绪的扰乱、家庭的解散、身体病弱、性的适应问题、学业问题、父母态度的问题,等等,并讨论了自我解决的方法,如找到自我、合理化、升华、转移、增加社会交往活动、正确对待失败,等等。③ 何毓芝在《消弭青年心理冲突》一文中则指出一种环境中的知识青年的境遇,即敌伪区的青年,一时受人引诱或者压迫而任了伪职,一方面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激荡,另一方面被环境束缚,无法解脱,在这种境地下青年心理冲突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应当利用这种冲突的心理,以争取青年。④ 文中所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导致一些青年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当时戴秉衡就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过此类病例。另外,潘菽还受刘源景之邀撰写了《青年心理问题的看法》(《现代读物》,1941 年第 6 卷第 1 期)一文,讨论如何改善当时青年心理上的“缺憾”,他指出“青年心理表现是环境变化最好的指数”,青年心理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争取抗战胜利,彻底改变社会环境才能改善青年心理健康状况。刘源景随后撰写了《关于青年心理问题的看法》(《现代读物》,1941 年第 6 卷第 5 期)对此进行了积极回应。

① 魏亦. 青年心理卫生(书报介绍)[J]. 西北工合通讯,1943(16/17):117-118.
② 阅灰. 抗战建国期中青年的心理卫生[J]. 战干旬刊,5-7.
③ 吕夔文. 青年心理的矛盾形态与自我解决[J]. 浙江青年旬刊,1940,2(7):753-756.
④ 何毓芝. 消弭青年心理冲突[J]. 浙江教育,1940,2(10):39-41.

(四) 战时心理卫生

抗战时期的心理卫生工作拓展到许多领域,如1938年第6、7期《闽政月刊》杂志的"战时卫生教育特辑"中发表了陈培光的《战时的心理卫生》和李为的《军士的心理卫生》两篇文章,李为指出维护军士的心理卫生,要从必胜信念的坚立、战斗情绪的安定、战时环境的变换、快乐心境的保持等几个原则入手。狄兑之发表了《望国人保持战时心理健康》(《时事月报》,1938年第18卷第10期),蒋宗文发表了《抗战期间的心理卫生》(《东南评论》,1941年第2卷第1、4期),后者分析了抗战期间军官士兵的战时心理神经症(War Psychoneurosis)的表现,以及战时民众和儿童所患的心理疾病,如神经错乱症、战争心理恐怖症、忧郁症、丧心疯症、离乡症等,该文中有多个案例,表明作者蒋宗文曾进行过相关的心理卫生实践工作。赵辰官发表了《心理卫生与民族健康》(《学思》,1942年第9期),认为民众心理卫生状况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幸福及其在社会上的服务能力,而且与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和民族道德都密切有关,因此心理卫生的目的应该是增进民族健康,要向全体民众进行宣传,并为全体民众的心理卫生服务。

二、丁瓒的心理卫生实践及思想

丁瓒(1910—1968),字慰慈,别号达四,江苏南通人,我国医学心理学研究和普及宣传的倡导者和开创者之一,医学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创始人之一。1924—1930年就读于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师范科,学生时代曾参加组织进步的社团活动。[①] 1931—1935年就学于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这一时期正是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师生发起心理卫生运动的阶段,大学三年级时就和同学丁祖荫合作翻译了美国布鲁克斯(Fowler Dell Brooks)著《青年期心理学》(1937)。1935年毕业后丁瓒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脑系科开始研究生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莱曼和戴秉衡的精神分析训练和指导,同时开始工作并且讲授心理治疗学课程。1937年完成研究生学习之后,丁瓒留在协和医学院脑系科教授临床心理学,成为我国正式开设临床心理学课程的第一人,后到公共卫生学系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讲授

① 都樾. 丁瓒《达四日记》[J]. 民国档案,2012(4): 21-34.

心理治疗学，还在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北平私立育英中学、北平仁立地毯厂正式开始心理卫生门诊工作，将临床心理学的理论应用到临床疾病防治实践。1940 年丁瓒离开了北平至长沙，投身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41 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重庆成立，翌年 5 月，该院成立了心理卫生室，丁瓒任主任，并建立了沙磁区卫生实验区、心理卫生咨询处和心理卫生诊所。同时兼任重庆社会教育学院、西南联合大学心理学教职。1943 年心理卫生室制订了《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咨询办法》，并于当年由教育部行令颁发。① 1945 年丁瓒及其助手赵婉和参加了周先庚和莫里在昆明主持的伞兵选拔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南京继续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并在该院设立心理卫生问诊部，由他指导工作。丁瓒经常到各种学校做心理卫生方面的讲演，其专著《心理卫生论丛》(1945)和《青年心理修养》(1947)收录了相关的演讲文稿和文章，这两本书是我国医学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早期的重要著作，也是关于青年心理问题最早的学术论著。

丁瓒接受过精神分析专门训练，在病患治疗和心理卫生工作中开始应用精神分析学说，并积累了宝贵的治疗案例经验，丁瓒对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化下的应用所做的有益探索，使其成为精神分析在中国早期的实践者之一。丁瓒主张尊重已有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同时以事实为依据，重新审视其理论，这体现了丁瓒对精神分析辩证的科学态度，例如他提到“……特别是在治疗方法上，他(指弗洛伊德——引者注)是贡献了划时代的发明。自然，我们一点也不忽视它的系统与方法的局限”。② 丁瓒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研究并实践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先行者。在丁瓒的著述中基本都是以其临床实践中亲身经历的案例为依据进行相关的学理性讨论。丁瓒的心理病理学、心理卫生工作是精神分析取向的，同时又选取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为指导思想，因此他比较强调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人心理疾病的影响作用。如“我国近五十年来的社会机构变动得那么剧烈，思想和文化是那么混乱，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个人对于生活上的心理适应自然发生严重的困难，以致心理疾病和行为失常遍及社会各阶层”。③ 又如丁瓒在

① 范庭卫. 丁瓒与心理分析的应用[J]. 中华医学史杂志，2010(5)：306 - 310.
② 丁瓒. 心理卫生论丛[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17.
③ 同上：7.

抗战结束后一年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践中发现，当时青年因对战后新情况的不适应而导致的心理疾病发生情况明显加重。

从《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咨询办法》可以看出丁瓒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期间开展的心理卫生咨询的一些情况及其规范。如咨询的对象包括各机关学校的团体或个人，以通信为主，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面对面咨询，咨询范围是人事管理方面相关的心理卫生问题，以及个人的心理卫生问题。条例中指出，在面向个体进行咨询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并征得咨询者的同意后，可以调查咨询者的家庭、学校、职业、生活环境等个人信息。心理卫生师在答复咨询时，所拟各项预防或治疗方法，只负建议责任，其实施由咨询者自行决定。心理卫生师所做的咨询均为义务性质。该办法虽然简单，但是对于当时心理卫生咨询工作的规范化有着重要作用。

丁瓒的心理卫生实践的主要对象是儿童和青年。他于 1942 年 10 月在国立边疆学校进行了为期 1 个月的学生心理卫生问题调查，采用的方法既有团体测验也有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工具是丁瓒编制的《自我心理检讨》大纲。丁瓒重视调查工作，将其视为开展心理卫生工作的必要步骤。在儿童心理卫生与行为指导方面，他指出，儿童行为指导工作是培养儿童健全的社会适应能力，避免或防止发生心理上或行为上的异常现象。导致儿童适应困难的原因则可以归于生物性、心智能力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在这方面，丁瓒相继发表了《战时难童的心理卫生问题》(1942)、《儿童期的性问题》(1945)、《略论儿童行为指导工作》(1945)、《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1946)、《怎么处理孩子们“告状”的问题》(1947)、《儿童行为指导我见》(1947)等文章。丁瓒指出，青年心理修养主要是指青年对于社会环境的适应。这个适应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智能力。科学地讨论心理修养问题需要先行分析当下社会文化的价值标准是否健全、行为规范是否合理进步。而在当时文化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从心理卫生的立场谈心理修养，更重要的是培养人们应有的能力和独立适应的能力。丁瓒在《青年心理修养》(1947)一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谈谈心理修养、了解你自己、人际关系与心理病态、人际关系适应的基础，弥散了的仇恨心、被“魔鬼”缠扰的女子、合理社会帮助的心理健康、现实的生活方法、青年期与神经衰弱、当前的青年心理卫生问题、略论思想与情绪态度的统一、论成

见、人们怎么会得精神病、救救心理苦难的人们等章节，在《心理卫生论丛》(1945)中涉及青年心理和心理修养的内容包括什么是神经衰弱、青年期的彷徨、男女之间、从心理卫生学研究观察男女之间的问题、父子之道、自卑与傲慢等内容。关于青年的“男女问题”(即性心理)的讨论，丁瓒主张从心理卫生立场科学合理地对待和研究性心理，在这方面还发表过《性教育案例》(《医潮杂志》，第1卷第3期)、《谈谈同性爱》(《医潮杂志》，第1卷第5期)等文章。

丁瓒积极开展心理卫生宣传，有很多的创新之处，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在心理卫生临床实践之外，经常在社会上进行公开演讲介绍心理卫生学知识，结合案例撰写文章传播心理病理学、心理卫生学知识，并且将文稿结集出版，对当时心理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丁瓒在其文章或文集的撰写中多以案例为基础，通俗易懂，又不失严谨，这样的文章对于读者，特别是心理上有病态倾向的人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他曾主张慎用心理病态学名词，因为特定的读者群体对于这类文字特别敏感，阅读过程中可能会“投射自己的愿望”，“找到依附自己病态现象的资料”。由此可见，丁瓒是将其作品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视为其心理卫生实践的一种延伸，是开展心理卫生实践的一种工具。这种观念和做法对于当今心理卫生与健康类科普著作的写作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周先庚也曾积极参与心理卫生运动，开展过心理卫生方面的调查研究。抗战期间他曾收到美国旧金山市“心理中心社”寄送的多份宣传资料，该社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其目的在介绍科学心理学的事实与原理，特别注意其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其服务内容涉及普通谈话服务类(家庭关系、性与婚姻问题、惧怕、烦恼、忧愁、饮酒问题、其他个人困难问题)、职业指导服务(职业与教育测验及指导)、父母子女问题(婴儿、儿童和青年行为问题，愚蠢、迟钝儿童问题)、诊断补救教学(阅读指导、写字、算术困难)等方面。受此激发，在1938—1940两个学年中，周先庚把这些传单内容在西南联合大学应用心理学班上与同学们讨论，当时就计划在昆明开展这项工作，并且照中国情形，改拟了实施方案，但是后来课业繁忙未能实行。后又计划与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学术研究委员会心理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心理组，以及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研究院理科研究

所心理学部合作成立了心理服务社。呼吁社会人士如有心理询问当尽诚解答,互相研究,并希望以此来奠定现代国家一种新事业之基础。在中国社会中,这类组织是否必要?兴办起来,有何困难?服务人员需要什么资格、态度与训练?最需要这种服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哪一类最多?周先庚以"心理服务社之商榷"为题就上述问题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① 这项工作虽然经常被周先庚鼓动宣传,而且当时人人都觉得需要,但是限于财力人力,始终未能成立正式机构开展工作。后来在文林堂牧师张绍桂和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倪中方的热心推动下,联合周先庚决定在文林堂成立这一机构组织,举办社会服务工作。因这项工作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先后约定西南联合大学体育系主任马约翰、训导长查良钊、教育系主任陈雪屏、理化系主任许浈阳、教育系教授胡毅和陈友松以及社会系主任潘光旦,共同交换意见,讨论筹备创办"青年问题顾问处",涉及的领域包括心理(周先庚)、娱乐(许浈阳)、健康(马约翰)、求学(胡毅)、职业(倪中方)、交友(张绍桂)、留学(陈友松)、婚姻(陈雪屏)、信仰(查良钊)、家庭(潘光旦)等众多领域。该顾问处自1945年3月5日至6月13日,曾请求顾问并进行登记的共57人,96人次。②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心理学者和教育者积极开展青年指导实践工作的情况。

1942年汤铭新和程玉麐在成都筹划开展"儿童指导所"和"成都市行为异常儿童研究"两个项目,虽然经过了教育部的审核和批准,但终因当时社会环境因素而未能开展实际工作。1943年汤铭新在成都三个小学选择了50多名行为异常儿童进行个案研究。此时程玉麐赴任华西大学医学院神经科主任,深感精神病预防工作开展的重要性。汤铭新受聘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负责社会工作及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工作,感到有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实习教师的需要,因此两人再次筹划以前的项目,着手选择行为异常儿童作为实地研究和矫治的对象,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一年后其效果颇受当时社会人士的关注。1944年秋季,这一项目成为成都基督教大学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实验工作的一部分,至1945年春,该所定名为华西大学医学院金陵女子

---

① 周先庚.心理服务社缘起[N].中央日报(昆明),1944-6-24.

② 周先庚.青年问题顾问处工作报告[N].中央日报,1946-1-5.青年问题顾问处工作检讨[N].中央日报,1946-1-26.

文理学院联合设儿童指导所。1946年,程玉麐赴广州,汤铭新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员回南京,儿童指导所在成都的工作遂告结束。① 汤铭新和程玉麐开展的这项工作是我国较早地实地系统开展儿童行为指导工作,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当时对于儿童心理卫生和行为指导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节　抗战时期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抗战期间军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心理卫生与青年指导方面的发展往往与当时的战事需要、社会需要有着密切联系,纯学科性的研究大多因为战争的阻碍而终止了,但是作为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在一些心理学者的坚守下,尽管身处艰难的境地但仍有较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刊物的创办还是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都反映着对教育心理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艾伟与教育心理研究所

艾伟(1890—1955),原名华泳,字险舟,湖北沙市人。曾在安庆圣保罗高等学校就读三年,后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大学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21年赴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23年入华盛顿大学,以一篇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学习影响因素的分析》,Ai Joseph Wei)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艾伟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大夏大学,1927年就任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任教中央大学期间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资助的“教育心理学讲座”,并讲授教育心理学、统计学等课程。他一方面开展国文心理、教育和心理测验的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心理学的组织建设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的沙坪坝,教育学院改制为师范学院。1938年艾伟卸任院长之职,专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主任和教育心理学部主任,并创办了教育心理研究所,亲任所长,为研究生讲授教育心理学研究、

---

① 汤铭新.儿童行为指导工作[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8-9.

学科心理学、高级统计学和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等课程,并在国内首次授予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艾伟创办的教育心理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国内创办最早、维持最久、规模最大、培养心理学专业人才最多的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机构,为我国培养了教育心理学专业人才。① 艾伟有时候称之为"中国教育心理研究所",由此可见该研究所在艾伟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影响。艾伟主持的教育心理研究所的各种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当时的《教育心理研究》杂志上,《教育心理研究》杂志是抗战时期唯一的心理学专业期刊,是当时心理学专业文章发表的重要平台,承担起了推动教育心理学发展,维系着教育心理学学科发展血脉的作用。另外,由于当时发行的心理学专业期刊稀缺,也有少量其他学科如生理心理学、人事测验等的论文在该刊上发表。1941 年秋,艾伟在中央大学研究院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采用了"善美纳"(seminar)制,即研讨会制,让学生们分别研读并摘译了十部教育心理学著作,后经郭祖超、张德琇、张述祖、杨清、汝若愚、林凤藻、闵灿西、朱道俊、方东澄、李象伟等整理,艾伟校阅,于 1945 年出版了《教育心理学大观》(上、中、下),为当时学界了解 1925—1940 年英美教育心理学在实验及理论上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34 年艾伟在南京曾创办万青实验学校,从事各科教学方面的观察与实验。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内迁,为了继续开展实验研究,艾伟在 1939 年 8 月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成立一完小,办了半年后因经济困难不得不放弃。1940 年 2 月又开办了学习心理实验班,招收初一或六年制中学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着手研究初中国文、英文、算术三门基本学科的学习过程,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研究如何发展儿童的学习能力。开始的一年半,实验班附设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中沙坪坝分校内,有两个班级,教员都是义务教学,一些教学器材(如风琴)由学生家长捐助,其他教具、纸张由教育心理学部提供。后来,实验班改属中央大学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名称改为"中央大学研究院教育心理学部中学六年制学习心理实验班",由当时教育部提供经费,共有高中一年级一个班,初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总共三个班,21 位教

① 方天天,郭本禹. 艾伟:中国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开拓者[M]//郭本禹. 中国心理学经典人物及其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130-148.

职员工。该实验班是艾伟在抗战时期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自然实验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反映了艾伟不畏艰辛的实践精神。艾伟在实验班上做了多种项目的实验研究,其研究结果经整理后记录在实验班的《教学报告》上,并由教育部出版发行。艾伟曾经自豪地说,在学习心理实验班8年时间里所做的研究非常多,获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拟定的原则,可供编写一部合乎儿童学习心理的初中国文教本。1946年以后,由于教育界种种不景气的状况,该实验班不幸停办了。①

二、教育心理学相关领域研究

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实践几乎一直在进行,同时,一些著作的编撰也在不断进行,其部分原因是当时教育部对师范教育中教育心理学课程标准的修改,相继出版了《教育心理》(陈选善,1938)、《教育心理的应用》(谷秀千,1938)、《教育心理实验》(杨衔锡,1939)、《教育心理学》(Harry Levi Hollingworth 原著,吴绍熙、徐儒译,1939)、《小学各科心理学》(Frank Nugent Freeman 原著,陈鹤琴、陈尧昶译,1940)、《学习心理学》(段铮,1943)、《教育心理学》(萧孝嵘,1944)、《教育心理》(杨鸿昌,1944)、《教育测验讲话》(陈选善,1944)等。其中有多部著作为教育部审定的大学丛书或师范丛书,这些著作的出版为当时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心理研究》上的教育心理学文章涉及的主题比较广泛,就心理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教育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发表了《心理学的意义及其应用》(萧孝嵘,1940)、《心理学与教育》(潘菽,1940)、《教育心理研究的贡献》(张德琇,1940)、《教育心理学问题》(艾伟,1940)、《心理学与教育》(艾伟,1943)。艾伟写的《心理学与教育》一文是9部英文教育心理学书籍的介绍,这些书籍也是其《教育心理大观》的主体内容。学习心理和学科心理方面,发表了《关于全体法与部分法的比较之一个实验研究》(萧孝嵘,1940)、《中学生的错字研究》(龚启昌,1941)、《国语朗读与默读之比较研究》(汝若儒、闵灿,1943)、《国语默读练习进步之实验研究(纲要)》(卢濬,1944)、《英语生字之实验研究》(林凤藻,1944)、《文白衔接问题研究第一篇》(艾伟,

① 江川.艾伟等人的阅读心理研究[J].语文教学通讯,2000(10):12-13.

1940)、《汉字心理实验中材料难易之比较研究》(艾伟,1945)。一批关于心理学、地理、算术、国文等课程的教学教法方面的著作也发表在该杂志上。艾伟主持的学习心理实验班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发表在该刊上,如艾伟和孙邦正的《国文教学报告》、陈永翱的《英语教学报告》、范冰心的《数学教学报告》,等等。另外,还发表过张述祖的《中学生课间自由活动的观察研究》。从总体上来分析,《教育心理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教育心理学文章中实证性研究占了较大的比例,采用的研究方法既有自然实验法也有观察法,反映出当时以艾伟等人为首的学术团队在战争的阴霾下的探索精神,以及对实证精神的坚守。

如果说抗战爆发之前,一些学者如郭一岑、阮镜清开始探索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心理学问题进行思考,那么抗战爆发之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些心理学家参加了革命活动,开始自觉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以其为指导思想开展心理学的研究和探索。

刘泽如(1897—1986)于 1938 年在延安撰写了心理学论文《行为研究举例》,这篇论文是他早年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心理学研究,走上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理论体系之路的标志。曹日昌于 1939 年发表《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读书月报》,第 1 卷第 8 期),提倡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建新心理学的方法。他阐明唯物辩证法是进步的科学方法,心理学应该采用唯物辩证法来建立新的研究方法。

朱智贤(1908—1991),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1936 年曾赴日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教育学研究室做研究员,并准备攻读博士学位。在日本学习期间,朱智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一些社会现象。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朱智贤放弃攻读博士学位,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救亡工作。1938 年前往桂林江苏教育学院任教职。在这里,他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探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并发表相关著作。同时他还在课堂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有关课程,引导学生用唯物辩证法看待心理、意识问题。①

潘菽出生于 1897 年,相继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

① 郭本禹. 中国心理学经典人物及其研究[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277 - 278.

在每个时代,他都紧紧地追逐着进步的潮流,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曾经参加过五四游行示威,是被捕的爱国青年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末,潘菽间接地接触到苏联心理学。后来受其胞兄潘梓年的影响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央大学的红色教授。30 年代后期,他对苏联心理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由此看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改造心理学的前途。他在《回顾六十余年的心理学历程》一文中称:"抗战期间,我虽够不上一个重要的头面人物,但起码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分子。在重庆的八年中,参与发起了九三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进步组织,终日凄凄惶惶,东奔西跑,几乎完全荒疏了'正业'。在此期间,虽然没有开展心理学的实际研究,但仍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专业岗位,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却开始转变了。通过自学,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有了初步的、最基本的了解,并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对心理学中长期争论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研究,以求心理学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道路。"①他认为,心理学之所以发展迟缓而曲折,是因为没有选择正确的哲学观为理论基础。自从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之后,潘菽改变了过去那种希望通过实验来发展心理学的想法,对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从整体上开始重视起来,对心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初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在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程,开拓了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研究道路。潘菽早年接受的是实验心理学的训练,最终成为一位心理学理论家,是有其必然性的,这主要归功于他自觉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心理学研究和探索的指导思想。

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编. 潘菽全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62.

第七章　抗战后中国心理学的恢复（1946—1949）

抗战结束后，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心理学界的发展依然未能完全走上正轨。但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学者依然执著于心理学的事业，在总结心理学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开始谋划心理学事业新的蓝图。

第一节　心理学组织制度的恢复性工作

一、学会组织

（一）中国心理学会复会筹委会

1947年英国心理学会曾经函请萧孝嵘调查中国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萧孝嵘在开展调查的同时，征询心理学同行关于恢复中国心理学会的意见，结果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1948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为提高军事效率，聘请全国心理学家成立官兵心理研究委员会。3月，来自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地的心理学家萧孝嵘、廖世承、杜佐周、艾伟、吴南轩、高觉敷、陈礼江等二十多人举行了官兵心理研究会第一次会议。与会的心理学家主张趁此机会成立中国心理学会筹备委员会，进行恢复中国心理学会的工作。当时召开了一个临时大会，产生了中国心理学会复会筹委会，选出萧孝嵘、艾伟、高觉敷、陈鹤琴、胡寄南五人为筹委，并推举萧孝嵘为召集人。同时推举张耀翔、陈鹤琴、杜佐周负责筹划会刊发行及第一期会刊的编辑工作，其中张耀翔为召集人。另推举谢循初负责筹划共同编撰大学普通心理学教材

工作,推举萧孝嵘、吴南轩、汪敬熙、沈有乾、陈鹤琴五人为出席第12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复会筹委会于1948年4月1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萧孝嵘为筹委会主席,高觉敷为会计,并按照决议案于各地报纸发表复会消息,以便登记旧会员,征求新会员。筹委会办事处暂设在中央大学心理学系。① 1949年3月12日,中国心理学会华南分会成立,选出陈一百、王越、郭一岑等七人为理事。②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心理学家对于学会的组织建设极为重视和迫切,并积极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因正处于新中国建国前夕,战事不断,中国心理学会复会工作在建国前夕未能真正实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12月北京一批心理学家开始聚议谋划中国心理学会的复会工作。

(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于1947年11月12—13日在南京召开了第二届年会,吴南轩、黄嘉音、程玉麐、袁贻瑾等约百人参会,通过多项提案。虽然中国测验学会、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均带有研究范围的相对局域性,但是参与其中的成员和全国心理学研究队伍具有较大的重叠性,因此这三个组织在当时起到组织和沟通心理学研究队伍的作用,使得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具有了信息交流的渠道和组织,增强了凝聚力。1948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上海会员推举吴南轩、粟宗华、黄嘉音、曾作忠、刘沧慈为上海分会筹备委会,黄嘉音为召集人,7月1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分会。另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在重庆也成立了分会。

(三)中国测验学会和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测验学会的会址遭敌寇炸毁。国民政府内迁之后中国测验学会暂设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自1943年以后,该会会务由萧孝嵘主持。抗战结束之后重新选举了理事会,萧孝嵘、艾伟、沈有乾、吴南轩、蔡乐生、陈鹤琴、王书林、廖世承、易克櫄、曹飞当选为理事,萧孝嵘被选举为理事长。中国测验学会曾拟定“战后三年计划”:推进各种测验的应用,如学校智力测验、教育测验、人格品质测验、普通警察智力测验、警官智力测

---

① 萧孝嵘.中国心理学会[J].科学大众,1948,4(6):275.

②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民国广东大事记[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935,953.

验、交通警察及刑事警察特殊能力测验的推行工作;扩大职业指导测验的范围,计划三年内完成各种技术人员甄别测验;进行罗夏墨迹测验及莫里的主题统觉测验修订等工作。

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最初是萧孝嵘发起,由中央大学师生所创,后来参与者众多,社会工作涉及军、政、警、工、医及教育各界。萧孝嵘曾拟定1948年的年度计划,包括下述数项:(1)空军人员普通分类测验已编成四种;特别分类测验已编成数种。(2)新近设立之副官学校,在人事心理上应有合理之训练。(3)官兵心理研究工作,在可能之时应于各地同时进行。(4)发展心理研究工作,应集中于比奈量表的重新修订。

由于当时中国心理学会的组织建设还处于恢复时期,很多本应由心理学学会组织开展的工作难以进行,如心理学名词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当时的一些心理学者从个人的角度来进行的。他们推进了心理学专业术语的规范化。例如,陈孝禅评论了当时出版的《英文新字辞典》中所列心理学名词的翻译错误,明显是因为该书编辑过程中没有心理学家参与其中,而且也没有参考教育部公布出版的《普通心理学名词》和《变态心理学名词》导致的。陈孝禅对一些英文心理学名词建议的中文翻译基本都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译词。①

二、心理学系的复建

抗战结束之后,随着各高校的回迁,一些心理学系纷纷复建,如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等,为心理学教学与科研进行最基层的组织和队伍建设。1947年1月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招收20名本科生,所设心理研究所于1946年招收一名二年级研究生。现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建为例,彰显当时心理学系恢复和重建的情况。

1946年秋季清华大学复员后,心理学系正式恢复独立成系,仍属理学院,周先庚主持工作。随后,敦福堂、唐钺、孙国华等教授相继返校。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图书、仪器在抗战前为全国各大学中收藏最为丰富,虽经战乱损耗严重,但仍保留下了一部分,甚至在抗战时期还有所添置(见图7-1)。复

① 陈孝禅.评英文新字辞典的心理学名词[J].读书通讯,1948(154):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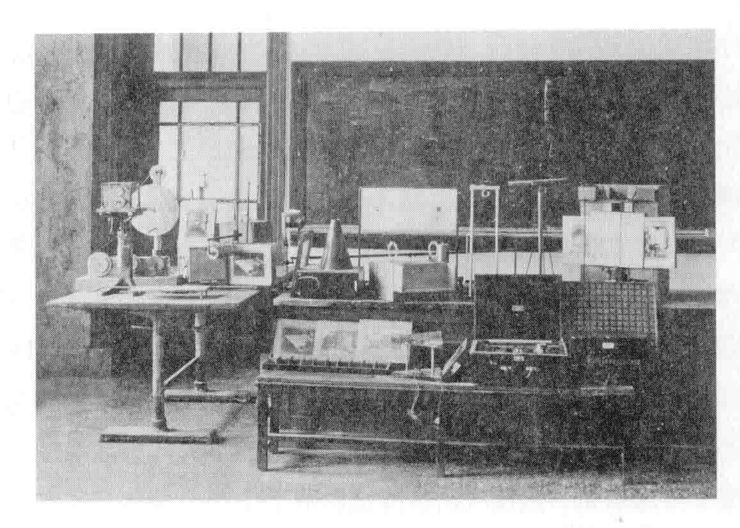


图 7-1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复员后存留的心理学实验仪器
(资料来源：周先庚个人档案,周广业提供并授权使用)

员后一些仪器设备被送到厂家进行维修,同时向国内外书店购置心理学图书、杂志。清华大学生物学馆的心理学实验室再次得以利用,并重新装修以恢复原貌,另外还特意改造一个大教室为普通心理学教室,讲台被装修成一个小型戏台,以便表演心理戏剧,还可以放映幻灯片或电影。1947 年度敦福堂任心理学系代主任。1948 年教师队伍有教授周先庚(赴美休假)、唐钺、敦福堂,兼任讲师臧玉洤、齐泮林,教员吴天敏、林宗基,助教顾吉卫,助理吴洁。孙国华教授于 1948 年下半年回校任教,此时林宗基离校赴法留学。1948 年度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共有 10 名本科生,1947 年毕业生为施泽翰、1948 年毕业生为郭长桑、1949 年毕业生为姜德珍。复员后短短几年时间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学基本恢复,研究工作也具备一定条件。该系定位是以训练专门学术研究人才为主,而不是为中学培育师资,因此在招生方面一直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在学生培养方面注重心理学实验技能的培养。①

三、心理学国际交流

中国心理学界与国际心理学界的交流初步恢复,1945—1949 年国内一

① 部分资料取自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资料. 本校各院系略述・心理学系[J]. 清华校友通讯,1948(4):5-7.

些心理学家陆续到国外进行访问交流或攻读学位,开始加强中国心理学界与国际心理学界的沟通和交流。1945年,曹日昌赴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陈汉标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1946年艾伟代表教育部和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出席澳洲新教育同志会国际会议,会后在澳洲留学半年。丁瓒获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资助于1947年9月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麦克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进一步深造。周先庚获得美国援华联合会奖励于1947年10月赴美进修访学。1948年李家治赴美留学研读工业心理学。丁瓒和程玉麐参加1948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心理卫生协会会议,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国际心理学同行建立或恢复了学术联系。这反映出在战乱影响下中国心理学在某些领域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成为中国心理学家向国际同行交流的基础,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心理学家迫切需要与国际同行进行沟通和交流,以获得国际上心理学的前沿性知识,为发展中国心理学而汲取营养。1949年自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心理学者有吴坤淦和林传鼎。

这一时期,中国心理学界与苏联心理学界的交流和联系日渐密切,尤其反映在对巴甫洛夫学说的学习和宣传方面。早在1934年中国生理学会选举巴甫洛夫为名誉会员,1935年几位中国生理科学工作者出席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15界国际生理学会议,此次大会由巴甫洛夫亲自主持。[①] 1936年2月27日,巴甫洛夫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发去唁电,代表中国学界表示哀悼。随后国内各大报刊纷纷刊发巴甫洛夫的去世消息和纪念性文章,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达到第一个高潮。此时国内心理学界对巴甫洛夫学说的态度,以郭一岑的观点为代表:“我们对巴夫洛夫(即巴甫洛夫——引者注)的纪念,固然要尽量地指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但亦不掩饰他的缺点,我们不想把他奉为一个教主,亦不愿把他的学说当为一种万古不变的真理。”[②]

1949年9月,潘菽、冯德培、季钟朴应邀赴苏联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同期国内北京、上海举行了巴甫洛夫纪念会。潘菽等三人回国后,于10月28日参加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举

① 赵以炳.十年来巴甫洛夫学说在我国的成就[J].生物学通报,1959(10):468-471,475.
② 郭一岑.纪念巴夫洛夫[J].教育杂志,1936(6):1-4.

行的座谈会,介绍苏联纪念巴甫洛夫的情况。很快,轰轰烈烈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运动在国内发动了起来。1949 年第六期《科学通讯》报道了潘菽、冯德培等参加座谈会介绍赴苏参加纪念巴甫洛夫百年诞辰活动,以及周先庚的译文《巴夫洛夫传略》,为 1950 年之后国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巴甫洛夫学说学习运动拉开了帷幕。

第二节　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延续

抗战之前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在中国都相继开展了基础性的、开创性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抗战期间,中国心理学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以往取得的成绩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严重的破坏,仅某些领域基于战时社会、教育的需要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军事心理学、人事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抗战结束后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恢复时期,科学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十分恶劣,组织建设和研究队伍有待恢复,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相对停滞。就研究队伍而言,抗战前后十年间,派出留学研习心理学的学生寥寥无几,回国任教者仅有一二。1946—1949 年,中国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对抗战时期相关研究的总结和延续,主要体现在教育心理学、心理卫生与指导、国防心理学和人事心理学等几个方面。

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

这一时期教育心理学的著作有王凤喈和廖人祥编著的《教育心理》(1946)、张仲友编的《教育心理学》(1947)、蒋文茂编的《教育心理学》(1948)、高觉敷著的《教育心理》。可以看得出,这些著作均是当时师范学校的教科书,是根据当时教育部新修订的课程标准满足教育需求编订的。

艾伟对抗战以来国内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工作进行了汇总,共计二百多项专著和实验报告,较为完整地体现出抗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艾伟认为,抗战结束之后国内教育心理学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继续开拓,或许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国家。艾伟同时将视野投向国际,分析了国际上教育心理学的新趋势,如教育心理学范围在逐渐扩大。他借此批评了当时国内关

于减少师范学校教育心理学学分的主张，同时他还反对将教育心理学简单地视为“心理学在教育上的应用”或“教育系学生用教育心理学”的看法，应该立足研究教育心理学范围内的主题，以此来发现新的结果，并以之制定新的原则。[①] 由此可以看出，艾伟很强调教育心理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尤其不能简单地将教育心理学附庸于教育，这样的观念在当今也具有重要意义。

黄觉民先后发表了《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读书通讯》，第 132 期，1947)和《教育心理学的演进趋势》(《教育通讯》，第 5 卷第 6 期，1948)。前一篇文章为概述，涉及教育心理学的定义、内容、意义和研究方法，并附录了 1931 年以来国内外教育心理学的书目。后一篇文章指出，自 1940 年后，教育心理学改变了以往仅将其视为普通心理学在教育上应用的观点，而是专注于教室及其他实际教育情况，研究对象由动物学习行为转移到人类学习行为，由学科心理扩展到研究学科以外的教学行为，进而展开人格对社会的适应问题，并涉及整个教育问题。此文中黄觉民还对十五部英文、两部中文(分别是黄觉民和萧孝嵘所著)的教育心理学著作的内容进行了评述。

在汉字心理、中文阅读研究方面，有艾伟的《汉字心理研究的总检讨》、龚启昌的《中文阅读心理研究之现阶段》，以及艾伟的专著《国语问题》。艾伟以教育的科学化为追求目标，用了 20 多年时间致力于探讨小学国语阅读心理。《国语问题》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中国心理学在 1949 年之前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艾伟曾对多个省份近百所中小学的 3 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涉及阅读兴趣、朗读与默读的比较、默读练习的功效、默读能力、辞句与文句的学习、作文错误与能力问题等内容。艾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国语教学提出了诸多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以中国当时教育实际情况为根据的，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艾伟的研究成果以教育实验为基础，扎根于中国教育现实，并利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获得，因此它在当时对于国语的教与学起到了指导作用，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① 艾伟. 抗战八年以来的教育心理学[J]. 文化先锋，1946(18/19)：7 - 17.

二、心理卫生与指导

1949 年之前,心理卫生与指导方面的著作有《心理卫生与儿童教育》(杨鸿昌,1948),《精神疾病和心理卫生》(冯鸿,1949),《儿童行为指导工作》(汤铭新,1948),丁瓒的《青年心理修养》,吴桢翻译普莱斯敦(George H. Preston)的《心理卫生十二讲》(1948),等等。其中《心理卫生与儿童教育》一书的作者杨鹏昌自称是一个心理不十分健康的人,精神的不适,情绪的烦扰使他感到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并认为自己痛苦之源是他在儿童与青年期的经历。为了不让将来的新一代人有同样的遭遇,故编著了这本书,以期对儿童开展更好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得以健康地成长。心理卫生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推动确实与一些人亲身经历过心理困扰有一定关联,如比尔斯、詹姆斯。感同身受是心理卫生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杨鹏昌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亲身经历过心理困扰成为参与心理卫生运动动力的例子。

1946 年汤铭新结束了成都儿童指导所的工作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复员回到南京。当年秋季儿童指导所重新开展工作,选取了约 50 多名儿童进行个案研究。与此同时,儿童指导所还协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儿童福利实验所以及社会部儿童福利实验区第一儿童福利站研究和矫治有异常行为的儿童。复员伊始,当时国民政府拨大笔经费在南京成立精神病防治院,延聘曾对心理卫生运动有重要贡献的精神病学权威程玉麐为院长,这是当时我国自办的第一家心理医院。同时卫生部与国际卫生机构合作聘请了美国精神病学会会长鲍曼博士(Karl Murdock Bowman,1888—1973,旧译波门)担任我国精神病学方面设施的顾问,曾在中国开展多次公开演讲,深受欢迎。1947 年汤铭新主持的儿童指导所与程玉麐合作开办了儿童指导门诊,附设于中央医院门诊部神经科。汤铭新利用在成都对 60 名儿童开展指导工作获得的资料撰写了《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一书。该书包括儿童行为指导工作概述、儿童行为指导工作分论、儿童行为指导个案记录举例三编内容以及儿童指导所登记表、生活概况与行为调查表、行为概况发展表、个案研究大纲等附录资料。该书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儿童心理卫生与指导实践的案例资料,是当时国内儿童指导工作不可多得的杰作,对于当时儿童心理与指导工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抗战结束之后,曾经的心理卫生运动重镇上海开始了相关工作。粟宗

华在虹桥疗养院(Hungjao Sanitrium)指导的精神病区中设立治疗所,收治精神患者进行团体治疗。心理卫生促进会试图重新开展活动,但是专业人员的流散使得工作难以开展,不过其中一些成员经常被邀请到各处演讲,传播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知识。1948年,经由上海国际礼拜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上海儿童福利委员会(Shanghai Advisory Committee for Child Welfare)和孤儿乐园(Boy's Town)发起,合办了一所儿童指导诊疗所。

当时国内的一些杂志经常刊发一些心理卫生与健康方面的文章,如《西风》、《西风副刊》杂志,它们对推动心理卫生运动一直不遗余力,作为编辑的黄嘉音在其中功不可没。一些医学杂志也积极宣传心理卫生工作,如《医潮月刊》、《西南医学杂志》。一些教育类杂志如《四川教育通讯》则关注教师心理卫生以及教师对于推进心理卫生的责任等问题。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心理卫生工作仍在各个方面得以继续推进。

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卫生思想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如张瑞璠发表了《老子的心理卫生》一文,文中指出"心理卫生"一词在当时中国非常新鲜,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原本不懂得什么是心理卫生,因为中国文化中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主张心理卫生,只是后人没有进行系统研究而已。他认为,针对个人欲望与现实、自身、社会条件之间的冲突这三个心理疾病的根源,老子提出了去欲、尚俭、知足、不争、合群等心理卫生的方法。① 另外,胡忠智的《中国固有之心理卫生学》中认为孔子所论的智仁勇可谓心理卫生的积极目的,不惑不忧不惧可谓心理卫生的消极目的。作者还整理了中国文化中正心、乐道、淡泊、去甚、闲赏、娱乐、适应、达观、心疗、自慰、小劳、整洁、省节、炼身等十四种心理卫生的方法。董华农发表了《中国心理卫生导论》(《现代医学杂志》,1948)和《中国古代的心理卫生学》(《华西医药杂志》,1948)两篇文章,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科学的内容,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健康心理的标准为同(同年龄相符的人心理表现相同)、刚(完整的人格)、毅(毅然的面对现实)、本(正常的情绪)、讷(勇于行其预定的计划)、仁(适应合群),作者认为如此心理健康标准的确立是完成中国心理卫生学的第一

① 张瑞璠.老子的心理卫生[J].文化先锋,1946,5(16):9-12.

步。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学者积极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内涵,以期为心理卫生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心理卫生的方法与标准。①

三、国防与人事心理学

抗战时期,军事心理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抗战结束之后,以南京中央大学萧孝嵘为首的一批学者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和探讨,并拓展到国防心理学这一领域。"国防心理学"一词译自德文 Wehrpsychologie,英文译为 military psychology,翻译成中文则为"军事心理学"。"国防心理学"与"军事心理学"两词对象虽有雷同,但含义略有差异,国防心理学较为广泛,可以涵盖军事心理学,同时也包括航空心理学、宣传心理学等诸多内容。抗战前后萧孝嵘在参与军事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就积极推动过国防心理学的建设,如相继发表了《国防教育与军事心理》(1936)、《国防心理之理论与实际》(1945)。在后文中萧孝嵘称,国防心理是指凡与国防有关的心理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国防心理研究的目标在于使影响国防工作的物质(物资分配、薪资制度、生活情形)、体内(能力、倾向、疲劳、工作与休息时间分配)、生活(风俗、习惯、法典、理想、人生观、国家观念、民族思想)等因素能有适合的配合,以引起有利于国防工作的行为,并制止有害于国防工作的行为,以提高国防工作效率,预防或排除一切有妨其效率的因素。1947 年光中发表了对德国国防心理学研究所参事兼科学指导官西蒙内(Max Simoneit)著《国防心理学》的介绍性书评,认为应该汲取德国国防概念超越军事范围而具有广阔性的特点,如"国防是关于精神方面的事","国防心理学的目的是增加民族战斗力"等先进的理念。唐志杰则发表了《关于国防心理学的问题》和《国防心理学现况》两篇文章。在前文中,作者认为国防心理学问题需要专门机构进行研究,并提出以下建议:应网罗国内军事心理学权威,成立国防心理研究委员会,负责设计、审议军政军务以及兵员的合理运用,或者设军事心理学研究所,从事心理的研究调查或实地指导。在后文中作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防心理学在德国、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现状,呼吁国内也应大力发展国防心理学以保证国防安全。

---

① 董华农.中国心理卫生导论[J].现代医学杂志,1948,4(5):11-12.

1948年第2期《国防月刊》刊发了“国防心理专辑”，发表了20多篇文章(部分为译文)，涉及国防心理学的内涵、官兵心理、航空心理学、工作效率、舆论心理、谣言心理、军队人事心理、军事心理思想等内容，文章的作者有萧孝嵘、邓文仪、王凤喈、廖人祥、程玉麐、桑灿南、徐时中、王徵葵、吴南轩、刘范、路君仪、程法泌、丁祖荫、胡寄南、谢循初、朱希亮、唐志杰、方辰、张义尧、王书林、沈有乾、高觉敷、李仲生、程克敬、黄坚厚、潘渊、曹飞等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参与这一领域讨论的学者包括国内心理学界的众多知名学者、专家。从该专辑的各篇文章主题来看，介绍性编译文章居多，涉及的一些具体研究主题几乎均为翻译文章，如飞行员的疲劳、高空航行时生理与心理的变化、军队训练中视觉辅助工作的应用等内容，这也反映了当时国防心理学还处于初创阶段，实证性研究因没有足够条件而难以开展。萧孝嵘在抗战时期曾受军事机构委托开展相关工作，并有多种著作出版。军委会干训团和青年军编练团总监部成立了军事心理研究委员会，曾邀请萧孝嵘主持工作，终因无法邀请全国心理学家参加、人员较少，研究工具无法制造等诸多因素，虽有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但仍被萧孝嵘认为不尽如人意。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内心理学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性，人才匮乏，倡导心理学科学研究的人偏少，当局不够重视，再就是当时国民革命军空军及机械化部队人员的选拔与训练多委托美国代为实施，导致依赖心过强，自谋发展的需要因此弱化了。①

当时的几篇国防心理学文章值得注意。程玉麐在《中国驻印远征军之精神病概况》一文中呈现了当时该军队中精神病发生的情况。当时因为国民军部队难以称得上现代化军队，缺少相关的精神病甄别工作，而远征军是与英美协同作战，部队中有相应的精神病学家及甄别手段和措施，使得远征军中患精神病的士兵得到了甄别。当时十万中国驻印远征军中有150名精神病患者。1946年1月程玉麐被派往云南视察当地休养院中所剩的104名患者，其余46名患者在回国途中已痊愈，大概是因为病情较轻，随着战争威胁解除或回家的愿望得以实现而告痊愈。程玉麐对104名患者的资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包括年龄、籍贯、军衔、教育程度、智力、症状分

① 徐时中. 国防心理发展概观[J]. 国防月刊，1948，5(6)：16－25.

析、诊断等信息。程玉麐指出，这些患者中的功能性障碍者自述思念家乡以及受到军官不合理待遇是他们致病的起因。另外，智力低下而有机会享受舒适、奢侈生活的士兵在军队中比较容易患精神疾病。这一报告为当时中国部队中精神病发病情况留下一份珍贵的实证性资料。① 潘渊在《吾国古来军事心理之鸟瞰与夫今日之应重视》中简要分析了自上古以来，中国文化中军事心理思想，如利用"敌忾同仇"心理，以"躬行天罚"激励士气的例子，以此彰显中国古代文化在当时军事心理学上的应用价值。另外，萧孝嵘提出了心理国防概念，即家庭、学校、工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心理建设，显然这与当时心理建设这一主张有着密切联系。

抗战前后，萧孝嵘大力推动了人事心理运动，抗战结束后，他仍一如既往地进行相关的探讨和工作。人事心理运动与心理测验在中国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心理测验的应用就可视为人事心理的实践工作。人事心理的目标包括择人以求其适合工作，调整工作使之能适合人，了解每个人的动机与兴趣，并研究其引起和保持的方法。② 萧孝嵘则概括为两个目标：一是个人效率的提高，二是人类幸福的增进。③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以萧孝嵘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包括教育、警政、军事、心理卫生等方面的各种心理测验工具的编制和修订，从而使人事心理研究工作逐渐渗入一切人事工作的部门。在理论方面，当时的人事心理工作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萧孝嵘使用"全人发展"一词)的概念，在具体技术上，对个别分析的心理技术也十分重视。萧孝嵘在开展人事心理的过程中，还开展过中国民族性的研究，调查过一万多名儿童与青年，希望在此基础上发现我国民族的心理基础，以此确定心理建设的有效计划。当时还开展了警察心理的研究。早在1938年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警政司与萧孝嵘合作成立了"警察智力测验室"，专门主持警察心理测验的编制与推广，借这些客观方法甄选优秀的警员。这是使用科学方法以筛查人员特质的开始，也是我国人事心理实际应用于行政工作的发端。抗战结束之后，警察署为配合开展警察心理测验工作，还专门印行了如何实施这两种测验的指导性资料。在这方面，李兴唐相继发表了《警政

① 程玉麐. 中国驻印远征军之精神病概况[J]. 国防月刊，1948，5(2)：15－23.
② 徐儒. 人事心理学的发展[J]. 新中华，1948，5(1)：50－52.
③ 萧孝嵘. 中国人事心理运动的基础[J]. 申论，1948，2(5)：3－5.

人员心理测验之发展》(1947)和《刑事警察心理特质之分析研究》(1948)两篇文章。前文总结了我国警政人员心理测验工作的发展,列举了当时编订完成的普通警察智力测验、警官智力测验、普通警察心理测验、交通警察心理测验、刑事警察心理测验、第一种警官品格测验等六种心理测验工具。1948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还曾专设军事心理学论文奖金,征集民族性的研究、兵种工作分析及其特殊性能测验的编制、影响士气因素的分析研究三个方面的论文,以此推动军事心理学的发展。①

无论是国防心理学还是人事心理运动,都反映出当时以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萧孝嵘为首的心理学工作者积极推进心理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性发展,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尤其是在行政人员选拔中采用心理测验技术,更是开创了行政科学化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工作充分反映了当时一批心理学家对心理应用价值的重视,并希望通过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理想。

① 国防部政工局设置军事心理学论文奖金[N]. 西大周报,1948-11-20.

第八章　东西方心理学的交流

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在西方接受心理学训练之后回到祖国，开始了中国心理学的学科开创和建设工作，并成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主体。但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并不是独立于西方心理学进行的，东西方心理学之间存在着交流和互动，这些交流和互动构成了中国心理学发展的部分驱动力，同时也是心理学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来华的西方心理学家

一、克雷顿、瓦尔科特、麦柯尔

1915 年，英国人克雷顿(J. Scott Creighton)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曾对 500 名儿童试用过心理测验，施测的项目有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1918 年，美国教授瓦尔科特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他曾在清华学校使用推孟的修正量表测验该校学生智力，这是西方学者应用西方成熟规范的量表在中国的最早尝试。后来成为人类学家的李济当时被瓦尔科特测得智商为 128，也曾被他告知，要学心理学就要到美国克拉克大学，李济后来果真赴克拉克大学研习心理学。

1922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教育心理测验专家麦柯尔来华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心理教育测验研究主任，主持编制测验工作(见图 8－1)。麦柯尔 1911 年毕业于坎伯兰学院(Cumberland College)，获理科学士，1912 年又在林肯纪念大学(Lincoln Memorial University)获得文科学士，1911—1913 年任林肯纪念大学心理学讲师。1914 年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

院,获得硕士学位。1915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心理讲师,1916 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1917 年夏任皮博迪教师学院(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教育心理讲师。1919 年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助教,1923 年升为副教授。曾任美国教育联合会会员,美国科学改进社会员,美国心理学会委员,美国全国教育研究会董事会董事等。著有《教育测验与心理测验的关系》(*Corrleation of Som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教育中如何测量》(*How to Measure in Education*)等书。



图 8-1 1923 年 3 月 31 日北京高师平民教育促进社欢迎麦柯尔博士留影

(资料来源:《教育丛刊》1923 年第 4 卷 1 期)

1922 年 9 月 10 日和 18 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下,麦柯尔和中国心理与教育测验界的人士分别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召开谈话会,讨论教育心理测验的编造办法及其进行计划。参加者有陆志韦、廖世承、陈鹤琴、俞子夷、陶行知、刘廷芳(与麦柯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是同班同学)、张耀翔等近 20 人。20 日,该社通过了《麦柯尔之研究调查计划》,商定以南京、北京为南北两大测验中心,并由两地教育心理统计教授协同麦柯尔进行各地的调查研究。其调查计划包括叙述之调查、实验的研究、

求因之调查三类，叙述之调查计划编造初小、高小、中学、大学智慧、算学、国语、历史、地理等24种测验。① 麦柯尔一行先后在广州、上海、苏州、南京、武昌、天津、北京等地调查研究，中外学者30余人合作编制了42种测验，包括智力测验10种，教育测验23种，特别测验及有关材料9种。在此过程中，被麦柯尔奉为圭臬的TBCF制②得以完善。TBCF制，不仅是麦柯尔编制各种测验的基石，同时也是其培养和训练测验人才的重要内容。

除了指导编制各种测验之外，麦柯尔来华的另一个任务便是培养和训练测验人才。1922年下半年，按照拟定计划，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东南大学合设"测验之编造与应用"课程，麦柯尔被公推为由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俞子夷等人士组成的导师会主任。1923年3月，麦柯尔结束了在南京的服务转赴北京(见图8-1)。麦柯尔在北京尚志学会会同北大、北高、燕大、女高四校心理学教授及学生，讲演并编造心理测验，每周三下午麦柯尔讲演，周五下午在他指导下分组编造心理测验，这样一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学员们掌握测验的理论和技术。同年6月底麦柯尔应邀到北大以"智慧与中华社会的前途"为题发表演讲。8月6日至18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高举办施行教育心理测验首期讲习会，请麦柯尔和刘廷芳担任主讲，学员295人，为各省的省视学及县视学、教育局长或劝学所长、中小学校校长、师范学校专任教员及教育心理委员。21日，麦柯尔又在该社的第二届年会上做了主题为"教育心理测验"的讲演。另外，麦柯尔的弟子德尔满(E. L. Terman)硕士也在华参加了教育测验的工作，曾任教育心理测验研究副主任，燕京大学教育测验教授，1923—1924年间曾赴各地开展教育、心理测验的工作。

麦柯尔来华的交流和工作，为中国教育与心理测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当时的教育刊物纷纷发表麦柯尔在华期间的有关论述和讲演。对于麦柯尔在我国近代教育与心理测验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时许多教育界人士给予了评价。《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回顾我国教育测验的发展历史时指出："至麦柯尔来华，于是中国测验运动发展极速。"③"在麦柯尔的指导下所编的测验，照当时的标准测验，大多数都是很满意的。……我国的测验

---

① 麦柯尔之研究调查计划[J]. 新教育，1922，5(4)：173-174.
② TBCF制，一种测量编制法，其中T：total ability；B：brightness；C：classification，F：effort。
③ 中华民国教育部，编.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M]. 上海：开明书店，1934：193.

运动,可说是在那时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1][2]

二、塞勒(夏仁德)

塞勒(Randolph Clothier Sailer,1898—1981,中文名字夏仁德),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1922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分获硕士、博士学位。另外,他还曾在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过一年的神学课程。1923年8月,他来到中国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并在中国与路易斯·埃伯格(Louise Egbert)结婚育子。1943年曾被日军关进集中营,当年9月被送回美国。1945年夏仁德来到内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后复员回北平。1950年8月夏仁德返回美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夏仁德政治思想是进步的。1932年他在心理卫生课程的指导参考书中,向学生推荐了《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籍,启发了一批学生探索马列主义真理的要求。夏仁德在当时对许多进步学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支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1973年夏仁德应邀来华访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受到高度赞誉。

夏仁德在燕京大学讲授过多门心理学课程,如心理卫生、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1930年前后夏仁德在大学一年级中开设了心理卫生课,这门课程在当时燕京大学备受关注,每年有大量的学生选修这门课程,甚至被学生们传称,没有选修过心理卫生课程,就不算来燕京大学读过书。在夏仁德的课堂上,每个学生都要写出一篇传记或列举出心理问题,他要与每个学生至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讨论学生所写的传记或提出的各种心理问题。另外,他不主张用演讲、讲道德方式填灌知识,更愿意使用问答的办法,帮学生用自己的思想来取得解答。他经常将大班分成小组,分组讨论各种心理问题。[3]夏仁德的课程试图教给学生们如何分析自己的心理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并传授给学生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摆脱不正常的心理反应,走出自我中心的状态,达到和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使得青年学生能够客观冷静地处

① 曹日昌.我国测验运动的回顾与展望[J].教育杂志,1940(7):5-8.
② 王剑.麦柯尔与中国近代教育实验[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328-332.
③ 高君纯.一位出类拔萃的伟人[M]//夏仁德先生纪念册编辑组,编.夏仁德在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9-15.

理问题，最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个体。夏仁德的教学对许多学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的解决了自身的心理困扰，有的则走上了心理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经过多年的教学积累之后，夏仁德将他的讲义加以整理出版了 *Personality and Everyday Behavior*（《人格与日常行为》）一书作为授课教材。该书共分人类行为的原因、何谓人类本性、解决困难的方法、满足方式如何改变、幸福、无私、满足自我、性、适应良好的人格以及儿童、个体与群体等章内容。每章的最后都会列举出一些心理或行为问题供学生思考和讨论，有时候在章内每讨论一种调节心理的机制或效应也会列出一些问题。该书最后还列出了 22 个典型案例，它们都是选自夏仁德课堂上学生们提供的传记资料。[①] 夏仁德的同事夏云还为书中部分术语提供了一些汉语翻译，夏仁德指出，这些汉语术语用的并不是它们的原初本义，用在书中是因为它们为理解一些新内涵提供了便利。夏仁德这部心理卫生教科书产生于中国社会背景下的教学实践，其部分内容既是源自对当时大学生群体心理状况的观察，同时又因其内容契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而对当时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好的指导价值。

作为一位西方心理学者，心理学研究的文化差异问题也受到夏仁德的关注，他和陆志韦在美国《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一篇《中国学生的自我评估》的研究报告。该研究的起因是有学者在美国以 18 名中国学生进行测评之后称他们在六项希望品质（desirable trait）上自我低估倾向相当明显。陆志韦和夏仁德在东南大学选取了 20 名学生，对清洁、美、勇敢、活泼、精明等五种品质进行自我评估，在燕京大学选取 40 名男生、35 名女生在诚实、忠诚、耐心、无私、体魄、幽默感、智慧、爱美、友善、自负等十项品质上进行自我评估。由 C. H. Chee 从上述被试中选出 20 名男生和 10 名女生在 10 个行为项目上进行自我批评（criticism of self）和他人批评（criticism of others）的评定。另由 Chun－Pin Hu 以 249 名五年级至九年级的学生对 40 项中文项目按照他们自己的感受、他们认为多数其他人的感受以及他们认为应该如何感受这三个方面，从“不喜欢”到“非常喜欢”进行 5 级评定。在以

① Sailer, R. C. (1935). *Personality and Everyday Behavior*. The San Yu Press.

上品质排序(trait ranking)、品质评定、行为评定和喜恶评定(rating of likes and dislikes)四种研究技术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显示,相比于对他人的评估,中国人自我高估趋势是一致而决定性的。陆志韦和夏仁德同时指出,尽管上述研究中的实验材料是中文而非英文,研究信度问题也未进行考察,但很明显,在美国环境中研究得出中国人自我评估偏低的结果是不可靠的。这可能与匿名状态下缺乏自信或在国外学习引发的精神状态有关,而不是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可以说陆志韦和夏仁德的研究无论是从被试数量、代表性,还是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上都比较完备,其结论更为可靠。[①] 这样的研究报告在国际上发表,对于正确开展中国人的跨文化心理与行为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和意义。

三、莱曼

莱曼 1921 年毕业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曾受教于美国精神医学家梅耶,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1953 年他先后到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多所著名大学从事精神病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医疗工作,如1930—1931 年,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系,与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教授一起工作。1931 年,莱曼应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之邀,受聘于该院讲授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课程。1932 年莱曼受聘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任精神病学教授和系主任。抗战爆发后,1938 年莱曼回国任教。抗战胜利前夕,莱曼参加了莫里领导的盟国战略服务局在中国开展的伞兵选拔工作。

在中国工作期间,莱曼自己捐助资金,在中国搞神经精神病学研究,为中国神经精神病学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还培养或指导了像粟宗华、许英魁等这样的中国神经精神病学宗师,帮助中国学者联系到国外进修的机会以及开展科研、教学和著书立说等。莱曼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脑系科任职时,与中国心理学界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例如 1934 年他让周先庚推荐心理学毕业生,周先庚推荐了赵婉和、粟明舆两名女生到莱曼那里工作。清华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当时新购置了达劳行为研究照相多道记录仪(Darrow

---

① Luh, C. W. & Sailer, R. C. 1933. The self-estim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 245 - 249.

behavior research photopolygraph)，莱曼当时建议周先庚用该仪器去记录神经病人的皮电、呼吸、血压以及手口联合动作，于是周先庚受邀到协和医学院脑系科任名誉讲师(honorary lecture)一年(1934—1935)。周先庚每个星期六到脑系科实验室与赵婉和工作一次，用记录仪替莱曼记录神经病人的各项生理和联想-行为变化。1937 年莱曼发表了《精神病学在中国》(*Psychiatry in China*)一文来介绍了精神病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况，他认为精神病学家梅耶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国家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包括中国。东西方情况的不同，致使不可能使用同样的工具测量适应不良问题。在中国，社会情形的应对、对群体结构的适应等方面成功与失败的问题十分突出，而在西方更为强调个体身上的情绪冲突。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本土的精神病学，行为失常者往往是由其所在家庭承担照管的责任。莱曼还追溯了 1873 年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在广州创办精神病院一事，以及哈尔滨、沈阳、苏州等地精神病学的发展情况。莱曼指出，精神病学在中国的发展受制于专业人才和经费支持的缺乏，虽然当时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已经成立，但是仍有待人们真正理解精神病学的价值。莱曼还讨论了精神病学作为一门专业知识，如何利用中国语言表达出精神病学基本概念的问题，其中梅耶的一个学生 Robert P. K. Wang 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莱曼认为，中国文化没有表现出对精神病学的抗拒，为其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随着精神病学在中国的发展，其研究数据和成果将会对比较种族精神病学(comparative racial psychiatry)有所贡献，进一步阐明社会和文化所起的作用。① 后来莱曼出版了一本《神经精神科学在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Neuropsychiatry in China*，1939)，报告了当时他指导和开展的各项研究成果。另外，留美博士徐恩锡也曾在莱曼那里参加临床心理学工作，日后成名的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也曾在此任职。以莱曼为首的协和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展了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精神分析实践与研究，精神疾病的社会学研究，精神疾病愈后和出院的分析，成瘾者的治疗与照料，警察与精神医学的合作情况，语言障碍的实验研究，精神疾病的思维和失语症的研究等。②

① Lyman, R. S. (1937). Psychiatry in China.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37(4): 765 - 771.

② 王文基."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J].新史学，2006，17(1)：91 - 142.

四、哈尔彭(韩芬)[1]

哈尔彭(Fanny Gisela Halpern,1899—1952,中文名字韩芬),奥地利犹太人,192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专业。哈尔彭对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十分感兴趣,于1924—1933年跟随瓦格纳-尧雷格(Wagner-Jauregg,192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曾就学于阿德勒。弗洛伊德也曾在此任教。哈尔彭曾任维也纳医院内科医师和维也纳大学神经系教授。1933年,莱曼从国立上海医学院离任赴北平协和医学院任教。中国政府请奥地利方面派人来华指导精神病医疗事宜,时任维也纳精神病院院长的瓦格纳-尧雷格派哈尔彭来华。1933年11月,哈尔彭受颜福庆的邀请就任国立上海医学院任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教授。1934年哈尔彭开始讲授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课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创建精神病科,以国立上海医学院为教学医院。同一年,哈尔彭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以培养精神病学护士,其学生既有国立上海医学院的,也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上海女子医科大学(Wome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这三所学校再加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中国正式开设精神病学课程的四所院校。1935年6月,慈善家陆伯鸿出资兴建了第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化的精神病医院,即上海普慈疗养院(Shanghai Mercy Hospital for Nervous Diseases)。哈尔彭积极参与了该院的筹备、计划和建立等工作,后任该院的医务主任(Medical director)。这所医院拥有600个床位,11栋建筑,也成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当时缺少训练有素的中国医护人员,医院还停留在传统的不科学的看护病患的方法水平上,也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哈尔彭克服了以上种种困难,成功地将现代精神病学医护和治疗方法引入这所先进的医院,并很快开始接受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患者。同时,哈尔彭还被几家大医院聘请为顾问、精神病科主任等。

1935年11月,广州召开了中华医学会第三次年会。哈尔彭报告论文从医学、社会、法律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精神病学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几个方面的问题:培养从事精神病学的医疗、护理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需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精神病学医

---

[1] Westbrook, C. H. (1953).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Shanghai.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0: 301-306.

疗机构；实行预防精神疾病和促进心理卫生的措施，开设培养教师和指导儿童行为的诊所和学校，开设对弱智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培养掌握精神病知识的社会工作者，创办进行精神病治疗的诊所；通过立法修改中国法律中有关精神错乱和失常的条款，包括收治、释放、法庭鉴定等条款。① 此次大会上决议组织精神病学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精神病学专家，颜福庆为主席，哈尔彭为秘书。1936 年 2 月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将首要任务定为将精神病相关草案呈交国民政府，并将此任务交给由哈尔彭、沈克非、朱恒璧以及两位律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完成。后因抗战爆发，这项计划被搁浅，但是此次会议活动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卫生工作的宣传和推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自 1935 年开始，哈尔彭就开始推动开展心理卫生工作，最初由谢里夫协助，后由韦斯特布鲁克协助教育项目的组织和联络，以及发展学生对临床、人格心理学、精神卫生兴趣等工作。1938 年 6 月 29 日成立了上海精神卫生委员会，并由哈尔彭、谢里夫和韦斯特布鲁克开展制定培训项目计划、启动培训班、制定规章制度草案等工作。此后该委员会由中国医学协会改组为下属的精神病学委员会。一个将护士、教师和社会人士培训成精神病学义工(psychiatry aids)的项目得以开展，谢里夫任培训主任，哈尔彭为培训班提供精神病学培训，圣约翰大学心理学讲师格莱格(Alice Gregg)讲授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概论性课程。哈尔彭在由 70 人参加的培训班上讲授了 14 周的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卫生学课程，并组织学员到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进行临床观察，经培训后约有 50 人达到要求，能够在需要之时提供有效的帮助。另外，韦斯特布鲁克还与陈选善、陈鹤琴、张耀翔、沈有乾、何清儒②等人拟定了一项开展智力低下儿童的筛选工作，计划从当时上海 50 多所战时避难所中将部分痴呆和智力低下儿童筛选出来，评定他们心智和需求并研究相应的治疗方法。但是方案未及实施，这些避难所就被解散了。

1938 年 3 月 8 日精神卫生所(mental hygene clinic)委员会成立，由哈尔

---

① 徐步曾. 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41－242.

② 英文资料显示此人为 Dr. C. T. Ho，director of the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中文资料写的是 Dr. C. H. Ho，全国职业教育会研究指导。中国职业教育家何清儒的英文名为 C. J. Ho，故判断此处所指是何清儒。

彭任负责人,准备于1940年1月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下的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 No. 1)开设上海第一个精神卫生所。1939年1月开始为诊所培训小规模的服务志愿者,韦斯特布鲁克为受训人员讲授了智力测验及实施方面的课程,志愿者经过受训后要能正确实施斯坦福-比奈测验修订版以及其他基本形式的测验。陈鹤琴还在上海一所公立学校利用他的团体智力测验配合进行了一次演示性教学。最后有六位志愿者达到了培训要求,其中一位是谢里夫,同时她还出任教育咨询者(educational adviser)和秘书。为了更好地开展心理卫生工作,1939年下半年哈尔彭利用6个月时间专门赴英国、美国考察精神卫生诊所和培训机构。1939年12月哈尔彭返回上海,出任新成立的精神卫生所主任,医学和精神病科负责人。韦斯特布鲁克负责心理学和心理测验科的指导工作,谢里夫在教育指导科出任咨询者从事督导工作,凯特(C. Cater)负责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科的工作。这些工作者除了在精神卫生所的工作之外,还要同学校、避难所、慈善机构进行合作。还有一些志愿者到监狱中开展社会工作,一些教育专业的学生开展对迟钝儿童的教育工作。

1940年5月,精神卫生委员会改组成上海精神卫生联合会(Mental Hygiene Association of Shanghai),中文名亦称上海心理卫生促进会。上海心理卫生促进会会长是沪江大学的韦斯特布鲁克教授,副会长黄嘉音(《西风》兼《申报・自由谈》编辑),书记为谢里夫,会计是亨格尔(国际女青年会干事),医药顾问包括哈尔彭(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神经和精神病学教授),凯特(仁济医院医生),委员有丁光训、李卓彧、曾景臣。① 另外,圣约翰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卜其吉(J. H. Pott)也曾参加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开展过一项儿童指导所的实践计划,实施对象是德籍避难儿童和说德语的犹太问题儿童,测查工具为推孟等修订的比奈-西蒙智力测验,完成了德语版和汉语版的修订工作。

1940年之后,战火迫使国立上海医学院学生迁往昆明。哈尔彭受聘于圣约翰大学,并在其医学院建立了神经和精神病学系,在同仁医院设置神经和精神病区。哈尔彭还在世界红卍字会(World Red Swastika Society,佛教

---

① 朱中德.心理卫生促进会[J].西风副刊,1940(25):16-18.

慈善组织)的一所医院创建了神经和精神病区,并任精神病治疗师。1951年,哈尔彭离开了中国前往加拿大。哈尔彭在精神病学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课程设置、医护培训和实践治疗等,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动和开展心理卫生运动,以其为核心人物组织起了一批推动心理卫生运动的中外人士,这些人士来自各个领域,对心理卫生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使得上海成为当时心理卫生运动开展的重镇。

五、韦斯特布鲁克(汪宗海)

韦斯特布鲁克(Charles Hart Westbrook,1886—1970,中文名汪宗海)1912年以传教士身份到中国,在沪江大学讲授英文。此后断断续续有11年时间在中国度过,曾回美国进修并于1920年获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1920年再次来华之后在沪江大学教育系任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1943年12月曾离华返美。1946年再次任教于沪江大学。1948年最后离开中国。1930—1940年,韦斯特布鲁克曾在海内外发表过关于上海青少年学生身体特征及其与智力品质相关性的两篇报告,中国青少年情绪稳定性和中国学生使用英文智力团体测验工作的报告各一篇。由于韦斯特布鲁克是上海心理卫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在海外发表的有关当时上海心理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的文章,保留下了珍贵的史学资料。

抗战爆发初期,日本占领了上海沪江大学的校舍,心理学实验室遭到洗劫,1937—1938年该校普通心理学只能在没有任何实验设施的情况下开展教学。1938年秋天,上海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杭州教会学院开始同沪江大学联合开设一些需要利用实验室和图书资料的课程。同时,中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来华协助教会学校购置仪器或在上海监制。韦斯特布鲁克出任心理学实验室委员会主席,利用所获资金添置心理学仪器。他不仅自海外购置,还到战时躲避起来的小店中购置物件用于心理学实验室用具的制作。直到1943年韦斯特布鲁克离开中国之前,这些设备还在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临时机构中被正常使用。1937—1938年,韦斯特布鲁克每年要给沪江大学80多名学生、杭州教会学院60多名学生、圣约翰大学四五十名学生讲授实验心理学课程。当时这几所教会学校的实验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四门课程联合开设,而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

理学、青年心理学独自开课。韦斯特布鲁克负责沪江大学学生实验心理学方面研究论文的指导工作。

自1935年至1943年,韦斯特布鲁克一直参与哈尔彭开展的心理卫生运动工作,做了许多组织、协调、授课的工作,1940年出任上海心理卫生促进会会长(详见上文)。1943年12月韦斯特布鲁克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此前他曾被日本关押在集中营中达七个月之久。1944年身在美国的韦斯特布鲁克呼吁美国研究机构和学者应当在"二战"结束之后帮助中国重建毁于战火的实验室和图书馆,他自己则肯定会听从这样的召唤。他特别强调科学期刊文献的重要性,希望心理学家能把手里的期刊文献保存好,待战后移交给中国的大学和图书馆,它们对基础科学文献的需求将是巨大的。[①] 1946—1948年韦斯特布鲁克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又一次回到沪江大学任教于教育系,并兼职于外语系。1946年赴华后不久,曾于10月21日发表了介绍美国教育的现状和趋势的演讲。

六、克兰伯格

克兰伯格(Otto Klineberg,1899—1992,旧译柯蓝博),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出生于加拿大。1919年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获得学士学位,192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25年获麦吉尔大学医学学位,192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25—1961年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社会心理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克兰伯格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致力于种族关系、国际关系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1935—1936年,克兰伯格获得跨文化研究的奖励和古根汉基金奖(Gugenheim Fellowship)赴中国从事研究。当时中国心理学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由北平心理学界以聚餐会的形式欢迎和招待克兰伯格。克兰伯格研究的主题是中国人的情绪表达,他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通过考察其文学作品来探讨中国人的情绪表达,而且他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方法。在中国文化中情绪表达注重的是社会接受性,就像中国的《礼记》这样的古典著作规定的那样。另外,克兰伯格还强调中国舞台表演中的情绪表达拥有最为明显的表达模式。他分析了中国的《红楼

---

① Westbrook, C. H. (1944). Note on psychology in occupied Shanghai.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1(5): 304 - 306.

梦》和《水浒传》中的情绪描写，前书是依靠当时燕京大学研究生吴天敏帮助他阅读的，后者是凭借赛珍珠的英文版。克兰伯格既分析了中国情绪表达和美国人的相同之处，也指出了文化差异性。他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情绪表达之后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主人公生气/愤怒（anger）时，往往被描述为会冷笑，或者是一边微笑一边诅咒。美国文化中"微笑的愤怒"（the smile of anger）出现的频率远不如在中国或中国文学中出现的频率高。克兰伯格对此十分不理解，问中国朋友为什么，而中国朋友却反问他为什么欧洲文学作品中女性总是那么容易晕倒。克兰伯格提出这些都是社会风俗所致，使得每个文化中都有其特定的情绪表达特征。最后他还指出，这种利用文学作品研究情绪表达的方法可以推广到研究印度、日本以及近、远东等人群身上，以此进一步探讨情绪表达的文化模式的性质及程度等。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克兰伯格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注意到中国文化情绪表达中存在"辩证情绪"②的现象，并在西方心理学界发表文章，增进了西方心理学界对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现象的理解；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这种利用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中国人情绪表达模式的范式，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

克兰伯格在中国从事研究期间，受到了中国心理学界的款待和协助，因此他深深地喜欢上了中国和中国人，甚至使得当时仅 50 岁的他希望马上退休，以便在中国度过余生。克兰伯格打算改变原有计划，延长一年时间用以继续开展研究，但是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不得不终止计划如期回国。此时他已经学会中国话，能够阅读中文，足以满足个人交往的需要，此时离开中国令克兰伯格深感惋惜。③

1948 年 5 月，克兰伯格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世界心理健康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lth，简称 WFMH），当年 8 月，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人际

---

① Klineberg, O. (1938).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3: 517 - 520.

② Spencer-Rodgers, J., Peng, K., & Wang, L. (2010). Dialecticism and the co-occurr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1: 109 - 115.

③ Klineberg, O. (1974). Otto Klineberg. In G. Lindzey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VI. Century psychology series (pp. 163 - 182). Englewood Cliffs, NJ, US: Prentice-Hall, Inc.

关系在心理卫生中的作用。丁瓒前往参加了这次盛会,并以自己在国内开展的与大会主题相关的工作同各位代表进行交流,与会期间遇到了克兰伯格,此时克兰伯格正主持“文化与品格研究”项目,于是邀请丁瓒将其研究计划纳入他们的研究计划。①

七、莫里

莫里是美国心理学家。191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入英国剑桥大学专攻生物化学,1927 年获博士学位。因在求学期间受弗洛伊德与荣格心理学说的影响,开始转向人格心理学研究。后应哈佛大学之聘,任心理学讲师、临床心理学教授。1935 年莫里还与摩根(Christiana Drummond Morgan, 1897—1967)合作设计了主题统觉测验,旨在了解被试的需要和其他人格倾向。1943 年莫里任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局,到中国领导和主持了伞兵选拔工作。莫里主持伞兵选拔工作的中方负责人是周先庚。在伞兵选拔中主要采用了莫里开创的主题统觉测验技术。莫里还在邱清泉的国民革命军中进行了军官心理测验的演示性测验工作。这些工作在第六章第二节中的“周先庚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与思想”部分已经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八、鲍曼

自从中国心理卫生运动兴起之后,卫生部与国际卫生机构合作聘请了美国精神病学会会长鲍曼博士担任我国精神病学方面的顾问,1947 年 8 月赴南京协助建立国立神经病学研究院,在中国的三个月时间里,鲍曼举行过多次公开演讲,深受欢迎,并赴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访问当地的医校和精神病院。

虽然当时中国精神病学发展相当落后,但是已经出现发展的好势头,医学院校开始积极对待精神病学,中国国民革命军中也接受精神病学,使其成为医学组织部门的一部分,而且还派一名医学官员到美国接受一年的精神病学的训练。当时国立神经病学研究院没有独立的房舍,只得使用国立中央医院的两间活动房。研究院院长是程玉麐,另外还有八名对精神病学训

① 丁瓒.国际心理卫生大会观感[J].西风,1948(112):301,332.

练感兴趣并有良好背景性知识的年轻医生。鲍曼还发现当时金陵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很不错，其中有两名中国人，一位曾经在美国纽约社会工作学院接受过教育，另一名曾在芝加哥大学心理学院学习过，只是他们已经疏于相关领域最新近的发展了，但是这两名心理学者已经被安排去美国进一步接受训练。鲍曼认为，中国医学院校中精神病学的教学由于师资缺乏而严重受阻，应该大力改善这种情况。鲍曼主张发展中国精神病学的计划应该是帮助中国人去帮助自己，而不是派精神病学的专家到中国去教中国人。当然派一两名得力的精神病学家到南京国立神经病学研究院，或北平、上海、广州等地主要的医学院校也是需要的，每个医学院校都派专家去就没有必要了。可能的话，可以派一个人到美国接受五年的训练，或精神病学者、心理学者、护士、社会工作者各两名到美国接受一年的训练，就可以很好地把精神病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带到中国来。[①] 鲍曼为当时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1947 年丁瓒、伍正谊赴美进修与鲍曼的帮助存在关联性。

北平协和医学院曾是我国精神病学发展的重镇。1919 年曾聘伍兹(Andrew H. Woods，1872—1956)为神经学和精神病学教授。1922 年开办精神学和精神病学班，曾训练了多位中国神经科医师。1928 年威利斯(Ernest de Veris)、莎伦邦德(Georg Schaltenbrand，1897 —1979)相继在此任教。1932 年莱曼来此接任教职，后来亚历山大(Leo Alexander，1905 —1985)和肖尔茨(W. Scholz)相继加入，协和医学院神经科在当时相当发达。1939 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瑞士人李欧丽阁(Olga Lee，1901—1990)[②]参加了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脑系科的心理卫生工作和精神分析工作。1941 年 4—6 月李欧丽阁等人在一所私立小学开展了心理卫生实践工作，共进行了 86 人次的学生问诊工作，并以布朗人格测验(Brown Personality Test)进行筛选作为问诊标准。李欧丽阁通过对这些孩子身上的心理困扰，分析指出中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要使孩子能在任何困难环境中把握住自己积极向上的决心。[③]李欧丽阁有多篇文章经翻译后发表在黄嘉音主编的《西风》杂志上，涉及中

① Bowman, K. M. (1948). Psychiatry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5: 70 - 71.

② 李欧丽阁(Rüesh Olga)，瑞士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结识并嫁给了后来成为社会学家的李景汉(1895—1986)，1924 年来到中国，1954 年加入中国籍。李美格."友谊大使"李欧丽阁[M]// 尚恒其.学界宗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70 - 180.

③ Lee O. 心理卫生实验谈[J].陆锡纯，译.西风副刊，1941(39)：106 - 108.

国家庭教育、婚姻、嗜酒、梦、积极心态等主题，其内容多以具体事例和学理分析相结合，能够令读者从中获得启发和心灵抚慰作用。

除了上述这些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到中国讲学、考察和工作之外，一些相关领域的学者，如哲学家、教育家等到中国访问考察，同样起到了促进心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作用。1919 年 4 月，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杜威受邀访问中国，来到上海，前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十一省讲演一百多次，到 1920 年 7 月离开中国。当时杜威主要是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中国开展活动。1922 年 10 月，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偕同夫人乘船抵达上海，其后在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巡回演讲(至 1923 年 6 月)。其讲演稿经由张君劢、瞿世英等翻译和整理出版了《杜里舒演讲录》(1923)。杜里舒曾经在北京大学以“近代心理学之问题”进行了七次演讲，后来在 1923 年 4 月《东方杂志》出版了“杜里舒专号”，发表了张君劢的《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以及杜里舒著《近代心理学中非自觉及不自觉问题》(张君劢译)的译文，该专号的其他一些文章也对杜里舒的心理学观点有所介绍。另外，如前所述有资料显示，格式塔心理学者彼得曼(Bruno Petermann)也曾到过中国，并做了关于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的介绍。[①] 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生理学教授、情绪理论家坎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1871—1945，旧译肯能)于 1935 年到中国讲学，并曾在南京中央医院进行演讲。这些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哲学家、生理学家在中国的交流和活动，要么促进了中国心理学某一领域的发展，要么曾利用中国文化开展了相关的心理学研究，如克兰伯格。虽然这一时期来中国进行交流的西方心理学家并非很多，但是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依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西方心理学家曾经以非心理学家的身份早年到过中国，接触到了中国文化。例如，麦独孤曾经在协助霍斯(Charles Hose，1863—1929)开展婆罗洲宗教文化传播研究期间(1900—1912)在东南亚一带考察时到过中国，最后出版了《婆罗洲的异教部落》(*The Pagan Tribes of Borneo*)一书。[②]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

① Peterman 讲. 德国心理学之最近趋势[J]. 张君劢，译. 姚兆胜，记. 光华月刊，1929(5)：1－6.
② Willam McDougall (1930). In C. Murchison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1, pp. 191－223).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87)1922年在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时候,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到中国参加一个国际基督教学生联谊会,在北京生活了半年时间。罗杰斯称这是一次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经历,这次东方之行使得他开始从思想上独立,这是他从家庭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的关键期,而且在这次旅行中,他感受到"一战"结束四年之后的不同国家学生之间文化的碰撞,并促使他努力超越已有的思维模式,认识到同样真诚和正直的人们却能够信奉不同的死板教义。① 罗杰斯后来还出版了《中国日记》(*The China Diary*)一书。可以说,中国文化成为一些曾到过中国而后来成为心理学家的人的人生经验的一部分。

"二战"期间,大量的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中国,其中包括两位具有精神分析背景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开展了一些精神分析的传播以及临床实践工作。尽管这些工作难以称得上影响深远,但是它们仍然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心理学者在华期间的历史性贡献,是西方心理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互动的一部分。

科布勒(Fritz Kobler,1911—2001),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具有精神分析背景的精神病学家、神经病学家。他的老师之一马尔堡(Otto Marburg,1874—1948)是弗洛伊德的好友。1938年科布勒为躲避纳粹迫害来到中国,曾在四川、南京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讲授精神病学、神经病学课程。1952年他离开中国返回维也纳,后来移居美国。1946年科布勒在上海曾给一对夫妻关系紧张的外国夫妇进行过精神分析,利用女方提供的一个梦分析了她的人格以及潜意识内容。1948年,科布勒还在《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tic Review*)上报告过一例缩阴症(Koro)的精神分析个案,科布勒认为这是中国人中的第一例急性阉割焦虑症(acute castration fear based on superstition),只在中国南部观察得到。该病例是他1941年在广东佛山卫理公会医学院工作期间遇到的。尽管目前还无法获得其他更多的资料,但从以上两则资料可以看得出,科布勒对精神分析是很熟悉的,他很有可能在中国开展过更多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工作。②

---

① Carl Rogers (1967). In E. G. Boring & G. Lindzey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5, pp. 341 - 384).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② Blowers, G. (2009). *Fritz Kobler in China: a Viennese psychiatrist and neurologist'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medical education (1938—195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e 2nd Chinese Psychoanalytic Congress, Shanghai, China, 19 - 20.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施托菲尔(Adolf Josef Storfer,1888—1944)是奥地利犹太人,弗洛伊德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长,兼任《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的副主编。1938 年 12 月 31 日施托菲尔因受迫害而抵达上海。抵达上海后,他曾和高校联系,谋求讲授德语的教职,但是因为抗战形势严峻,高校纷纷迁往内地,因此施托菲尔未能有机会在中国高校中任教使其在大学的讲坛上传播精神分析,实在是一种时代的遗憾。施托菲尔在上海为排解寂寞,身兼社长、主编和作者三职创办了德文报纸《黄报》,在当时影响颇大。他在自己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文章,影响过中国精神病学家和知识分子。①

第二节 沟通东西方的中国心理学家

一、郭任远

郭任远作为一名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对比较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和世界心理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 1921 年,他在美国心理学权威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向心理学界盛行的本能论提出挑战,激起当时有众多心理学家参加的论战,并为其赢得了最初的学术声望。郭任远曾自豪地说:"在 1920 年至 1930 年间,虽然有几篇内容相近的、反对和批评'本能'的论文发表,但是在反对'本能'问题上,我就敢说,我是最先的和最彻底的一个人。""反本能论"的提出,破除了以往将很多行为视为本能而无法开展实验研究的桎梏,为研究一些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郭任远发表的论文也曾得到过华生的指导,②还有学者认为华生是在读了郭任远的文章之后,毅然放弃了他此前关于"本

① Plänkers, T. (2010). Adolf Josef Storfer (1888—1944). Ein Psychoanalytiker im jüdischen Exil Shanghai. Shanghai, Ausstellung und Vortragsreihe des Jewish Refugees Museums und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Shanghai. 引自: Varvin, S. & Gerlach, A.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Interan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8(3): 261-267.

② 郭任远. 归纳推理的实验·注一[M]//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 上海:开明书局,1928: 286.

能的遗传”的见解。①

郭任远回国后在国内期间的学术贡献体现在几个方面：传播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学说，开展了多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如鸟类胚胎研究，发展出了“郭窗”技术，完成了“猫鼠同笼”实验，创办了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心理学家胡寄南、生物学家童第周、生理学家冯德培、神经解剖学家朱鹤年、教育家杨贤江等。复旦大学心理学院的创立和它早期的教学、科研成果被教育界、科学界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史、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可以说，郭任远早年在美国心理学界亮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回国后通过一系列经典而严谨的实验支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原创性地发展出“郭窗”技术，该技术通过其研究报告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比较心理学家雪尼尔拉（Theodore Christian Schneirla，1902—1968）的教科书《动物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Animal Psycholpogy*）自 1935 年出版之后的多个版本中都收录有“郭窗”技术。西方科学界曾一直试图找到如此成功的技术，既能保证胚胎正常发育，又能科学地观察其发育过程，郭任远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西方生物学界的多项研究成果都是以“郭窗”技术为基础而获得的。

郭任远在国内相继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并曾任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校长，但是其因立场、个性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其仕途颇多曲折，最终弃职而去。1936 年郭任远收到业师托尔曼的邀请，再度赴美，并试图寻求学术职位。博士学位的头衔对于此时的郭任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 1923 年因为他不认同答辩委员会对他论文的修改意见，于当年选择放弃了学位。此时托尔曼开始积极活动，最终促成郭任远重新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候选人资格，并被授予博士学位。1937—1940 年，郭任远相继在罗彻斯特大学、耶鲁大学奥斯本动物实验室、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进行胚胎学研究，并赴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开设讲座和开展研究工作。

1936 年 7 月，郭任远与日后成为罗彻斯特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卡迈克尔（Leonard Carmichael，1898—1973）相识并成为好友。卡迈克尔对郭任远

① David Hothersall(2004). *History of Psychology* (Forth Ed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 482.

的学术研究工作一直很欣赏。1937年卡迈克尔邀请郭任远到罗彻斯特大学任教职,部分解决了郭任远的科研经费问题,并向他提供了科研仪器,两人还合作摄制了一部记录活体小鸡胚胎研究的电影资料。也是在卡迈克尔的协助下,郭任远后来申请到耶鲁大学奥斯本动物实验室的研究基金。在耶鲁大学期间,当时盛行的行为发展遵循"考格希顺序"的理论,即考格希(George E. Coghill,1872—1941)提出的,"整体反应"模式先于"部分反应"的发生,例如只有在躯干动作出现后,翅膀的动作才会出现。郭任远认为,这一观点缺乏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忽略了伴随神经元系统改变的生理与新陈代谢的变化,因此他提出全新的"行为梯度"(behavior gradient)概念。在郭任远看来,本能理论与尝试错误学说涉及的概念使人们远离了对行为的正确理解,而行为梯度能够纠正这些误解。

20世纪30年代,郭任远还完成了关于动物争斗(animal fighting)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在当时没有及时发表,而是到了60年代郭任远在香港生活的期间,这组文章才以《动物争斗中基本因素的研究》(*Studies on the basic factors in animal fighting: I - VII*)为题发表在《发生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上,并再次引起学术界对郭任远的关注。

1940年,在当时任复旦大学教员的胡寄南邀请下,郭任远由美国来到重庆,创办了"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在郭任远请求下,卡迈克尔写信给《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和《科学》杂志的编辑介绍该所创办情况。《心理学公报》刊载了郭任远任所长的"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创立的消息,称郭任远为"著名的中国心理学家、实验胚胎学家",由此可以看出郭任远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①]《科学》则报道称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所长郭任远赴美一年,推动中国与美国、英国文化关系的发展。[②]

1941年,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成立后不久,郭任远再次赴美,此行他担负着中国教育部赋予的使命,即与美国大学的校长们取得联络,以便为更多的中国留学生争取经济援助,可以说承担着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卡迈克尔仍然大力协助郭任远在美国与大学校长们进行会晤,但是募得资金并不

① Notes and News (1941).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8(5): 305.
② Scientific Notes and News (1961). *Science*, 93(2420): 470 - 473.

充足。当时卡迈克尔正在主持一项研究，使用问卷量表等工具采集数据，以确定美国人群拥有哪些不同的技能，以及接受技能培训的相对程度如何。他询问郭任远是否有兴趣使用此类工具在中国开展类似的项目。郭任远接受了卡迈克尔的建议，向重庆政府提出了报告申请。这一设想最终成形，即在美国国务院的主持和资助下开展一个名为中美文化合作理事会的计划。但是该项目又因郭任远于 1941 年 9 月赴英访问和交流而搁置。郭任远在美国学术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经常在美国大学中进行演讲，如曾于 1943 年 3 月 31 日在瓦萨大学（Vassar University）进行了"中国人的战争心理学"（The war psychology of Chinese）的演讲。[①] 尽管如此，但是他作为中美之间文化交流大使使命的完成并不理想。郭任远于 1946 年移居香港，此后他几乎没有再继续进行他最早开展的动物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而是转向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性格的相关研究主题。

郭任远在心理学上是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不畏权威，勇于突破已有的条条框框。在生活轨迹上，郭任远总是试图跳出心理学圈子，走向社会甚至走向政治领域。郭任远自从回国后就一直是个"新闻人物"，例如上海的《申报》经常会报道郭任远及其创办的心理学院的事情，郭任远在当时是中国心理学界少有的公众人物式心理学家。同时，他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引起学术圈内学者的关注，即使民众也对其研究主题相当感兴趣，反映出郭任远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着较强的原创性和深刻性，其研究成果能够积极推动一些领域的科学认识和发展。

二、戴秉衡

戴秉衡（1899—1996），1923 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担任中学教师，讲授现代欧洲史、逻辑与心理学导论。圣约翰大学是颜永京曾任教的地方，自颜永京开设心理学（心灵学）课程之后，该校一直有开设心理学课程的传统。

1924 年秋，戴秉衡参与了梁漱溟在山东主持的教育实验。1927 年到上

① Dr. Kuo. Discusses war psychology of Chinese tonight (1943). *Vassar Miscellany News*, March 31.

海从事反烟毒的社会工作。1929年赴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学。他在听过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的"犯罪与人格"课程之后转攻社会学。在帕克指导下,戴秉衡的硕士论文《说呓语》(*Speaking with Tongues or Glossolia*,1932)讨论了宗教狂热分子、灵媒等人会不自主地语无伦次,甚至新创出一套语言的现象。他认为,这种说呓语的现象同生理或心理的病态无关。他在分析了若干说呓语者的"生命史"与"文化模式"之后,提出了一套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个体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其人格是文化影响的产物。"说呓语的行为看似是自动化的,具有潜意识、强制性的特征,但实际上与正常的意识活动没有差别,都衍生自其社会文化。可见,戴秉衡采取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取向,将说呓语与其他社会病态行为(如人格分裂、宗教狂热、犯罪行为与毒瘾)做了某种程度的联结。一般人往往倾向于将这些现象视为精神疾病或脑部缺陷,而戴秉衡将这种所谓的病态看作是个体主观、文化与情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1935年戴秉衡在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1900—1987)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芝加哥的鸦片瘾》(*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英文出版。该研究与其早年从事过反烟毒社会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指出,一般人认为鸦片瘾是东方人特有的"民族恶习",但中国人之所以当时变成嗜食鸦片的民族,并不是因为一些固有的民族特质,而是因为特殊的历史与政治因素,而且涉及文化因素。在戴秉衡的博士论文研究中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源自精神分析的"长期访谈法"(prolonged interview method)。戴秉衡曾经师从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学习过访谈技术,在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萨尔(Leon Saul)的分析,并由精神分析学家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进行督导。①

戴秉衡于1936—1939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脑系科任职,当时脑系科主任是莱曼。1936年戴秉衡在此讲授精神分析课程,这是我国第一次开设这一课程。在协和医学院,戴秉衡主要的工作包括看诊,负责疗养院的精神治疗,为同事与住院医师讲授精神治疗课程,并且为其中少数成员进行短期"训练治疗"。他通过收集与环境及社会因素相关的资料,对特定个案进行

① 王文基."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J].新史学,2006,17(1):91-142.

深入研究，以便评估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反应，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适用度，此外，中国人的象征体系、家庭、政治等对精神的影响也是他关注的主题。受过社会学和精神分析训练的戴秉衡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为分析"神经与精神症人格"，借以发掘"特定文化模式整合进人格结构中的深度"。戴秉衡在当时的很多文章中都反映出精神分析、社会学与当时中国社会之间的碰撞。他指出，保持健康与预防疾病，意味在特定社会与文化环境下保持人格上的完整。真正的问题不是个体本身，而是社会适应问题。戴秉衡借用主要来自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医院内若干病患进行精神分析，力图理解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以及家庭、政治困境下的病理表现。在这些知识关切与社会关切之下，戴秉衡提出一套将当下中国社会现实融入其中的人格与社会互动模式，并以此修正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抗战爆发，北平沦陷一年之后，戴秉衡于1939年再度赴美。他在北平的四年工作经验对他之后的发展影响很大。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仍以北平市立精神病疗养院的资料与病历为研究资料，发表中国文化中人格的相关文章。戴秉衡的学术论文大多数发表在国际上，这也是在国际学术界发表中国精神分析案例的首位华人。

1941年，戴秉衡发表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Personality problems in Chinese culture*)，他从北平市立精神病疗养院1135位患者收集的统计资料中，列出中国患者必须面对的主要社会情境：经济与工作、家庭、学业、社会、婚外情等社会问题。对男性患者而言，养家糊口最为迫切。而大、小家庭环境中的各种问题成为女性主要的痛苦来源。社会因素指的是国内外政治形势，受影响最大的是年轻男性。这包括日军对学生、爱国分子造成心理上与实际上的迫害，国民政府对疑似共产党员的拘捕，以及战争带来的威胁与迫害。①

1943年，戴秉衡与莱曼转至杜克大学任教，莱曼就任精神科主任，戴秉衡担任临床心理师。戴秉衡这段时间以及之后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精神医师与医学生提供临床训练和督导。1944年戴秉衡在沙利文主编的《精神医

① Bingham Dai (1941). Personality problems in Chinese cul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688-696.

学》(*Psychiatry*)杂志上，发表了《战时分裂的忠诚：一例通敌的研究》(*Divided loyalty in war: A study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enemy*)，文中讨论了一个体在适应求生存上最为极端的情况。来自沦陷区的一个曾经的爱国知识青年，因抗日活动而被日军拷打三日，后来叛变到华北的伪政权下工作。1937年7月北平沦陷，两个月之后，这位青年因为被熊爪或人从背后逼迫的强迫意念，以手摸洞或黑点，注视空处的强迫行为，以及心悸、莫名恐惧、呼吸困难等症状而求诊。在长达十个月，总共71次的面谈中，戴秉衡使用自由联想、释梦和转换分析(interpretation of transference)等古典精神分析技术进行治疗，并将病患诊断为"强迫神经症"。戴秉衡分析了这位患者的初级群体环境以及其基本人格结构。患者是个独子，家境殷实，这样的传统家庭背景使得患者自幼备受父母与家族成员宠爱。患者也回溯了若干的童年经验，发现他的强迫行为与早年对母亲及其他女性亲戚的性好奇有关。他对父亲也有性幻想，并有同性恋的倾向与行为。而由于中国文化强调孝顺、友爱，任何对尊长、同辈的敌意都会被压抑，故导致强烈的"被动侵犯性"(passive aggressivity)。该患者的基本人格特质是喜欢当领袖，但一旦有危险就立刻逃跑。这些性格特质也表现在他当下的生活经验之中：其困境之一是究竟要到南方参加抗日运动，还是留在敌人占领下的北平。早年受父母之命而成婚，后来却又与多位女性有染，故时常为责任感及罪恶感所折磨。戴秉衡的分析指出，该患者企图适应当下的社会情境，努力在群体中建构关于自我的概念与意识，并且在社会中找到定位与归属感。然而在此情况下，他早年的基本自我概念已经过时，与当下较为理性的自我概念(爱国心、责任感)产生冲突，进而引发不安全感与焦虑，导致神经症人格的产生。在患者陈述出包括熊掌、女性生殖器、带刺刀的日军、铁刷、日文教师、蜥蜴、墨索里尼的梦境，以及随后戴秉衡对梦进行解释之后，患者的症状逐渐减缓，当分析进行到23次，在莫名的焦虑、欲望以及同性恋式的被动侵犯性的人格结构变成意识之时，患者宣称95%的症状已经消失了。戴秉衡指出，精神分析缓解了患者的焦虑，但无法改变其人格结构。治疗能做的仅是让患者得以在意识层面上处理冲突，他最后达成类似如下妥协：在通敌过程中，他不仅能为沦陷区的同胞尽点心力，也可以在敌人的手下继续进行地下活动。虽然戴秉衡一再强调需要从当下、特殊的社会情境才能理解患者的症

状，即便人格在正常发展过程中有其可塑性，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似乎早已决定了沉浮于动荡时局中全体同胞的命运。相对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驱力概念，戴秉衡始终从意识或者说从社会意识、集体意识为起点，进而思考精神疾病的起因以及中国人格结构的生成。[①] 戴秉衡以中国人进行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性治疗，无疑为国际精神分析学界提供了来自中国人视角的中国文化中的案例，为丰富和发展精神分析理论作出了贡献。

对通敌者（即汉奸）的心理学分析是抗战时期中国心理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如潘菽曾著有《汉奸的心理分析》，[②]文中提到陈剑脩写有一文《汉奸心理的分析》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指出这些人都是心理变态的人。吴南轩以卖国为例，解释"适应"必须适合某一个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生活理想与行为规范："汉奸卖国，国人皆曰可杀，社会理想与规范所不能容恕者也。"[③]戴秉衡则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汉奸者心理与行为进行的剖析。

另外，戴秉衡于1945年曾受邀参加莫里在中国主持的伞兵选拔工作，以其专业知识为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艾伟

艾伟自从1925年留学回国之后，一直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成果。1929年，他作为中国心理学者代表之一参加了在美国耶鲁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积极地与国际心理学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艾伟代表教育部和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出席澳大利亚新教育同志会国际会议。新教育同志会是一个世界性学术机构，由教育态度一致，互相团结的进步人士、教育家和为人父母者组成。该会议主旨是使教育力求进步，使每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国籍、宗教、社会地位都接受相应的教育，以充分地、协调地发展每个人的人格，进而对于社会能够透彻了解并完成其对此的责任。艾伟出席的此次会议主题包括：影响战后教育的主要社会变迁，个人态度及向前展望上的变迁，学校教育及继续教育的实际活动，教育的原则与技术等。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共

① 王文基."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J].新史学，2006,17(1)：91-142.
② 潘菽.汉奸的心理分析[J].新民族，1938(3)：4-10.
③ 吴南轩.广释心理卫生[N].中央日报，1938-12-5.

有16名代表,每位代表在澳大利亚每个主要城市演讲三到五场。

1946年8月27日,艾伟由上海登船赴澳大利亚。行前他准备了两份讲稿——“中国战前战时小学儿童能力测验”和“大学入学在学试验及标准测验三种成绩信度之比较”,在旅途中,他又撰写了一篇“中国科学化教育运动”讲稿。

艾伟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讲是在昆士兰大学作的题为“中国科学化教育运动”的演讲,详细讲述了他在学习心理实验班内进行的各种实验,其中提及国文、英文和代数三种学习心理实验,还谈到了实验与经验的比较。艾伟认为,根据经验办教育如同戴有色眼镜一样,是不可取的。想要让经验合理化,必须有逻辑式的组织和才能,尤其要注重实验。在昆士兰的第二个演讲为“中国战时之教育”,介绍了我国被迫而战的情形,政府应战,学校方面的准备,北方及东部的大学和中学奉令西迁,同时为抢救儿童办理保育院等情况,最后论及了战时的教育统计资料,抗战八年时间里,学校数量、大学生人数、中学数量、中学生人数、小学生人数等的变化。最后还谈了民众教育,抗战之初接受民众教育的人数不过三百万,抗战结束之时增至六千万,文盲的百分比由百分之八十降至百分之六十。

艾伟在悉尼大学作了三次演讲,第一场的题目是“战前战时中国小学儿童能力之测量”,第二场是关于心理实验班的情况,第三场演讲题目是“教育之新趋势”。艾伟除对科学事实做详尽的陈述之外,还提到研究人员郭祖超在1942年赴鄂西举行小学能力测验时,中途遇炸几遭不测,仍奋力保护测卷的事情。中国科学人员的献身、求实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当时的听众。同时,艾伟开办实验学校的做法被在座的国外学者高度评价,被认为由此真正可以做到教育的科学化。

在墨尔本大学,艾伟在文学院演讲“教育测验在中国”,阐述中国测验学史并谈到当前的趋势。另一演讲题为“中国文字及其心理学研究”,艾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长达25年之久,其研究的主旨是澄清国外人的错误观念,即以为中国有多种写作文字。同时对在过去30年时间里从事汉字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非昔日所能比的。艾伟还作了“中国战时教育”的演讲,此后又到文学院演讲了“考政之重要”。这是他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心理实验成果之一,他认为大学入学实验中择题评分不可靠,学生入

学一年后的成绩较为可靠，而且客观性测验尤为可靠。该资料的英文版本曾寄给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主席，得到的回复是此结果与他们研究所得相符合，剑桥大学在当年入学试验中已实施了这一计划。艾伟的演讲得到大会主席的高度评价，称他的报告极有科学根据，想不到英语国家所用的技术竟在中国已大有用处。

艾伟在塔斯马尼亚大学演讲了“中国儿童生活”和“智力学力及体力之相关研究”等数场。到达阿德莱德大学，艾伟撰写的讲稿由科学研究方面转到哲学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兴趣在这方面的听众比较多，另一方面因中国代表只有艾伟一人，除演讲教育科学实验之外，还需照顾到教育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孔孟的教育哲学。于是他撰写了“中国教育与国际了解”一文，先讲述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民众教育，再述及战时教育、儿童教育与善后复员，并重点讲述其中的中国教育哲学思想，让国际了解。他还在塔斯马尼亚师范学院讲演了“中国的小学教育测验”，在广播台录制了“中国的妇女教育”的演讲。

艾伟澳大利亚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铂斯，结束会议在西澳大利亚大学召开。艾伟在这里作了“民主国国民之教育上”和“中国教育之趋势”两场演讲，其中涉及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开始都以为中国人惯用哲学头脑，不知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听了艾伟的演讲之后，他们对中国心理学的进步均表示钦佩。六周会议期间，艾伟旁听了其他与会代表的演讲并记录下来。除演讲之外，艾伟还在澳大利亚参观了若干学校、幼稚园等，与国外教育专家交流经验、互赠资料，收获颇多。会议结束之后，艾伟留在澳大利亚讲学半年。①

尽管艾伟这次赴澳大利亚讲学的主题是教育，但是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仍然在国际教育界展示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尤其是艾伟的心理学的实验班研究，体现出科学取向的教育心理学在中国艰难时期的发展趋势，并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四、汪敬熙

汪敬熙自 1920 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接受心理学与生理学训

① 艾伟. 出席澳洲新教育国际会议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练之后,于1924年曾短暂回国。此后,他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一直处于中国与西方在生理心理学领域交流的前沿,一方面多次赴海外进行考察、合作研究以及参加学术会议,另一方面将其在国内的研究报告在国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起到了学术交流的作用。

1925年,汪敬熙曾返回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继续与里希特合作进行科学研究。1929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帮助下,汪敬熙远赴欧洲,到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一些研究机构进行考察,深入研究心理学在国外发展的情况。这一年8月,汪敬熙还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1930年,汪敬熙等五人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报告了我国心理卫生方面的发展情况。他称,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开始了心理卫生工作,各省份已经设置了一些机构和部分从事这些工作,但是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大多数患者病情相当严重,康复的希望相对较小,这些机构多是以监护为主而不是治疗,或者说防止病情的继续发展。随着预防医学,尤其是心理卫生运动的发展,许多心理治疗机构在中国大城市相继建立,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还是相对太少。自从1928年中国卫生署成立之后,心理卫生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心理卫生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汪敬熙希望在下一次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上,中国心理卫生事业会有更多的内容向国际同行汇报。① 在中国当时还没有成立心理卫生协会这类组织的情况下,汪敬熙一行五人首次与心理卫生运动的国际同行进行了对话和交流,使得国际同行对中国心理卫生运动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4年,汪敬熙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在这里他和助手们自己组装仪器,创建了电生理学实验室,并开展了一系列视觉电生理学的研究工作,成果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这份英文版杂志在当时国际上很有影响,许多研究报告都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1932—1936年心理研究所创办了心理学专刊和丛刊,不定期发行,刊载的文章以英文撰写,其目的主要是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

① Willams, F. E. (1932). *Proced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ntal Hygiene Vol. Two.* New York: Internation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 Inc. ,pp. 94 - 95.

1944年,汪敬熙再一次前往美国,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伍尔西(C. N. Woolsey)合作研究。1945年作为访问教授,汪敬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德特威勒(Detwiler)实验室工作半年。1946年回国代理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1947年回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赴北京大学工作。

1948年汪敬熙因卓越的科学成就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当年,经英国科学家李约瑟(Sir Joseph Needham,1990—1995)的推荐,汪敬熙赴巴黎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替李约瑟担任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这在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整体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由一位中国科学家出任这一职位,具有深远的意义,是中国部分心理学研究成果产生了国际影响最好的例证。

五、周先庚

在1949年之前,周先庚一直与西方心理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共有20多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权威杂志上;曾在1929年第9届、1937年第11届、1948年第12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①] 他也是1945年前后美国心理学会中唯一一名中国的心理学会员。[②]

周先庚于192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在迈尔斯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27年夏天曾参加麦独孤和考夫卡主讲的暑期课程班。美国心理学家沃什伯恩(Ruth Wendell Washburn,1890—1975)曾邀请周先庚把中国心理学界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心理学界。沃什伯恩认为,中国心理学的情况最好直接来自中国专家的介绍,此时周先庚既在国外学习心理学,同时又对中国国内的心理学很熟悉,因此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周先庚给国内的张耀翔写信购买了其主编的中国第一种心理学专业期刊《心理》,以《自1922年以来

---

① 第9届国际心理学会议上周先庚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生身份宣读论文"*Tachistoscope*" *vs.* "*Bradyscope*"一文;第11届国际心理学会议在巴黎召开时,因抗战爆发,交通阻断,周先庚未能亲自赴会,由沈迺璋代为宣读论文 *A modification of Luria's combined motor method for affective reacion ... The method of simiullaneous colunlary maintenance of exposure for reading reaction to be adapted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emotions*。第12届则由陈汉标代为宣读论文 *A system of human motivations: McDougall's 18 instincts in the light of development of motivation theory*。

② 周先庚并不是中国第一位美国心理学会会员,但是别人因未能连续缴纳会费而未被美国心理学会持续收录其名。据查,沈有乾在周先庚之前被收录入过该会名录,这是目前能确定的美国心理学会中第一位中国会员。

中国心理学旨趣的趋势》(*Trend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interests since 1922*)为题向西方心理学界介绍了刊发在《心理》杂志上共分为 21 类的 110 篇论文。[①] 在《中国心理学当前的状况》一文中,周先庚将中国对西方心理学的引介主要概括了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这四个领域,同时他还专门介绍了中国原创性著述,如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郭任远的《人类行为》、陆志韦的《心理学》(当时唯一的高级中学教材)、廖世承的《教育心理学》。[②] 这体现出周先庚对中国心理学自主发展的重视。周先庚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又将国内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的情况介绍到西方心理学界。他提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同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增设了心理学学科,在北平拥有了一群建筑,能够满足现代心理学实验室的需求。[③] 另外,周先庚还在 1927—1928 年度《心理学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杂志上撰写了中国心理学刊物上发表过的 28 篇论文的摘要。这些介绍基本涵盖了中国当时心理学界的研究队伍、研究条件和研究成果,这既代表着当时中国心理学取得的成绩,也展示出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基础。

1928 年上半年这一学期,周先庚选修了"智力测验"(intelligence testing)这门课程,智力测验这门课程由推孟开设,由梅里尔[④](Maud Amanda Merrill, 1888—1978)博士做教授助理(associate professor)。在课上,梅里尔打算让周先庚做一篇"智力测验的理论"的报告,但周先庚认为做一篇关于"心理测验在中国"的报告可能更有意义,而且他自己在关注心理学在当时中国的发展,差不多主要是在教育心理学领域,而在教育心理学中又主要体现在测验工作上。事实上,测验工作在中国标志着心理学研究技术和方法运用达到巅峰,可是心理测验和智力测验历史或相关课程却没有涵盖中国取得的成就。另外,运用心理测验的方法测量个体或群体的能力在中国的历史相当

---

① Chou Siegen K. (1927). Trend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interests since 192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 (3): 487 - 488.

② Chou Siegen K. (1927). The present status of psychology in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4): 664 - 666.

③ Chou Siegen K. (193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2): 372 - 374.

④ 梅里尔,女,1911 年在 Oberlin College 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在 Minnesota Bureau of Research 做 Fred Kuhlmann 的助理。1919 年到斯坦福大学推孟门下攻读学位,1920 年获硕士学位,1923 年获博士学位。1924—1931 年任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助理。自 1919 年到斯坦福大学之后,她一直跟推孟学习和合作进行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的修订工作。

悠久，例如比奈智力测验的一些方法在公元前 260 多年就被中国人使用，有的方法至今还被一些父母用来测量满周岁的孩子的智力，还有一些成就测验至少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后来周先庚就 1923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麦柯尔博士到中国指导测验工作之事在课程班上进行了报告，班上的同学都为麦柯尔取得的成绩所触动。因为当时麦柯尔的工作计划十分庞大，甚至达到“吹牛”的程度了，因此被梅里尔评论为听起来有点乌托邦的感觉。[①] 周先庚认为，麦柯尔作为桑代克的高才生，年仅 37 岁，应该是前途无量。这也反映出周先庚内心对心理测验在中国发展前途的美好憧憬。

1947 年 4 月，周先庚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赴美访学的申请，称“感觉中国心理学之不振，在于科学的心理学之根本不固，故有赴美调查之计划”。[②] 他计划赴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爱荷华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参观考察心理学实验室的情况，研究计划包括皮肤电反射与情绪的关系、肌肉、腺体、眼中的动作电流与心理活动的关系，以及脑电与意识活动的关系。周先庚认为，与其只待在一个地方读书搞研究，不如多走几处，以便了解各种电生理的研究方法，为回国后开展研究做准备。[③] 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 5 月周先庚赴美国休假并进行学术考察。这一次学术交流是 1949 年之前中国心理学家与西方心理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交流。

1947 年 10 月—12 月，周先庚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此时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1904—2001)接替了推孟任心理学系主任，周先庚多次参加希尔加德的学术研讨会。他曾与希尔加德搞了两个条件反射实验，一个是瞳孔反射，另一个是瞬目反射(wink reflex)。在斯坦福大学他看到了斯通(Calvin Perry Stone)关于怀孕白鼠实验性惊厥(experimental convulsion)的实验。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周先庚购买了新出版的两卷本英文版《巴甫洛夫演讲集》带回国。这两卷本著作是巴甫洛夫的美国学生甘特(W. H. Gantt)在 1928 年出版的《条件反射演讲集(第一卷)：高级动物神经活动(行为)的二

---

① 1928 年 3 月 15 日周先庚致艾米(Aimee Ah Fong)信件，收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周先庚档案第 1037 盒“周先庚的英文来往信件”。

② 周先庚致梅贻琦信，1947 年 4 月。

③ 周先庚，撰. 美国援华联合会奖励正教授/研究员赴美进修申请书，1947 - 4 - 9.

十五年客观研究》,1941年出版的《条件反射演讲集(第二卷):条件反射与精神病学》基础上整理而成。这两册书后来成为解放初期周先庚主译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演讲集》的底本。

周先庚1947年11月17日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其标题延续了他在1927年使用过的《中国心理学的当前状况》(*The present status of psychology in China*),其内容是在他1927年和1932年发表的三篇介绍中国心理学状况的文章基础上,对心理学自1910—1947年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介绍,介绍了当时中国心理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北平、南京、上海、广州,介绍了1930—1937年中国的心理学刊物、心理学会组织、心理学会议以及当时活跃着的心理学家,还介绍了心理测验、心理物理学、比较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情况。对1937—1947年的介绍集中在心理学系和研究队伍的瓦解,当时教育部的官方活动,以及工业和军队对心理学的需求,最后周先庚集中介绍了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历史、实验室、设备、职员、毕业生以及学位情况,同时他还介绍了自己以往发表的英文学术成果,以建议制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开展的工业士气研究(industrial morale studies)、心理学的工厂培训课程以及对麦独孤本能论的理论思考,等等。可以说,这是继周先庚在1927—1928年中国心理学界首次介绍到国际心理学界之后,时隔20年又一次向西方心理学界介绍了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情况,尽管这次介绍仅仅是从周先庚个人的视角,但是依然起到了向国际心理学界传递中国心理学声音的作用。

周先庚到美国之后很快与戴秉衡、赵婉和等人取得了联系,后来到杜克大学拜访了戴秉衡,戴秉衡积极安排心理学系的教师与周先庚会晤、交流。

1948年1—3月,周先庚在耶鲁大学进行考察学习。迈尔斯已经离开斯坦福大学任职于耶鲁大学,但是精神状态并不好,并且很快为避寒而去南方了。周先庚在耶鲁大学期间有时跟随迈尔斯的夫人考克斯(Cox)进行问题儿童的指导研究和实习。周先庚还参观了格塞尔的儿童治疗中心(Child Clinic),特别是格塞尔采用的记录婴儿活动的电影设备和技术。1948年二三月间周先庚赴迈尔斯家中拜访。周先庚因情况有变,不得不提前回国,迈尔斯为自己没有在周先庚访学期间提供学术上的帮助而深感难过。

周先庚还同推孟进行了联络,并于1948年1月拜访推孟夫妇。其间周

先庚书信介绍吴天敏将赴美有意翻译推孟的《天才儿童的成长》(*The Gifted Child Grows up*)一书,[①]并诚邀推孟访问中国,推孟回信称很希望在退休之前前往中国访问,但是由于随着天才儿童的成长,后续工作缠身,而且战争也使得出行困难,而无法实现前往中国访问的愿望。[②] 在美期间,周先庚还通过耶鲁大学的波纳姆(P. S. Burnham)拜访了昌西(H. Chauncey)及其研究团队,以考察耶鲁大学的学生咨询与指导工作以及测验工作。波纳姆在引荐信中还称周先庚会有很多挑战性问题与他们进行讨论。[③] 周先庚在美期间通过师友多方收集美国最新出版的心理学著作信息,并购买心理学书籍以准备回国后开展相关研究,其中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还在推孟的介绍下给予周先庚优惠的价格。在耶鲁大学期间,周先庚前往哈佛大学参观了斯金纳的实验室,退休了的波林(Edwin Boring,1886—1968)将周先庚介绍给斯金纳(1929 年两人曾在第 9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见过面),斯金纳还为周先庚演示了"斯金纳箱"的操作。

1948 年 4 月,周先庚到纽约大学格恩创办的"测验与辅导中心"考察学习,主要是向他学习心理、职业、测验、辅导等社会服务的技术与方法,并收集了一些测验样本,准备回国推广学习、能力、智力、品性、职业技能等测验工作。1948 年 5 月,周先庚路过芝加哥大学时顺访在此进修的丁瓒之后,拜访了克莱恩(G. W. Crane)。抗战期间克莱恩曾经应周先庚之请将自己的多部著作寄赠给他。此次拜访时,克莱恩赠送给他一个半游戏半测验性质的测验箱。当月,周先庚回到旧金山市,在鲍曼主持的"波特治疗中心"(Porter Clinic)跟随正在那里学习考察脑电波的伍正谊一起学习脑电波记录一个月。

当然周先庚赴美访学期间不会错过与莫里的会晤。1945 年 8 月中旬,莫里结束了昆明的心理测验工作之后回国。1946 年周先庚请莫里推荐范准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时,与莫里有过书信联络,莫里还曾让周先庚自己列一个心理学书目单,以便寄书给他,供他研究使用。莫里对自己在中国的几个月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感到难以忘怀,曾称"我在中国期间

① 吴天敏赴美因故未能成行。
② To Chou Siegen K. written by Lewis M. Terman dated Jan, 3, 1948 and Feb. 26, 1948.
③ To Henry Chauncey written by Paul S. Burnham dated April 5, 1948.

非常开心”。[①] 周先庚到美国之后很快与莫里取得联系,莫里获知他赴美访学一年的消息之后,写下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

亲爱的周博士:

展信好!我非常高兴获知您已经来到美国,而且要在这里待上一年!这真是太棒了!当然您最先去了您的母校。我希望在那里他们仍然可以教给您一些东西,但是我猜想您也会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他们,等您今冬来东部我们这里访问时,您也会把这些东西教给我们。

我已经在头脑里给您写了很多封信,但我想您不会收到其中任何一封——除非在夜晚的梦境里可能会收到它们——因为这些信件没有一封写到纸上被寄送出去,但当看见活生生的您的时候,我将这些信件从我大脑皮质上刮下来,这样您就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在中国您同我们一起共事,而我又是多么频频想起您和您的学生,我是多么焦急地想知道在眼下这动荡的岁月里,您过得是否安好。

今年冬天的这三个月我会在纽约和波士顿度过,这样我可以很容易地调整我的安排以配合您的计划。届时,我们将有机会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同时,我将聆听您经过推敲之后的更为精细、明晰的计划。

热切盼望您的到访

您真诚的

亨利·A.莫里

周先庚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莫里博士:

收到您 11 月 24 日那封友好、热情洋溢的回信,我高兴得都不知该如何再给您写信了。我的惰性、不主动,或者说停滞不前,暴露的仅仅

① Robinson, F. G. (1992). *Love's Story Told: A Life of Henry A. Murr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283.

是我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前的内心状态，这种状态更多反映的是我们在其中努力挣扎想要战胜克服的客观环境，而不是我的个人人格。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而您知道为什么它对我来说是有待决定的重大问题。

然而，就算只为了您和您的热情，我也必须在纽约和波士顿度过冬天的这几个月，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来讨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了。没错，共同的兴趣，因为我们已经证明我们之间有这样一种东西。我来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而不是教书，您的希望是对的，在这里他们仍旧有东西教给我，他们可以教给我主题统觉测验和罗夏墨迹测验，道奇和赫尔也能教给我一些东西，当然，这是间接的了。当然，我也有许多东西教给他们，但是内容会是“情境心理学”这样典型源自中国的东西，对吧？但中国的“情境心理学”，如果确实有这么一样东西的话，那么它应该在中国情境下进行讲授。您能允许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有机会当场讲授我们自己品牌的心理学吗？

我预计 12 月 28 日左右到纽约。但是您也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对世事过于肯定，情况不会让硬性严格的时间表得以无误奉行，明年五月底我就得回到北平。

期待着拜谒之期的到来，从而读到从您大脑皮质上刮下的那些未曾寄出的信件，当然，我也会以反射性的行为从我自己的大脑皮质上刮下给您的信件。

谨上

周先庚①

这两封充满学术气息又不乏幽默的信件，展示出两位心理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建立的深厚友情，从中可以看到莫里为周先庚身处艰难岁月而时时挂念他是否过得安好，以及周先庚在美国心理学同行心目中的学术地位和受到的尊重，更可以看到周先庚作为中国心理学家的谦逊、自信的精神品

① 莫里和周先庚通信的英文原文参见：Yan, S. C. & Chen, J. (201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nry A. Murray and Siegen K. Chou. *History of Psychology*, 16(3): 212 - 216.

质,以及尤为可贵的开创"中国牌心理学"(Chinese brand of psychology)的本土意识和品牌意识。从莫里的信中可以看到,周先庚此行赴美访学带有许多研究计划和设想,莫里很愿意与其进行深入讨论,助其一臂之力。1948年四五月间,周先庚到莫里家中拜访,随后莫里还带周先庚到书店中购买了一些心理学书籍,其中就包括收录了昆明伞兵选拔、军官心理测验相关数据和资料的那本《人的测量》(*Assessment of Man*)一书。

在这些沟通东西方的中国心理学家中,郭任远的学术研究直接参与到国际心理学的发展进程之中;戴秉衡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开展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实践,为精神分析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文化的研究个案及理论解释;艾伟扎扎实实地在中国开展实践与研究,并与国际教育界、心理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展示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状况;汪敬熙以扎实的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并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先庚参加了多次国际心理学会议,在赴美访学期间与美国心理学家积极沟通和交流,展示出发展"中国牌心理学"的宏大理想,这也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家一代人的学术梦想。

第九章　结　　语

前述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心理学自19世纪中后期输入中国，截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基本情况，下面作一个简要回顾，并展示中国近代心理学(1872—1949)发展历程的启示。

19世纪中期，随着封建帝国王朝国门的打开，以容闳、颜永京等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始进入西方教育体制，接触到西方心理学的早期形态——精神哲学(心灵学)。同时，精神哲学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通过传教士和积极引介西学的国人，以字典、书籍、报刊为载体，逐渐传入中国知识界。这是相对自发的传入、传播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学的学科名称在汉语语境中逐渐被创制新语予以翻译，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种适应性接受过程。早在1872年即有中国人("执权居士")以"心理(学)"命名心理学这门知识体系，这是以"心"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为基础的原创性应用。学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对"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产生与创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执权居士"首创"心理(学)"一词这一史实的发现，将为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梳理这一形塑过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晚清时期西方心理学术语历经丁韪良、颜永京等人的系统创制，完成了这一学科"东渐"的重要一步，不失为其中国化的开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谋求西学强国，转而通过日本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中也包括对心理学的引介。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产生对心理学知识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学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虽然以日本心理学为桥梁引入西方心理学在一段时间之内占相对优势，但这并不是唯一途径，以王国维为代表，同一时期也在从西方国家引入西方心理学。这一时期对心理学的输入途径是多元的，同时也是较为系统主动地学

习、吸收和传播心理学的过程。这一时期,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心理学也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到心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过程之中,同时,心理学知识也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被广泛地运用到其各自关注的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良运动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留学生的大规模派遣,许多留学生在海外开始学习心理学或教育学,接受西方心理学家的专业训练,尤其是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训练,他们大多在导师的指导下做出了重要的学术研究,并成为西方心理学知识界的组成部分,其中以郭任远为代表,其研究直接参与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之中。海外归来的心理学留学生,逐渐成长为中国心理学的专业研究队伍,这些留学生在海外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处于当时心理学的最前沿,而国内教育现状以及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使得他们难以沿着原有的研究路径前进,转而更多地结合中国现实去完成这一代人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中的使命,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国心理学的制度建设、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不是真空状态下的产物,它受到中国近代社会动荡这样大环境的极大影响,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严重打乱和阻碍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中国心理学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和进步,这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或者说是“黄金时代”。从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建,到专业期刊的创办,再到专业领域的开拓,都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不幸的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心理学界的这些良好势头灰飞烟灭。但是,中国心理学家并没有失去对心理学的信念,而是执着地在与战争相关联的领域继续开拓心理学的实践性应用工作,如以萧孝嵘、周先庚为代表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以吴南轩为代表的心理卫生与健康工作。另外,以艾伟为代表的心理学者们仍然坚守着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阵地。在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之后,以潘菽、朱智贤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考心理学的理论问题,开拓出一条心理学研究的新道路。

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既有中国第一代心理学家艰苦卓绝的自主性开拓,也离不开心理学国际传播大背景下西方心理学家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东西方心理学界之间一直存在互动,尤其是科学取向心理

学在中国发展的阶段，多位西方心理学家来中国作学术访问或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其中既有以教育改革为背景的教育与心理测验学家，也有以医学为背景的精神病学家，还有抗战时期运用心理学理论选拔军事人才的心理学家们，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心理学发展的部分动力。同时，多位中国心理学家与西方心理学家或在国外或本土开展合作研究，他们在国际上代表着中国心理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中国心理学家的声音，如郭任远直接参与到行为主义心理学运动之中；戴秉衡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开展的精神分析的工作，展示出中国文化对心理学理论的参照价值。无论是西方心理学家在华工作期间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心理学问题的思考和实践，还是中国心理学家在西方心理学界的直接参与，这种"中国经验"是东西方心理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包含着"西方遇到东方"的问题。中国文化为其创制了带有"心"字的学科名称，那么中国文化又能为西方心理学带去什么呢？或者说，中国文化能够为全人类的心理学带来什么呢？中国早期的心理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价值，并作出了一些草创性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诸如对孔、孟、荀等儒家心理学思想、佛教心理学、《人物志》心理学思想的探讨。心理学如何面对中国文化，将在很长时期之内都是中国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近代心理学家虽身处艰难的社会时空之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心理学的信念和追求，而是致力于心理学在中国社会条件下的实践应用工作，体现出他们在追求心理学与社会的切入点，致力于心理学的探索和应用。每个时代都有心理学参与社会实践的切入点，当代心理学者虽身逢盛世，但是同时也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也许应该汲取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实践精神，致力于心理学在社会中的实践工作，这是心理学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学既可以当做一个职业，也可以作为一种志业。从中国近代许许多多心理学家身上，可以看到以心理学为志业的追求精神。他们从海外归来，在艰苦的社会条件和落后的科学技术手段之下艰难地开拓着中国心理学的疆域，追逐着"中国牌心理学"(Chinese brand of psychology)之梦，这个梦在当代中国仍然需要一代代的心理学者去追逐！

主要参考文献

一、书籍类

灵学略论[M]. 石印本，无出版信息，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 南大百年实录(上、中、下)[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概况[M]. 1946－11(无出版者信息).

艾伟. 出席澳洲新教育国际会议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艾伟. 国语问题[M]. 南京：中华书局，1948.

艾伟. 汉字问题[M]. 上海：中华书局，1949.

艾约瑟，译. 格致总学启蒙[M]. 上海：总税务司，1886.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学生卷)[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 北京辅仁大学校史(1925—1952)[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北京图书馆，编.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蔡元培. 蔡元培选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陈大齐. 迷信与心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2.

陈大齐. 心理学大纲(第13版)[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陈大齐. 哲学概论(第3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0.

陈鹤琴. 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陈榥. 心理易解[M]. 东京：教科书译辑社，1906.

陈立. 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

陈立. 工业心理学概观[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丁韪良. 天道溯原[M]. 上海：美华书馆，1869.

丁韪良. 性学举隅[M]. 上海：美华书馆，1898.

丁瓒. 心理卫生论丛[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佛雏.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服部宇之吉. 心理学讲义(全)[M]. 东京：东亚公司，1905.

高觉敷. 中国心理学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高觉敷. 中国心理学史(第2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高觉敷. 现代心理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高平叔，编. 蔡元培教育论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4—1988.

高平叔. 蔡元培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高时良. 中国教会学校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郭本禹. 中国心理学经典人物及其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郭任远. 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郭一岑. 现代心理学概观[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韩同文. 广文校谱[M]. 青岛：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

胡寄南. 胡寄南心理学论文选(增补本)[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胡适. 治学方法[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黄昌谷，编. 孙中山先生演说集[M]. 上海：民智书局，1926.

黄翼. 儿童心理学[M]. 南京：正中书局，1942.

姜义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荆其诚，傅小兰. 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久保田贞则. 心理教育学[M]. 上海：广智书局，1902.

李心天,汤慈美,编. 丁瓒心理学文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刘毅玮.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科发展史[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罗亨利,瞿昂来,译. 格致小引[M]. 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86.

马西尼.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 黄河清,译.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潘菽,吴绍熙,编. 教育心理学(第2版)[M]. 上海:北新书局,1947.

潘菽. 心理学概论[M]. 北平:北新书局,1929.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清华漫话(二)[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阮镜清. 学习心理学[M]. 桂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

森本藤吉. 大东合邦新义[M]. 陈高第,定校. 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 心理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舒新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第2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孙本文. 社会心理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第2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孙中山. 心理建设[M]. 上海:一心书店,1937.

汤铭新. 儿童行为指导工作[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汤志均. 戊戌变法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汪凤炎.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王国维,译. 心理学(元良勇次郎著)[M]//谢维扬,房鑫亮,编. 王国维全集(第17卷). 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海甫定. 心理学概论(第8版)[M]. 王国维,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王垒,朱滢.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简史(征求意见打印稿). 1998.

王绍曾. 清史稿艺术志拾遗[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王文兵. 丁韪良与中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蔡元培美学文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3.

吴颂皋，胡寄南，黄维荣，译. 郭任远心理学论丛[M]. 上海：开明书局，1928.

西周，述. 百学连环[M]//大久保利谦，编. 西周全集(第四卷). 东京：宗高书房，1981.

西周，译. 心理学(第一卷)[M]. 东京：文部省，1875.

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等.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萧孝嵘. 儿童心理学及其应用[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萧孝嵘. 变态心理学[M]. 南京：正中书局，1934.

萧孝嵘.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 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

萧孝嵘. 人事心理问题[M].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萧孝嵘. 实验儿童心理[M]. 上海：中华书局，1933.

徐步曾. 寻访犹太人：犹太文化精英在上海[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徐维则，编. 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M]//熊月之，编. 晚清新学书目提要.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徐宗泽，编.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阎书昌，周广业. 周先庚文集(第1、2卷)[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颜永京，译. 心灵学(上本)[M]. 上海：益智书会，1889.

史本守. 肄业要览(颜永京，译)[M]//袁俊德，辑. 富强斋丛书续集(第卅册)[M]. 小仓山房校印，1901.

燕国材. 明清心理思想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燕国材. 中国心理学史[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杨鑫辉，赵莉如. 心理学通史(第2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杨鑫辉.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M].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

余凤高. "心理分析"与现代小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袁同礼. 袁同礼著书目汇编[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张德培，编. 心理学论文引得[M]. 北京：文化学社，1935.

张静庐，编.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M]. 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张耀翔,编.心理学论文索引[M].上海：南新书局,1931.

张耀翔,编.心理杂志选存(上、下)[M].上海：中华书局,1932.

张耀翔.心理学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张耀翔.感觉、情绪及其他：心理学文集续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章颐年.心理卫生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长尾槙太郎.心理学讲义[M].蒋维乔,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赵莉如.中国现代心理学的起源和发展[J].心理学动态(专集),1992.

赵元任.赵元任全集(第15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郑小杰,李为.心理卫生概论[M].南京：正中书局,1936.

中国心理学会,编.中国心理学会80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潘菽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周进华.经师人师：陈大齐传[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朱锡侯.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M].朱新地,整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Boring, E. G. & Lindzey, G. (1967) (Eds.).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5).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Brock, A. C. (2006) (Ed.). *Internationalizing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urchison, C. (1930)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1).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Cattell, J. M. (1930) (Ed.).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Proceedings and Papers*. Princeton, NJ: The Psychological Review Company.

Cross, W. L. (1934). *Twenty-Five Years After: Sidelights on the Mental Hygiene Movement and Its Found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Company, Inc.

Fay, J. W. (1939). *American Psychology Before William Jam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Fiske, N. W. (1942). *Outlines of Mental Philosophy or Psychology in a System of Questions*. Amherst: J. S. & C. Adams.

Haven, J. (1858).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Boston: Gould & Lincoln.

Hothersall, D. (2004). *History of Psychology*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Lindzey, G. (1974) (Ed.).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Autobiography* (Vol. 6). Century psychology series. Englewood Cliffs, NJ, US: Prentice-Hall, Inc.

Roback, A. A. (1952). *History of American Psychology*. New York: Library Publishers.

Robinson, F. G. (1992). *Love's Story Told: A Life of Henry A. Murr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iler, R. C. (1935). *Personality and Everyday Behavior*. The San Yu Press.

The OSS Assessment Staff (1948). *Assessment of Man: Selection of Personnel fo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Wang, C. P. (1916). *The General Value of Visual Sense Training in Children*. Warwick & York, Inc.

Willams, F. E. (1932).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ntal Hygiene* (Vol. 2). New York: Internation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 Inc.

Yung, W. (2006). *My life in China and in America*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enry Holt & Company, 1909). Transcribed by Cassandra Bates.

二、论文类

Lee O. 心理卫生实验谈(陆锡纯,译)[J]. 西风副刊,1941(39): 106 - 108.

Peterman. 德国心理学之最近趋势(张君劢,译,姚兆胜,记)[J]. 光华月刊, 1929(5): 1-6.

格致略论[J]. 格致汇编,1877-1(第1年第12卷).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工作[J]. 教育研究,1942(108): 86-88.

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之兴起及其工作[J]. 新世界,1944(12): 55-56.

中华心理学会筹备会[N]. 申报,1931-7-7(第20925号).

第二届中国测验学会年会[N]. 申报,1933-12-29(第21809号).

艾伟. 抗战八年以来的教育心理学[J]. 文化先锋,1946(18/19): 7-17.

艾伟. 写作教育心理研究专辑之前[J]. 教育杂志,1948(4): 1-2.

艾伟. 中国学科心理学之发展[J]. 教育心理研究,1941,1(3): 6-11.

曹日昌. 我国测验运动的回顾与展望[J]. 教育杂志,1940(7): 5-8.

陈大齐. 八十二岁自述[M]//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浙江近代学术名人.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陈大齐. 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J]. 北京大学月刊,1919,1(4): 23-52.

陈大齐. 民族心理学之意义[J]. 北京大学月刊,1919,1(2): 27-33.

陈大齐. 有鬼论成立的一大原因[J]. 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12-1,27.

陈汉标. 苏俄的心理学[J]. 中华教育界,1936,23(10): 11-16.

陈汉标. 中文直读研究的总检讨[J]. 教育杂志,1935,25(10): 53-68.

陈孝禅. 评英文新字辞典的心理学名词[J]. 读书通讯,1948(154): 17-20.

陈仲庚. 心理学系[M]//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程玉麐. 中国驻印远征军之精神病概况[J]. 国防月刊,1948,5(2): 15-23.

崔光辉,郭本禹.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发展史略[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3(2): 1-12.

丁瓒. 国际心理卫生大会观感[J]. 西风,1948(112): 301,332.

董华农. 中国心理卫生导论[J]. 现代医学杂志,1948,4(5): 11-12.

董少新. 从艾儒略《性学觕述》看明末清初西医入华与影响模式[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1): 64-75.

都樾. 丁瓒《达四日记》[J]. 民国档案,2012(4): 21-34.

杜雪娇. 近代国立综合性大学心理学科课程设置研究(清末—1937)[D]. 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2.

儿玉齐二. 第一个将心理学传到中国的颜永京牧师[M]//杨鑫辉. 心理学探新论丛.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41.

儿玉齐二.《奚般氏心理学》之研究(1) [M]//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1982(26)：97－114.

樊际昌. 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学系心理学组概况[J]. 中国心理学报，1936(1)：84－85.

范庭卫. 丁瓒与心理分析的应用[J]. 中华医史杂志，2010(5)：306－310.

范庭卫. 黄翼与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开拓[J]. 心理学报，2009(2)：182－188.

服真士女. 一个古人对"梦的心理"的研究[J]. 新科学，1939(1)：67－74.

龚昊. 传科学的传教士——傅兰雅与中西文化交流[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胡寄南. 动物心理学研究法(上、下)[J]. 出版周刊，1934(113,114)：1－5.

胡寄南. 评非本能论[J]. 民铎，1922,4(3)：4－10.

高君纯. 一位出类拔萃的伟人[M]//夏仁德先生纪念册编辑组，编. 夏仁德在中国.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9－15.

郭一岑. 纪念巴夫洛夫[J]. 教育杂志，1936(6)：1－4.

黄嘉音. 精神健康运动[J]. 西风副刊，1938(1)：40－41.

黄义祥. 著名心理学家汪敬熙教授[M]//李尚德. 凝聚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245－251.

郑晨晓，陈巍. 落花相与恨　到地亦无声：缅怀中国现代生理心理学家朱锡侯[J]. 大众心理学，2015,(8)：47－48.

江川. 艾伟等人的阅读心理研究[J]. 语文教学通讯，2000(10)：12－13.

蒋维乔. 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M]//张静庐，编.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 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蒋维乔. 答汪炳台驳心理学术语解[J]. 教育杂志，1910(5)：5－8.

蒋维乔. 心理学术语解[J]. 教育杂志，1909(13)：1－12.

金钟哲. 西周的启蒙思想与日本近代化[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94－196.

景昌极. 中国心理学大纲[J]. 学衡,1922(8):31-44.

康拉德·雷施格. 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J]. 应用心理学,1996(2):56-60.

李光谟. 李济先生学行纪略(未定稿)[M]//北京大学考古系,编. 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李美格. "友谊大使"李欧丽阁[M]// 尚恒其. 学界宗师.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廖世承. 我的少年时代[J]. 良友,1935(109):12-13.

刘建华. 抗战时期技术工人培训中的职业能力测验[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2):45-46.

马文驹. 清末民初心理学译著出版中的若干问题[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39-46.

倪中方. 湖大心理学最近概况[J]. 湖大季刊,1937(1):132-134.

聂长顺,王淑贞. 近代"心理学"的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M]//冯天瑜. 文化论丛(2012年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87-303.

宁建功. 儒家心理学说史略[J]. 心理建设,1943(5):34-39.

潘菽,陈立,王景和,陈大柔. 威廉·冯特与中国心理学[J]. 心理学报,1980(4):3-12.

沈有乾. 各国心理人才统计[J]. 人文月刊,1931(2).

沈有乾. 心理学人名第三集[J]. 人文月刊,1934(4).

汪敬熙. 答潘菽先生"关于心理学的预言"[J]. 独立评论,1933(49):17-18.

汪敬熙. 中国心理学的将来[J]. 独立评论,1933(40):13-16.

汪敬熙. *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J]. 新潮,1920(4):818-827.

王彩芹. 斯宾塞中译本《肄业要览》译词考[J]. 或问,2011(21):91-116.

王吉民. 中国近代精神病学发展概况[J]. 医史杂志,1953,4(3):127-133.

王剑. 麦柯尔与中国近代教育实验[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328-332.

王文基. "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J]. 新史学,2006(1):91-142.

王文基. 心理的"下层工作":《西风》与1930—1940年代大众心理卫生论述[J]. 科技、医疗与社会,2011(13):15-88.

王扬宗. 赫胥黎《科学导论》的两个中译本[J]. 中国科技史料,2000(3):

207 - 221.

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J].中国科技史料,1991(2):9 - 19.

乌特亨利.治心免病法[M].傅兰雅,译.上海:上海格致书室,1896.

吴南轩.广释心理卫生[N].中央日报,1938 - 12 - 5.

吴南轩.国际心理卫生运动[M]//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编.教育丛刊,1935.

吴南轩.中国心理卫生运动之回顾与前瞻[J].教育通讯,1938(36):12 - 14.

萧孝嵘. 中国心理学会[J].科学大众,1948,4(6):275.

萧孝嵘.军官智慧测验[J].新民族,1938(1):8 - 9.

萧孝嵘.中国人事心理研究社[J].科学大众,1948(9).

萧孝嵘.中国人事心理运动的基础[J].申论,1948(5):3 - 5.

徐儒.人事心理学的发展[J].新中华,1948(1):50 - 52.

徐时中.国防心理发展概观[J].国防月刊,1948(6):16 - 25.

学部编订名词馆,编.心理学名词对照表. 见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13052871/.

阎书昌,陈晶,张红梅.抗战时期周先庚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与思想[J].心理学报,2012(11):1554 - 1562.

阎书昌."心理学"在我国的第一次公开使用[M]//杨鑫辉.心理学探新论丛(2000年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0 - 241.

阎书昌.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J].心理学报,2009(5):464 - 470.

阎书昌.蒋维乔的心理学实践与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8(3):33 - 36.

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䞭良及其《性学举隅》[J].心理学报,2011(1):101 - 110.

燕国材."心理"正名[J].心理科学,1998(1):97 - 101.

杨鑫辉.蔡元培在现代中国心理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与贡献[J].心理科学,1998(4):293 - 296.

张德培.从近四年杂志论文上观察中国心理学的趋势[J].师大月刊,1934(16):135 - 145.

张瑞璠.老子的心理卫生[J].文化先锋,1946,5(16):9 - 12.

张耀翔. 从著述上观察晚近中国心理学之研究[J]. 图书评论,1933(1): 3-7.

张耀翔.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J]. 教育心理研究,1940(3): 16-31.

赵莉如. 有关《心灵学》一书的研究[J]. 心理学报,1983(4): 380-388.

赵以炳. 十年来巴甫洛夫学说在我国的成就[J]. 生物学通报,1959(10): 468-471,475.

赵中亚.《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D]. 上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9.

真实之士. 辨论西教废兴书[N]. 申报,1872-12-5, 3-4.

执权居士. 论西教兴废[N]. 申报, 1872-11-28,2.

职雍.《东方杂志》(1904—1948)所载精神分析文献之研究[J]. 精神分析笔记,2002,夏季刊.

钟年. 反思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轨迹[J]. 心理科学,2008(5): 1181-1184.

钟年.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J]. 心理学报,2008(6): 748-756.

周先庚,陈汉标. 心理学界消息[J]. 中国心理学报,1936(2): 140-166.

周先庚,陈汉标. 中国工业心理学之兴起[J]. 中国心理学报,1936(2): 140-166.

周先庚. 工厂建议制度(上、中、下)[N]. 民国日报,1948-1-24,31: 2-7.

周先庚. 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J]. 测验,1934,3(1): 29-62.

朱中德. 心理卫生促进会[J]. 西风副刊,1940(25): 16-18.

Blowers, G. (2009). *Fritz Kobler in China: A Viennese psychiatrist and neurologist'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medical education (1938—195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e 2nd Chinese Psychoanalytic Congress, Shanghai, China, 19-20.

Blowers, G. H. (2001). To be a big shot or to be shot: Zing-Yang Kuo's other career. *History of Psychology*, 4(4): 367-387.

Blowers, G. H., Cheung, B. T., & Han, R. (2009). Emulation vs. indigenization in the reception of Western psychology in Republica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Chinese psychology journals (1922-193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45(1): 21-33.

Bowman, K. M. (1948). Psychiatry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5: 70 - 71.

Chou Siegen K. (1929). A quadrant tachistoscope for studying the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 178 - 186.

Chou Siegen K. (1929).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2(2): 156 - 177.

Chou Siegen K. (1927). The present status of ssychology in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4): 664 - 666.

Chou Siegen K. (1927). Trends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interests since 192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3): 487 - 488.

Dai Bingham (1941). Personality problems in Chinese cul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688 - 696.

Dai Bingham (1987).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before the Revolution: A letter from Dai Bingham. *Current Issues in Psychoanalytic Practice*, 3(1): 99 - 102.

Garrison, K. C. (1939). 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 (Re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52(3): 501.

Kantor, J. R. (1971). In memoriam: Zing Yang Kuo 1898 - 1979. *Psychological Record*, 21: 361 - 383.

Klineberg, O. (1938).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3: 517 - 520.

Lapointe, F. H. (1970).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term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5(7) : 640 - 646.

List of school and text book (1881). *Chinese Recorder*, 12: 95.

Luh, C. W. & Sailer, R. C. (1933). The self - estim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 245 - 249.

Lyman, R. S. (1937). Psychiatry in China. *Archives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37(4): 765 - 771.

Spencer-Rodgers, J., Peng, K., & Wang, L. (2010). Dialecticism and the co-occurr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1: 109 - 115.

The prepar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books (1880). *Chinese Recorder*, 11: 140.

Varvin, S. & Gerlach, A.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analysis in China. *Interan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8(3): 261 - 267.

Westbrook, C. H. (1944). Note on psychology in occupied Shanghai.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1(5): 304 - 306.

Westbrook, C. H. (1953). Psychiatry and mental hygiene in Shanghai.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0: 301 - 306.

Yan, S. C. & Chen, J. (201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nry A. Murray and Siegen K. Chou. *History of Psychology*, 16(3): 212 - 216.

后　记

1995—1998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师从邹大炎教授研习中国心理学史，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心理学史包括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两大领域，前者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论著的发表出版，都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2000年前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局面有所变化，研究队伍中的中青年教师有的转向心理学的实证科学研究，有的追求研究范式的创新，有的侧重理论心理学的探索，而纯粹的中国心理学史方面的研究似乎也总是受到“冷遇”。我置身于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中，也是倍感迷茫，亦曾试图离开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但是，我仍无法割舍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情怀，视野逐渐地聚焦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这一领域上。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赵莉如、马文驹两位先生贡献最大，其后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以这两位先生的研究为基础，难出其右。我之所以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史发生兴趣，是因为可以做到开展实证性研究，以事实说话，这与当前心理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是相吻合的。说心里话，我当时未敢想系统地开展研究，只是尽自己所能，以各种方式搜集中国近代以来的心理学史学资料，似乎仅仅是为满足我个人考证方面的嗜好，亲眼看到别人没有见到过的史料，我就高兴，拥有别人难以寻觅的史料，我就兴奋不已。回想这么多年来，唯一让我深感遗憾的是，那本我本可收入囊中却失之交臂的服部宇之吉的线装本《心理学讲义》，该线装本大致印行于1902—1903年，是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讲授心理学时早期讲义的一部分。晚清时期至新中国建国前夕的相当一部分心理学文献资料，我都浏览过纸质版或电子版文档，这也奠定了我撰写这本著作的坚实基础。寻访颜永京翻译出版的《心灵学》(线装本，上

本)的经过,可算得上是我苦苦寻觅近代心理学史资料的一个缩影。

赵莉如老师曾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发现了海文著、颜永京译的线装本《心灵学》(上本),并发表了相关著述。我于90年代就阅读到赵莉如老师的文章,当时好想能直接阅读到线装本《心灵学》(上本)进行研究。虽然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可毕竟去一趟国家图书馆摘抄这本书,非一两日之功即可完成,于是我暂时将这一愿望埋藏在心底。

2007年因科研方面的工作,我结识了当时河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的牛焕岐神父,牛神父曾在美国从事神学学习多年,回国时带回来不少英文旧书,我经常在他书橱前驻足翻看。某日,一本 *Mental Philosophy* 突然映入我的眼帘,这本书的名字及其作者怎么让我感到如此熟悉?! 我马上去网络上查找,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它就是海文的原著,颜永京所译《心灵学》(上本)的底本! 这本出版于1857年的英文著作竟然在这里让我遇到了,天下竟然有如此美妙的事情! 牛神父也替我高兴,说:"如果不是你,或许这本书会永远地在这里待着呢。"当时我很激动,马上写下一纸借条提出向牛神父借这本书,并称他永远是这本书的拥有者,但是我要长期借用,什么时候我想还的时候再还给他。如今牛神父已经转赴多地继续从事他的神职工作,*Mental Philosophy* 这本古籍依然静卧在我的书橱内,不过我已经很少翻动它了,因为它的电子版在当下网络时代已经随处可见了。峰回路转又一村。2010年6月,超出许多人想象力的是,我竟然从互联网上购买到线装本《心灵学》(上本),一了我十多年的夙愿! 另外,2010年赴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我曾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寻访颜永京后人的信息,但终因线索不详而未果。

当我在前辈们的基础上,拥有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方面的更多认识之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些个人化的认识报告给心理学界,努力使其成为中国心理学殿堂中的知识。在这样的信念之下,我开始努力写作和发表相关论述,承蒙一些学术期刊厚爱,在美国的《心理学史》(*History of Psychology*)、国内的《心理学报》、《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科技史杂志》、《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上发表了多篇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方面的论文;同时也使得我有机会带上自己的研究报告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与心理学界各位专家进行交流。另外,2009年,我申报的一项中国

近代心理学史研究课题忝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的资助。这一资助对维系我对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热情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必须承认,我这部著作的完成,得益于当下的网络时代。早些年我个人多致力于收集纸质本近代心理学文献,仅靠这种方法来完成一部心理学史专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也让我感叹当年赵莉如老师开拓这一领域经历的艰辛并心存敬意。随着晚清以来文献资料数字化工作的广泛开展,大量文献都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诸如《教会新报》、《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申报》、《新民丛报》等,国外英文文献的获取也很方便,尤其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很多文献版权保护期已过,往往都可以开放获取。

我在本书的撰写中也利用了档案文献法,即大量使用了周先庚先生保留下来的个人档案资料。2009年我从网络上购买到美国心理学家莫里写给周先庚的一封信,信件的背面附有周先庚的回信。莫里在信中写了一句话:"我是多么感激您同我们在中国一起共事,我是多么频繁地想起您和您的学生们(How much I appreciated your working with us in China and how often I have thought of you and your students)","in China"一语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来过中国。自此,我就开始了对周先庚的相关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周先庚的儿子周广业教授的大力支持,使得我有幸亲眼看到周先庚生前保留下来的几乎全部档案资料,同时使得我有机会从周先庚身上了解到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相关研究的推动下,周先庚作为目前唯一一位心理学家入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等12个部门和单位共同组织实施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档案资料将作为见证着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的历史文献向世人开放,供学界研究使用。

我在本书中采取了交流与互动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晚清时期自然不用过多强调,传教士来华传教,颜永京留学归来传播心理学,西方心理学知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等均体现得很明显。民国以降,研习心理学的留学生回国后发展中国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家来华工作或从事研究,中国心理学家在海外的工作、科研和宣传中国心理学,等等,这种交流与互动一直伴随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本书还收录了一些我多方搜集到的图像资料，有的来自心理学家周先庚、戴秉衡的子女们保存的私家相册，有的取自《心理》、《教育杂志》、《心理季刊》等杂志，有的则取自网络。这些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方面的图像资料不仅仅能增加史学形象、生动的一面，同时，这些图像资料包含的许多信息将来也应该成为研究内容。

能在中国心理学史这条研究道路上走到今天，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邹大炎教授，是他引领我走进了这个研究领域。多年来，邹先生一直慈父般地鼓励我、支持我的学业和工作。邹先生校读了我这部著作的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赐序一篇。78 岁高龄的邹先生曾为校读我的书稿到深夜，我无以报答恩师的大爱，唯有继续努力前进！赵莉如先生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方面的几部著作一直是我多年的重要参考著作，2013 年 10 月 26 日我有幸登门拜访赵先生，目睹了她积累多年的珍贵文献资料，并获赠线装本《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的封面复印件。赵先生的耳提面命将不断激励我前进！

2011 年我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汪凤炎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汪教授对我鼓励有加，多次关心我著作的进展情况。我在本著作中对他的大作多有借鉴，在此深表感谢！郭本禹教授长于西方心理学史，近年来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也颇有研究，对我撰写这样一本著作给予了很多关心和支持。刘昌教授长于认知科学研究，同时又是很诗性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家的其人、其文、其事一直很关注，对我的著述甚为关心和支持。在南京师范大学期间，我与崔光辉博士、陈巍博士就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有过多次有益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感谢清华大学周广业教授提供给我丰富的周先庚个人档案资料；感谢戴秉衡的女儿戴美玲(Meiling Dai)女士提供并授权我使用一张中美军事心理测验成员在昆明的合影照片；感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晶博士多年来同我真诚的合作以及知识上的交流；感谢台湾的陈祥美博士帮我搜寻在大陆难以查找到的资料；感谢武汉大学的聂长顺教授，他很慷慨地赠我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文献线索，并为我解读过许多日文文献；我的大学同学、同事董存梅博士也在日文文献方面给我提供不少帮助，袁立壮副教授给我提供图片制作方面的许多技术支持，深表感谢！

感谢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鲁忠义教授、薛彦华教授多年来对我研究

工作的理解，支持我在当下相当不“时髦”的研究方向上孑然前行。感谢曾经在河北师范大学或工作或学习过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诲、指导和帮助。感谢吴艳红教授帮助我联系上了周广业教授，让我有机会获得周先庚个人的资料。感谢赵旭东教授多年来对我的提携。1995 年我刚入学读研的一个晚上，第一次结识了这位大师兄(其实早在 1992 年我曾以被试的身份参加过他的心理学实验)，当时我把他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谈的一些看法记录在日记中。每当看到我取得一点成绩时，他都会告诫我要继续努力。2006—2007 年，在罗劲教授资助下，我得到去他课题组访学的机会，此次访学让我“顿悟”到了心理学实验研究的魅力！他鼓励我坚持走心理学史研究的道路，因为史学研究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是无法替代、不可或缺的。

我要深深地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父亲若在世，或许还能读一读儿子笔下的文字。母亲不识字，经常见我伏案写字，曾不解地问我每天写的是什么，怎么也没个完啊，我告诉母亲，我写字就和当年的您，以及许许多多的农民在地里种下一粒粒种子一样，都是在“种地”！感谢妻子李艳丽和儿子阎拓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在我学术发展深陷困顿或忙于写作而无暇顾及家庭事务之时。

以上既是我自研习中国心理学史以来的个人心理历程，也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在我这样一个普通研究者身上的体现和反映，如果能的话。

本书的撰写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09YJCXLX006)的资助；承蒙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编辑谢冬华先生的辛勤工作，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师长、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另外，限于作者的能力和水平，书中难免有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专家与同仁不吝赐教、指正。

阎书昌
2015 年 7 月 19 日
定稿于问石斋